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外交学


eBOOK
网络资料 非精英

几点说明

关于写作本书，略作几点说明。

一、出于责任感。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周恩来终其一生未能目睹这样一部著作问世，实在是一件憾事。

作者自1950年进入外交部至离职休养，前后从事外交工作历时38个春秋。由于工作关系，受过周恩来耳提面命者有之，耳濡目染者尤多，而对他老人家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了解，在他生前，仍属点点滴滴，看不出全貌全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诗集》23），道出其中部分原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的认识水平有限。

1989年3月，作者应命参加外交部举办的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为了准备论文，再次迈进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与以往只调阅某种案件的档案不同，这次系统查阅一个专题的全部档案。本书附录关于中巴关系的文章就是根据档案和作者经办的情况写就的。作者在文中引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颜回对乃师孔子的敬仰之词，见《论语·子罕》）来表述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博大精深，也是对周恩来作为政治家与外交家之伟大的写照。借助外交档案写一部周恩来外交学的动机于焉萌发。

将新中国的外交作为一门学问对待，原是周恩来的要求。而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是周恩来，他既是决策人、指挥者，又是实践家，新中国的外交在周恩来生前与身后都带有强烈的周恩来特色，因此将本书定名《周恩来外交学》是适当的。然而当时要写这样一本书，难度很大，主要是资料不足。周恩来的外交活动，见诸报端者并不少，未公开的档案则浩如烟海，远非个人一时所能穷尽。作者曾建议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现并入政策研究室）将一般的或已过时的机密档案向社会开放，以利于学术研究。事实上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已陆续编印一些回忆录和编年史之类的出版物，受到社会上的重视。本书有关周恩来外交活动的史料就是根据公开发表的档案写成的，尽管目前已公开的有关档案仅占全部档案的极小部分。

周恩来逝世后，怀念和研究周恩来这一世纪伟人一度形成热潮。各种回忆录和专著纷纷出台。国外的有关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成立了周恩来研究室，汇编出版了许多极有价值的书籍。各种研讨会的文集也接连出笼。这给作者以很大鼓舞。1994年初拙著《春秋战国外交群星》出版后，作者乃得以全力投入本书的写作，历时三年三易其稿才勉强完成，终于圆了个人宿愿。编写这样一部专著，虽说责无旁贷，但距离“科学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门学问的要求，还很远很远。

二、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必须明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的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建国后 25 年的时间内。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1)新中国由初步建立到暂具规模，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始终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创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2)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长期采取敌视中国的遏制、封锁政策，蓄意阻挠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而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在国际上进行的分裂活动，更使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异常激烈复杂。这是中国外交所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3)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日趋崩溃瓦解。然而霸权主义却仍图借机控制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国际平等、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紧张尖锐，错综复杂。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斗争也异常激烈。(4)战争威胁严重存在。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地区冲突、外来武装干涉从未间断。中国本身就数次遭到军事威胁，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中苏边境冲突，以及大国的军事压力等，一直存在。中国周边也爆发过地区冲突。争取国际和平的工作极为艰巨。(5)进入 7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际环境根本改善。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开展外交工作，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周恩来在他外交生涯的最后岁月，曾对此作出新的探索。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正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反映。——

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可以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上述建国初期面临的外交任务，大多已胜利完成。然而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美国仍然以变相的形式对我国进行遏制；国际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引起的新问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肆虐，世界仍不得安宁；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制度的改变；再加上地区性战乱频仍；外层空间的争夺加剧；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反毒品斗争的国际化；人口增长的压力；南北经济差距的扩大，等等，使中国的外交又面临更大的挑战。充分发掘和利用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这座丰富的宝库，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更加自觉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进而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开拓创新，仍然是当前外交工作的需要。——

三、外交是一门多学科的学问。

从一个学科的要求阐述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必然涉及古今中外有关的历史、文化、思想与实践，进行纵向剖析和横向联系，对周恩来外交作多角度的透视与观察，并提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可以强化和深化对周恩来外交的全面理解。

本书不采取西方外交学教科书通常不涉及外交政策与外交思想的写法，而是以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为主轴进行立体式的、有层次的综合论证。作为一部外交学，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对从事国际交往的外事工作

者有所裨益，对读者了解周恩来的外交艺术有所帮助，对大专院校讲授国际政治学有所参考，对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有所取舍。限于水平和能力，作者对已出版的有关著作不仅未能尽览，即使对手头上的材料也难免挂一漏万，谬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如蒙批评指教，使本书有机会重印时得以订正，则受惠者当不限于作者个人也。

四、本书引用材料繁多，大体可分四类。

第一类是周恩来的言论，不论直接间接援引，均郑重注明出处。演义小说铺张周恩来的言行，因不知虚实，不敢引用。凡与史实不符的重大事例，虽耸人听闻，亦不引用。例如1950年中苏缔约谈判，据说斯大林认为毛泽东不在行，要求调周恩来来谈。这种说法国内外流传甚广。事实上中苏应缔订新约废弃旧约，建国前夕刘少奇秘访莫斯科时已与苏方谈过。毛泽东先行，周恩来随后，也是党中央早已确定的。再如尼克松首次访华到上海时，尼克松一行被安排住在著名的锦江饭店，只有国务卿罗杰斯等人住在第13层楼。西方人对“13”这个数字是很忌讳的。周恩来看出罗杰斯面有难色，便解释说：中国人不信邪，有句成语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言外之意是，只要阁下不干坏事，住13层又何妨！——这个胡编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广为引用。殊不知，解放前由洋人经营的锦江饭店12层之上为14层，根本就没有13层，足见编造者之无知与轻率。这类编造的事例，以讹传讹，歪曲史实，更不足取。

另一类是引用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不只是对其劳动业绩的尊重，尚可弥补作者一时研究所不及。如本文引述关于建国初期的外交课题的论据，虽未公开发表、亦均注明出处、以示不掠人之美，并对本人和读者负责。

第三类是引用一些有参考意义的评论。

还有一类是征引中国古籍和成语。有些成语是周恩来援引的，注明出处，便于读者了解周恩来熟读过的古籍。有的成语虽属人所共知，加注出处，有助于熟悉成语来历及其背景，从而增进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了解。这一类引用都在文中括弧注明出处。

以上各种引文，除文中注明者外，都作为脚注。为节省篇幅且便于查索，脚注只注明作者、文章和所载书刊及页码，重复出现者则予简化；出版单位和年份均见附录《引用书目》。

五、本书作为周恩来诞辰百周年(1898—1998)献礼，所附相片为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时作者在驻印度大使馆院内摄下的勃勃英姿，为国内所仅见。

最后，谨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陈尺楼图书馆和中央党校图书馆为借阅图书所提供的支持，外交学院图书馆在查索报刊方面所给予的方便，中央党校出版社在审阅、编辑和出版本书上所惠予的鼎力襄助，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作者忘言交周寿显自大洋彼岸寄来美国新出版而在国内一时难以看到又富有研究价值的图书，则非一声谢谢所能尽意。

作者 1997 年春于北京耳山坳

内容简介

建立新中国自己的外交学是周恩来生前的要求。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根据在外交部工作数十年的亲身经历，系统地阐述了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在各个领域的生动事例，并将其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理论概括。这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有助于了解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方方面面和这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以及它在世界外交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是从事对外活动，从事国际政治教学一部必要的参考书。

周恩来外交学

第一章 何谓周恩来外交学

什么是外交学？

在阐述什么叫做周恩来外交学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什么叫做外交学。外交学是一门多学科的庞杂的学问，除直接涉及外交历史、理论、政策和国际法，还涉及国际关系学、文史哲等广泛领域。它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学科。国际政治不等于外交，但离不开外交；外交是国际政治的重要部分。上述各个领域都可以成为单独的学科。

外交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1)从法律的、逻辑的角度看，外交学属于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外交作为一种制度，有一系列国际法规、成规或惯例保证外交职能的行使。(2)从经验的、实用的角度看，外交学是研究国际关系实践的技巧与艺术，是外交家、政治家的外交经验的总结与升华。(3)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考察外交方法的演变及当代外交的特点。¹总而言之，外交科学即为研究国际行为之因果关系，及解决国际问题之基本原则的学问。

综合中外学者 20 世纪以来关于外交学对象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三派意见：一派强调研究外交技术；一派强调研究外交理论和原理；还有一派主张学理与实务并重。30 年代我国学者顾少川、刘达人属于这一派。顾少川认为，“无外交学则不能有外交术，学理与技术盖外交前进之双轮”。

我国外交学的建设亦应学理与实务并举。外交学所研究的对象应是一国外交的机构根据其本国的外交政策从事对外交涉、活动、手段和程序的综合。它们应有如下层次：一、外交的本质；二、外交的形式；三、外交机构的活动；四、外交的规则与程序；五、外交的技术与技巧。

外交学的科学体系可安排如下：一、外交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级本质国家的外交的特点；三、外交政策与策略；四、外交机关与外交行政；五、外交谈判的程序与技巧；六、外交礼仪与外交礼节；七、外交文书与外交语言和用语；八、国际会议和多边外交；九、二次大战后外交新现象和新特点；十、外交典型案例举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重在阐明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总结我国外交的实践经验。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以中国的外交实践为基础，以总结我国的外交经验为主。二是以中国的外交原则为指导，着重阐明我国所主张的

¹ 张厉厉等：《现代国际关系学》第 84—85 页。

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第 15 页。

《外交科学概论》序言。

王德仁：《建立中国化的外文学刍议》，《外交学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

外交原则。

乔冠华(1913—1983)离职后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不幸未能如愿。他认为新中国的全部外交是为了实现如下战略目标:一、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二、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三、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繁荣富强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他的这些想法实际上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部分概括,也可以作为新中国外交学的研究对象。

外交目标与政策,因时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我国春秋时期,规定外交“为四国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国语·鲁语上》)。这是对西周的“以嘉礼亲万民,以脉之礼亲兄弟之国,以庆贺之礼亲异姓之国……以丧礼哀死亡……以吊礼哀祸灾,以礼哀围攻,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周礼·春官·大宗伯》)也就是“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左传·文公十五年》)的引伸和发展。

印度古籍《政事论》指出封建时代的外交政策包括六个方面:和平、战争、保持中立、备战、联盟和离间敌人。外交的目的是通过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策取得的。《政事论》还阐述了外交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是“与国—敌国—中立国的组合”的论点。《印度政制史》详细列举了国王制定政策的程序。

现代西方学者有的认为,外交的基本任务有四:一、根据本国现有的和潜在的力量决定外交目标;二、估计其他国家的目标及其追求目标可资利用的、现有的和潜在的实力;三、弄清本国目标与对方目标可以相容的程度;四、确定实现本国目标的适当手段。这四大职能是互相联系的。有的认为:一、为了国家安全;二、避免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三、使当权者继续当权;四、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和威信;五、追求国家的经济利益;六、促进多边国际合作。

只有新中国的外交,不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也照顾了对方的利益,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一般外交定义

谢鹏:《国家主权原则是外交学的基本原则》,同上引。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253页。

潘尼迦:《外交原则与实践》第8页。

《印度古代外交》,转引自《国外外交学》第323页。

《印度政制史》英文版第30—31页。

汉斯·摩根索:《列国政治》英文版第78页。

查尔斯·约斯特:《外交行为的正当和不当》第21—23页。

国家的阶级属性和时代背景决定外交的定义，故外交定义因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异，即使是同一阶级属性和同一时代的国家，外交定义也人言言殊。

中外学者和辞书对当代外交所下的定义可以列出上百条，这里只举出有代表性的几条。

西方外交学的经典著作《外交实践指南》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处理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他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该书还援引了几位西方著名学者所下的外交定义。

《牛津英语辞典》的《外交》条目说：“通过谈判处理国际关系；由大使和使节们调整和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外交官的业务和艺术，处理国际交往或谈判的技能或谈吐。”

美国《韦伯斯特英语辞典》大百科全书版的定义为：“由国家首脑直接或通过委派的代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驾驭国际谈判的艺术；从事这种谈判的技巧。”

法国学者则说：“广义的外交是关于对外关系或外交事务的科学。在更确切的意义上，外交是谈判科学和艺术。”

潘尼迦认为，“用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外交是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推进本国利益的艺术”。

苏联《外交辞典》的解释是：“外交是各国首脑，政府和专门涉外机构所进行的活动，旨在通过谈判、文书往来和其他手段来实行由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对外政策方面的目标和任务，以及捍卫该国在国外的权利和利益。”

台湾出版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则说，外交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有时被用来指谈判。谈判的进程或外交机构”；又说“外交为学与术”，是“国家代表谈判之学与术，以处理对外之关系”，而且“无学则不得言术”。

我国《辞海》(1979年修订版)认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书、缔结和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行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10年后出版的《汉语大辞典》则简略地声称，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外国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我国外交学院从事外交研究的教授参照种种说法，归纳为如下定义：“外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英文版第1页。

《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潘尼迦：《外交原则与实践》第71页。

交是主权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官方行为，是一国捍卫本国利益和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外交采用的是和平方式，主要是谈判和不同形式的对话，包括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从事外交活动的不仅是专职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还包括国家和政府首脑多种方式的直接参与；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关系的科学、艺术和技巧。”

另一名教授分析了新中国外交三要素——意图、行动、形式后，对外交定义作如下概括：“外交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部门和官员，为了执行一定的对外政策，向有关外国和国际组织，从政治上对有关问题表明情况，表明态度和传递信息的一种非军事的行为和姿态，以及因此而构成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其状况。”

简要地说，外交一般指的是国家的政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同外界打交道时的政治。外交的实质是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行为。

外交行为多达 22 种类型：让步、批评、协商、赞同、许诺、授予、报答、同意、请求、建议、拒绝、谴责、抗议、否决、要求、警告、威胁、示威、关系降格、驱逐、剥夺、强迫，等等。

周恩来外交定义

周恩来生前未及为他终生从事的外交下过完整的定义。他在许多场合谈过什么是外交，而且从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中，也不难理解他心目中的外交指的是什么。

外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个是依靠谁，一个是同什么人打交道。周恩来说：“国家这个统治武器……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这就是说，外交依靠的是本国的力量。但不能因此笼统地说弱国无外交，古今中外都不乏“弱国”外交办得很出色的事例。这里所指的力量，不只是物质上的，也包含精神上即道义上的力量，而道义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物质的力量。中国的历史证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民族，其文明程度和文化(包括科技)普及率，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周恩来回答说：“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

黄金祺：《什么是外交？》第 6 页。

谢益显：《外交智慧与谋略》第 163 页。

陈乐民、周荣耀：《西方外交思想史》第 2 页。

谢鹏，《试析周恩来外交思想》，外交学院 1990 年 12 月学习《周恩来外交文选》研讨会论文。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 页。

民，这是辩证的。”可见外交是代表本国去同对方所代表的国家打交道，外交的对象是国家，也就是一国的政府。正因为外交的落脚点在于影响和争取人民，新中国的外交除了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有民间外交这一重要的方面。这是已往的外交学者从未阐明的论点，是新中国外交一个重要的领域。

周恩来经常就外交与内政的关系讲解说，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就是要争取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内政和外交相辅相成，目标一致，互相促进。

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的延续，并服从和服务于它的国内政策；它必须以我国国内工作为基础，为加强和巩固国力服务；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除国内一切条件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我们在外交上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为我国保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

国家是分门别类的。就政制而言，有王国、君主立宪国家、议会制国家、中立国家。就社会性质而言，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就对外政策而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强权政治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时代及其后期，有殖民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宗主国、被保护国、附属国、托管地、等等。就地理条件而言，有大陆国家、内陆国家、沿海国家、群岛国家、城市国家，等等。国家如此众多，门类如此庞杂，在外交上就产生一个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的问题。周恩来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两个方面“都通过外交形式表现。……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对某些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他又说：“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我们在外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因此，无论是联合还是斗争，都有一个如何联合和如何斗争的问题。所以说“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

联合和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周恩来说：“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的时候，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用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对外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人民，反对敌视我们的国家。”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指出：条约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2 页。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313 页。

《张闻天传》第 639 页。

《周恩来外文文选》第 2、7、2—3、4、4、2、11、15 页。

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反对与日本勾结的美国，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这两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__又说：“没有力量就不能保卫和平，而争取和平的运动也是为着增强保卫和平的力量，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从外交上说也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争取和平，使各国人民觉醒，另一方面也要预防和抵抗战争，不能高枕无忧。……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尤其是出国的同志，头脑必须灵敏些。到国外去要做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的工作，揭露帝国主义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诡计。这种在国外的工作，就是一种触角。”__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周恩来指出：当年“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1972年以后，中国差不多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关系都纳入了正常化的轨道，敌友的概念不同了，然而周恩来所阐明的原理、原则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那么，就处理国际关系而言，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利益和保卫世界和平呢？周恩来在1953年底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绳。1954年5月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__他又说：“我们认为，只有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__

这样，关于外交工作的任务、性质、意义、要求和原则，周恩来基本上都说到了。以此为准，似可将周恩来外交定义作如下概括：外交不是为了损人利己，而是为了增进友好与合作，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是大小、强弱、贫富国家之间和国家与地区之间平等的文明的交往；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维护国际正常秩序；是贯彻对外政策的官方手段；除了通过外交渠道，还可以进行民间交往以影响和争取人民。自然，周恩来外交的方式也包括国家通过其代表就双边或多边问题同有关国家的相应官员进行会晤、磋商、谈判，参加国际会议，并就达成的协议签署文件或缔结条约。

周恩来外交的定义，可以说是对古今中外外交实践的正面总结，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的体现。

至于周恩来外交学，本书所论述的，主要是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在许多重要领域的表现，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不涉及其他方面的一般论述。

外交内容与形式的新发展

自有外交以来，外交内容、方法和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

国际社会的扩大，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创新，国家之间互相依存关系的深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等主要因素造成的。

1919年以前，只有16个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其中15个在欧洲。1919年之后，增至47个国家，其中22个属于欧洲国家。1949年联合国成员多达60个国家，主要来自亚洲。到本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的会员国已达185个，遍布世界五大洲。

我国清朝末年，常驻北京的外国使团不过12个国家。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外国使团的成员也没有超过这个数字。新中国成立头一个10年，常驻北京的外国使节已达32名；到60年代，这个数字增至50；70年代建交的国家猛增至120个；到90年代中期，建交国家已达163个。这时常驻北京的外国使馆120多个，是清朝末年的10倍。这是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反映。

西方学者认为，二战后新型外交的发展，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国际社会与外交活动领域成倍扩大。……外交联系与外交谈判的范围是空前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性质的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超级大国与微型小国都要发生联系。

二、外交所涉及的与各国利益攸关的事务成倍扩大，外交联系的实际程度也在加深。当代外交除了和平解决争端，处理领土边界、商业与贸易、移民与国籍等问题外，还要涉及从政治、军事结盟到核废料处理；从外层空间、海底资源管辖权到大气污染；从裁军到科技术语命名等一系列事务。这导致更多的非职业外交官的技术专家从事外交事务。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减少了外交联系的时空限制。这使各国政府可进行长距离的对话与协商。在谈判过程中谈判者可直接与本国政策制订者取得联系。高速旅行穿梭，直跨区域联络，大大便利了重要的外交活动。

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外交越来越引起民众的关注，公众舆论介入外交事务，对各种级别的谈判和谈判各阶段的干扰，改变了传统外交的精神与特点。当代的谈判者往往要担任双重的角色，他必须同时对付他的谈判对手和他本国的公众舆论，外交谈判的结果不仅是谈判双方的妥协，而且要与本国舆论相容。

四、外交进入多边主义时代。伴随着世界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出现了全球的、区域的、跨国的外交机构和非国家的国际行为主体。外交官的责任不仅是要代表本国利益，而且要引导公众舆论接受国际政治相互依存的现实；外交的决议不仅限于国家双边谈判，而且还通过国际会议公开讨论，通过民主化的表决程序作出决定。

五、政府首脑直接介入和干预外交政策的制订和谈判。最高级外交的广

《外交原则与实践》第86页。

《当代中国外交》附录二。

泛实践，打破了传统外交的许多惯例与原则。特别是东西方首脑外交成为当代外交中极富戏剧性的实践。

总之，多边国际会议的普及；最高级会议即所谓“高峰会议”，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外交在各国外交活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外交人员队伍的扩大，除职业外交官外，更多的部门行政首脑与业务专家直接参与外交谈判；经济、文化与外交相互影响和渗透，是二战后新外交的主要特点。

然而主张传统外交的学者则认为多边外交是多边的，但不是外交的，摩根索讥之为“多数人决定的恶习”，尼科松贬之为“推理的谬误”。另一些人指出、多边外交往往会因在程序问题上的争执而影响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有争端国家之间的问题主要靠双边的协商，不应在多边的场合争执不休而加剧分歧，等等。

多边外交已成为现实，它大大扩大了外交活动的领域，也大大增加了外交学研究的范围，将外交的复杂性提到空前的高度。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及其趋势将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置于一个紧密的网络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自外于这个网络而然自立。各种经济集团，地区性和专业性的，纷纷成立。国家关系的重点逐渐转向经济问题的趋势一直在加强。

文化交流也被纳入外交范围。文化团体的互访，要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安排；经常性的文化宣传要通过外交使馆进行传播。国家间文化艺术的多样性通过交流，不但增进了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强化了友好联系的纽带，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

外交内容的这些变化自然引起了外交方法和外交形式的相应变化。这是传统外交难以想象的。传统的或古典的外交主要表现为直接的交涉和双边的谈判，而由职业外交官或具有外交身分的高级官员进行。第一次大战后出现了美国所谓“公开外交”，或誉之为“民主外交”。由于国际联盟的成立又出现了“议会外交”或“会议外交”，二战后联合国更使会议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公开外交”，“民主外交”与“会议外交”将公众的关心与舆论监督引进外交领域，披上“大众外交”的外衣，增加了外交的复杂性。双边外交发展为多边外交，两者并行不悖。早已存在的“首脑外交”越来越普遍了。“经济外交”登上国际舞台。美苏的对抗产生了“冷战”外交，限制核武器的谈判带来了“核外交”，为了解决涉及多国的地区争端则引进“穿梭外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殖民地外交”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强权政治的外交；陈朽的“炮舰外交”则为快速反应部队的外交所取代；帝国主义外交的阴魂仍在徘徊。

西方强权政治的外交则通过宣传和其他手段将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

《现代国际关系学》第 89—90 页。

《现代国际关系学》第 91 页。

于人，以遂其政治上“和平演变”的罪恶用心，企图使多彩的世界单一化。这是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外交内容、方式和形式的种种变化，使外交对象、课题、领域迅速扩大，同时也使外交概念、思想与实践为之更新而丰富了，外交艺术被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外交人员必须具备适应和驾驭这种变化的能力，对外交人员的要求因而也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周恩来显然早就预见到外交这种新趋势、新发展。立国之初，他就提出要有自己的外交学，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要注意而不迷信外交形式，认为任务和形式是完整的、统一的，是为了完成外交任务。周恩来一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便挥洒自如地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和 1955 年的万隆会议同各国首脑周旋，并扮演积极的角色，出色地完成重大的外交使命。1956 年末至 1957 年初出访亚欧 11 国，以及 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2 月对非洲和亚洲 13 国的访问，不仅为新中国开创了一个外交新局面，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一大创举。可以说，开国总理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会议外交”和“首脑外交”之中，成为当代举世瞩目的外交巨星。

周恩来在职 25 年间(1975 年 9 月后不再接见外宾)，由他制订、领导、主持的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公报、换文、合同等外交文件共达 1628 件，超过自 1842 年 8 月至 1949 年 8 月共计 107 年间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类似外交文件 1624 件。足见新中国第一个 25 年的外交，其规模已大大超过以往一百多年的屈辱外交，其性质则截然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新中国外交同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关系之密切，它在世界外交中已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世界外交学便不成其为一门完整的科学了。

参见《新中国的外交》、《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这个统计是根据《中外条约协定索引（1662—1980）》作出的。

第二章 历史背景：周恩来所处的时代

周恩来所处的时代是资本帝国主义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由鼎盛转趋衰落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洗雪了一百多年列强凌辱，推翻了压在头上三座大山而屹立于东方的时代；是广大第三世界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桎梏，走向自由独立而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二次大战前，的确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却不是它的最后阶段，更不是它的垂死阶段。紧随其后，凭借其高科技和一整套适应新形势的企业经营与管理经验，还有一个后帝国主义阶段，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不对等的经济政策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扩张和政治压迫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性转折关头，周恩来以创造历史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一员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全身心投入并积极引导这一历史运动的发展。周恩来参与缔造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周恩来祖辈的中国：岌岌可危

历史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周恩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大地，其遭际尤为惨苦。在周恩来降生前的半个世纪，即从1840年至1898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从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降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二是不满于清朝统治的人民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三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严重事件。头一件大事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向世界范围继续扩大，列强的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争夺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加剧。刚刚走上殖民主义舞台的德、意、俄、美纷纷要求获得“有阳光的地方”，竞相向亚洲扩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参加了这一行列，同它们一起展开重新瓜分世界的争夺。1898年即周恩来降生之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太平洋从此变成美国湖，其重要性等于德国对胶州湾和英国对香港的占领。跟着，除英、法、葡、荷已占领的岛屿之外，南太平洋各主要群岛也都沦为英、美、德的殖民地。这时整个世界基本上已被瓜分完毕，中国也不能幸免。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从1840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2年）就是在这次战争中签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次战争的实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此后，各帝国主义随即纷至沓来，以洋枪洋炮、坚艇利甲胁迫清政府相继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史不胜数。甲午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1895年），中国除失地、赔款之外，

李祥麟：《门户开放与中国》第43、44页引美国怀特雷德（WhiteReid）《扩张问题》书中和斯科特·尼陵（ScottNearling）的话。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有关论文。

还规定给予日本比“最惠国”待遇还要优厚的条款，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大致命伤。帝国主义者屡次压迫中国受城下之盟，皆未曾提出如此条款。此约既订，列强皆援最惠国待遇之例，于是中国工业全被东西帝国主义的资本所压倒，不能抬头。

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已从一个自高自大、天下独尊的“天朝”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闭关自守的中国门户洞开了；香港、澳门、琉球、澎湖、台湾之外，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共计 15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落入列强手中；文化侵略接踵而至，波及于城乡；同中国有藩属关系的朝、越、缅、哲孟雄(今锡金)沦为日、法、英殖民地；东三省和辽东半岛成为日俄、日德俄角逐的地区；海关失去自主权；司法独立权和行政自主权在租界中全被剥夺；东三省、蒙古、西藏、云桂、闽粤等地岌岌可危。

持续 15 年(1850—1864)的太平天国运动在曾国藩的湘军同相信扶植清廷比听任它覆灭更有利的外国侵略者的勾结和夹攻中失败了。惟其如此，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胁迫逃避热河的清廷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濒临灭亡的清朝才得以苟延残喘大半个世纪之久。

在周恩来的祖辈年代，中华民族已陷入万劫的深渊而不知将伊于胡底！

周恩来在襁褓中：神州大地已被瓜分完毕

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周恩来尚在襁褓中、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又以迅猛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一年之间，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项目之繁，条件之苛，竟不亚于以往半个世纪中国所受屈辱之总和。

周恩来降生前夕，1898 年 2 月，英国提出并胁迫中国内河向外轮开放，中国担保不以长江地区让与他国等项要求。3 月，周恩来哇哇坠地时，清政府与英德签订《英德借款合同》，以海关税收和长江各口岸的盐厘为担保。同时沙俄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胁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整个辽东半岛实际上即成为沙俄独占的殖民地，南满以北也成为沙俄独占的铁路投资场所。沙俄的势力从北满伸展到南满，整个东三省遂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它控制了渤海湾的门户，加强了它在华北的侵略地位。4 月英俄秘密达成协议，将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地区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然而英国对沙俄的进展极不甘心，向清政府索要“补偿”。7 月，双方签订《租借威海卫专条》，“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英国则向德国保证不妨碍它在山东的利益，事实上等于确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贪婪的法国岂甘落后？它也向清政府提出多项要求，甚至

限期答复，“不准更动一字”。清政府被迫允许法国修筑一条自越南边界至云南府（即昆明）的铁路，租用广州湾（今湛江）99年，并保证对“越南邻近各省”，“绝无让与或租借他国之理”。第二年11月，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遂使法国在我西南三省的侵略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眼看法国占了便宜，英国立即向清政府提出租借九龙半岛等项要求，于1898年6月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占九龙和新界。

在攫取铁路投资和修筑权方面，英国于1898年5月与清政府签订《沪宁铁路草合同》，企图实现它在长江流域建筑铁路系统的计划。这时俄法集团便通过比利时财团强迫清政府于6月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详细合同》，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加强对卢汉铁路的控制。英国同时胁迫清廷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取得自北京至牛庄（今营口市）的铁路控制权。

清廷批准了卢汉铁路合同之后，英国立即提出修筑五条铁路的要求：天津至镇江，晋、豫至长江，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至杭州或宁波。这些铁路除广九路以外，都汇合于长江，其作用在于抵制法俄集团的卢汉铁路计划，并发展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侵略势力。在英国武力威胁下，清廷于9月接受除津镇铁路之外英同的全部要求。《津镇铁路借款合同》于翌年由清廷与英德银团签订。美国则于1898年4月攫取了粤汉铁路的投资修筑权。

在1895—1898年的三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共掠夺了长达6420英里的铁路建筑权，其中英国占2800英里，沙俄占1503英里，德国占720英里，比利时占650英里，法国占420英里，美国占300英里。上述铁路沿线的矿区也都被有关国家视为独占的禁脔。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竞相角逐，上下其手的结果，中国已被“偷偷摸摸”地“瓜分”了，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洋人何以如此蛮横？大清统治集团中被列强侵略者引为满意的“高才生”李鸿章之流总结“丧权辱国”的经验，得出洋人仗势欺人“所持者惟洋枪铁甲而已”的结论，于是兴起一阵模仿洋人的热潮，其意图就是为了“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统治集团中形成一个洋务派。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了机器制造局，在福州、马尾设轮船制造局，筹办铁甲兵船，选派学生分赴美国、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并派福建船政学生留学欧洲，开始购买铁甲兵船、开设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于天津，在旅顺建军港船坞，成立北洋舰队并设海军衙门，甚至在北京浅水湖面的颐和园中训练海军，折腾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然而这一切既未能避免中法战争（1884—1885）中的败北，也无法拯救北洋舰队在甲午

法国代表吕班（G-Dubail）致李鸿章照会语，见《翁同日记》第37卷第33页。

清政府致法国照会，见《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1页。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1840—1911》，第285、286页。

魏源：《魏源集》第207页。

战争中的覆灭。以康有有力代表的“君子”们，对“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¹怀着满腔悲愤，于 1898 年 6 月投袂而起，公车上书，发动百日维新的政变，企图从政制的改良谋出路，出现“家家言实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百日维新有如昙花一现，被西太后(慈禧)扼杀了。于是有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蔓延。

这时，站在瓜分中国“门外”的美国坐不住了，于 1899 年向英、法、德、俄、日、意六国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门户开放”其实质就是由列强共管中国，美国则借此保持和发展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这就是周恩来 1924 年在《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一文中所说的“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盐税共管之后，有铁路共管江河共管，不久将有无线电共管，最后财政共管一出，共管中国便完全成功了。”

周恩来尚在襁褓中时，帝国主义列强便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下由分说地打上了如此之多的耻辱的烙印。无怪他从少年时代起，便以中华之崛起为己任，终生为之奋斗不息。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列强在中国宰割分赃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的时期。资本家同盟和列强在互相配合、互相争夺中进一步瓜分了世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则引发了革命；俄国 1905 年的革命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在国外则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俄国十月革命。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周恩来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一次历史变革。13 岁的周恩来欢天喜地，在同学中率先剪掉头上的长辫子，以示与象征清朝专制彻底决裂。然而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政权反而落入奸诈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生机初露的中国又被进一步推入苦难的深渊。

列强在欧洲的争斗无可避免地在中国反映出来，它们乘中国改朝换代、立足未稳之际，极尽其巧取豪夺之能事。

辛亥革命之前，英、美、俄、德、法、日、意、奥八国联军于 1900 年 8 月攻入北京，因出卖维新派而深得西太后宠信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联合镇压受骗的义和团。上述八国之外，加上比西荷 11 国驻北京使团提出 12 条要求，迫使逃亡西安有如惊弓之鸟的西太后全盘接受，于翌年 12 月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的谈判自始至终主要不是在清政府和各

¹《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 440 页。

参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88 页。

国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它是既维持清朝统治者的权位，又巩固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支配势力的一个条约。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羸弱无能的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中国实在没有外交史，只有丧权辱国史，卖国殃民史。或者从对方来讲，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压迫中国史。或者从另一方面讲，旧中国只有外交失败史。

继此而起的是列强对神州大地的宰割和分赃。沙俄是在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中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它激化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控制权的矛盾。沙俄为避免受制于英日同盟，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于1902年8月签订条件苛刻的《交收东三省条约》。美国则借口反对沙俄对东三省的独占，维护其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迫使清廷于1903年10月签订中美《通商行船续行条约》。日本在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之前，迫使沙俄直接谈判，企图就东三省和朝鲜进行分赃。因谈判破裂1904年爆发以东三省为战场的日俄战争。吃了败仗的沙俄在美国斡旋下，于1905年8月同日本签订和约，瓜分东三省。英日此时则签订第二次同盟条约，互相保证尊重彼此的在华权益。日俄虽然从东三省撤兵，但是中国并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任何赔偿，反而被迫向它们让出重大的权益。

与日俄对东三省进行激烈争夺同时，英国加紧了在西藏的侵略活动。1904年英军自印度进入西藏，攻陷拉萨，胁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续订藏印条约》，在西藏让出一系列特权。

1912年7月日俄已在密约中私自将我国内蒙划为东西两个部分作为它们的势力范围。随后沙俄和外蒙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1915年6月袁世凯政府加以确认。外蒙古实质上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俄国的殖民地。袁世凯对西藏主权也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政策，1913年中英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举行会议。1914年两藏地方当局的代表单独同英方签订《西姆拉条约》。是年3月西藏地方当局背着中央政府私自就边界问题在德里同英方秘密换文，规定西藏地方与印度的东段边界线，即后来通称的“麦克马洪线”。然而，无论《西姆拉条约》还是“麦克马洪线”，从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它们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软弱的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德国自知日本势必参战，却又不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拱手让给日本，于是表示愿将该租借地交还中国。袁世凯竟然不敢接受，希望由美国转手交还。美国却不愿为中国火中取栗。日本随即向德国宣战，同时在胶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进占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21条要

《中国外交史：1840—1911》第318页。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161页。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8页。

求，并限期答复。袁世凯被迫屈服，同日方签订了关于山东的条约和关于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条约，还有几个换文，通称为“民四条约”，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

周恩来在 1915 年秋写的一篇作文中，对此极为悲愤，“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

21 条的具体内容泄露以后，在列强中间引起巨大反响，纷纷向中国要求利益均沾，同时遏制日本的过分扩张。1916 年 8 月取代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宣布参加对德奥的战争，企图以参战国的地位缓解日英等盟国的压力。然而参战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实际利益。中国代表在 1918 年 11 月的巴黎和会中，并不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出现，恢复中国主权的请求未能得到支持，对德和约是在中国代表迫于国内的压力拒绝签署却要中国履行的情况下缔结的，这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具有历史意义的 1919 年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触发的。

刚从日本“逢密群科济世穷”归国的周恩来立即投身于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积极参加各种斗争，甚至因此坐牢。1920 年 12 月至 1924 年 7 月，周恩来利用勤工俭学的机会到欧洲深入寻求“为中华之崛起”的道路，并在那里组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开始走上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征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共有 33 国参战，人口 13 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 75%。整个战争期间，被送上战场的共有 7500 万人，死伤逾 3000 余万，因战争灾害包括饥饿而死亡的也有 1000 万人左右。战争消耗了大量物资，各交战国的经济损失总计约 1700 亿美元。许多城市和乡村变成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各国经济紊乱，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赋税加重，人民陷于极端的困苦之中。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周恩来在一篇作文中，谴责这场战争。但是他并未想到，几年之后他竟前往凭吊这一文明的废墟。

战争引起革命。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政治面貌。十月革命破坏了资本主义体系最薄弱的一环，破坏了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中部，德意志帝国被推翻了，奥匈帝国瓦解了。在西亚，奥斯曼帝国也崩溃了。俄国革命推动了欧洲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德、奥、匈、波、捷等国，都曾一度建立苏维埃政权。周恩来在欧洲不仅积极配合国内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而且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形势的变化，并

《顾维钧回忆录》第 1 分册第 204 页。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第 410—411 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 145 页。

联系中国实际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战争削弱了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则乘机扩大势力，大发战争财，由欧洲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日本也在战争中占尽了便宜。然而战争并没有解决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战后在许多固有矛盾之上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即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以及战胜国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因素潜伏着，发展着。

周恩来的青年时代：应召参与挽救民族危亡

周恩来于 1924 年底应党中央的召唤从欧洲回国，以迎接由于国共第一次合作而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从 1927 年至 1936 年，国内外发生两件互相影响的大事：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和希特勒法西斯篡夺了德国政权。前者导致中国十年内战，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后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又一次遭受空前浩劫。

1927 年 4 月蒋介石的背叛，不但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且招引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入侵。党中央及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1927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领导了南昌武装起义，同年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正是这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也建立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是党在十年内战中得以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保证。

在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并确定“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殃民的方针的形势下，1927 年 6 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作为对蒋介石反共方针的回应。征服中国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提上了日程，从此，日本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行动，步步尾随，侵略中国，毫不放松。

蒋介石从 1930 年开始，对江西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围剿”，一次比一次严重，致使中国在日军侵略铁蹄下丧失的领土主权也一次比一次沉重。在 1930 年至 1931 年的三次“围剿”中，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四个月内席卷了东三省，并成立伪“满洲国”。我 3000 万同胞沦为奴隶，遭受日本残酷统治达 14 年之久。1932 年日本又发动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蒋介石又一次屈服，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蔡廷锴的抗日部队被调离上海，上海成为“非武装区”，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的中国驻军统统撤走。

在 1933 年初的第四次“围剿”中，日本即以热河省中国军队“危及满洲国的存在”为由，出兵占领省会承德，继而攻占蓟县、平谷、怀柔等 22 县，直逼平津，迫使签订《塘沽协定》。日方主其事的就是 1937 年后侵华战争总

周恩来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一系列通讯，见《周恩来早期文集》上、下卷。

《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第 410—411 页。

头目冈村宁次。根据协定，中国军队退出今日北京郊区延庆、昌平、顺义、通县以及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今河北宁河县)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则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驻有正式军队。这样，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三省和热河，而将绥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察北(今属河北)、冀东划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为日本进一步侵占整个华北打开门户。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向西北作战略转移，而蒋介石则进一步向日本妥协退让。

1935年6月察哈尔省主席兼第29军军长宋哲元竟因扣押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的日本特务而被免职，宋军全部撤出察东非军事区，取消省内国民党机构，胁迫代理省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秦上协定》。7月则由南京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取消在华北党政机关，撤退驻华北的国民党机构，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至此蒋介石又在日本关东军的刺刀下屈服，华北的大部主权又被出卖了。同时日军又深入到北平的丰台、东交民巷，成为一只登堂入室、对主人虎视眈眈的恶狼。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被称为日本“国策基准”的对华政策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广田在日本右翼军人的支持下继任首相后又炮制出“帝国外交方针”、“对华策略实施办法”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等一系列侵略扩张文件，贯彻田中奏折的野心，确立了吞并中国、独占东亚，称霸太平洋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被称为太平洋战争蓝图。

在广田三原则面前，蒋介石已被逼上不是接受而灭亡，就是拒绝而战争，再也没有第三种选择。在中共共同抗日的再三号召下，在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敦促下，在1935年12月9日以北平的学生运动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奋起抗日的推动下，触发了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终于迎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从此，现代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中心的欧洲，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肆侵掠之际，德国的希特勒篡夺了政权，扩张军备，蚕食邻邦。他继日本之后于1933年10月退出国际联盟。这个羸弱不堪的组织，只能对他们的侵略行径发出软弱无力的呼吁。希特勒德国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狼狈为奸，相继承认伪“满洲国”，组成德、意、日三国法西斯轴心。苏联力倡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制止战争的主张得不到短视的英法绥靖主义者的支持，欧洲听任德意蹂躏。

1935年意大利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战争。1936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内战，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收回萨尔区，占领莱茵区，并吞奥地利。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促使希特勒大步地走向战争。1939年3月捷克屈服于德军铁蹄下。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粉碎了英法企图将德国

的侵略锋芒引向苏联的阴谋。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拉开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合而为一，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回顾这一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日本侵略中国得力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利用了英法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反苏反历史的政策。日本和德国都以反共为名以行其侵略之实，得逞一时。设想蒋介石如将其先后用于内战的几百万军队用来对抗实力并不十分强大的日本，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当不致于遭受丧权辱国之痛和八年抗战之苦。设想英法统治阶级能及时识破希特勒的罪恶用心，接受苏联集体安全的战略构想，二次大战未始可以避免。果能如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都可以少走、甚至于不走弯路。这就充分说明，反共反人民、阻止人类进步的企图，因其违背历史潮流，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周恩来为抗日战争胜利竭尽全力

西安事变是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的集中反映，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党采取了远见卓识的明智决策，及时调整了对蒋的策略，改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方针，从而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妥善地解决了西安事变。周恩来为此身入虎穴，充分发挥了聪明睿智，完成了历史使命。

西安事变不到半年，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周恩来为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殚精竭虑，费尽心力。

八年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5600亿美元，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的总和，为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昭雪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也是正义战争，所以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大量军力，这对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起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抗战是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

1995年5月9日江泽民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宣布的数字。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7—208页。

反对倒退”的历程中进行的。这是党所领导的全国革命力量同蒋政权力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势力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胜利是在不断克服投降阴谋和分裂危机中取得的。没有这种斗争，便不可能坚持抗战，也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蒋的消极抗战和中共所领导的全国人民的坚决抗战造成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后挺进，开辟和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春，这样的根据地已有19块，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抗日武装91万人，民兵220万人。抗击侵华日军64%，伪军95%，其中约50万人是国民党投敌部队。平津、沪杭、武汉、广州近郊区都有游击队的据点。另一种是国民党的正面战线基本上没有大的战役。日本为了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国民党军队大多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日军一度进占贵州独山，重庆震动。国民党在八个月内，丢失中国最富庶的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部分地区，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正面战场这种完全不应有的溃败，同敌后战场的形势形成强烈的反差。国民党的统治更加不得人心。

然而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强化官僚资本，致使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美国为了在战后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实现取代日本控制中国的目的，随着欧洲战局的好转，开始对蒋政权的全面支持，于1943年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暨换文》。欧战结束后，又于1944年签订《中美处理租界物资协定》，并诱使蒋介石签订最后一个卖国条约《中美商约》。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二次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死伤人数达4600万，物质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这是人类一次空前浩劫。

二次大战改变了国际格局：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在东欧和远东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德国和日本被打败了，英法降为二等国家，只有一个美国反而在战争中加强了。资本主义国家都围绕在美国周围，形成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国际格局进入一个由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时期。

《1949年世界年鉴》公布的数字。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法新社1995年5月5日巴黎电讯说，欧洲死亡人数为5500万，有一半是无辜平民。

弗·尼·尼基甫洛夫：《世界通史讲义》下册第249页。

新中国的诞生：周恩来外交学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立即将国内阶级矛盾突出为主要矛盾。在美国支持下他干了三件事：一、首先从峨嵋山上下山抢摘“桃子”，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劫收大员”，抢占地盘，劫掠财物，大发战后财。二、破坏和撕毁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达成的“双十协议”，破坏和撕毁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的协议，一手操纵、包办召开排除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三、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和具体部署对解放区采取军事进攻，企图从军事到政治一举消灭共产党。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经多次呼吁，多方奔走，争取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通过由国共和美国特使三人组成的军事调停小组调处各地的军事冲突，但都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以致国共关系再度破裂，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

原来设想需要进行五年的解放战争实际上只进行了三年便胜利结束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诚如周恩来手书毛泽东撰写的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所说的，这是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作出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换来的。周恩来少年时期为中华民族之崛起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拿破仑目为“睡狮”的中国醒过来了，正如他所预料的，苏醒的“睡狮”震动了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1842至1949年历届政府签订的1175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绝大部分成为废纸。然而自1840年的战争赔款13亿两白银和1894至1937年支付的贷款利息7.29亿美元，已无法收回。

作者根据《中外条约协定索引》的记载统计，自1842年8月至1949年8月的107年间，中国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章程、合同的总数为1624件，其中同沙俄及其后的苏联签订的共计182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也并非都是平等的，1945年8月称之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至于1945年2月斯大林背着中国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这种秘密出卖中国的作法已与社会主义的性质相去甚远了。

1918年1月苏联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废除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沙皇

1816年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说的原话是：“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就会震动。”拿破仑是从一本游记中了解中国的，游记的作者是航行到中国的一艘“狮子”号舰艇的大副，后来便有人将当年萎弱的中国喻为“睡狮”，附会拿破仑原话。（见忻剑飞著《世界的中国观》第320—321页。）

《北京市教育学院资料中心》1990年第6期。

政府的文件，重申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获得的一切权利与特权，放弃对中国的各种歧视。1919年7月苏联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再次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直至1924年苏联仍多次重申这一决定。如果说由于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情况，使这一决定难以实施，那么新中国成立了，中苏已成为“坚如磐石”的“兄弟国家”了，苏联政府却不但把列宁制定的此一政策抛诸脑后，在中苏关系发生龃龉后，竟坚持那些不平等的边界条约为“平等”的条约，甚至还要进一步蚕食中国的领土，以战争相威胁。这不能不说是列宁的背叛！

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于东方，改变了世界国际关系的旧秩序，削弱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加速了殖民主义体系瓦解的过程，为第三世界的形成展示了广阔的前景，大大提高了维护世界和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立即受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为巩固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合作的世界新秩序而奋斗。在世界外交学中独树一帜的周恩来外交学开始形成。

综观周恩来的一生，概括地说，他的前半生是为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而后半生则为新中国四个现代化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献身。这也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20世纪中所干的两件大事。周恩来的一生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融为一体。

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第87页。

《苏中关系：1917—1954》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44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573页。

第三章 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探源

本章试图探索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本源，以求对周恩来外交学作深层的了解。作者以为，周恩来外交思想有三个源头：一是出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哺育和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汲取；二是萌发于爱国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结合；三是继承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实践。这三个源头汇合凝聚于一个焦点：为中华之崛起，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人类的进步与和平。

源头之一：传统文化的陶冶

周恩来的睿智与才华，源于家庭的教养和学校的栽培，出自悠久文化的熏陶和祖国历史的启迪，再加上他自己的勤奋追求。

周恩来家庭有几个特点：一是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以“绍兴师爷”晋身为七品芝麻官。“绍兴师爷”以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复杂矛盾著称。这个封建大家庭，按叔伯兄弟排行，他这一支的伯父排行第四，生父第七，三叔第八，而继父第十一。他们虽然立户自炊，依然亲爱和睦，互谅互助；维持这种关系，主要靠“孝”“悌”二字。例如周恩来的继父多病无子，为使他卸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的思想包袱，周恩来尚在襁褓中便被过继给他，两个月后他便瞑目归天了。二是到了周恩来的父辈，这个家庭开始中落衰败了，周恩来的童年，经济拮据到了举债度日的地步。三是周恩来的三个母亲，即生母、嗣母和乳母都很贤慧，她们在世时间不长，却对童年的周恩来产生了终生的积极影响。可见周恩来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祖辈父辈都有教养，他的童年虽然贫困，总算幸运。

周恩来生母万十二姑（也以排行为序），小名冬儿，他叫她“干娘”，读过几年书塾，知书识礼，颇受生父影响。她聪明机智，明事理，达世务，善处事，精明果断，全力主持家务，是排难解纷的能手，经常带着儿子出面调解家族内部的瓜葛。周恩来后来的办事能力，显然师承生母的美德。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他称之为“娘”，英年（22岁）丧偶，把全部的爱和希望倾注在幼弱的继子身上，视为掌上明珠，对他扶持将护，备极劬劳。在她逝世之前，周恩来终日生活在她身边。陈氏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天资颖慧，性格文静，德才兼备，在诗文书画上都颇有修养，对周恩来的思想情操和文史功底有深远的影响。从周恩来呀呀学语开始，她就谆谆善诱，孜孜以求，临窗教子，认字诵读。五岁入书塾，开始练书法，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和《唐诗三百首》。嗣

母还经常给他讲述各种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包括《天雨花》、《再生缘》、《窦娥冤》、《西游记》。这都是些爱国主义和人民性很强的故事，娓娓动听，周恩来偎依在嗣母身边，“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周恩来对岳飞破金，文天祥抗元，梁红玉击鼓拒敌，关天培御英，太平天国反清，百听不厌。他从小就培植了敬仰民族英雄、憎恶国家败类、伸张正义、排斥邪恶等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也萌发了道德观的幼芽。他聪明过人，理解力强，记性又好，能分毫不爽地复述已听过的故事。嗣母因此得到莫大的安慰，心情有所寄托，而周恩来则灵犀初通，智力渐启。

周恩来的乳母蒋江氏是个 20 来岁的劳动妇女，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在用乳汁哺育小恩来成长的过程中，用自己的言行向他灌输了劳动人民的朴素、诚实的感情。

不幸，生母和继母在周恩来 9 岁和 10 岁时，都相继离开了心爱的儿子。乳母则坚持到周恩来北上沈阳时才离去。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家中，依靠亲戚接济生活，“佐理家务，井然有序”。他的生父为人忠厚老实，不善交际，长年在外省谋事，收入菲薄，经常失业。他的伯父无子，视周恩来如己出，极尽栽培之能事。周恩来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在他早年的家书和日记中都有充分流露，南开的国文老师在批阅他的一篇寒假记事文中，留下了“篇中叙及父(指继父)母双亡，不忍蓼莪卒读，直令人昼夜心伤。古人云，读陈情表而不动情者，必非孝子。吾于此文亦云”的批语。

周恩来乳名大鸾，寓有飞腾之意。嗣母为他取名“恩来”，指望他为这个不幸之家带来恩惠。“翔羽”之字，则是他离开沈阳南下天津前夕，史地老师“斟酌忖度”而起的，希望这位“志大青年如鹏翱翔宇宙”。周恩来则自号(笔名)“飞飞”。“翔”、“飞”来自“大鸾”，父辈、师长的瞩望和本人的志向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周恩来少年气盛、壮志凌云的抱负，策励一世，履践终生。

周恩来在书塾的几年里，熟读了《四书》，也念过《春秋》和《左传》，对《诗经》名篇则已吟诵自如。8 岁便在嗣母的辅导下，开始阅读古今诗文和民间文艺。外祖父家中藏书甚丰，便于自由阅览。四部古典小说和《离骚》等书就是在这里读到的。他尤其爱好《离骚》的优美神韵和崇尚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

这些启蒙课本、经史子书和演义小说，都充满了封建思想的人生观和道

《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15、14 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 77 页注释。

这位老师名高盘之。周恩来参加革命后在延安回答外国记者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提问时，曾动情地说：“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教诲与鼓励，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领袖实录·周恩来》第 395 页。）另一说是，“翔宇”之字是由书塾先生代起的，见《早年周恩来》上卷第 29 页。周恩来的两个弟弟都以“宇”为字，证明此说可信。

德观。然而从周恩来一生的言行来检验，可知他汲取的是精华，扬弃的是糟粕。这当然是由于他从青年时代就不断接受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周恩来对父母伯叔和弟弟怀有至亲之情，特别是对嗣母和伯父。在 1917 年初的一篇作文中，他说自己“幼失怙恃，长依伯父，随宦东西，迢迢千里，形影相随。伯父无儿，视生(自称)犹子。呜呼！十岁前生我育我者父母也，十岁后育我(教我者)之人殆伯父矣(也)。”可知其情之笃。1917 年秋至 1919 年春，他在留学日本期间，随身携带嗣母 15 岁待字深闺时手书诗篇，不时拿出来焚香吟诵，思母心切，潸然泪下。他在 1918 年 7 月 26 日的日记中深情地写下“母亲亡后十周年忌辰”。__1920 年在天津警视厅羁押期间，还在她的忌辰之日写了《念娘文》，缅怀亡母。无论在旅日还是旅欧期间，他都经常给家中写信，抒发对他们的眷恋。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儿女情怀，这是一种纯真的美德。早在 1916 年的一篇作文中，国文老师的评语便已指出：“作者笃于家庭，异日将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必能扩而充之矣！”__国文老师能将对家庭的爱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不能不说独具慧眼。

40 年后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说：“我的母亲(万氏)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不言而喻，他的容貌也来自这位美丽的母亲。谈到嗣母，他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又说：“嗣母经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他还讲过，母亲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1941 年，在一次恢复国共合作的谈判间歇，他曾对几位朋友遗憾地表示，他的愿望是打败日本人，那就可以在他母亲坟前祭奠。他说：“至于我，我今天的一切和我所期望于自己的一切都多亏了我的母亲。她的坟地如今在日军占领下的浙江。我多么想能马上回到那里一次，去清除她坟上的野草。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游子能为他母亲做的起码事情。

最足以反映周恩来对家庭的高尚情操的，莫过于他对生父之死的哀痛。周老爷子(邓颖超对公公的称呼)和邓颖超的母亲是周恩来夫妇在重庆生活比较稳定时被接来同住的。1942 年 6 月底周恩来因患膀胱脓肿(埋下了 35 年后膀胱癌的隐患)住院动手术。不料 7 月初周老爷子突然中风身亡，因周恩来伤口未愈，董老和邓大姐商定暂时隐瞒。然而，周恩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到第三天，便责问前来探视的吴克坚：“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并表示马上要出院。第二天伤口刚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 230、295、83 页。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 15 页。

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文萃》第 31 期。

《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普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

尼克松：《领导者》英文版第 227 页。

刚拆线的周恩来便被接回红岩。他一下车就发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他一进办公室看见迎出来的邓大姐臂上缠着黑纱，猛地止步，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猝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老爷子……去世了。”

周恩来“呜”的一声凄哀的号哭，双手捂脸，仿佛流泪已无法减轻内心的痛楚，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一屁股坐倒地上。他这次的哭声与以往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中华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着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迸发而出。这哭声使人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

周恩来断断续续地斥责说：“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说不要爹……我父亲死了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不敬父母，不忠不孝，算什么共产党员？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由于嗣母的教导，周恩来在学业上各科成绩都表现优异，尤以国文成绩“早露头角”。他14岁时在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校所写的一篇作文，获甲等奖，不但参加全省评展，而且收入全国性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1916年春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一次国文特试中，又以《诚能动物论》一文夺魁。他文思敏捷，作文不拟稿，提笔直书，一气呵成。他在全校的演说比赛和书法比赛中也多次获奖。他的数学和英语成绩都名列前茅。

从迄今收集到的1914年1月他在南开写的第一篇作文到1917年1月最后一篇作文，共计54篇。这些文章题材多样，有感言、信札、评说、辩论、回忆、旅游、传记、叙事、志序；内容广泛，涉及学习、志向、人生追求、中外古今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外大事评论等等；都以文言体写作。课外作品和发表的大量诗文和演讲，尚不包括在内。周恩来还创作剧本，对音乐也颇有研究。国文老师对他的作文篇篇有评语，对他表达才思的文笔赞不绝口，或誉之为“才思发越，笔仗纵横，少年文字，蓬蓬勃勃”；或称之为“气机流畅，词藻纷披”；“原心立论，痛快淋漓”；或赞之为“发抒感慨，采纵自如”；“章法谨严，神味隽永”，甚至说是“大文章”。国文老师对少年周恩来行文“气充词沛，畅所欲言”而评价为“苟非养到功深，万难至此也”。预见此生“越后能高人一筹，不可限量矣”！南开创办人严修老人早就看出周恩来具有“宰相之才”，欲纳为婿不成，不惜资助他赴法勤工俭学。从作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12—113页。

《领袖实录·周恩来》第388页。

文中涉及的史、事、人及用典和援引的成语，可知周恩来当年的文史知识来自广泛涉猎儒家经典、诸子学说、古代史籍和文集，研读过清初王夫之(1619—1692)、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的著作和近代谭嗣同(1865—1898)的《仁学》、章太炎(1869—1936)的《国粹学报》；文风受唐宋八大家和梁启超的影响。《饮冰室全集》是周恩来爱读的一部巨著。梁启超不但为周恩来展现一个广阔的世界，其雄辩的思想风格和研究问题的灵敏思维，对周恩来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他为梁的演说作记录时，曾誉之为舆论泰斗，近代文豪。同时他也遍读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对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颇有研究。所以他能对比孔、耶、释、回教义，评论项羽与拿破仑之优劣，论述中外古人的所谓圣贤，中外古代暴君。若非关心时事、经常阅报，不可能对国内外时局作出评论。他实践了早年对自己的要求，即对传统的“圣贤书籍”和新的“各种科学”都应“深究而悉讨”。

如果我们随意检阅周恩来 20 年代和 40 年代的若干题词和挽联，就不难看出周恩来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造诣之深了。例如 1919 年 1 月他在东京时，为同学题词：“浮舟沧海，立马昆仑”。令人有霄汉之感。这位同学极为珍视，铭刻在铜制镇尺上以策励自己。1941 年 1 月为皖南事变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揭穿了事变的实质，连当代词宗毛泽东也“为之神王(往)”。四言诗源自《诗经》，毛泽东擅长诗词，但从未写过四言诗。1941 年 3 月周恩来为马寅初 60 寿辰祝寿并题写四言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坐帐无鹤”是说寿堂里寿星缺席，这是对国民党当局迫害马老的揭露；“支床有龟”是说马老在狱中以琴书作伴，生活艰苦，连床架都残缺不全，只好用龟来撑持。“有龟”“无鹤”，对仗严谨而生动，而“有龟”谐音“有归”，寓意马老必将获得自由。1941 年 8 月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去世，周恩来为他的追悼会送去“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念文章说彼此初无私交，且隶两党，由公谊而增友谊，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的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周恩来这种诚挚的感情，使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大为感动。这不只是内交，也是很有感染力的外交。

周恩来年轻时，就把思想品德的修养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实现其理想与志向的操守与毅力。周恩来的理想和志向是：“作事于社会，服役于国

见 1912 年周恩来在《关东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教师评为“心长语重，机畅神流”；《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 1 页。

1941 年 2 月 2 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转引自《周恩来传》第 486 页。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

《新华日报》1941 年 11 月 9 日。

家，……以其所学，供之于世”。后来他便赋予其理想和志向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周恩来从小就意识到个人毕竟身单力薄，必须广交朋友，才能众志成城，而且必须从自己做起，从对公共事务而尽一己之力做起、才能团结集体。他热情谦和，尽管品学兼优，却从不骄躁凌人，从不争名争位。正是由于他“温和诚实，最富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的评语），所以他能团结人，善与人合作共事。正是由于早就具有群众路线的思想，所以他重视团体，重视组织，并形成组织观念。他在南开学校期间担任的职务，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事无巨细，无不兼顾。他重视媒体的宣传作用，包括新剧的推广。他甚至男扮女装，粉墨登场，倾倒全座，轰动京津。他虽然兼职极多，但认真负责，不走过场，显示其多才多艺、缜密的组织才能。他经受各种锻炼，为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一年多的日本留学生活，五四运动后的革命斗争和在法国勤工俭学，终于使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并具备作为一名卓越外交家的素质。

源头之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

读者从本书第二章不难了解，周恩来从小就浸透了爱国主义思想。他全身的血液、细胞、神经，无不带有爱国主义的基因。这是他所处的时代、国家和社会，他所受的家庭熏陶和学校教育，再加上他个人的特殊素质锻铸而成的。

周恩来政治上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表舅龚荫荪。此公思想倾向维新，到过日本，家中除许多古籍外还有宣传近代西方文明的一些新书和报刊。周恩来在他的家塾中读书时，开始接触到这些新鲜事物。

周恩来12岁时移居奉天府（今沈阳市）伯父周贻赓家，就读于新建的小学堂东关模范学校。这是周恩来青少年时代发生的第一次转折。由温带的鱼米之乡来到风雪冰封、盛产高粱大豆的北国，使周恩来的身体由文弱转趋强韧。周恩来自小已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自觉地、有意识地迎接东北地区这一特殊环境的挑战，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养成吃高粱大豆的习惯，吸取了细粮所缺少的营养，增强了体魄。这种磨练对后来周恩来在革命征途中经受艰苦的考验，无疑有极大的帮助。就学习而言，由成天“之乎也者”的书塾走进新式学校的新天地，课内外读物和老师，从内容到讲授，都大异其趣。周恩来眼界顿开，一下子拓宽了知识领域，使学习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后来回忆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7页。

解放后到了北京，严冬季节，从不穿棉毛内裤。有时到机场迎送外宾，寒风刺骨，仍泰然自若，不为所动。

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他还说过，“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

东北是当时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十年前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15万沙俄军队越过边境，强行占领东北几乎全部主要城市。他们在江东六十四屯，在海兰泡制造一起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战争结束后，他们拒不撤兵，说是要把东北变成他们的“黄俄罗斯”，从而激起了席卷全国的拒俄运动。1904年，日本和沙俄又以中国的土地——东北作为战场，进行了为时一年七个月的战争，使中国人民在外国军队的炮火和硝烟下遭受深重的灾难。战争的结畸，南北满分别成为日本和沙俄的势力范围。1910年，也就是周恩来到东北那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中国邻邦朝鲜。东北同朝鲜只有一江之隔，唇齿相依。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感同身受，寝食不安。——

这一切，不能不给少年周恩来以异常强烈的刺激。他在课堂上经常听老师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爱国热情受到激励。暑假中，周恩来到同学家中作客。那里正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村后的山上留有沙俄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建的塔。当地的老人向他们悲愤地诉说沙俄军队血洗这个村子的悲惨情景。同学的祖父带他们到日俄军队曾经激烈争夺过的烟龙山察看，并且写下激动人心的诗句，结尾是“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富于感情的周恩来，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就在这些年头，他时刻关心国事，养成了坚持读书看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大声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各有自己的打算，唯有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这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

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连串问题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周恩来的心中，成为经久不衰的动力，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

周恩来回顾自己青少年的历程时说：“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机、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从爱国到革命，这几乎是所有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周恩来到东北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延续两千

《周恩来传》第5、6—8页。

《周恩来教育文选》第41页。

《周恩来传》第6—8页。

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文萃》第31期。

多年的封建统治垮台了。

周恩来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启发下，先后阅读当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陈天华(1875—1905)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等书，受到很大的触动。

1913年初，伯父因工作调动移居天津，15岁的周恩来也跟着到了这个华北门户的工商城市，进入南开学校求学。这是一个更加广阔而多样的世界。这里有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九国租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新式教育以及列强的影响，使周恩来接触到大城市的社会生活，呼吸到近代社会的空气。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从周恩来在南开写的一系列作文中，可以看出这一思想的发展与深化的过程。他为“神州暗暗，天地为愁，国体(指帝制)呼声，满禹城(中国)”而不安。他重视“国魂”，认为是“延国脉于不堕”的精神支柱；既批评维新复古，也挞伐“袭泰西之皮毛”，而主张“以国学役西学”，“以西学之科学传之国人”。他对“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苾苾乎不可终日”，极为痛心。呼吁“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①他说“千古仁人志士，所最痛心疾首之事，莫如河山破碎，家室凌夷，祖国有黍油麦秀之悲，社稷有荆棘铜驼之感。”^②他批判民国之治说：“辛亥光复，于今五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民可以无议院，政治可以揽独权……民意可造也，私法可定也，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朝三暮四，愚鼓黔首，忽而帝制，忽而共和，腾笑万邦，贻羞后世，使居世界四分之一之人民，蒙不洁之耻，占四万万方里之禹城，载无耻之民。吾为国耻、吾为民愧，吾益为世界之人种辱，世界之土地冤也！”

他认为“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林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他振臂高呼“吾党青年，有兴起者耶，时乎时乎，不再来矣！”^③

周恩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是怀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抱负于1917年秋负笈东瀛。在东京经过不断的探索，加以国内政局的发展，使他的思想又朝着新的方向迈进，用他《雨后岚

^①《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52、62—63、64页。

^②“闻鸡起舞”，语出《晋书·祖逖传》，指有志为国者，奋勉自励。周恩来早年以此语自勉。1945年他在延安为挚友叶挺之子题字，即以此语勉励，要他“做一个革命将军的好儿子”。新中国电影的“金鸡奖”，即据此而设。

^③语出《晋书·索靖传》，指国土沦丧后残破的景象，连洛阳宫门的铜驼也将为荆棘所覆盖。

^④《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181、171、300、292、293页。

山》的诗句来说，就是在“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国内时局是指1918年春日本要求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使留日学生受了很大震动，周恩来也有“国事益坏矣”之痛。留日学生在酝酿成立救国团体，准备全体离日以示抗议的秘密会议，又受到日警的残暴镇压。著名报人彭翼仲蹈海自杀留下的绝命诗“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尤使周恩来受到强烈刺激。四百名归国学生参加北京十数校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为第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了一次演习。这个巨大的波澜，使他的满腔热血沸腾起来，再也无法沉下心来埋头准备考试了。他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会”，以期“刷新中国”，为国为民。他在入会演说中，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重申他原来的主张，认为应该学习西方文化为我所用。周恩来对这个“新”字，怀有厚望，以“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与会友共勉。

周恩来来到日本不久，俄国十月革命便爆发了。俄国党派的情况引起他很大的关注，而日本于此时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大米骚动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他进一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转折性意义。这从他日记中所说的“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已显示出来。从阅读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等书籍，转而注意阅读有关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中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周恩来便阅读英文和日文的有关书籍，可以说是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中能更早地、更多地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为周恩来手不释卷之书。他已开始钻研《资本论》。周恩来留日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思想上经历过不少艰难曲折，终于使他在摸索解决中国问题的访徨中见着一点光明，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而出”。

为了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部，周恩来于1919年4月底回天津。这时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巨大风暴——五四运动突然来临，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道路，把他推向革命。他参与组织了觉悟社，主持《觉悟》编务，积极投入爱国群众运动的浪潮，并因此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一方面组织各种斗争，同时主办读书团，介绍各种新思潮，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他系统演讲世界工业革命史和马克思学说，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生平，唯物史观总论和阶级斗争史，经济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讲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所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已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297页。

《周恩来传：1898—1949》第48、49页。

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是他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他“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结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他在巴黎入党，成为中国党8个建党组织之一的一名积极成员。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在法国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参与《少年》、《赤光》的编务，发表了大量战斗性文章。从此再没有任何游移和反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奉献给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他旅欧的目的，在于“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考察的初步结论是：“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然而他以为服膺共产主义的原理，“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这种实事求是、以我为主的态度成为周恩来行事的重要准则之一。

在欧洲的三年半中，周恩来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期间他除学习外，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积极参与并领导建立、巩固和发展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并出版宣传刊物。二是参与并积极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反对中、法当局迫害其爱国活动的斗争。三是积极参加国共合作在欧洲的组织工作。四是天津《益世报》写了一系列反映国际时事的通讯。

这期间他的思想觉悟、组织能力、斗争策略和分析研究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水平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为迎接新的更为艰苦的斗争做好了准备，成为一名“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旅欧共青团执委会的评语）的战士。

周恩来为《益世报》撰写30多万字的通讯，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主要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及其政治动向，战胜国在处理与战败国关系中的矛盾，西欧各国与苏俄的关系，华盛顿会议中的英法、英美、日美关系以及中国的处境等重大问题。这是他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开始。由于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加以功底好，文笔流畅，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已令人瞩目。许多分析放眼世界，衡量得失臧否，都以祖国为本。

周恩来以记者的身分，遍访法、德、英等国，广泛接触华工和留学生、当地工人、学生等各界人士，深入西欧社会调查研究。光是报道英国矿工的罢工运动，他就写了两万多字的考察报告。他对英国议会内幕、巴黎会议内幕、华盛顿会议内幕的揭露，对欧洲经济恐慌、社会救济、议会选举、中法勾结等方面的采访报道，使他接触了大量的现实问题。他身临其境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深入掌握帝国主义之间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实质。

这些通讯反映了周恩来研究世界事务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对他日后从事外交工作具有实践意义。他在欧洲，一方面对祖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地位，感同身受，深化了爱国主义；同时对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加深了了解，提高了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他对共产主义

的信仰，使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了祖国自由独立和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深化了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者。

周恩来在建党初期已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苏联俄罗斯”是我们的朋友，要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

源头之三：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先驱，是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是新中国统一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他又是统一战线思想和理论的创建者和集大成者。统战工作与外交有密切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对象是国内的不同党派，不同阶级和阶层，而后者主要对象是不同的国家及其代表。然而这两者又有其基本共同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所采取的战略、策略、任务、条件、方针、政策、原则、形式和方法也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以致许多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始自统战工作，外交工作不过是统战工作及其延伸。

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所谓统战，无非是联合一方对付另一方。这种方式在上古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战争中早已出现。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战略可以说是这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并赋予一定的组织形式。周恩来的统战思想把这种经验与形式提到新的高度，不只是对历史的继承，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指导，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

周恩来的统战思想最早来源于春秋时期“众志成城”这一历史实践的概括。“众志成城”出自“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国语·周语下》）。韦昭（204—273）注释其义为“众心所好，莫之能败，其固如城也。众口所毁，虽金石犹可销也。”东汉应劭对前一句解释为“众人同心者，可共筑起一城”（《风俗通义佚文》）。后世遂多作“众志成城”，表示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力量，就能取得成功。“团结就是力量”是它的衍义。

周恩来从小学就以同学为友，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到了中学便着手组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455页。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202页。

织“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科教之不及”的敬业乐群会。将切磋学问提高到品德修养。他从事各种课外活动，无不以此为依托，并逐步将注意力引向社会问题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他进入社会便组织革命团体觉悟社，提倡“革心”、“革新”、“自觉”、“自决”，灌输世界新思潮，鼓吹“妇女解决”、“工读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留学日本时参加了类似政党组织的新中会，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推动组织全国学联，明确提出要依靠“群众运动”实现打倒反动政府的目标。这是在我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运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由于他禀性热情，为人坦诚谦逊，不爱出风头，不争名不爭位，乐于承担繁琐的具体工作，一切以大局为重，在党内外各种团体中，人们都愿意团结在他周围，为共同的目标而奉献。这使他在各种活动中起着核心的实际的领导作用。周恩来将“众志成城”这个成语落实到行动中，使之具体化、组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周恩来对古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深刻理解，发扬光大，于此可见。

如果说周恩来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从事某种统战工作不够确切，那么旅欧期间他从事国共两党的合作属于名副其实的统战工作，就毫无疑问了。1923年孙中山派王京歧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周恩来根据党的三大关于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决议，立刻同他取得联系。经过磋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切实建议。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周恩来并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分协助王京歧将巴黎分部改组为旅欧支部，扩及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成为旅欧中国人最大的进步组织，扩大了革命影响。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全部工作。这样，在国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周恩来已领导欧洲的中共组织率先与国民党实现了合作。党中央很重视周恩来从事此一工作的经验，通告全党，要求各组织加速组建统一战线的进程。1924年9月王京歧在给父亲的信中深情地谈及与周恩来合作的感受，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

周恩来同法共、德共都有一定联系，同法共的联系得力于胡志明的关系；同第三国际和苏共的旅法代表也有接触。

周恩来在领导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中，在他所主编的《少年》、《赤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时论文章，对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破坏国共合作关系，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其时周恩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比较明晰而实际的认识。1924年2月他在一篇《革命救国论》

的文章中，提出“谁是我们真实的友人”这一革命首要问题，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内贼国内军阀为主要敌人，而国民革命所依靠的力量是全国工人、农民、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和海外华侨这五派为革命势力。这一重要问题的提出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早两年。

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周恩来1936年末成功地完成妥善处理西安事变的使命，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周恩来毕生致力于统战工作，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理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

首先，统一战线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带有全局性战略问题，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周恩来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并且要求全党各部门都来做好这项工作。然而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形式又不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它是随革命形势变化和任务的不同而变更的。因此要善于调查研究，随时观察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正确分析和估量形势，分清敌我友的关系，才能认清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确定相应的组织形式，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例如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有民族的、民主的、社会的三重性质，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则要求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各民族和海外华侨，结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又有新的情况，新的要求。

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任何“左”的和右的错误，都会把革命引入歧途，甚至遭受失败。而掌握领导权，首先自己要有力量；同时要争取中间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必须正确处理国共两个主要大党的关系，双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在掌握领导权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 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内容，一是坚持党的主义和政见；二是积极发展革命武装，扩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三是坚持对国民党的监督权和批评权。

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

《赤光》第2期，1924年2月15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0、111—114、104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10、96、97、97—98、103、43—45页。

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复杂了。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这些，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很多错误。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

周恩来总结了统一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队伍里的人分作三类：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并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三个争取，三个勿忘”的原则。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争取好转，勿忘防卫；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进展，勿忘巩固。在斗争中又必须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周恩来还系统地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形成周恩来独特的统战风格。早在1939年8月，周恩来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统一战线的十条策略、四条方法和六条守则。——这些策略非常切合当时的实际，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同时又是十分灵活的，对正确开展斗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现了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领导水平，影响深远。——

六条守则不仅是他对全体从事统战工作同志的规范要求，而已他言行一致，终生身体力行，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人们从无数事实已清楚地看到、这些守则是周恩来行为的真实写照。在实行守则的问题上，他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做到，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身教重于言教”、“正人先正己”的传统美德。——

周恩来还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提高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声望和地位，而且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大量的道义和物质援助，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周恩来主持并创建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权机关，制定并贯彻了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协调各阶级、阶层、各党派、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12月。

刘焱、杨大钊主编：《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第117—118页。

各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之间的关系。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民族经济，健全民族立法，促进民族繁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宗教团体要独立地建成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要团结海内外广大的华侨、华人。要正确处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上下关系、政权中的党政关系等，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周恩来的外交工作是从统一战线工作开始的。他早就以“谈判家”闻名，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外交的含义。统战思想与实践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本源。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又是他的统战思想与实践的扩大和发展，深入探讨和研究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及其哲学基础，不仅有助于理解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而且对更好地掌握与运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具有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他观察问题，提出见解，开展工作，无不以实事求是为依据，具有客观全面性，避免了主观片面性。周恩来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对比分析与研究，总是善于抓住矛盾的焦点及其主要方面，使问题迎刃而解。他在论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和关系时，指出两者“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就是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

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本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的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有机结合及其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体现。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273—274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6 页。

第四章 创世界外交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世界外交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周恩来对世界外交学的杰出贡献。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就世界外交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作一次简要的回顾。

世界外交：起源于东方

在人类社会，外交起于何时何地？从广义上说、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的交往，包括自发的人员交流、婚娶、互通有无等和平的活动，都可以说是外交。特别是部落之间的战争，虽然是一种非和平的极端手段，却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结果的群体活动。战争的结果，败北一方，除了完全被消灭或者全部遁逃者外，还可以求降乞和。如果两败俱伤，再也打不下去了，也就只好偃旗息鼓，妥协停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乞降求和还是妥协停战，都有一个双方互相交涉与谈判的过程。交涉与谈判，就是一种外交。

就严格意义上说，外交作为一个国家行使主权在对外关系上的手段，只有原始社会分裂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从而在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国家，并由众多的主权国家形成一个国际社会之后，始有真正意义的外交。因此，国际外交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的出现，二是国家拥有主权独立的地位，三是由众多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

外交起源于世界几个最古老的文化摇篮：埃及、巴比伦、中国和印度，后来的爱琴海诸岛中的希腊、地中海北岸的罗马。这些地区都先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特别是埃及和中近东地区的国家和爱琴海诸岛国，由于交通比较便利，关系日益密切，争执、冲突和战争频繁发生，外交是经常被应用的手段。印度和中国在上古时期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同上述各个地区的关系尚未沟通，基本上自己形成一个“天下”，在这个范围内出现众多国家。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中国，所有这些地区的古老国家很少留下文字记录，其外交详情已难尽言。

中国的外交，最迟在商代已具雏形。其时外交的各种形式尚不完备，外交是在中央政府与周边的方国之间进行的。这些方国都是商王朝的藩属，他们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与商王朝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商王朝是一统天下的权威，国际社会尚未出现。他们之间的外交，不是完全意义的外交。

周灭商后，基本上仍维持商代的国际格局。但因为西周实行封建国家的体制，王权至尊，严禁诸侯国之间进行外交，故有“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梁·隐公元年》）之说。这表明，周

黎虎：《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朝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只有周天子才有外交权，诸侯没有外交权。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也就是黄帝治天下时“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五帝本纪》）的观念的体现，它形成了“天下独尊”的世界观，影响后世逾二千年。所以除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几乎没有外交可言。历代官制，只有掌朝庆吊贺之礼的“鸿胪寺”的类似建制，而没有专司外交的机构。“朝庆吊贺”来自藩邦，他们不能与王朝平起平坐。清朝国门被打开之后，迟至1861年才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即使如此，颛顶无知的清廷仍在外国使节觐见时必须行跪拜礼、是否同意外国派常驻使节等问题上纠缠不休，最后不得不同意对方要求时，则以有损“天朝威仪”如丧考妣。

春秋战国所以有外交，是因为各诸侯国已相对独立了，拥有不容否认的主权，周王室只维持宗主国的名分，不但列国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同周王室的关系在实质上也是平等的，而且因此形成一个“天下”之内主权国家林立国际社会。所以完全意义的中国外交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春秋的外交，崇尚德、义、诚、信，外交辞令婉约文雅，国际交往以周礼为规范，朝聘盟会制度化，谈判艺术臻于极致，战争的目的只求对方臣服。战国时期的外交，战略策略思想进一步发展，合纵连横运动对后世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战争的目的在于兼并。秦汉以后，中国终于完成了统一，然而王权至尊的思想更甚于先秦，国际间平等往来的外交不复存在了。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才被迫同列强交往，但已没有平等可言，进行的是屈辱的外交。

印度在四《吠陀》书年代，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奴隶制国家尚未形成。第一部史诗《摩诃婆罗多》描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印度各邦之间历时18天的一次神话式战争，相当于我国西周末年至春秋初期。印度第二部史诗《罗摩衍那》描述萨罗国（今马德拉斯邦的一部分）与师子国（即锡兰，现更名斯里兰卡）之间的神话式的战争，（其中的诃奴曼猴王即《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期。比较系统可靠的印度政治史是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约在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陆续编成的《摩奴法典》主张通过谈判和其他包括使用武力的三种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而以外交谈判为主；外交的全盘策略就是“要使友邦、中立国和敌人都不能取得对自己的优势，并对使节的作用加以肯定。印度第一个强大的帝国孔雀王朝（前324—前185）的鼎盛时期为阿育王年代（前273—前232），相当于我国战国的秦王政时期。阿育王统一了几乎是现在的印度次大陆，秦始皇也在差不多同时统一了全中国。孔雀王朝重臣考底利亚有一部传世之作《政事论》（亦译《实利论》）几经后人增删，至公元2世纪才最后写定。它把古印度政治经济制度加以理想化，但仍是研究孔雀王朝历史的重要依据，其中多处论述外交问题。

成文的印度古代史地足可稽考者只有我国晋代法显的《佛国记》和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两部著作，成为印度各大学的必修课，可惜未涉及外交。

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时期的外交，从埃及、中东到印度，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其对外政策手段主要是战争，目的是掠夺土地、奴隶、牲畜和财物。苏联弗·鲍爵姆金编的卷帙浩繁的《世界外交史》中在论述古代东方外交时，未尝一语道及中国，可见编纂者对中国先秦外交茫然无知。

东方外交之有文字可考者主要是前 2000—前 1400 年古埃及的《泰尔·阿玛尔纳文书》和前 1278 年埃及王与赫梯王所签订的和约，它成为后世希腊罗马条约的范本。这个条约由三部分构成：导言、条约正文和结束语（主要是誓词）。这同我国春秋时期的《葵丘盟约》（《孟子·告子下》）等国际条约的结构如出一辙。

古希腊和罗马由于海上交通便利，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了商品经济，其时对外政策则以扩张领土、猎取奴隶、争夺市场为主，殖民地的扩张与建立即肇始于此。古希腊对外交的贡献，一是使节必须持有全权委托书，由两片折叠式的小木板组成，相当于我国古代使臣所持的符节，称为“diploma”，西方“外交”一词即由此而来；二是提出“国家平等”、“国际社会”等概念。占罗马对外交的贡献则在于制订一部后来充实的《罗马法》，成为后世国际法的滥觞。

中世纪欧洲外交：神权与王权之争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长达一千多年。这个时期虽然被称为外交上的“黑暗年代”，对后世外交却有许多重大影响。中世纪初期经过二百多年的征服、战争和民族融合，于 800 年出现了囊括西欧的查理曼帝国，得到扶持回罗马的教皇利奥三世（750—816）乃加冕查理曼大帝为罗马帝国皇帝。其后这个帝国分裂为东、西、中三个法兰克王国，为德、法、意三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拜占廷）帝国则对周围外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它在外交上多用分化瓦解、制造不和、金钱收买和宗教同化的手段。这个时期的外交特点是：一、外交权掌握在国王手中；二、外交仍从属于军事，是军事手段的补充；三、外交出现欺骗、狡诈的风格，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近代欧洲外交。

欧洲中世纪中期的外交具有二元性质，即教皇外交和世俗的王权外交。

弗·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 1 分册第 4、7 页。

莫瓦特 1935 年出版《外交与和平》书中对欧洲外交理论发展所划分的第一个时期。转引自尼科松《外交学》英文版第 34 页。

《世界外交史》第 4、7 页。

两者之间的权力之争是经常的、尖锐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互相利用和妥协是暂时的，是为了更猛烈的争夺。教皇在鼎盛时期拥有派遣主教的权力，而主教则成为干涉帝国内部事务，甚至左右政局的工具。教皇在教会事务中享有绝对的权力：有贬黜皇帝的权利，有解除人民对其不正直的君主所守的誓约的权威。他还有一种精神武器，即将不听命者逐出教会，这是任何一个祈求死后上天堂的君主最畏惧的一招。

罗马教皇热衷于十字军远征，从 1096 年第一次东征到 1291 年最后一次在北非遭到彻底失败，先后发动了 8 次十字军远征。十字军成了教皇影响欧洲君主的工具，成了干涉欧洲国家内部生活的新口实，成了掠夺新财富的手段。教皇的外交武器就是建立同盟与皇帝对抗。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是政治阴谋的能手。他以极巧妙的外交手腕将西西里、瑞典、丹麦、葡萄牙、阿拉贡(西班牙东北)、波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甚至阿美尼亚的国王置于被保护的地位，并使英国屈服。他成功地恢复了教廷的一切权利。然而英诺森三世及其后继者格里戈里九世(1227—1241)都无法征服德皇弗里特烈二世(1212—1250)这位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但是德国几代皇帝对意大利的进攻都以失败告终。教皇统治世界的幻想也破灭了。

以法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为欧洲近代外交摆好了新的舞台。法国腓力四世(1268—1314)秉政时期为其后整个法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他同当时已席卷东欧的成吉思汗(1162—1227)的书信往来，使欧洲的口头谈判转为书面协议。谈判促成法国外交的发展和完善。不常有的、短期的使节往还，开始成为经常的、常驻的关系。他同教皇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之争。他通过伪造文书，贿赂收买、阴谋暗杀等手段，迫使教皇成为他的“助手”。

14—15 世纪的欧洲外交是围绕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3)进行的。法国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奋起反抗侵略，出现了穆桂英式的民族英雄贞德率众抗击侵略者，终于收复了巴黎等全部失地，赶走了英国侵略者。法国王权得以加强，并于 15 世纪末成为第一个在中世纪和近代交替期中所产生的强有力的民族君主政治的先驱。“百年战争”前夕及其间几乎所有当时欧洲的主要力量都被卷入这一旋涡，展开了非常复杂的外交斗争。每一战役几乎都伴随着休战，而休战、妥协、和约都通过外交的斡旋与谈判进行。一旦休战与协议遭到破坏，战争又重新开始，随之而来便是新一轮的外交活动。

法皇路易十一(1461—1483)被称为现代欺诈外交的先驱。他深信诡计胜过实力。他深信只要是人都能收买，包括英王爱德华四世(1442—1483)在内。他派遣或收买的间谍，像蜘蛛网一样密布各国。他还有一大批才能出众的外交官和为数众多的秘使。他被称为“人鱼”，是一个有着特殊的欺骗本领和技巧娴熟、恳切表情、冷酷精明的伪善者，富有魅力又善于诱惑。他具有善于适应环境、布置复杂的阴谋诡计和欺骗的手腕。他警告他的外交官们要提防受骗，他说：“如果你受骗了，那好，你就设法加倍地骗人！”路易十一给欧洲外交的发展以极大的影响，他的方法完全改变了欧洲外交的性质和形

式。

欧洲人一直把意大利当作近代外交的故乡。意大利当年处于分裂状态，教皇无力加以统一，却有力阻碍其统一。然而由于频繁的贸易往来，在国家统一以前，意大利各城市已经产生了一种机构以保护其商人在国外的利益，这就是最早出现的领事馆。这些由母国任命的领事官员，拥有民事、尤其是本国侨民方面的贸易裁判权。意大利在15世纪有不少优秀的外交官，米兰公国的领导人弗兰西斯科·史福尔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当过法皇路易十一的教师。教廷也有不少杰出的外交官，格里戈里七世(1020?—1085)和英诺森三世是他们的代表。然而他们的外交手腕仍然是典型的诱惑、收买、伪善、失信、叛卖和间谍活动，比之他们的先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殖民地派有执政官，负有共和国重要的外交使命，他同时又是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威尼斯成为世界的“外交学校和外交工场”。威尼斯在许多国家驻有代表，还有大批秘密代理人和间谍。威尼斯外交的主要贡献是使之制度化，颁布了驻外代表的行为与活动的许多法令，并使常驻使节制度化，发明了外交密码，规定使节完成使命之后必须写出总结报告。意大利的外交方法，尤其是威尼斯的外交方法对当时欧洲所形成的专制君主政体的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开始了欧洲国际关系一个新时期。会议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欧洲秩序。它对欧洲的政治和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确认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承认新教、旧教享有同等权利，承认国王对其国内的宗教和世俗事务都有支配权。国王的权力扩大了，不再向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顶礼膜拜。经过几个世纪演变的常设外交使节制度首次用条约的形式确立起来，形成了近代以来的大使馆制度。不过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使团中，教皇的使节享有优先权，使团长总是由他领衔。

这个时期对后世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的欧洲政治思想家有意大利的马凯维利(马基雅弗里，1469—1527)、法国的让·布丹(1530—1596)和荷兰的格劳秀斯(1583—1645)等人。马凯维利在《王公论》一书中提出借助武力加强王权的外交策略思想，大发“野兽”论。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是运用法律，是属于人类特有的；一是使用武力，是属于野兽的。前者时有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特有的斗争方法”。野兽当然不懂得道德，所以他就公然主张抛弃道德观念，运用权术。他说一个精明的统治者“在遵守信用就要违反自己的利益时，或

《世界外交史》第1分册第138—142页。

杨闯：《外交起源、早期演变与常驻使团制度的确立》，《外交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马凯维利：《王公论》第83页。

者在约束他的理由不复存在时，就不必遵守信用”。他进而鼓吹“谁要取得伟大的业绩，谁就应当钻研欺骗之术”。马凯维利这一套论调，实际上是总结前人的经验以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并为这个阶级的传统外交提供理论依据。他的外交权术思想为后世一切剥削阶级所利用。

布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国家主权的思想，以与教皇的神权主义相对抗。他认为国家主权就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不言而喻，外交必须受君主的绝对支配。事实上，这是古已有之的思想。布丹的贡献在于确认各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应共同遵守的准则，成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依据。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与布丹不同，他是从国际法、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国家主权的。他认为国际关系不应以强权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依据，而国际法的准则应该是“正义”和公理。这些主张对于外交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当然，各国在接受这些原则时，无不使之服从于本国的利益。

欧洲近代外交：五强争霸

16—19 世纪的外交在世界外交史上称为近代外交，潘尼迦称之为“旧式外交”或“宫廷外交”，莫瓦特则称之为“欧洲国家体系”的外交。本节单表 16—18 世纪的欧洲外交，19 世纪的外交将在下一节另叙。

资本主义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由于商业联系的扩大、商业路线由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转向大西洋，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了。葡、西、荷、法、英这些海上强国，主宰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外交。王朝政治的利益和封建贵族的掠夺性倾向起着决定的作用。战争与外交并用、外交仍为战争服务是这一时期国际外交的特征。

这个时期的欧洲，存在着国际矛盾的三个基本焦点，存在着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根源。一是西欧的西、法、英及随后追赶上来的荷兰在商业上的竞争同殖民地的争夺发生冲突。二是东南欧列强同大土耳其帝国的关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三是东北欧诸国争夺波罗的海沿岸的统治权问题仍无结果。三个焦点互相交织，互相影响，时而出现复杂的联合。

这个时期欧洲外交史分为三个阶段：西班牙势力受到法国的挑战，两国进行尖锐的霸权斗争。法国势力达到高峰，其标志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外交学》第 46 页。

苏联《外交辞典》第 1 卷第 507 页。

《两方政治思想简史》第 68—69、77—78 页。

潘尼迦：《外交原则与实践》英文版第 85 页。

《外交学》第 35 页。

的缔结和法荷互争雄长。后来居上的英国同法国展开争夺殖民地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集中反映上述矛盾与冲突的战争有三次。一是“三十年战争”，以德意志为主战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德意志丧失了大片土地，加深了德意志的割据分裂局面。二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引起的“十三年战争”(1701—1714)，法皇路易十四(1643—1715)以西班牙皇位继承人自居，他想要争夺的是西班牙本国之外的意大利、尼德兰以及非洲、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实际上是在争夺世界霸权。战争以法国败北告终，签订了18世纪欧洲史上两个意义重大的乌德莱克和约和拉斯太特和约，除了法皇不得同时兼任西班牙王位，法西两国都丧失了许多土地。英国除了得到至关重要的直布罗陀海峡之外，还在北美得到法国大片的殖民地，并成为海上霸权国家。三是法国路易十五(1710—1774)同以英国为主所进行的“七年战争”(1756—1763)。

17世纪后半期到拿破仑战争为止的一个时期，法国人称之为“第二次百年战争时期”，即英法继续争霸，而“七年战争”是法国大革命以前所发生的最后一次全欧洲范围的冲突。战争的结果使法国丧失了在美国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土地，西班牙的海外领土大部分也落入英国手中，从而结束了法国在美洲的殖民统治，西班牙的势力也大大削弱了，保证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英国变成在资本主义发展上超过其他国家的“日不落”殖民帝国。美国的独立并没有动摇英国的基础。彼得大帝统治下的年轻俄罗斯仍不能望其项背。

马凯维利、布丹和格劳秀斯等人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已成为欧洲各国共同遵守的原则。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为了适应新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思想，产生了新的影响。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法国亨利四世(1553—1610)时期的舒里(1560—1641)提出“天然界线”论，认为可以掠夺的东西只有那种可以保存的东西，国家的强盛是有界线的；越过这个界线，就会引起敌对者的联合反对。因此而产生亨利四世强调的“政治均势”原则，以求保持欧洲各国间已形成的力量对比。曾任路易十二(1601—1643)首相的黎塞留(1585—1642)是世界外交史中第一个运用报纸作为宣传媒体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外交家。他提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法。18世纪英国提出的势力均衡的概念，左右欧洲外交达200年之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开始抨击君主专制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战争。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战争的增大，就产生了暴政”，“战争毁灭了”法兰西。伏尔泰(1694—1778)则痛骂君主专制的外交阴谋和王位战争为“非正义的”“愚蠢的”战争。法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对君主专制外交的抨击尤其猛烈。他们的杰出代表卢梭(1712—1778)对君主专制的秘密外交

《世界外交史》第1分册第244—248页。

亨利·基辛格新著：《外交》英文版第17—18页。

深恶痛绝，认为它掩盖了强化王室权力而从事领土侵略的实质。他认为国王只有两个目的：“对外扩张，对内专制”。他们公开宣扬的什么“社会福利”、“人民幸福”、“民族的光荣”，都不过是一些伪善的饰词。他甚至提出建立永久和平与消灭战争的空想的方案。英国边沁(1748—1832)和德国康德(1724—1804)也提出类似的主张。这种和平主义思想虽属转瞬即逝的运动，但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而且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外交理论的出发点。

外交事务的组织开始固定化，外交代表的常驻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外交官等级确立了，通用外交文书的格式制定了，外交礼仪大多隆重而夸张，法语成为外交谈判的通用语文，外交成为一门学问。资产阶级外交家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法国的塔列兰(1754—1838)，意大利的加富尔(1810—1861)，英国的克拉林顿(1609—1674)、坎宁(1770—1827)、帕麦斯顿(1784—1865)和索尔兹伯里(1830—1903)，奥地利的梅特涅(1773—1859)，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1815—1898)等人。各大国君主，如法国的拿破仑一世(1769—1821)和拿破仑三世(1808—1873)、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奥地利的腓特烈二世(1740—1786)和普鲁士的威廉三世(1859—1941)等人在外交舞台上都做过有声有色的表演。

这个时期的外交手段仍然是尔虞我诈，诱骗蒙混，贿赂收买，阴谋肆行，颠覆干涉，无所不用其极。英国外交官亨利·沃顿(1568—1639)说了一句老实话而丢官：“大使是一个为了本国的利益被派到国外去说谎的好人”。因鸦片战争备受马克思谴责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也是一位谎言大师。马克思说：“当实际上是容忍的时候，他会装出进攻的架势，而在实际上是变卦的时候，他会装成退守的样子；他善于巧妙地宽恕假想敌，使当日的同盟者走投无路，善于在政治上的紧要关头支持最有力的一方去反对最弱的一方，并且具有高声勇敢地乱吹而闪避敌人的技巧”。当时行贿收买的行径甚至侵入王室内部。据说有人向英王告密，说他的宫廷里有许多大臣私受西班牙俸给。英王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不算什么秘密。如果西班牙国家肯花比现在数十倍的俸给，他也不反对，这样西班牙用来对英国作战的钱就更少了。查理二世(1630—1685)就老实不客气地接受法国路易十四的俸禄。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1626—1689)曾当面向英国驻瑞典公使指出“你们英国人是伪善者”，指派这位公使的英国摄政克伦威尔就是一个“一手拿剑，一手拿祷告书”的人物。这种伪善在18世纪及其后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外交官的基本特征。黎塞留有一个据说是17世纪杰出外交官名叫约瑟夫(1577—1638)的托钵僧，法

《世界外交史》第3分册第28页。

《外交学》第4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88—489页。

《世界外交史》第1分册第202、194页。

国历史学家斥之为“恶臭的僧侣”，一般人则目为“灰色圣人”。他的本事是秘密地始终如一地在静悄悄的外交家的私室里为法国的利益和国王的光荣效劳。近代欧洲外交官的这些作风虽然古已有之，却是伴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而愈演愈烈。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因此可以肯定他说，只要资产阶级存在，这种作风是改不了的，这是外交艺术的一大污点。

当代欧洲外交理论家概括近代传统外交有下列特点：(1)在观念上把欧洲视为国际重心。(2)在思想上认为组成欧洲协同体的大国比小国具有更大的重要性。(3)各国都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具有共同职业行为规范的外交队伍。(4)认定外交谈判是旨在达到一定结果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清谈。(5)每个阶段的谈判必须严格保密。

19 世纪欧洲外交：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

19 世纪至 20 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属于近代时期，之所以要分开论述，是因为它对当代外交具有更直接而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期影响世界的大事是拿破仑利用法国大革命上台，并发动席卷欧洲战争以及远征莫斯科的失败；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出现与争雄；英国“光荣的孤立”政策的推行；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近代史，揭开世界现代史的外交。革命与反革命在这个时期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其结果是产生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这个时期粉墨登上外交舞台的主要角色是：拿破仑叔侄一世和三世，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普鲁士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英国的几位首相。其中尤以梅特涅和俾斯麦最为耀眼，两人相继左右欧洲局势达一个世纪之久。本节即以他们两人的表演为中心展开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

梅特涅和俾斯麦是欧洲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时期的外交家，堪称近代的纵横家。说来有趣，他们同张仪（前 310—前 310）和苏秦（前 340—前 284），都从外交出身当了首相。不同的是：前者出生于贵族世家，是欧洲旧秩序的卫道者，欧洲民主革命的死敌；而后者则出身贫寒，是旧秩序的破坏者，新制度的献身人。梅特涅为人机智、矜持、才思敏捷，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在大学里便以狡猾、虚伪、浮夸闻名。他风度翩翩，谈吐优雅，在外交界有“蝴蝶大臣”之称，是惯于拈花惹草的纨绔公子。他高攀奥皇重臣的孙女为妻，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向上爬。他在出使巴黎期间，为了接近拿破仑一世，竟勾引拿破仑的妹妹为情妇。而在奥地利处境最困难时，他设计诱使拿破仑向奥皇之女求婚，借联姻加强奥地利地位。他曾坦率面告俾斯麦：“就我的策略来说，说真话是对自己的不忠”。俾斯麦不像梅特涅那么斯文，

而对革命人民的残酷性则有过之。他从小就有“野人”之称，秉性暴烈，桀骜不驯，嫉妒自私，狡猾残忍，诡计多端，曾因一言不合与议会中的同僚进行决斗。他继承梅特涅的衣钵成为国内外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最凶恶的敌人，是迫害马克思终生流亡国外、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罪魁祸首。他力主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战争统一德意志各邦，以“铁血宰相”著称。

当年奥地利的处境是：东有力图左右欧洲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西有妄图征服欧洲的拿破仑一世，卧榻之侧则有不安分的普鲁士。梅特涅不但要克服普鲁士将德意志各邦统一起来的图谋，还要防止欧洲沦为拿破仑的属地；既要利用亚历山大遏制拿破仑的扩张，又不让沙俄过于强大。梅特涅的外交战略始终集中在孤立和打击普鲁士，镇压和扑灭国内外的革命运动这两个中心目标。为此，他采取“远交近攻”、“声东击西”的策略，时而联合拿破仑，时而拉拢亚历山大，纵横捭阖，忽左忽右，而以波兰、土耳其、巴尔干国家为牺牲。1808年他参与法俄联盟排斥英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与拿破仑达成交易。而当拿破仑进军俄罗斯时，他却向亚历山大秘密保证，不积极参战，以换取相应的保证，使奥免遭法俄夹击。随后拿破仑挥师进入维也纳，梅特涅被迫与之缔结反俄联盟，但私下里他却转向沙俄以求“摆脱那个套在整个欧洲身上的枷锁”。在拿破仑自莫斯科溃退途中，梅特涅由非自愿联盟转为“武装中立”，跟着又采取“武装调停”，以免拿破仑被彻底打败，欧洲霸权落入沙俄手中。

梅特涅在外交上的得意之笔，除了促成法奥联姻，加强了奥地利的地位，制约了拿破仑的对奥政策外，要算在拿破仑处境最困难的时刻，两人进行了一场斗牛式的会谈，迫使不可一世的法皇就范。也就在此时此刻，拿破仑后悔娶了奥皇之女，认为干了一件蠢事。他说：“我同她结婚，是想把新的和旧的中世纪的偏见和我这个世纪的制度融为一体。那是自己骗自己，现在我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也许我的主座会因此而倒塌”。在此时此刻的梅特涅眼中，身材矮小而又装腔作势的拿破仑显得“渺小”而具有“喜剧丑角”与“悲剧角色”一身二任的“讨厌相”。历史注定他在军事上败给沙俄的独眼龙库图佐夫(1745—1813)，而在外交上则输给纵横捭阖的梅特涅。1814年在维也纳举行由梅特涅主持的结束拿破仑战争以重新瓜分欧洲的会议，恢复欧洲各国被推翻的封建王朝。为防止欧洲各国民族革命卷土重来，梅特涅又于1815年在巴黎成立“神圣同盟”，纠合法、俄、普和欧洲多数君主国家加入这个反革命同盟，以维护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镇压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个堪与当年“佩六国相印”的苏秦比美，以欧洲国际首相自居的“欧洲贵族院”头头梅特涅，得意忘形地扬言：一切革命的乌合之众都

阿尔杰农·塞两尔：《梅特涅》第117—118页。

约翰·罗斯：《拿破仑传》下卷第292页。

阿尔杰农·塞西尔：《梅特涅》第50页。

将匍匐在他脚下。他没有料到，不过三年工夫，他便在奥地利反封建、反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出国门，亡命英伦。

有当代纵横家之称的亨利·基辛格以师承梅特涅自许，他对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推崇备至。斯宾格勒因阐发中国纵横家鼻祖鬼谷子的纵横捭阖之术而被目为现代鬼谷子，而基辛格则被比作现代的张仪、苏秦。梅特涅的外交谋略是在新形势下发展了中世纪已有的国际均势的外交实践，而保持国际战略平衡以维持国际秩序正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基辛格的这一思想已被当代资产阶级外交家奉为圭臬。就是这位基辛格，也坦白承认他曾经说过一些“用心善良的谎言”。

拿破仑一世的外交谈不上什么艺术性，那是一种掠夺性的、战争的、专权的、不择手段的外交，他的杰作之一是推行欧洲大陆政策，将崛起的英国摈斥在欧洲大门之外。这个以贸易封锁政策闻名的措施几乎维持到他垮台为止。

一如梅特涅视普鲁士为心腹之患，俾斯麦认为奥地利是德国统一的绊脚石。梅特涅憎恨拿破仑一世，俾斯麦视拿破仑三世为普鲁士世仇。俾斯麦虽然对拿破仑三世极尽讨好之能事，却把他当作同梅特涅一样的棋子。俾斯麦也推行“远交近攻”策略：远交法俄，近攻奥地利；远交英俄，近攻法国。他在外交实践中既有承袭梅特涅的一面，又有青出于兰，超越梅特涅的许多做法。

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和称霸欧洲是通过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的胜利并实行联盟战略取得的。俾斯麦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激怒法皇挑起战争，使法国陷于孤立被动。这便是欧洲外交史上有名的“埃姆斯急电”的故事。威廉一世(1793—1888)在柏林郊区埃姆斯温泉接见法国大使会谈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后，将情况电告出使巴黎的俾斯麦。

俾斯麦对电报未加增减地作了精心编排，突出侮辱性口气，故弄玄虚地透露给报界公开发表；他深信这将起“红布刺激高卢公牛”的作用。电文公布果然在法国激发一片反普鲁士的歇斯底里，使拿破仑三世怒火中烧，以此为口实，对普宣战。这场战争是俾斯麦策划的，给人的印象却是法国挑起的。俾斯麦事前已得到沙俄不介入的保证，法国孤立无援，屡战屡败，在色当陷入名将毛奇(1800—1891)的重围时，拿破仑三世亲率十万法军举起白旗，亲笔致函威廉国王：“愿将佩剑呈交陛下”。两天之后，巴黎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了，第三共和国成立。逃亡凡尔赛的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

《梅特涅回忆录》法文版第3卷第482页。转引自《梅特涅》第234页。

房立中：《鬼谷子全书》第623、626页。

马丁·梅耶：《外交官》第91页。

俾斯麦说过：“我的祖先没有一个不曾同法国人厮杀”。见艾伦·帕专尔《俾斯麦传》第7页。

《俾斯麦传》第178页。

屈辱的“城下之盟”。俾斯麦出于阶级本性，他仇恨革命甚于对波旁王朝的憎恶，乃挥师长驱直入，包围巴黎。1871年3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成立公社，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凡尔赛政府在普鲁士支持下，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然而巴黎公社的血没有白流，它的经验与教训推动国际共运以更加波澜壮阔的气势向前发展。

俾斯麦在制眼法国之后，便掉转头来对付俄罗斯。他害怕俄法接近甚于憎恨法国。俄国因恐波兰失控，宁愿接受俾斯麦的欧洲新秩序，他则支持沙俄对出海口非军事化的要求，双方以此成交。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同拿破仑三世作三次长谈，争取同法国建立密切关系，同时挑动意大利与奥交恶，陷奥于两面受敌之境。奥被击败后，俾斯麦又与拿破仑三世达成交易：普鲁士承认法国对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主权要求，法不干预普在德意志范围内的行动。有时他则扮演法俄调解人的角色，斡旋于法俄两国之间。然而一旦波兰发生反俄起义，他又支持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的镇压政策，与沙俄联合行动。镇压波兰民族要求，维持专制统治，是俾斯麦离间俄法关系的策略。镇压巴黎公社后，为了遏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又推动奥地利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1830—1916)、拿破仑三世和威廉一世于1873年成立“三皇同盟”。为了对抗沙俄的扩张，俾斯麦又于1878年在柏林同英奥缔约，瓜分俄国在土耳其的利益，压缩沙俄势力范围，并于1879年与奥订立秘密军事同盟，防止沙俄侵袭，开创了欧洲近代史上结盟外交新时代，因而导致1882年德、奥、意三国军事同盟。1884—1885年由俾斯麦倡导在柏林召开欧洲14国瓜分非洲的国际会议，确立了臭名昭著的“有效占领”原则。1887年俾斯麦又策划签订两个《地中海协定》即近东联盟，支持土耳其抵制俄国。俾斯麦这一系列活动导致20世纪初年欧洲正式分裂为英、法、俄与德、奥、意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从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由于俾斯麦的大日耳曼主义，第一次大战后又发展为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将世界投入第二次大战的烈火之中。

19世纪梅特涅的奥地利重建了欧洲协调，而俾斯麦的德国则以强权政治的铁血游戏重造欧洲外交。1896年清朝特使李鸿章在参加以“血腥的沙皇”著称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1896—1918)加冕典礼后，专程到已卸任而受冷落的俾斯麦隐居地向他请教中华帝国现代化之道。这使推行过侵华政策的元凶感到意外，他说他唯一的建议是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军队。李鸿章表示感谢，并以中国人传统的礼仪对主人说：“君将无憾于此生。”而俾斯麦却很悲观，他回答说：“这里和中国一样证实了古希腊一句谚语：‘物无常住，一切皆流’。”建立一支德国式的军队，遂成为从李鸿章到蒋介石的信条。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756页。

亨利·基辛格新著：《外交》英文版第17—18页。

《俾斯麦传》第306页。

189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欧洲，随着俾斯麦的去世，近代外交史上画上了句号。而在正受列强瓜分之痛的中国，由于周恩来的诞生却在阴霾中透出的一线光明。

被誉为具有外交天才、曾三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在俾斯麦为德国建立欧洲霸权的背景下，只能以“光荣的孤立”自命。“光荣的孤立”政策的特点就是不结盟外交。俾斯麦的结盟外交将欧洲大陆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变成他所开创的同盟体系的奴隶。“光荣的孤立”意在与结盟外交对抗，事实上却成为德、奥、意三国同盟和俄法同盟(1891)的支点，如果英国加入其中任何一方，就难以维持大陆的均势。所以“光荣的孤立”是英国为了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是传统的均势外交的一种手段而已。结盟与否，都是帝国主义的性质决定的，一旦不结盟对它不利，它便弃之如敝履，转而采取结盟政策。1902年的“英日同盟”宣告了“光荣的孤立”不再光荣了。

索尔兹伯里只记得帕麦斯顿在外交学中留下的名言：国无常友，亦无恒敌，只有不变的利益。

周恩来外交学：逆资产阶级外交而生

困扰着旧欧洲一切势力，特别是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60年之后，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彻底垮掉了，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诞生了。从1917到1992年苏联解体，这个苏维埃国家在20世纪的世界外交中起过独特的作用。

潘尼迦称列宁的外交为新式外交，以区别旧式的传统外交。列宁在组建苏维埃外交机构时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国家机构中一个特殊的机关。我们不容许任何一个曾在沙俄机关里稍有影响的人物进入这个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凡是稍有威信部门全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因此这个机关已经争取到(可以这样大胆地说)一个经过审查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这是为了划清与资产阶级外交的界线而制定的“另起炉灶”的方针。

与此同时，苏联决定按新方式确立国际关系原则，废除秘密外交，并且

《世界外交史》第3分册第48页。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757页。

基佐：(1787—1874)为法国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曾任外长和总理，著有《欧洲文明史》等书，否认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共产党宣言》引言。

《外交原则与实践》第11页。尼科松则认为新式外交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其特征是殖民地扩展的欲望；商业竞争的加强；交通速度的提高。(见《外交方法的演变》第79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3页。

在一个半月内就出版公布了七卷沙俄同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文件，包括 100 多项条约和其他重要资料。这就给秘密外交和外交谈判的机密性以重大的打击，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强烈反对，而要求停止秘密外交的呼声则响彻欧洲。

列宁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我们公布了一些秘密条约今后还要公布。任何怀恨和诽谤都不能阻止我们这样做。资产者老爷们所以狂怒，是因为人民已经看清他们是为什么被赶入屠场的”。

遗憾的是，列宁逝世之后，苏联的外交渐渐资产阶级化了。苏联后来不但没有废除而且发展了秘密外交。从外交学的角度说，谈判在特定情况下保持秘密，不但可行，而且必要。问题是为什么保密，保的是什么密。二战末期，斯大林(1879—1953)、罗斯福(1882—1945)、丘吉尔(1871—1965)所签署的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事先既不征求中国意见，事后也不及时通告中国，这种秘密外交带有与资本主义列强分赃的性质，就完全背弃马列主义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更加资产阶级化，这是人所共知的。曾任苏联驻美大使达 25 年之久的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欺骗工具”，甚至将冷战结束(指苏联解体)归功于里根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外交学引进的另一个因素是“威尔逊主义”。美国总统威尔逊(1856—1924)1918年1月参加巴黎和会，打着和平的幌子提出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纲领“14点”，旨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威尔逊是“公开外交”的倡导者，他在“14点”的第一点中规定将来应该有“公开缔结的公开和约，今后不应再有任何秘密性国际协定”。“公开外交”后来则披上“民主外交”的外衣。然而，他所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却不是“公开缔结”的，他在密室里同英法等国首脑举行了 150 次秘密会议。威尔逊分不清“公开条约”与“公开缔结”，即政策与谈判的根本区别，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虚妄的境地。一个月后，他又提出四项原则，包括建立国际联盟。第二年，这个提案被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历史对威尔逊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他在竞选连任总统时失败了，美国国会否决了国联盟约，美国也没有成为国联的成员。朝令夕改，正是美国外交的一个特点，也是美国经常失信于国际社会的污点。

维戈兹某等编：《外交史》第 3 卷第 88 页。

《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323 页。

多勃雷宁：《秘密》英文版第 477 页。他说“结束冷战”是指“在苏联内部和东欧各国最终实现自由化”（第 347 页）。

尼科松：《外交学》第 83 页。

《国外外交学》第 124、84 页。

详见《世界外交史》第 4 分册第 59 页。

基辛格认为 21 世纪将是分崩离析与不断增长的全球化并存的世界。21 世纪至少有美、欧、中、日、俄，可能还有印度六个大国，再加上一大批中小国家。美国的政策将大大不同于以往的孤立主义和冷战时期事实上的霸权主义。而其他的主要国家也将面临其调整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的困难。然而他竟主张已被美国实际上抛弃的“威尔逊主义”作为世界新秩序的准绳。这就表明，美国外交已耍不出什么花招了。

国联是外交史上第一个企图协调国际关系的世界性组织。它意味着欧洲人垄断的外交结束了。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有了国联失败的经验，才有二战后在宗旨和体制上比较完善的联合国的建立。虽然，联合国也不能完全摆脱主要由美国操纵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它不可能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凡尔赛和约》已孕育着第二次大战的矛盾。二次大战虽然由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反法西斯战争，然而由于战争使帝国主义势力受到极大削弱，被压迫上百年的一系列殖民地国家，从亚洲到非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独立解放斗争，纷纷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形成了第三世界的强大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更加激化了。于是出现了在二战中实力增强的美国的“实力外交”，公然侈谈“美国必须保持其世界各国领导者地位的决心”。

出现了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说，主张不惜以原子武器摧毁“苏联铁幕”，主张建立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同盟，主张建立“英语各民族同胞的联合”。于是在实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英法在敦刻尔克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1947 年 3 月），一年之后又在布鲁塞尔签订关于建立西欧军事政治联盟条约，跟着又扩大为包括美加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方外交中传统的联盟战略又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了。1954 年美日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跟着美国又拼凑一个“东南亚国家组织”。1955 年 2 月又组织了巴格达条约集团。1955 年 5 月欧洲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华沙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华沙条约组织宣告成立。美苏争霸，时而对抗、时而勾结的冷战持续到苏联解体。

1950—1953 年曾任职北京并同周恩来有过频繁接触的印度大使潘尼迦在离职后从事世界外交史的研究中，对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作了如下评论：随着革命的中国的出现，“以往远东国际政治的所有观念突然垮掉了。过去一个世纪远东的地位是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的权威这一牢固的基础之上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那种权威不复存在了。不幸的是，西方国家在外交关系上未能作出必要的调整”。潘尼迦认为阻碍这种调整的

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对历史的延续性存有幻想。欧洲国家记忆犹新，

《外交》第一章《新的世界秩序》。

潘尼迦：《外交原则与实践》第 12 页。

杜鲁门 1945 年 12 月 19 日的咨文，载美国《国会记录》第 91 卷第 12398—12399 页。

《纽约时报》1946 年 3 月 6 日。

只不过几年以前，他们的炮舰一出现，中国便会立即屈服；从历史上说，现在的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这种观念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幻想。他们拒绝接受中国的变化。直到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一番较量，美国人才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中国，是一个同过去他们所了解的那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完全不同的国家。二是由于种族偏见，欧洲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仍未消除，对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要他们接受他们在东方那段辉煌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不愉快的现实，不是容易办到的。于是过去 100 年来他们在东方营造起来的外交体系彻底垮台了。

潘尼迦的分析意味着新中国揭开了世界外交的新纪元，因为一个旧的外交体系的垮台，必然有一个新的外交体系取代它；国际外交不会有真空。这个新的外交体系，就是周恩来外交学；这个世界外交新纪元，是由周恩来开创的。

那么，周恩来所开创的外交新纪元在哪些领域有别于旧式的世界外交呢？本书试图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只能简要地作几点提示。

第一，世界是一个其成员互相联系而共存的整体。这种联系或紧或弛，但总的趋势是越发密切，谁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自外、凌驾于这种关系。

第二，世界所有成员都谋求生存和发展，而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和平。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要求。国际外交应体现这种要求，并为其实现而努力。争取世界和平、反对战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第三，世界各国有大小、强弱和贫富之分，但是大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应当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这是和平与发展的条件。贫富的差别将长期存在，国际外交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竭尽所能去缩小乃至消除南北之间的差距。在这种差距消除以前，大国对小国只有多方照顾的义务，而没有压迫欺凌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各国人民另一个共同任务。

第四，国际间的利害矛盾和争端在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应通过和平协商，谋求友好解决。在协商中，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照顾对方的利益，做到平等互利。求同存异、互谅互让是友好协商必须遵循的方针。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是强权政治的表现，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第五，坚决反对任何军备竞赛；主张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裁减常规军备，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第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权利。

第七，“革命不能输出”。中国不向他国输出革命，也坚决反对别国以其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政治制度强加于人，反对以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多极化的世界，比一个单一的世界更有活力，更

加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

第八，和平共处是国际外交的总的要求。实现和平共处的主要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这些原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是互相联系的整体，离开任何一项原则，不可能和平共处。

周恩来所开创的这个世界外交新纪元，同资产阶级外交中的一切损人利己的思想、行为、作风和倾向划清了界线，并宣告与之彻底决裂。然而新与旧的更替和决裂，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周恩来生前身后，地区战争从未间断，民族矛盾，国家冲突，领土纠纷，经济争端，仍然层出不穷。美国对新形势新外交仍未作出必要的长期的调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在它的外交中仍占优势。到了克林顿总统手里，美国实施其对外政策的手段只剩下“制裁”、“人权”之类强加于人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棍棒，美国已无外交艺术可言。诚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克林顿几乎继承了历任总统的一切弊病”。另一位美国评论家在分析克林顿出尔反尔的动机时说，别以为他的决定是基于道义上的考虑，“首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从来没有受道德推动过，决定美国议事日程的恰恰是私利”。“克林顿政府的美国成了对敌对友既不可靠又难以预测的国家。”

当然，这种外交逆流阻挡不住周恩来所开创的世界外交新纪元的发展和普及，周恩来所阐述的外交原理及其体现的外交艺术的普遍性是不能抹煞的，世界外交新纪元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欧洲一位当代外交理论家早就说过：“健全的外交原则是不可改变的，最终必将获胜，从而消除新旧外交之间的过渡给世界造成的混乱”。——

罗纳德·凯斯勒，《白宫内幕》，转引自《巴黎竞赛画报》1995年5月4日出版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白宫：总统变得像君主，成了偏执狂》。

《洛杉矶时报》1995年6月4日。

《华盛顿邮报》1995年7月30日。

第五章周恩来外交队伍的组建

本章以周恩来外交队伍为题，意思是，这是一支周恩来式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队伍。

外交人才是外交工作的关键

斯大林说：“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又说：“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干部决定一切”成为苏联当年干部建设中最流行的口号。

我国早在古代已认识了这一点。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称霸，肯赖管(仲)鲍(叔牙)；楚材晋用，晋乃败楚；楚庄(王)用贤，始敢问鼎；秦举客卿，六国尽灭。“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说苑·尊贤》)这是古时用人经验教训。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培养人才，首先要进行教育。早在西周时期(前 1045—前 771)，统治阶级已十分重视对其子弟进行严格的教育。京师设有“辟雍”(四周有水，形成壁环；像壁园又以法尺，于雍水侧，像教化流行。明清年代改名国子监)，诸侯国设有“泮宫”(鲁僖公作学宫于泮水之上，故名)、“庠”、“序”、“校”等学府，所以说“学在官府”。春秋依然，孔子及其后始有私学。战国的“稷下学宫”已开百家争鸣之风。秦汉以后，公私并举。这种施教方法，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对外交人员进行专业教育，则始于近代的欧洲。

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尤其重视群体的作用。早在 1914 年 9 月他在南开学校的一篇作文中便提出“爱国必先合群”的论点，把它提到“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真诚”的高度。所以他从小就爱结交朋友，“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在革命斗争中，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为了挽救同志，竭尽全力，隐蔽精干，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护党的骨干，他不怕入虎穴，下地狱。他对李富春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陈云也承认，“没有他，局势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

发现人才，起用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成为周恩来思想实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外交人才的要求便被纳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373、458 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 13 页。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528 页。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 441、440 页。

入这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在人为。外交的成败，取决于执行政策者的素质与才能。

未雨绸缪：建国前积极筹划

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时期，已有外交部的建制；王稼祥(1906—1974)任外交委员，即外交部长。实际上以外交代表名义同当年国民党地方和中央代表进行谈判的只有潘汉年一人。他是新中国的前身唯一的“特命全权大使”。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央长江局工作，设立国际宣传组，开始有组织的对外宣传，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系。周恩来自己也开始同外国驻华使节接触。1939年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央南方局工作，对外宣传小组改称为南方局外事组，进一步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活动。皖南事变后，又在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成员到达延安，周恩来即致函重庆外事组，明确提出注意储备外事人才的要求，并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军人员来边区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指出，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1945年为了避免内战进一步发展，周恩来同国民党张群和美方马歇尔将军在北平组成三人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地区又有三方组成的军调小组。党开始集中了170名外事干部，后来增至600余名，耿飏、黄华、冯铨、伍修权、柯柏年、黄镇、董越千等人，都是当年这支队伍的中坚。

1946年11月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周恩来从南京撤回延安后，预见战争必胜，更加重视外交队伍的建设。在转战陕北的繁忙军务中，他便着手筹划建国后的任务。他立刻把储存在脑中的重庆办事处、南京梅园新村、北平军调部以及在其他地方做过外事工作的干部名单开列出来，同时将已在晋西北的干部先集中起来，成立中央外事组，叶剑英任组长。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在已经解放的各地大中城市中相继建立外事机构。大量外事干部、翻译人才的集聚和调配，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准备了一个基本班底。这些同志在建国后成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骨干力量。

周恩来十分重视外事干部素质的提高。他强调要加强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业务能力，以适应将来外交工作的需要。他认为外事干部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学习。

第一，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思想整风。“必须从思想整风中打破资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79—80页。

《周恩来年谱》第580—581页。

《叶剑英传》第342、344页。

吴瑞章、王永钦：《周恩来在建国前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第317页。重复引用时简称《周恩来研究》。

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在外交工作中，他要求一定要站稳民族立场，一扫过去半殖民地的奴隶思想，不要见了外国人就卑躬屈节。他强调要有一种民族观念。他说，我们是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应该关心整个民族的胜败兴亡。他要求把爱国主义与排外分开，坚持爱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但不排外，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他要求外事干部一定要遵守外事纪律，一切外事活动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领导要亲自掌握外事问题的处理。他要求在接待外宾工作上一定要诚实朴素，不搞小动作，不要装腔作势；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隐瞒，不掩饰，对于好的建议和意见，要诚恳接受，虚心求教。他要求对外工作要采取认真的态度，不是单纯的交际一番，人走了就完事大吉。一旦把门打开了以后，还要继续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准备建国后做好新中国的外交。

第二，他强调外事干部要深入实际生活，安排一定时间，轮流到群众中去，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觉悟。

第三，他强调外事干部要学习外语会话、写作和翻译，努力提高外语水平，提高业务工作能力。

周恩来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在学习中应该与外事组的工作有机地联系，又要与参加土改和扩军等实际生活相联系。他特别强调要注意总结过去的外事经验。他认为只有具备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才能掌握政策，才能在外交场合中运用自如，以至战胜对方。

1949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了建国后的外交问题，强调我国人民百年来在外交上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要有气概，要反对恐美媚外，长自己的志气，去掉国民党买办作风。

由于周恩来这种“预则立”、“未雨绸缪”的筹措，新中国成立前夕，外交工作已经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外交部的组建

新中国一成立，外交部随之诞生，外交工作也就开始了。周恩来以总理身分兼任外交部长近九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外交部。前三个外交部，即清代的总理衙门(后因《辛丑条约》改力外务部)、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都是周恩来所说的“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跪着办外交”的外交部，只有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才是独立自主的人民的外交部。

周恩来在中央外事组学习计划上的批语，1947年7月31日。见《周恩来年谱》第741页。

《周恩来研究》第317—318页。

《周恩来年谱》第806页。

《我们的周总理》第537页。

外交部代表谁，为了谁，截然不同，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的差异。

建部伊始，急需两套人马：一套主持部内工作，一套派往国外担任重要职务。主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一是来自部队中各级领导，包括兵团级、军师旅直至团级政工干部。首批驻外大使多数是兵团级干部，如袁仲贤、黄镇、耿飚等。二是来自地方有过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如章汉夫、王炳南、乔冠华、龚澎、宦乡、王任叔(巴人)等。三是自己培养的外事干部，他们多数充任驻外使馆的秘书工作和部内科(处)级骨干，外语干部则充任翻译。四是国际问题专家和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的起义人员，他们多数担任外交部国际法顾问或专门委员，如周鯁生、梅汝璈、李浩培、刘泽荣、凌其翰等。部内总数只有 170 人。偌大一个部，开始只有章汉夫和李克农两名副部长(王稼祥挂名出任驻苏大使)和王炳南(办公厅主任)、伍修权(苏欧司长、随后升任副部长)、乔冠华(代沈端先即夏衍任亚洲司长)、宦乡(西欧非洲司长)、柯柏年(美澳司长)、龚澎(新闻司长)和董越千(国际司长)等八九条枪便把全部的主要工作撑起来。这百把人构成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骨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等方面的人才，都是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的精英。这种干部构成既体现了“另起炉灶”的精神，也是为了适应外交关系多方位多层次的需要。

外交机构的建立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而铺开的，是一个由下而上又由上而下的过程。1948 年秋，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下设外事处。这是党在政权建设中最先建立的一个具有实际职能的外事机构。1949 年初，北平解放了，军管会设外事处，接管了国民党驻北平外交特派员公署。新中国外事工作中一些经常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后，外事处随之成立，周恩来亲自安排各处负责人。全国解放后，又在昆明、拉萨等地设立外事处。

培养外事人才的院校也是从解放区首先建立起来的。早在 1941 年已在延安建立了外国语学校，其后辗转华北各地，解放后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外国语大学。1946 年组建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学院并以之为基础成立了外事学校。全国解放后，华北联大改建为中国人民大学，内设外交系。1955 年以人大外交系为基础扩建为中国外交学院。同时在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设立东方语系和国际政治系，并从全国重点大学招收研究生。这些院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外事人才。

50 年代中期，一批国际问题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外交部首先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后改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各外事部门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研究所，如苏联东欧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拉美研究所等。现在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地区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已将全世界问题的研究囊括在内。各地各院校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机构，著名的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广西印支研

究所、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及其后的台湾研究所等。

50年代中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一系列外交干部的管理和培养体制。如外交部总体布局的构想“三三制”，即1/3在国内，1/3在国外，1/3储备培训，以解决国内外定期轮换以及管理、培养、调配、使用等问题。1955年制定了《培养外交干部十二年规划》，随后修订为《培养外交干部七年（1956—1962）规划》。在培养翻译干部方面，又于1958年制定了以通用语种为主，提高质量，增加数量，补齐语种为中心任务的《十年规划》。1959年制订了培养56个语种的初级翻译的三年规划。1964年又为外事口制订了培养初级外语人才的五年应急计划。这就不但为外交部充实和扩大了外事队伍，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作了相应的准备。

我国规定外交部的主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办理外交事务，发布国家重大对外政策和决定，公布外交文件和声明；负责外交谈判和交涉，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外交文件；参加联合国和政府间的有关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的活动。这实际覆盖了外交工作的主要方面。

外交队伍的思想建设

周恩来十分重视外交队伍的思想建设。解放战争期间，已对开始形成的外交队伍进行过一次整风，重点是划清与旧中国外交的界线。此后，他仍经常强调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鲜明提出，对旧中国的外交要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要同它彻底决裂，要摆脱任何屈服外交传统的影响与束缚。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要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建国前夕，周恩来已明确地阐述了即将创建的新中国所要采取的基本外交立场，他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他生前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一外交立场。

周恩来进一步提出，贯彻新中国外交方针，在思想领导方面，必须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下列七个方面：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尊重和学习。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

《中国政府机构名录》1996 / 上卷第2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

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关系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一定很危险。外交工作中不容许个人打算，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把原则当教条不是政治，是教条主义。

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 —

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向广大干部宣讲过好“五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但一般干部，所有外交人员都要过好这“五关”。他把过好“五关”提到解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没有人不同这“五关”相联系，过不好这“五关”就谈不上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谈不上革命，谈不上做好外交工作。

周恩来说，过思想关就是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辈子的事。思想要不落伍，就得跟上不断前进的时代。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

过思想关要联系自身的阶级关系，还要联系自己工作的周围环境的工作关系，接触事物中的阶级关系。这对外事工作者尤为重要。周恩来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谈到统战工作中同国民党高官和美国显要的复杂关系，从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谈到周围环境的复杂情况，联系自己的思想。他还自告奋勇带头改造思想，经常反省，经常“洗澡”，一直改造到老。

1963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勉励在国外工作的同志说：“入污泥而不染”（北宋周敦颐《爱莲说》），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他一向反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外事人员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

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方能看出立场稳不稳；而且不是看一时一事，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要看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和党性，特别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否知过必改，帮助人进步。

过社会关之所以重要，因为中国社会特别复杂。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一个北京城，到处都可以看到旧的习气。要把北京这个社会改造好，需要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周恩来讲这话已经 30 多年了，北京这个社会改造好了吗？可见周恩来对这个何等艰巨的任务作了多么深刻的剖析！

亲属关不只是指直系亲属，还有本家，亲戚。到底谁影响谁？如果解决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过这个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周恩来显然已经觉察到干部子弟问题，认为十分重要。他呼吁领导干部做出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他还以秦二世亡秦为例，大敲警钟。——提倡计划生育后，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小皇帝”、“小公主”，这个问题更突出了。

生活关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物质上应知足常乐，使艰苦朴素成为一种美德。这样就会心情舒畅。自己节约，增加集体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尽快将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上应全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疾苦为忧，以世界前途为念。这样，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做一个好的革命者要树立四个观点：第一是革命观点，第二是阶级观点，第三是群众观点，第四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无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扼要的概括，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世界观上最完备的教科书。关于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周恩来也讲得很清楚。他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类是公而忘私，第二类是先公后私，第三类是半公半私，第四类是自私自利。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该追求高的境界。但是“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因而又提出“先公后私”。对世界观的改造，周恩来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他认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周恩来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这些论述，是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一大贡献。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终生不懈，也要求所有革命干部严于律己，不断进步。对外交人员的这种要求，在世界外交学中则未之前闻。

周恩来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在同一场合的讲话中，历数官僚主义的 20 种表现，“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50 年代许多老部长最怕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常当众给那些有官僚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23—428 页。

《我们的周总理》第 443—444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8—422 页。

主义作风的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责问：“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个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当面汇报更难：怕问数字，怕问细节。有时被问得满脸通红，浑身冒汗。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周恩来对外交部各级干部的要求同样严格，很少有人敢对工作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

十六字诀：外交人员的金科玉律

1951年周恩来为外交干部规定了“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这16字便成为所有外事干部的座右铭，也应该是全国各条战线工作人员的准绳和箴言。它是周恩来长期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干部德才兼备的概括与提高，是理论升华的结晶，是永远策励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金科玉律。

周恩来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这16字诀作过详细解说。就总的方面而言，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懂中国历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反对失掉民族自尊心”，他说，“加强我们的自信，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对我们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它与国际主义是结合着的，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以下就16字诀逐条举例说明：

站稳立场。早在40年代，重庆有一名外国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共产主义与你的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当年有一种别有用心心的诬蔑，说中国共产党员没有国家观念，因为他们的祖国是苏联。解放后，也有些记者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周恩来的答复表明，都是共产主义者，由于国别不同，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完全一样的。共性之中有个性，这是经常要注意的问题。

周恩来对作为中国人的感受是很深的。他经历了中国人受尽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经历了中国人陷入苦难深渊的年代。拯救屈辱的祖国，解放受迫害的人民，成为他献身革命的动力。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牺牲，新中国诞生了，人民翻身了，应该为国家争气。政治上站稳立场，首先就是要站在中国人的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38—139页。韩念龙在外交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也谈了类似情况，列举了很多生动的事例。

《我们的周总理》第356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3页。

立场，要热爱祖国，热爱民族。周恩来多次说过，一个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作为一个外交干部，首先要处处体现出他是一个中国人。周恩来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穿的服装，用料一定要国产的。一旦有了国产手表，他便戴上，并向外宾介绍，引以为荣。有了国产轿车，他便不再乘坐洋车。迎送国宾的汽车一律改用国产的。甚至剃须刀片他也要求用国产的。周恩来经常接触外宾，也让外宾从服饰和容貌上首先感到他是一个庄重的中国人。他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爱国必须了解本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国情。周恩来从小就注意中国历史的变迁，熟悉历史掌故。他几乎了解全国两千多个县市的方位。在同印度人谈判边界问题时，他了解具体地点的情况令对方吃惊。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更是情有独钟，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对于国情，他也是了如指掌，不仅令外宾敬佩，连主管同志也自叹不如。

爱国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国家利益，既包括阶级的和民族的利益，也要顾及全人类的利益。周恩来的国家利益观，正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国家的最高利益莫高于国家主权。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领土不容侵犯，人民的生活不受他国干扰，内政不让他国干涉。外交，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不仅表现在内政不受干涉和诸如拒绝赫鲁晓夫组建中苏联合舰队和设立长波电台等重大的问题上，许多看似细微末节的小事，也不能忽视。1971年1月，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美国总统发言人向我方提出，美方已准备花100万美元租用通讯卫星以供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大批记者播发电视，图片、电讯之需，要求我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方承担。周恩来闻报后，立即指出，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问题，并指示答复美方，请他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在租用期间，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同意美方事先申请使用权的要求，并向使用者收取费用。这位发言人听后很惊讶地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同意你们的办法，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由于周恩来的坚持，也出于对周恩来的尊重，尼克松不得不放弃乘坐自己专机的一贯做法。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这种处处维护国家主权的类似事

据韩素音在《我与周恩来的九次会见》文说：“一位见过周总理七次的印度驻华大使写的回忆录里，说周总理对中印边界比谁都清楚，山多高，谷多深，什么村子，他都知道。印度外交部都不清楚的，他清楚。他们觉得要知道自己的边界、要问中国人。”见《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404页。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311—312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50页。

例，列举出来，可以编成一本畅销书。

掌握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生命也涉及国家民族的生命。这是每一个干部都明白的道理，外交人员尤须铭记在心。周恩来早在新中国外交部的成立大会上就已提出告诫说：“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大家都知道大使是“特命全权”代表。在我国春秋时期，已有“臣义而行，不待命”的思想和做法。《公羊·庄公十九年》解释说：“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这是因为当年信息传递全靠人马输送，应允许出使人员拥有处理未及请示或虽有训令但不合事宜的权力，否则将使国家受损。这也是欧洲中世纪外交的通例。鲁国叔孙豹在参加“弭兵之会”（前546年）对如何处理晋楚两霸要求各自的与国“交相见”（轮流向对方霸主朝贡）的问题，断然不顾国内“视邾滕”的指示（采取与小国邾滕相同的立场），毅然与诸侯并列缔约，从而避免将鲁国降为附庸的屈辱地位。叔孙并未因此受到朝中的责难，可见他贯彻了“臣义而行”的思想。降至战国时期，纵横家“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还被认为是他们的专长（《汉书·艺文志》）。春秋战国的这些外交人物都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意义的“特命全权大使”。然而当代外交，其范围和内容之广泛复杂已大大超过古代，而且现代的电讯传递只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完全来得及请示国内并得到及时的指示。所以周恩来常常告诫说：“特命全权”其实是“授权有限”。

陈毅曾对一位新任驻外大使说：“特命全权，好像有多大权力似的。跟你实说，权力有限。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请示汇报。”他继续说道：“不要说大使，就我这个外交部长，也权力有限嘛。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我们国家外交政策，外交动态，都是主席亲自过问，总理亲自掌握的。你们刚到外事口，还不晓得外交的厉害。你在外边，往来电话、对外交涉，都要详细记录在案，一事一报。占书上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改几个字送给你，叫做‘大使在外，不可自作主张’。”诚然，授权有限只是对内而言，对外一言一行，人们仍以为是代表国家的。掌握政策，可不慎乎？

钻研业务。前已说过，周恩来关于学习的名言是：“活到老，学到老、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页。

《中国外文官丛书·开启国门》第258—259页。

干到老，改造到老。”公元前 521 年晋卿士鞅访问鲁国，因为不知道鲁先君之讳，闹了笑话。他回国后，逢人便告诫说：“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唯不学也。”（《国语·晋语九》）其实当时已有“入乡问俗，入门问讳”（《礼记·曲礼上》）之诫，士鞅太大意了。周恩来熟读经传，这个故事无疑对他一生好学起了策励作用。他不但向历史学习，而且向现实学习；他不但向书本学习，而且向群众学习；他不但向中国人学习，而且向外国人学习。他时时学习，处处学习。

有一位外国学者说：“周恩来的领导才能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那就是他对外部世界有广博的知识。中国领导人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在外国的资历。甚至著名的列宁，能否同周相提并论，也是值得怀疑的。”

周恩来懂英、日、法、德、俄五种语文，能熟练运用英语。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正因为周恩来深深懂得学习的重要性，他不但强调外事干部要学习，而且亲自为他们安排，甚至现身说法，手把手地教导。

早在武汉时期（1938 年），周恩来就在亲自领导的国际宣传组强调外事干部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搞外事工作一定要多动脑筋，还要做到五勤：一是眼勤，就是要多读马列和毛著，深入领会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针。二是耳勤，要多听和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三是嘴勤，要积极地有效地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批驳错误的东西。四是手勤，凡事要自己动手、决不可养成懒惰的作风，依赖旁人。五是腿勤，要多走动，广泛结交，不能深居简出，等人上门。周恩来 1914 年在南开的一篇作文中便提出了“一生之计在于勤”的思想，认为“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五勤”正是这一思想的发展和运用。到了重庆以后，外事工作进一步展开了，外事干部需要学习的迫切性也随之提高了。有一次他在接见《新华日报》的同志时，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也要博，不要自满”。即使是在国内外斗争已日形尖锐激烈的南京梅园新村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放松对外事干部的学习要求。

建国后，他经常勉励外交干部，要有四海为家干一番事业的抱负，要一辈子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学习和掌握外交业务知识，做到“又红又专”。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教育等基本知识，还应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

要搞好外交业务，还要努力掌握完成本职工作的基本功。除了上述“五

费力克斯·格林：《围墙内外》，《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128—129 页。

《回忆周总理在解放前的外交战斗》，《敬爱的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续编，第 122 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 7 页。

《周恩来传》第 503 页。

《研究周恩来》第 303 页。

勤”，他还要求外交干部做到“四多”、“一化”。“四多”已如前述。“一化”指“外语化”，要学会外语。__他甚至要求主管国别事务的同志，成为了解该国的一本“活字典”。

周恩来要求驻外使节向驻在国学习，指出一个民族能存在到今天，一定有其长处，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要学习驻在国语言，尊重驻在国风俗习惯，熟悉驻在国情况。周恩来特别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思想。1952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主义表现，便抓住这个问题，大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平等待人。他说，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孟子·梁惠王下》）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谈话，强调要用阿拉伯语翻译。他还说，去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要学《古兰经》，了解宗教情况，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学吃牛羊肉，尊重人家的款待。他自己就同主人一起吃当地的饭菜，主人很高兴。

周恩来对外事人员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千方百计提高大家的学习自觉性。有时他利用分析研究国际形势的机会，向在场的同志询问国际上和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属于重要情况，主管同志答不上来，他就要责备，然后耐心他讲解学习业务知识的重要性，外事干部应具备的知识范围和怎样提高业务知识的水平等，引导大家钻研业务。他有时还考问一些中外古今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引导大家注意掌握必要的广博的知识。

一位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建国初期，从部队调来一批干部，总理为他们开办外交业务学习班，还亲自参加讲课，使他们逐渐学会办外交。他还要求使节到农村参观访问，了解国内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要使节列席一些重要会议，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全局，以便更好地代表国家出使国外。__使节出国前，他在接见中往往介绍该国的主要情况、对外政策以及同我国的关系，并交代使馆的职责、任务、机构、编制原则和工作方针、方法以至如何开展工作等，使他们心中有数。凡有使节回国，他总是亲自接见，听取汇报，一起研究问题，给予具体指导。人所共知，周恩来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对外交干部也不例外。周恩来经常提醒各级领导，要公平地对待和使用干部，以团结为重，律己严，责人宽。对犯错误的干部，真正做到“改了就好”，从不抓辫子，打棍子。“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再叮嘱外交部的当权派，下放干校的司级干部，非经他同意，不得擅自调离，从而为外交部保存了一批外交骨干。他关心职工的群众生活。他自己常常在节假日深入到部内食堂，与大家聚餐，或参加周末舞会。即使他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了，也从不间断，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止。

遵守纪律。列宁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

《我们的周总理》第 537 页。

《我们的周总理》第 537—538、538 页。

弱了一点(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周恩来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有口皆碑。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已在实际斗争中体会到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党员入党,遵守纪律成为誓词的主要内容之一。泄密对党的危害,有时可以使整个组织遭受破坏、所有负责人被捕杀的严重地步。他对不该透露的事情,真正做到守口如瓶,即使对朝夕相处的夫人也不例外。周恩来对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叶剑英从长期的并肩战斗中深有体会。据当年参加北平军调部工作的李聚奎将军回忆、叶剑英对此作过如下交代说,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注意:第一,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考虑,话一说出口就不好改变;第二,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第三,要注意保密,防止他人钻空子;第四,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不言而喻,这正是周恩来的要求。

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一个个大城市即将解放的时刻,周恩来再三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指示“凡有关外交行动和外交政策的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方可执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跟着又严令各部队入城后必须“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违犯”。“凡外事上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央已定方针可循的,一概不要忙于答复,以便向中央请示,并留回旋余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立即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发出指示: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们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不要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往来,但对其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也不必进行登记。随后又发出指示说:一切有关外侨事件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

建国后,他经常对外交干部说,路线的正确执行必须靠纪律来保证。外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事关涉外大节不准边斩边奏,更不准先斩后奏。因为某一事件从局部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局看,这样做又是有损全局的,因此必须请示中央全面考虑,作出决定。他对驻外大使们说,外交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能形成力量。外交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所有不同乐器的演奏者都要统一在一个权威的中央指挥下,进行有规律的合奏,才能有效地配合,演奏出优美和谐的乐章来。周恩来出国参加会议或访问,每天不管多晚,都要写电报向中央报告请示。凡遇重大问题,立即请示中央,一直等到中央复电才执行。周恩来在遵守各项工作纪律方面,给大家做出了表率。

周恩来绝不容忍违犯外事纪律的言行,对谁都不宽贷。有一次,某驻外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1页。

《李聚奎回忆录》第237页。

见《周恩来年谱》1948、1949年记载。

甄小英:《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第131页。

大使，是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应该国总统之请，向与之有龃龉的该国总理转达意见。周恩来阅报，指示秘书立即起草电报并亲自签发，批评这种卷入驻在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做法“荒唐之至！”这是作者亲闻目睹周恩来对驻外大使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正是爱之深，责之切！

周恩来留给长期在身边工作人员难以忘怀的印象是：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几个方面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在主持和领导外交部工作的几十年中，周恩来结合外交工作的特点，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倡导和培育了外交战线的一代新风。他要求“在新的外交风格上树立一面旗帜”，他的外交风格就是这样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坚持原则，策略灵活；庄重大方，不亢不卑；推己及人，交友以诚；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光明磊落，“言必信，行必果”；平等协商，以理服人。周恩来身上那种神奇的魅力，吸引力，不是别的，正是他这一整套外交风格或外交艺术所发生的作用。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新中国赢得朋友，赢得尊敬。——

对外事翻译的要求

翻译的职能是为双方沟通对话。翻译人员和外交人员在历史上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同义语。我国古代已有专职的翻译，名称很费解，叫做“象胥”（《周礼·秋官》），后来则称为通译官。到了清代，自己的译员不用，竟聘请洋人当翻译，这些洋翻译才是真正的里通外国者。

周恩来需要翻译，不是因为自己不懂外语，而是在正式场合使用本国语言，是自尊自重的表现。1950年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侵略朝鲜问题，台湾“代表”在发言时不使用联合国通用语文之一的中文，而使用英语。此人就是蒋帮一肚子洋墨水的名教授、老官僚蒋廷（1895—1966）。伍修权抓住他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嘲笑挖苦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他连中国人民的语言都不会讲”，弄得那位蒋家“代表”十分狼狈，在会上抬不起头来。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在机场上对前来欢迎的印度总理等高级官员和外国驻印使节发表谈话，由译员先口译印地语，然后译成英语，以示对东道国的尊重，并照顾听不懂印地语的人。

周恩来自始就很重视翻译工作。早在武汉长江局和重庆南方局年代，翻译——宣传——外事就已经构成外交工作三个紧密相联的环节。组内成员个个都是一身三任“又红又专”的精英。建国后他们都成为外交战线的中坚，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60页。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第58页。

几乎全都担任外交部领导。据 1989 年粗略统计，外交部现职正副司长和大使、参赞级干部将近 60% 是周恩来在世时期选拔培养的翻译。周恩来生前已把翻译当作外交人员的重要来源。所以翻译人员既是外交队伍中的一支特殊“兵种”，翻译工作又是锤炼外交人员的“战场”。

应该说，周恩来在对外活动中的一切成就，都有他的译员的一份功劳。周恩来说，他们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他们，重要的事，双方坐在一起相对无言，动都动不了”。一场重大的翻译工作下来，周恩来都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周恩来对翻译的理解、体贴，感人至深。他对翻译说：“我们两人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会谈前，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知道大体内容，让他们看到有关文件或讲稿，预作准备。他最理解和体会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他说：“不让翻译参加政治业务学习是最残酷的。”内部聚餐他为之敬酒，设法让翻译吃饭；看到翻译迟疑时，就主动重复一遍。有一位朝鲜族翻译听不懂上海话，总理就反过来替他当上海话的翻译，并说“你要注意学习方言”。

周恩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深深懂得培养翻译人才任重而道远。所以他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就在解放区设立外国语学校。建国后，除各院校原有的外语系，又创建了许多外语院校，以应急需。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部内和各驻外使领馆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学习一门外语。到 1957 年，由外交部安排培养的外文和翻译干部已达 27 个语种 600 多人。然而形势急速发展，仍有捉襟见肘之感。周恩来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

1957 年 11 月周恩来接见来访的埃及文化代表团时说，我们的阿拉伯文翻译太少了，一有事就拉刘瑞麟教授，他身上北大的校徽是对我们的一个抗议。周恩来并当场交代外交部陪见的司长，要他在两年内培养第一批会阿拉伯文的人，几十个或几百个能写会讲的人。

周恩来对外交部的批评一个多月之后，又一次类似的情况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

1957 年底，周恩来在机场欢迎中东某国副首相来访时，阿拉伯文译员因一时紧张听不懂来宾的讲话，翻译中断，出现冷场，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文翻译顶替。

1963 年 8 月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访华。由于索马里的历史情况，周恩来考虑到意大利语比英语更通行，交代这次接见要配备意语翻译。当时外交部尚

《研究周恩来》第 316 页。

《研究周恩来》第 316—327 页。

《我们的周总理》第 538—539 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222 页。

无意语翻译，临时从外语学院借调一名刚从罗马留学归国的青年女教师。因舍马克也懂英语，会谈基本上没有使用意大利语，但周恩来仍指定这位教师参加。一些参观活动则尽量用意语翻译，让她有锻炼的机会。毛泽东接见时，周恩来也安排她参加，并在接见结束后为她引见毛泽东。周恩来颇感自豪地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意文翻译，是专门派去意大利学习的。将来我们要做到世界各国的语文都要有人去学，我们搞国际主义就要这样做。毛泽东微笑称是，并和这位青年女教师亲切握手问好。这充分显示周恩来对新生力量满腔热忱的爱护，更是对培养非通用语种翻译的重视和关切。

翻译干部十年培训规划就是在两次出现阿拉伯语翻译问题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订的。1973年周恩来批准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计划。他在审批这些规划中特别强调配齐语种，将报告中三处提到的“小国语种”逐一改为“非通用语种”，体现了他尊重小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

除了教学上的培养，周恩来也很强调在职锻炼，多次指示要重点抓好高级翻译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要为翻译多提供实践的机会，要让他们参加和熟悉外交业务，了解政策。

周恩来对翻译人员的要求是严格的：要求他们练政治思想基本功、语言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还要求翻译加强形势政策学习，看有关的文件资料，不要当传声筒，而要参与业务。做口译的则要对领导同志所谈的问题、外宾可能提出的问题，预作准备；要熟悉领导同志的意见，领会精神，还要当好领导的参谋，帮助把关。他还不止一次他讲过，一个好的翻译不仅要译得准确，而且要译出领导同志的口气和感情。重要的词句怎样译，他是很注意的。遇有译得不妥之处，当即提出纠正。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60年代初，有一次周恩来会见外宾谈到越南问题时，说美国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抗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74章》）的成语。因为翻译未理解好，译得不准确。周恩来就解释成语的含义，再让他准确译出。

偶尔为周恩来当翻译的一位外交部处级干部（原北京外语学院英文教师）说，她因为译不出“越俎代庖”（《庄子·逍遥游》）受到批评。她说，周总理对我语气虽温和但意思却很严峻地说：“你是章行老（章士钊）的女儿，行老古今中外，知识渊博。你怎么未能继承？连‘越俎代庖’都不懂吗？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太少了。”她后来将此事告诉当时担任周恩来主要翻译的同事，据说周总理也嘱咐他要通读《资治通鉴》。

翻译界老前辈师哲深有体会地说：翻译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口译则更需

孔繁农在外交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的周总理》第538页。

《研究周恩来》第322页。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86页。

要机敏、准确、灵活、有风韵。毛泽东有一次对他说：翻译工作不仅要精通两国语文，还要熟悉它们的文学、艺术、历史、风俗、生活习惯、人情世故，而且要不断学习，汲取新东西，以充实自己，否则就难以应付局面。他谈到他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作翻译时，总要让斯大林听到道地的俄语(民间话)，让毛泽东听到道地的汉语，甚至是乡土话。否则有些话直译，则由于双方语言文字、文化、生活、习惯、历史和语言结构的差异，必然会使双方不甚了了，觉得似乎隔靴搔痒，甚至还会发生误会。他的经验是：在外交斗争中，任何有歧义的词都可能引起误会纠纷，丝毫马虎不得。难怪当年曾参与其事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都感叹说：“中国的翻译对俄文研究到这个地步，啊，这么抠字啊。我们都不得不翻字典了。”

周恩来从不放过一字一词的真正含义。他第一次访问尼泊尔时，在一个地方的招待会上，主人赠送一尊木雕释迦牟尼像，以示对客人的敬重。周恩来讲了一段热情友好的话，表示感谢。译员译成英语时，将一个物称的关系代名词 which 用在这尊木雕上。周恩来立即亲自用一个人称代名词 whom 加以纠正。这就避免了对如来佛的不敬，显示了对主人的尊重。可以设想，如果周恩来不懂英语，所造成的不良政治影响就难以挽回了。所以周恩来事后对同志们说：“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你们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60年代末，尼克松入主白宫，中美关系出现解冻迹象。周恩来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美国著名评论家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在白宫屏风后面指挥尼克松的行动》(大意)的文章，周恩来阅后十分重视，却一时弄不清“屏风后面”是何所指。要搞清美国的真正意图，必须首先“解题”，其关键就是“屏风”一词。他问外交部美澳司一位负责同志，此公答不上来。周又转身问主要翻译，她立即用电话转问另一位高翻。回答是：“屏风”的典故可能出自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他查阅原著后肯定说，意思是“幽灵”，即毛泽东的幽灵在白宫指挥尼克松的行动，是中文刊物的编辑译错了。

周恩来要翻译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他说这是“基本功的基本功”。第二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指语音、语法、词汇和听、说、写、读、译五个字。他要翻译注意了解所学语言的使用环境，要下苦功夫把外文世界地图背熟。第三是文化知识的基本功，学好外语的同时，还要学国际知识、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对外文报刊，包括反动的东西，也要阅读了解，才能译得好，驳得对。

周恩来多次说过：“翻译工作很重要，不能轻视这一行。”他还说过，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600、601 页。

师哲：《峰与谷》第 130 页。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195 页。

《不尽的思念》第 577 页。

《研究周恩来》第 322—324 页。

“外交谈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很重要，但翻译的口译也重要。口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纠正过来。”他很注意发挥翻译的作用，鼓励他们对工作积极提建议。他多次说过，翻译可对外交文件草稿提出修改意见，即使中央已定稿的文件，只要修改的意见是对的，他不但采纳，而且加以表扬。遇有重要翻译任务，周恩来总是亲自召集他们座谈，讲文件的精神，解答提出的问题，征求对草稿的意见。周恩来找外交部的部、司领导研究对外工作的重大问题时，常常要有关翻译列席参加，并征求其意见。这样做不仅帮助翻译熟悉了政策和业务，而且有利于提高翻译工作的水平。

世界上有些国家不重视翻译的地位，在安排领导人会谈或宴会活动时往往不给翻译安排座位。周恩来认为这不公道，指示外交部在遇有这类活动时都要给翻译安排座位。他在会见外宾照相合影时也经常让翻译参加。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翻译人员的培养抓得很紧，这支外交战线上的特殊“兵种”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外交立下汗马功劳。

“夫人风波”：女外交官粉墨登场

建国伊始，外交部闹过一场“夫人风波”。起因于一大批“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随原本是战友的丈夫进入外交部。要出国去当“夫人”；要卸下“武装”，重新穿上“红装”；要涂脂抹粉，乔妆打扮；要将解放鞋换成高跟鞋；要戴上丝织的手套，挽着丈夫的胳膊；要让洋人搂腰跳舞；如此等等。她们受不了这些早被批臭了的封资修的脏货又卷土重来；不愿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发火了，表示宁愿离婚，也不出国。

事情闹到周恩来都知道了。他很理解这些女同志的心情，恐怕是想到要开培养女外交官的先河，因此作出决定，并让邓颖超大姐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大家都是外交战士，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职。男同志能做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女同志都要安心学习，好好工作。至此，“风波”才算平息。此后，外交部始终贯彻执行周恩来的这一决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后都没有改变。周恩来也一视同仁地大力培养。新中国女外交官辈出，她们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数之多，不仅资本主义国家比不上，也大大超过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顺便提一下周恩来在外宾面前如何称呼邓大姐，是很有意义的。他不用“爱人”或“夫人”，而称为“我的妻子”。因为洋人分不清“爱人”与“情人”有何区别，“夫人”则是等称，只有“妻子”的含义谁都清楚，不会引起误解，邓大姐对此也不介意。

第六章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与建交谈判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在建国前夕就确定了。这个方针把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作为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以免污浊的渣滓尚未涤净，新的龌龊的东西又涌了进来。帝国主义凌辱中国长达一百多年，其特权和势力盘根错节，浸透到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它们强迫旧中国签订的 1175 件不平等条约，就像锁链捆绑在中国人民身上。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必须彻底推翻，那一千多条锁链必须砍断，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行。所以新中国一成立，就对外关系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肃清这些特权和势力。

帝国主义者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主要有五。一曰驻军权。北京的东交民巷自不必说，天津、上海、青岛等地都驻有外国军队，长江流域停泊外国军舰。二曰自由经营权。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法人和团体可以在中国自由经营企业，享受与中国人同等的所谓“国民待遇”，在中国境内居住、旅付、经商，设厂、购地、置产，以及从事各种文教、宗教、救济事业，简直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殖民地。三曰内河航行权。帝国主义国家的船舶可以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四曰海关管理权。二次大战前，中国的海关由英国人掌管；战后则由美国人控制。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进出中国或其在中国生产的商品就地销售，都享受同中国商品一样的待遇。五曰司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涉及双方国民、法人或团体的争端，必须交由双方设立的公断机构裁决。这些特权，在二战期间，属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都已被取缔，包括英、法等国在各地的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也都被收回或取消。只有美国，由于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它在战后对中国的控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甚于前。

1952 年周恩来形象地说过：我们用铁扫帚和鸡毛掸各种不同的办法来打扫，或者采取狂风暴雨，或者应用和风细雨，都需要。打扫是经常的，但要看怎么做。1953 年，周恩来又说：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要慢慢地、一个一个地请进来，要把尘土——特务、帝国主义分子清除以后，才能请资本主义国家进来。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帝国主义的特权全都一扫而光。

1949 年初，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华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府成立以后，希望民主国家首先承认我们。至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承认我们越晚越好，因为我们屋里还很脏，打扫干净后才好接待客人。”《师哲同志谈话记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77 辑。

旧中国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据统计，1919—1925 年间，帝国主义全部垄断中国生铁的生产，到 1937 年还垄断着 97.6%（见《中国的昨天与今天》第 284 页）。

《中国外交官丛书·外交风云》第 271 页。

侵略者“国中之国”的什么“冒险家的乐园”呀，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的洋人公园呀，全都荡然无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这就是采取铁扫帚和狂风暴雨的办法所取得的成果。对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则视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如代管、征购或管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一些宣传、文教、卫生、救济等机构进行逐步清理，支持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立场等，采用的就是鸡毛掸子和和风细雨的办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大缩短了这一进程。

当然，不经过斗争，帝国主义是不会拱手归还其残余特权的，其中尤以美国最为蛮横。美国在北京的兵营于1950年1月被征用时，美国国务院竟指责北京市军管会的决定“违反了1901年给予美国、并在1943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并扯谎说、中国收回的是“美国领事馆的办公地址和产业”，还威胁要因此“撤退所有美国官方人员”。尽管如此，美国最终仍不得不交出该兵营。

1950年1月18日新华社就此发表评论，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其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已明白宣布，要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不管它们是“久已存在的”也好，是“1943年重申过的”也好，北京市有义务执行《共同纲领》，但决无义务执行这些不平等条约；在北京的一切守法外侨，包括外国驻京前领事在内，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而不应当妄想保护旧日的特权，否则就是违背中国政府的命令，侵犯中国的主权；北京市军管会所收回的不是任何领事馆的“办公地址和产业”，而是某些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中的所谓“驻军权”而占领的中国地产，军管会所要征用的只是此项地产上的兵营，而且因此项地产收回所产生的房产问题，中国政府还要另定办法解决。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这是一篇声讨列强在华特权的檄文，立场何其严正，决心何其坚强，态度何其鲜明！

到1953年底，新中国废除了旧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又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处理了外资企业和外国政府或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或津贴的各种文化、教育、卫生和救济机构，实现了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这有助于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并且为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开辟了道路。

《当代中国外交》第19页。

《人民日报》1950年1月19日。

《当代中国外交》第23页。

所以毛泽东在 1954 年 5 月一件接待外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我们的房子打扫干净了，现在可以请客了。”诚然，当时说房子已经打扫干净了，当系指上述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而言，至于帝国主义无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则远远没有肃清。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此外，要“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如果情况变了，还可能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外交史上罕见的建交谈判

根据国际惯例，两国政府只需相互正式承认并交换文电，建立外交关系的程序即告完成。新中国却采取自己独特的建交程序，接受对方的承认，不等于建交，尚需经谈判始可确定。这是迄今外交史上所罕见的。

为什么必须通过谈判才能建交呢？因为蒋介石集团仍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盘踞在台湾，并继续占有联合国的席位，世界各国仍未完全改变对它的承认。也就是说，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还没有完全从中国领土上肃清，如果不在法律上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会在国际上形成“两个中国”，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所以建国伊始，中央便确定了“另起炉灶”的方针，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周恩来说，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

周恩来把当时表示要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第二类是帝国主义国家，第三类是资本主义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族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建交程序。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率先承认我国，它们对新中国都采取了鲜明而热情的支持态度，因此不需要通过谈判过程双方便建立了外交关系。

对于帝国主义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可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因此必须通过谈判

转引自《奇特的建交》，《外交风云》第 276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0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49 页。

才能建交。

至于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一般也要经过谈判，只有个别国家，情况特殊，可以不经谈判即与之建交。例如新中国成立时，印尼仍处于继续同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坚决支持这一斗争。中国在承认印尼联邦共和国时，表示愿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它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印尼表示同意，双方通过照会往来很快达成互换使节的协议。又如芬兰，由于它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既无外交关系，又未参加联合国，我国因此决定不经过谈判即与之建交。

英国和荷兰对新中国的建交方针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长时间处于半建交状态。有些国家一时难以同我建交，但是同意互设商务代表处，其中典型的就是日本。于是在外交实践中出现了三种建交方式：全建交，半建交和办理商务机构。对于设立商务机构有困难的国家，则采取体谅和耐心等待的方针。周恩来甚至设想过第四种建交方式。这样，周恩来在外交学的建交程序中独树一帜，创造了建交的多种方式。

回顾新中国的建交史，就会发现一种规律性的情况：每 10 年出现一种建交模式，出现一次建交高潮。50 年代建交的国家有 32 个，以中印模式为代表。60 年代 18 个，以中法模式为代表。70 年代有 70 个，以中日(中美)模式为代表。如以周恩来在职年间计算，则最后一个年代建交的国家有 57 个。中美建交虽在周恩来身后，但其模式则是他生前亲自制订的。这种规律性的情况当然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历史发展的反映。

中印建交模式

首先应当肯定，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它们同台湾的关系也不同，建交谈判的模式遂有所差异，但基本原则是始终不变的。

新中国谈判建交的第一例从而构成建交谈判的基本模式的，是中国同印度之间外交关系的确立。

印度是继缅甸之后第二个宣布承认我国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时，原印度驻华使馆尚有一名临时代办留守南京。这名代办奉印度政府之命率先于 1950 年 1 月应邀到达北京，同我国代表进行建交谈判。印度是 1947 年才摆脱英帝国主义长达二三百年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反帝反殖仍然是它建国初期对外政策的主流。它比较能够理解我国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的立场，并接受我国对台湾和联合国席位的基本方针。所以经过谈判，印度政府便同意：一、撤消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两国在

这三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建交协议，并于是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次建交的程序和协议遂成为中国谈判建交的基本模式，适用于此后所有愿意同我建交的国家。1993年1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中国同梵蒂冈关系的问题时，仍然重申：“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同的是，“梵蒂冈必须停止干涉我国内政，包括对我国宗教事务的干涉。中国愿意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同梵蒂冈实现关系正常化”。即使是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三万的摩纳哥公国于1995年1月在同我建立领事关系时，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尽管它同台湾连这种关系也没有。这就再一次表明，在祖国实现统一之前，上述建交模式始终适用。

两国建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在一些新生国家中，出于友好，有时也会发生戏剧性的趣事。例如独立后的加纳于1960年7月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原任总理恩克鲁玛当选为首任总统，要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恩克鲁玛在庆典第二天便接见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对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他回答得很干脆：我已指示外交部长同阁下商谈。两天后一个下午便有人到大使下榻的旅馆房间敲门。此人对尚在休息的大使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阿科·阿杰伊。”原来是庆典中见过一面的外交部长未经约定突然光临了。两人到旅馆的咖啡厅叙谈。他说是奉总统之命来谈建交问题的，加纳政府已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大使建议先发表一个建交公报。他满口答应，并应大使请他先起草一个稿子的要求顺手从茶几上操起一张报纸，撕下一条白边写起来。大使见状，连忙向服务员要了几张旅馆便笺，递给外长。阿杰伊随即在便笺上“刷刷刷”写了几句话，并按大使建议，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句，自己先签名，然后递交大使签名。中加建交谈判至此完成，前后不到一刻钟。外长并同意大使建议，回去后将协议文稿打印两份，再正式签署，并约定双方在同一时间广播。谁知阿杰伊去后不久，加纳电台当天下午就广播了这份建交公报，而北京到第二天才接到报告。《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中只得加上两国政府“已经”同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已经”二字就是上述戏剧性建交谈判的概括。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传为佳话。

前面已谈到，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同我国的建交程序可以简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以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在这些情况改变以前，上述方针的原则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具体运用则视具体对象灵活处理。中法建交谈判提供了另一个典型实例。

《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0日，1995年6月4日。

中法建交模式

60年代中国同外国的建交程序不变，建交模式则以中法为代表。这个模式基本上适用于中国同美国和日本以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国不同于印度，同法国的谈判要复杂得多。

早在1958年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时，重新执政的戴高乐将军便有同我国改善关系的愿望。1962年法国结束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为中法关系的发展，扫除了一个障碍。

1963年10月，戴高乐授权前总理富尔携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前来中国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周恩来缜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同法国建交，可以在西欧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干涉。根据法国在同我建交问题上的意向和态度，周恩来指示，在同富尔的谈判中一方面要坚持反对“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在策略上要灵活运用，即在实质性问题上坚持原则毫不含糊，在程序性问题上可变通处理。

当时法国同国民党政府虽然尚未断交，但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法方在台使馆仅维持在代办一级。1959年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其基本立场与美英两国显然不同。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法国的态度亦同美英有别。这次富尔来华又向我明确表示：14年来法国一直未承认中国是个错误；现在应由法国方面迈出第一步；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活动。周恩来据此确定，要把法国同美英区别对待，要多做富尔的工作。周恩来并亲自同他进行多次实质性会谈。会谈中，周恩来主动地、有针对性地向他介绍了我对美对苏关系状况和政策，对联合国问题的态度，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使法方对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推动双方建交谈判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告诫外交部主管同志，既要看到法美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正在发展的一面，看到法国同我们有一定共同语言的客观情况，也要看到法美在根本制度上的共同点和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强求对方按照我们的愿望行动。富尔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提任何前提条件，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并未直接予以批驳，而是在具体建交问题的讨论中牢牢坚持我方原则，并通过双方内部协议的变通方式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周恩来在同富尔探讨两国建交方式问题时，首先向他介绍了我同西欧各

国关系的状况并表示，法国可以从同中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全建交，如瑞士和北欧诸国；或半建交，如英国、荷兰那样，这对处理某些问题不是十分方便的；或暂缓建交，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也许还可能出现第四种类型。同时也提出，采取全建交方式必须以同蒋帮断交为条件；半建交如当时的英、荷对华关系那样，对双方都将不大愉快；如果暂缓建交，则双方应采取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早日建交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等待，并提出可先设贸易代表机构等。他还表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他对富尔说：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与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地交换大使。如果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周恩来这番谈话，不仅表明了我方积极推动建交的诚意和所坚持的原则，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我平等协商、尊重法方选择的态度。

关于双方应采取何种具体步骤建交的问题，周恩来又同富尔进行了反复讨论，共同研究了几种方案：第一，无条件建交，即富尔一再强调的在建交问题上“双方均不提任何前提条件”。对此，周恩来表示，由于富尔没有回答法国如何处理它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关系问题，中国政府难以考虑。第二，有条件建交方案，即在解决法国对台关系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国先同蒋断交后再同我建交。周恩来根据会谈情况指出，虽然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方案，但要法国驱蒋尚有困难，因此也不便采取。第三，延期建交方案。由于法国急于同我建交，富尔表示不愿走这一条路。鉴于以上方案均行不通，周恩来接着又提出了“直接建交方案”，即在达成内部协议的基础上，允许法国先宣布同我建交，然后由法方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蒋帮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对上述各种方案的探讨中，周恩来既不是僵硬地毫无弹性地坚持要法方选择首先同蒋断交的模式，也不是简单地把难题抛给对方去寻找答案，而是真正本着协商的精神，同富尔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能妥协的余地。正是这种态度才进一步赢得富尔的信任，调动他朝积极创造条件的方向前进，最后终于就第四个方案即“直接建交方案”达成一致。

在谈判中，富尔一方面表示，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并声称不学拖泥带水的做法；但同时却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个“微妙问题”，法国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甚至说什么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他在二战时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系”等等，以此向我讨价还价。

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蒋帮之所以能够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保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全世界人民都清楚，蒋帮之所以还留在联合国，

还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这是现实的、也将是历史的笑话。他强调，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他还以法国本身作比喻说：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设想他在国外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他，或者两个都承认呢？法国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一百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负和干涉着我们。他严正指出，我们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希望不会有什么误解。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富尔，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便不能建立互换大使的外交关系，只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设立贸易代表机构等。听了周恩来这些明确、坚定而又入情入理的说明，富尔最后不得不改口，表示法方愿找前进的办法解决问题。

会谈中，富尔还曾试探可否允许中法建交后法方在台保留一人，降低级别。周恩来对此断然回答“不可能”，并指出：英国就是因为在台湾有领事，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状态。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中法双方都不会愉快。由于我方坚持原则，法方才放弃了这个打算。

一个成熟的外交家不仅表现在他勇于和善于坚持原则，而且还表现在他勇于和善于进行妥协，尤其是表现在能够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光讲斗争而不讲妥协，往往要犯“左”的错误，其结果常常是使谈判陷于僵局甚至破裂；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往往要犯右的错误，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周恩来同富尔的谈判在原则与妥协正确结合方面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法国必须同蒋帮断绝外交关系，不能搞“两个中国”这两大原则，同时在程序性问题上又作出了恰当的让步。第一，鉴于富尔一再要求允许法国先同我国建交而后再同蒋帮断交，我根据当时法台关系的实际情况和戴高乐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承诺，在双方达成内部协议的基础上满足了法方这一要求。第二，在法方确认其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条件下，我不再坚持要法方以书面形式声明它的这一立场，而是用由我单方面在照会中申明，法方予以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第三，在后来双方代表进行具体建交谈判时，我方又同意了法方的要求，把确认双方建交的方式由原定的互换照会（法方照会我方，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议中法建交，我方复照欢迎和同意）改为发表联合公报。这样可以避免给人以法方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我的印象，达到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我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孤立我国的图谋，使它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了。英国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步子。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也相继表示愿同我讨论建交问题。1964年，意大利、奥地利先后同我互相建立半官方和民间的商务代表机构。日本主张对华友好，争取恢复

日中邦交的力量也从中得到鼓舞与推动。这一切证明，中央和周恩来关于积极争取法国从而调动同西欧国家关系的政策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周恩来在中国建交谈判中所体现的外交艺术至今仍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

中日建交模式

中法建交加强了许多国家同我国建交的倾向，对日本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1971年即我国外交史上著名的“乒乓外交”年，便出现了为中日全面建交作准备的最好形势。日本各政党团体加紧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这年6月，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该党访华代表团来到北京，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深受感动，整理出五点建议。(1)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3)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签订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4)美国的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侵略行为，必须撤出这个地区。(5)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称赞公明党在日中关系问题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接着说，如果照公明党的五点主张，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日中友好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公明党代表团即以此为中心内容同中日友协公开发表了有关中日建交条件的联合声明。此后，竹入在中日建交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被称为日本的基辛格。7月初，基辛格秘密访华，然后中美双方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访华。这一举措震惊了世界，日本感受更力强烈，称之为“尼克松冲击”。从这时起，日本从财界到政界都唯恐落后于形势，“搭不上末班车”。9月，藤山爱一郎率议员联盟代表团来北京，同中日友协签署了载有中日建交四原则的联合声明。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关系正常化运动一时呈现沸腾状态。

1972年1月，日本工会系统代表团，土井多贺子(后任社会党委员长和社会党村山内阁时期日本众议院议长)等社会党年轻议员和刚刚回归日本的冲绳县友好代表团相继访问北京。周恩来接见他们时作了热情洋溢的谈话，展望中日关系前程似锦的大好形势。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发表了导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再次震动了日本。佐藤内阁坐不住了，几个月后便声言要辞职。从年初开始，日本在野党领袖和自民党内重要人物纷纷

《研究周恩来》第246—252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94页。

《研究周恩来》第221页。

来到北京。周恩来多次同他们进行长时间会谈，简直应接不暇。4月，民社党领袖春日一幸首次访华，同中日友协发表了载有建交条件的联合声明。自民党内著名领袖之一、随后担任首相的三木武夫率领大来佐武郎等智囊人物到北京，同周恩来商讨如何结束中日间在法律上尚存的战争状态等问题。松村谦三的接班人古井喜实也前来作推进建交的具体试探。日本新闻界为日中关系正常化大造舆论。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周恩来决定作建交前的最后准备，赶在日本新内阁重组前派去了长期空缺的备忘录贸易驻东京首席代表肖向前。建交前夕，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受田中委托到京试探田中访华的可能性，取得周恩来欢迎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建交的承诺。随后大平正芳外相会见其时正在日本访问的中日友协负责人孙平化和肖向前，交换意见，认为建交之议可以加快进行。跟着，竹入委员长四次同田中和大平密谈之后，又昼夜兼程赶到北京，进一步传达与中国建交的设想。周恩来三次会见竹入，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在第一次会谈时，周恩来就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的“正统”两字，表示不太理解。竹入解释说，“正统”就是你们说的“合法”。周恩来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不知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周恩来于是讲了一大段中国的历史，从秦始皇一直讲到朱元璋和清朝，凡有“正统”，就有“偏安”，因此需要将“正统”的含义搞清楚。竹入表示回国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田中、大平认为周恩来所说通情达理，坚定了谈判成功的信心。田中确定访华时，周恩来接见了长期以来从事日中民间贸易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获原定司和热心发展日中经济贸易的钢铁资本家稻山加宽，声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政府、民间贸易并行不悖。周恩来在同佐佐木会谈时，要求他转达“对日本人民为造成实现邦交正常化形势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随后又会见长期致力于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古井喜实等人，引用“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成语，感谢和慰问这些老朋友。田中访华前夕，周恩来接见前外相、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率领的自民党访华团时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民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你们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在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晚上周恩来在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说，我们深信，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将使我们两个伟大的民族“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就任次日即声明要力日中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于9月25日以日本总理大臣的身分访问北京，并于四日后同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40—641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119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46、129页。

中国签署了建交公报。田中抵达北京机场时，第一次升起中日两国国旗，与尼克松总统在发表《上海公报》最后离开上海时才在机场上升起中美两国国旗，形成鲜明对照。从田中声明到两国建交，只用了 82 天，而从《上海公报》到中美建交则用了 6 年零 10 个月。尼克松访华冲击了日本。田中访华则推动了中美建交。日美两国在同中国的复交关系中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早在 1955 年 11 月周恩来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谈到中日关系时便说过，日本应该超过美国。日本是个几千年的独立国家，是有民族自尊心的，应该争取超过美国。日本终于超过了。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两国人民和广大的日本各界朋友以及许多有识之士 20 多年来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走过了多少艰辛的路程。然而周恩来早在 1956 年已预见到中日国民外交的方式将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日本首相、外相喝香槟酒了。

在周恩来欢迎田中的宴会上，田中致词中讲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使中国人民蒙受损害时，只说是“添了很大麻烦”。第二天两国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有针对性地强调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的意思很轻”。随后毛泽东在接见时又针对田中发言再次强调说：“年轻人认为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是不充分的，通不过。在中国，这是往妇女裙子上洒了水之后使用的语言”。田中为此费了不少唇舌进行解释，最后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双方在会谈中围绕战争责任、结束战争状态、台湾归属等问题，针对日本外务官僚顽固坚持已在“日台条约”中解决，日本不能再次表态的言行，周恩来怒斥其为“法匪”。充分考虑到日中两国关系的过去，不辜负中国人民的重托，这就是“身似柔柳，心如巨石”（田中评语）的周恩来形象。

1972 年 9 月 28 日在同田中就中日建交举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时，周恩来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之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同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论

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第 104 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171 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298 页。《研究周恩来》第 233 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648—649 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313 页。

语·子路》)。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随后，周恩来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大字题赠田中。晚上出席田中的答谢宴会，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再次表示相信，只要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代友好下去。

“言必信，行必果”，“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嘱托。这不但要求于对方，也要求于我们自己。

1972年10月6日，在接见台湾同胞、旅日旅美华侨和美籍华人，谈到关于不要日本战争赔款问题时，周恩来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基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在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承担战争赔偿的权利，对此周恩来做了如下解释：“我们不向日本要求赔偿。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民也和我国人民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所以，如果我们要求赔偿，就会变成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支付。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看也是不可取的。”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每逢谈及此事都语重心长地说：“即使赔偿金额定为500亿美元，那么从当时日本经济实力来看，要支付这些钱也要花费50年时间。这样一来必将大大阻碍日本经济的增长，结果也就没有今天的日本了。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新中国所以放弃了赔偿要求，是因为他们从心里就十分重视要把日中友好世代地传下去。”

中日两国政府的建交联合声明，包括九点，比中法建交公报详尽。这是因为中法和中日的关系不同。除了上述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还有几个重要问题的表述，更为突出。一是宣布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即战争状态）结束。二是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在表示充分理解这一立场时，还加上“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同时还规定：一、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建立持久的和平友好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49—650、651页。

据美国合众社1947年4月13日华盛顿电讯：中美两国似已达成默契，要求日本分别支付1300亿至1500亿美元战争赔款。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150页。

1945年7月26日签发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条件必须实施……”。（[美]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第318页。）同年8月8日苏联正式加入这个公告。1943年12月1日签署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说：“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国际关系资料选编》上册，第758页。

关系的基础；二、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两点规定则是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中的协议。这表明中国对它们的要求不同于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反映了中美、中日的建交谈判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情况。

中日建交模式的公式是：三项建交基本原则 + 结束战争状态 +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 反霸权条款。

中美建交在中日建交之后，本书将另行论述。

半建交模式

半建交模式出现在中英和中荷的关系中逾20年之久。这种半建交关系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反映特定国家关系的一种历史现象。

作者为半建交关系下的定义是：在双方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并互换全权外交代表之前，由双方常任代办维持低水平的关系。代办不是国家元首的代表，而是由双方外交部长委任的，授权有限。半建交关系带有过渡性质，它可以前进，也可能倒退，因此是不稳定的。如所周知，外交学中的使节只有大使和公使之分，在他们因故暂时离开驻在国期间，由其副手担任使馆临时代办。代办不是一个级别的外交官，不包括在外交官的固定系列之中，他在外交使团中的位次是最后的，当然更无资格担当使团长。常任代办的办公地点称代办处而不称使馆，虽然在他之下仍可设置与其他使馆相似的各级外交官如参赞，一、二、三等秘书等，但不设武官。

荷兰在与我建交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类似英国。本节单说英国。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它力图尽可能保持自己在中国外资中居第一位的巨大经济利益，但在美国的影响下，又不愿接受中国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交条件。这就决定了中英建交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电告周恩来外长，承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法律上的政府”，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认为“双方换文本身已构成外交关系的建立”。同时英国外交部却又发表声明说，英美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虽有分歧，但英国并不改变同美国一道“反对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还表示“有决心阻止共产主义潮流越出中国国境”。电文声称双方如欲在相互关系上进行谈判，通常也是在建交之后而不是在它之前。英国官方人士强调，这种谈判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他也承认、不能阻止一国政府在同另一国政府建交以前提出问题。这正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外交。英国当时不大理解新中国不急于同它建交的方针。事实上，对英方的建交要求拖延时日，出些难

中日建交联合声明全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

《中国外交史：1949—1979》第31页。

题，是为了掌握主动权，以表示我国并不急于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交，相反倒证明，这些国家急于要钻进来。这样做也可以使美帝国主义集团推迟钻进来的时日。英国政府虽然仍以帝国主义惯用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扬言“若谈判是为了在建交前附加条件，则英国无须考虑建立这种关系”，然而它仍不得不于 1950 年 3 月派一名代表到北京来谈判。

谈判伊始，中方向英方指出：关于建交问题，最重要而必须先行解决的，是英国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问题，这包括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的投票行动，也包括英政府对在英国、香港和其他英国属地的国民党集团的各种机构以及中国的国家财产所持的态度。中方要求英方对这两个问题加以澄清。英方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诱之于“多数表决”；对中国在香港的资产问题，则诱之于“诉诸法院”。事实上，当时英国在联合国所属一切机构中，对中国代表权采取不支持的态度，一直投弃权票；而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民航局的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在香港直接保有的飞机，港英当局既多方阻难其起飞返回大陆，又不真正负责保护。就在中英谈判之际中国 7 架飞机被炸毁。跟着，英国又下令扣押两航留港飞机 71 架。在此情况下，建交谈判搁浅。当然，还有一个英国坚持同台湾保持领事关系，即不同意同国民党集团完全割断关系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朝鲜战争爆发后，既诬蔑我抗美援朝是“侵略者”，同时又跟着美国对我施行禁运。可是英国的临时代办不走，他一直呆在北京。

1954 年 5 月日内瓦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期间，当时担任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同周恩来多次交往，态度相当友好。周恩来的魅力征服了艾登。艾登认为在谈判中周恩来是庄重沉着、坚定不移的；他总是为争取最理想的结果而努力不懈。艾登还对记者说：跟周恩来打交道，我当然乐意；要知道，他可不是平凡的人，你们早晚会清楚，他是个不平凡的人。周恩来则感到艾登依然未能摆脱英国旧外交的窠臼。考虑到英国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保守党政府又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周恩来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方针。6 月 1 日，艾登宴请周恩来。席间，艾登说，我们已经承认了中国。周恩来说，不错，你们承认新中国，但在联合国又承认另一个“中国”，而我们只承认一个英国，所以我们不能互换大使。艾登也承认这种情况不好。他说：“我们应该努力进一步改进英中关系。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您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威廉(当时英国在北京的谈判代表)来。”显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49 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 13 页。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79 页。

《艾登回忆录》英文版第 1 卷第 123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56 页。

艾登是在委婉地要求中英两国互换正式的外交代表。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双方经过磋商，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对方的代办享有外交人员的身分和地位，其使命除继续进行建交谈判，还包括代表各自的政府处理侨务和商务等事宜。这样，原来英国在北京谈判建交的代表，其身分和地位也就提高了。不久，中国首任驻英国代办宦乡便走马上任。这一协议，表示中英关系已开始向正常化迈进。但在双方协议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正常的，仍然停留在建交谈判阶段。中英间建立的只是代办级外交关系，也就是半建交关系。由于英国继续追随美国，不但未能满足中国建交条件的要求，甚至制造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这种半建交关系持续到中美的关系有了突破的1972年3月才宣告结束，两国才建立起完全的外交关系。

关于“台湾地位未定”论，1950年11月出席联大安理会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在他经周恩来审定的发言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他嘲笑说：1950年6月25日的杜鲁门反对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杜鲁门总统反对罗斯福总统(指他们在台湾地位的问题上自相矛盾的态度)。伍修权坚定地指出：“台湾的地位早就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地位问题。台湾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问题”。他再次讥笑说，所谓“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台湾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一切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玩笑”。

周恩来对英国的做法曾多次提出批评，其中一次较为详尽。例如1958年2月25日，他在接见英国工党议员哈罗德·威尔逊谈到中英关系时说：日内瓦会议后中英关系应该有所改善，但自从我同艾登先生谈话后，快四年了，这种希望没有达到。周恩来指出，关键问题有四个：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我们并不要求英国保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但英国政府既然承认了中国，就应在联合国支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而不投票支持蒋介石。我曾同艾登先生说过，我们已交换了代办，只要英国政府在联合国中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蒋介石代表，我们就可以互换大使。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未实现。二、台湾问题。现在美国的政策是制造“两个中国”。美国知道不能长久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因此企图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今天美国还不便于正式出面制造“两个中国”，因此采取幕后操纵的做法，而要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出面造成这种局势。制造“两个中国”不但新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反对，台湾人民和蒋介石也反对。所以我告诉英国朋友们，如果英国帮助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就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绝不会同意让中国进入安理会，同时让蒋介石留在联合国内。三、香港问题。香港前任总督

访问北京时，我曾会见他。我当时希望改善大陆同香港的关系，他也同意。我曾提出几点建议：（一）广九通车。现在技术性问题都已达成协议，双方来往人数控制问题也可以由君子协定解决，但香港当局不同意通车。（二）派中国政府代表驻香港问题。我国有政府企业、银行等产业在香港，有近千名职员，更不用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很多事务需要同香港当局接触办理，有一位中国政府代表在那里是合理的。美国在香港只有一千多侨民，但领事馆却有一百多人。而我们只能经过新华社记者作为代表，这岂不滑稽？我们为此向英国政府送了外交文件，但两年多没有答复，这在英国外交史上也是很奇怪的。英国的外交以最讲礼貌出名，现在也变了。四、禁运问题。中英贸易有悠久的历史。两国贸易现在应建立在平等、互利的新的基础上。工党朋友是赞成这个原则的。但禁运如不完全解除，平等、互利是办不到的。其后在接见英国另一外宾时，周恩来又批评英国的做法非常可笑。周恩来还对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从法理上到事实上进行批驳。

关于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中央、周恩来早就有了战略构想和处理原则，为以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创造条件。

1972年5月，荷兰继英国之后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虽然在1984年前还有过反复。

圆了“远交近睦”宿愿

苏联解体以前，中国的毗邻有11个国家。50年代同我国建交的有苏、朝、蒙、越、印、印尼、缅、巴、阿、尼10国。由于许多国家受内外因素的制约，60年代建交的邻国只有老挝。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建交的有70个国家，其中有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孟加拉，尚未建交的就只有不丹、新加坡和文莱了。

四邻安，国乃兴，这是中国传统的立国方略。同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是周恩来终生在外交上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他对之事必躬亲的大事之一。国家不论远近大小，所有建交谈判，都经过周恩来策划、安排和指导，有的则由他亲自主持。尤其是对邻国，即使是在身患重病或住院期间，周恩来也都勉力参加。对美、对日的建交谈判自不必说，对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建交协议，也都是由他亲自出面签署的。

1974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会见并设宴欢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时说：拉扎克总理这次来我国访问，两国政府将正式宣布建交，从而揭开中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周恩来在会谈中，着重阐明我对当地华侨和华人的政策，即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34—235页。

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的《关于香港问题》。

《当代中国外交》第480页。

不采取双重国籍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在另一次单独会谈中，针对对方另一个考虑，着重阐明我反对并始终坚持的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立场。5月31日晚，周恩来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建交公报。第二天，周恩来便住院了。

1974年9月20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在谈到中菲建交问题时，周恩来以最近同日本和马来西亚建交情况为例，阐明了我国始终坚持的建交原则。1975年6月7日，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女儿以及外长等人访问北京同中国建交。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他们时，说明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这次你们差不多全家都来了，还有外长，我本来应该举行一次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先生吃顿饭的，可惜现在没有可能了。6月9日，周恩来在医院里和马科斯签署了中菲建交公报。

1975年6月30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里·巴莫及其主要随行人员。第二天，便在医院同克里·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这是周恩来亲自签署的最后一份建交公报，是他对同邻国建交的最后一次奉献。

新加坡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由于照顾同印尼的关系，多次表示它同中国建交要在中国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之后。中国同印尼的外交关系由于不是中方的原因于1967年中断。1975年3月16日晚上快10点钟了，周恩来在医院接见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和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时针对对方的顾虑说，我们尊重你们的国家主权。你们不会是什么“第三中国”。连“第二中国”我们都不承认，怎么会有“第三中国”呢？有人把台湾叫“第二中国”，搞两个中国。你们新加坡共和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主权。我们希望能早一点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但晚一点也不要紧，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理解。请转告你们总理，新加坡独立后不承认台湾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很欣赏这一点。1990年8月中国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中新随即于10月建交。1991年9月，中国同文莱也建交了。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于1975年10月初同我建交，周恩来在医院获悉甚感快慰。同所有邻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总算完成了。

截止1975年底，即周恩来在职期间，中国已同遍布五大洲的107个国家建交。这个浩大的工程本身就是他毕生所追求的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丰碑。孔子对国际关系的理想是“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即邻近的国家心悦诚服，遥远的国家愿意往来。周恩来的战略目标则是“远交近睦”，即同邻国和睦相处，同遥远的国家交往不替。周恩来堪以自慰的是，他已圆了这个宿愿。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711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709页。

回顾周恩来所指导和亲自主持的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历程，可以看出，无论是在 15 分钟达成的建交协议，还是长达 20 多年而于最后完成的程序，无一例外的都必须符合周恩来一以贯之的建交条件：措辞可以斟酌，形式可以不同，原则却不可移易。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始终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轴心，错综复杂的建交谈判亦不例外。

第七章 独立自主：新中国外交的基石

独立自主原则在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战略策略成败的关键；而在建国之后，则是新中国外交的基石。

涉及主权的问题，周恩来是非常敏感的。1950年初在赴苏途中，这个问题已涌上他心头。他在列车上同秘书谈起曾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十分气愤地说：“这本书很糟糕。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他说，他看了这本书，印象坏透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着手指说：“第一，这本书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四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就国际法的意义而言，独立自主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人的国格，就构成国家基本要素之一的人民而言，独立自主则是人之为人的人格；人若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也就失去了为人的价值。周恩来从小就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他在少年之作《论名誉》、《尚志论》、《我之人格观》等篇章中，认为人格为人生的第二生命，而志向则具有超物质的力量。周恩来所追求的人格，为实现他心向往之的人格观而立下的志向，当然不是个人的富贵荣华，而是立国兴邦的理想，铸造“国魂”的期求。他所说的“国魂”也就是国格。这样，在此后几十年的追求和锤炼中，他便将国家的独立自主同个人人格中的独立自主统一起来，融为一体。

周恩来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就从理论上集中论述了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为了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去其独立性质而下应再有任何独立主张”。他认为党“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他强调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党“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共产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

周恩来认为，统一战线中有利益不同的复杂的阶级关系，这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坚定的独立性。资产阶级在内外敌人的引诱、压力下为了自己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70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1、42、179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9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9页。

的阶级利益常常妥协和屈服，小资产阶级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用自己“最不妥协的”革命彻底性打击敌人，推进革命，才能坚定小资产阶级的决心，防止和消除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对革命的不良影响，使统一战线顺利发展。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归纳总结出独立自主原则的确切定义为：“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

周恩来还阐明了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基本内容：一、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党的主义和政见；二、坚持独立自主必须积极发展革命武装，扩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三、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坚持对国民党的监督权和批评权。周恩来指出：“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这样，才不会因为实行统一战线而模糊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建国后，周恩来经常根据上述精神对内对外阐述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周恩来外交方针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争取新中国外交的主动权。他说：“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对“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及其与独立自主外交的关系做过精辟的论述。

首先，他揭示了此一方针的真正内涵。他指出，“一边倒”并非倒向某一国，而是倒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和进步人类一边；“倒”并非倒在人家怀里，也不是依赖人家，而是指在外交方面必须采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即表明我们在对外关系中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其次，他指出我们之所以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并非受制于人，听了什么人的话，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而且必须这样选择，因为这样选择是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

第三，他指出“一边倒”的实质就是国际统一战线。他说，新中国成立时，世界上就已经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与战争的尖锐对立，我们必须明确“反对什么，联合什么”。“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第四，基于以上的原因，他得出结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独立外交是一致的，并不矛盾的。（以上各点参见周恩来在青年团一大、新政协筹备

《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第 111 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4、9 页。

《风范·思想·乡情》第 320 页。

会的讲话等。)

周恩来的这些论述，既解除了人们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误解，又回击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一方针的歪曲与攻击。新中国外交的独立精神也日益深入人心。

“一边倒”初期，政务院各部门请来了许多苏联顾问。周恩来当时指示，要尊重他们，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不一定了解中国的实际，所以在原则问题上还是要独立自主。据说文化部的年度工作计划、上报国务院的文件等，一度都要先经文化部总顾问审签。周恩来说，这是不合适的。我们没有经验，可以请顾问提意见，但不能由他们作主，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问题。后来中国戏剧学院的一位苏联顾问主张改革京剧，反对脸谱和挂髯口，发生了所谓挂胡子还是贴胡子的问题，京剧界意见很大。周恩来知道后纠正了这种做法。他说，这位专家是搞话剧的，他用斯坦尼斯拉夫的学说来提高我们的话剧水平，应该听听他的意见，但他对京剧不了解，不应该让外国的外行来“改造”我们的传统艺术。可见，对独立自主要有正确的理解。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建国初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进入70年代，这一方针逐渐为全方位的外交方针所取代。然而从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去理解，它的现实意义仍然是重大的。

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第一，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

第二，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

第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的经济繁荣。

第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坚持谋求的是，中美关系在严格遵守历次中美公告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上稳定发展，中苏关系在采取实际行动消除主要障碍的过程中切实改善。

第五，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风范·思想·乡情》第332—333页。

《研究周恩来》第23页。

《中国外交概览(1987)》第16—18页。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工作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努力。中国殷切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涉。

第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就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当前的首要问题是，两个超级大国应当率先实现大幅度裁减核军备，从而为所有核国家的核裁军创造条件。中国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

第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

第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第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曾经遭受过一个多世纪的外来侵略，深受丧权辱国之苦。争取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把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略、干涉和威胁作为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外部压力多么巨大，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决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

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独立自主原则不是排他性的，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

第八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核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周恩来外交学的纲领，新中国外交的灵魂。它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是周恩来对世界外交学的创造性贡献。

五项原则要旨及其相互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构成的一套原则。它“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的全面的政策”。

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和领土都是国家的基本属性。对领土完整较易理解，这里着重从国际法的角度说一说何谓主权。

国内外的国际法学者对国家主权的性质有过许多论述。我国老一代国际法专家周鲠生说：“国家必须具有主权，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又说：“主权是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属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在国外是独立的”。

英国学者说：“当国际法学家说国家是有主权的，其全部真正的意思就是：国家是独立的”。苏联学者则指出：主权是“每个国家和人民在其对内和对外事务中享有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外国的控制。各国人民享有完全主权所固有的权利”。又说：“国家主权意味着该国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不受外国统治的独立性”。

国内外学者对国家主权的见解大体相同。概括起来并详为阐述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几位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他们说，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具有不可分割和不可让予性，是国家固有的而非外界所赋予，不从属于外来的意志和干预的，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主权作为国家的固有权利，主要表现为国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和防止侵犯的自卫权三个方面。就对外独立权而言，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上的体现，包括自主权和排他性，即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并排除外来的任何干涉。自卫权是指国家为维护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对外来侵略或威胁进行防卫的权利。这种权利既是国家所固有的，也是根据国际确认国家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和保障国际法实施的一种重要手段。与国家主权相联系的国家基本权利包

《张闻天传》第 640 页。

周鲠生：《国际法》上册第 74、75 页。

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第 18 页。

科热夫尼科夫主编：《国际法》第 47、94 页。

括独立权，其前提是政治和经济的独立，也包括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等方面，同时必须尊重不干涉的原则，不然，国家的独立权就无从谈起。国家基本权利还包括平等权，表现在国家之间的互相尊重、平等相处，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此外还包括自保权和管辖权。自保权是国际关系中互不侵犯原则的基础，以不构成对他国的威胁为前提，以国土防卫为限度，是以承认别国享有同等独立权和平等权等权利为基础的。由国家主权原则规定的上述基本权利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国家享有自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必须尊重别国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这是国家的义务。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国家之间正常往来的必要条件。领土是国家另一基本属性，它和国家主权一样，是国家所固有的属性，具有不可侵犯性，因此也具有独立权和自保权。

周鲠生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条加以阐明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就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具体实施。可以说，五项原则是从主权原则出发，而这些原则的遵守具有维护和体现国家主权原则的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国家的主权应受尊重，同时亦负有尊重他国主权的义务”（五项原则第一条），“互不干涉可以说是国家主权平等题中应有之义”（第三条）。“直接的公开的干涉之最粗暴的就是武装干涉”（第三条），而这“就是不尊重别国的主权，是对它的独立权的侵害，肯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国家平等与国家主权原则也是分不开的。国家是主权的，因而是平等的”，“互利同平等联系起来成为一项原则，可说是标志着国际法上平等原则的发展”。他说国家间只有平等才能互利，“只有实行互利才是真正的平等”（第四条）。

另一位国际法学者也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其他原则都是从这一原则引申出来的，它们表现了尊重国家主权的各个不同的具体方面”。

还有几位国际法学者说：“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原则”。互不侵犯是对上述原则的“保证和补充”。“互不干涉内政……是直接由国家主权原则引申而来时”。“平等互利……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发展”。而“和平共处实质上是前四项原则的结论”。

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也谈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相互关系。他的说法，自然是最具权威的。他在1963年8月至9月同外宾的谈话中讲到，只能在独立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双方地位不对等就不能和平共处。各国间只有平等，才能说到互助，才能互通有无。有人总是要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四条，只有实行前四条才能和平共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大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104、106页。

周鲠生：《国际法》第177、184、188、190、207、213页。

王沪宁：《国家主权》第11页。

罗振宇、李景全等：《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第85—88页。

国沙文主义把我们看作是劣等民族，不平等相待，那不行。我们站起来了，一定要给我们平等。我们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屈服。

进入70年代后，针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周恩来在1971年11月与一位外宾谈话时，进一步阐述了确立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的思想。他首先概括了超级大国的四个特征，即侵略人家，颠覆人家，干涉人家，欺负人家。然后指出，作为这种霸权主义政策的对立物，中国的总原则是：国家不论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不能强加于人。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政治上的平等。接着，他又具体说明政治平等的内涵最主要是对其他国家，即使是小国，也应该尊重人家的主权。人家不同意的事，你不能强加。另外，提供经济援助不能要求特权，不能使对方的经济附属于你，而是应该帮助它经济独立起来。最后，他强调了实行政治平等原则与维护和平的密切关系，提出不往这方面走是不行的，不然就是战争。

周恩来上列论述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包含和平共处的总原则，也包含实现此一原则的四项基本条件。五项原则中第一项是前提，后三项是第一项的补充，最后一项是落脚点；或者说，前四项是手段，最后一项是目的；反过来说，为了在国际间实现和平共处，必须履行前四项原则。和平共处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整体，缺少前四项中的任何一项，就不可能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形成和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了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一规定已具有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侵略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等基本思想。

如所周知，在中苏谈川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伊始，苏方首先提出的草案就是1945年8月他们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的底本。那是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苏方不得不接受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方文本作为谈判的基础。双方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5条便列入这样的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文已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四条概括出来了。这预示着五项

《研究周恩来》第164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12页，《江东兴日记》第194页。

原则已经诞生。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终于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1954年6月在中印、中缅的联合声明中作为国家关系的准绳公之于世。1954年7月在日内瓦关于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张将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扩大到所有国家。

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醒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注意贯彻同西方国家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互相贸易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不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革命不能输出，各国的社会制度是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是处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

1954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不同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应该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周恩来还说，“美国如果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也欢迎。”事实上，自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丘吉尔、艾登都说过，连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说些和平共处之类的话。这是人民的要求，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1955年亚非会议发表了以“万隆精神”闻名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周恩来写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扩大与发展，并以宣言的形式使这些原则的影响延伸到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向铁托赔礼道歉，在贝尔格莱德宣言中，已列入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1956年6月两人在莫斯科声明中明确加上“按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平等、互相尊重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实行和平共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予以肯定。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在访问非洲10国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身说法，更具说服力。同时，他根据五项原则的精神，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4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第79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1—82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91、92、80页。

毛泽东向赫鲁晓夫透露，引自《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80页。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2日。

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可见，早在周恩来提出五项原则时，他已考虑到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1954年9月30日他在庆祝国庆五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便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的提法也表明，其时周恩来已认为，即使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绳。周恩来在与前来参加我国国庆纪念活动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时，也强调了这一思想，并把它写进了10月13日的《中苏联合宣言》中。宣言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将继续把它们同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各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在严格遵守互相尊重……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当时之所以没有明确地专门强调这些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是由于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普遍地、明显地暴露出来，团结互助的主流掩盖了潜在的矛盾。

1956年波匈事件给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造成了损害。10月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访苏期间，对苏联的做法提出了严肃诚挚的批评，指出波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同斯大林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有密切关系，这种大国主义至今没有彻底克服；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在中方的建议下，苏联政府于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上犯了错误，损害了平等的原则，并表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

由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的中国政府声明于11月1日发表，声明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指出这些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过程——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始告完成。

五项原则对马列主义的贡献

《当代中国外交》第14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6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77页。

《研究周恩来》第159页。

《研究周恩来》第159页。

社会主义国家在只有一个苏联的情况下，还谈不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在马列主义理论中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一个世纪以前，恩格斯曾经提到国家的独立自主问题。他说：“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恩格斯此时已预见到国家独立自主的重大意义，即使是在国际主义的框架之中，其理论价值也是应当肯定的。

首先提出和平共处这一概念的，是列宁。但他所面对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因而产生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战略构想。当时不存在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理论。惟其如此，列宁特别强调“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或者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保卫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这就是说，苏俄一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这种认识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出现了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就失去了它的客观依据。可是，斯大林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在情况发生变化后仍然坚持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就必然导致无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国主义错误，损害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使恩格斯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思想充实和完善了，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首先，周恩来根据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国家关系分开处理。1956年5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国家社会制度与国际关系要分开处理的思想。他说，“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但讲到国际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讲，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如果两种制度的国家再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互相攻击，那就不是和平共处了，就会推动战争了。那样就会使国际局势紧张，而不是和缓。”“从社会制度来说，两种制度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的前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因此，在国际关系上，还要有另一条，那就是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

第二，列宁的和平共处只限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周恩来的和平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4页。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4页。

《研究周恩来》第157—169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58—159页。

处五项原则既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理由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是重大的理论突破。

第三，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是着眼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一种策略考虑，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着眼于“求同存异”。“求同存异”的前提是承认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文化方面存在差异，不要求对方改变立场与态度。这种求同存异的策略，要求有着各自不同利益的诸多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寻求在某些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求得妥协，达成协议。这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冲突，发展国际合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以说是最为高明、最为现实的策略。

第四，列宁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当时，难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制度，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基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于一个国际社会的长期性，是作为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对立物而提出的，因而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本原则。1956年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会谈时曾经指出：各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来相互约束，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制度，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这种制度同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旧制度根本对立；它不排斥任何国家，也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周恩来这些思想无异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先声。

可见，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贡献。

五项原则对当代国际法的贡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集古今中外国际政治思想之精华、融会贯通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他将中国古代“泛爱众”（《论语·学而》）、“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下》）、“和为贵”（同上《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同上《颜渊》）、“尚同、兼爱、非攻”（《墨子》）、“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礼记·礼运》）的政治主张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不干涉其他国家事务，也不允许其他民族干涉法国事务”的宗旨以及美国独立宣言对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等民主原则，兼收并蓄。这种思想既符合历史潮流，又适应现代要求。

杨阎：《论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杨阎：《论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宪章第一条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促进国际上经济、文化、社会及福利方面的合作。第二条规定，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以侵害任何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宪章虽然没有写明“和平共处”字样，但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本精神已包含这种意义。例如宪章的序言号召成员国“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在宗旨部分又要求会员国“发展友好关系”、“增强普遍和平”、“促成国际合作”等，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和平共处”同宪章的这种精神是一致的。

二、尽管国家主权概念在 15—16 世纪的欧洲已经确立了，不干涉原则随后出现了，国家独立的重要性和一系列国际法著作对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和平等原则也十分肯定，列宁则明确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则，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其每一项原则而言，都是早已有之。但是将五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作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却是二战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创举。事实证明，在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的情况下，传统国际法上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只有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精神，才能得到各国的承认；一切与此背道而驰的过时或陈腐的规定，都已经或正在被历史淘汰。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除 1955 年亚非会议外，在 1957 年第 12 届联合国大会的议题中也列入了一项《各国和平共处原则宣言》的提案。一些国家代表在会上指出，“假如联合国大会呼吁各成员国在其相互关系中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必将大大有助于国际局势的改善和缓和”。大会后来通过了其标题为《各国和平和睦邻关系》的第 1236(X) 号决议，完全反映了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和内容。这是五项原则第一次以联大决议形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

与此同时，联合国所通过的其他一系列重要文件，如 1960 年《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1961 年联大 12 个亚非国家提出“审议各国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原则”议题，许多国家代表进行审议时指出：“对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编纂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趋势”。1965 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 年联大一致通过的《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及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简称《国际法原则宣言》)，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具体化，并被公认为现代国际法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与五项原则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主要思想是各国主权平等，即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

周恩来在关于美蒋共同防御的声明中说：“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3 集第 213 页。

刘文宗：《论和平共处在当代国际法上的划时代意义》，《国际问题研究》1994 年第 3 期。

平等权利与责任，均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主权平等包括下列主要内容：(1)各国法律上一律平等；(2)每一国均享有主权的固有权利；(3)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4)国家的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受侵犯；(5)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6)每一国均有责任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1974年联大以120票赞成、6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宪章》开宗明义声明，其基本宗旨是在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社会制度如何)一律公平、主权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利益和彼此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宪章》肯定了国家主权的原则，宣布一切国家主权平等。第一章《国家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所有国家主权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公平互利、和平共处，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第二章《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规定：“每个国家有依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强迫或威胁。……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所有权、适用权和处置权，并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宪章》体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意志。《宪章》也在不同程度上重申了五项原则的内容和精神。

此外，在1976年欧安会的最后文件中，与五项原则直接有关的条文就有：(1)主权平等，尊重主权固有的权力……；(2)边界的不可侵犯性……；(4)国家领土完整……；(6)不干涉内政等。可见，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经受了战后以来长期的历史考验。日本国际法学家在论述“友好关系(或和平共处)原则的意义”时写道：“忠实遵守这项原则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实现联合国其他目的至关重要，因此，被看成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都具有反对侵略和干涉的目的。宪章除去序言和宗旨原则部分载明“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制止侵略行为”外，整个第七章和第八章都是用来规定与此有关的事项的。英国国际法学家在论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写道：“可能和平共处概念的真正价值，在于强调把宪章和其他国际组织章程中的规则准确适用于一个像目前这样已经分裂为敌对集团的国际社会。果真如此，那么即使没有给宪章的条款增加更多的内容，只要将有关原则正式固定并加以编纂，就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可见，西方学者也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助于“准确适用”宪章的规则，能够同联合国宪章一样起到制止战争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作用。不但如此，在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

王沪宁：《国家主权》第120页。

王沪宁：《国家主权》第120页。

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第144页。

史塔克：《国际法导论》英文版，第129页。

五项原则用最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使人便于记忆和引用，容易揭示问题的实质，这不能不说是五项原则对联合国宪章的一大贡献。

五项原则不只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概括，同时也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指导各国间经济关系的行为准则即“平等互利”原则。大家知道，宪章虽然在序言里宣告了“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但并未明确提出用什么原则和方法来实现。

周恩来未尝以国际法学家闻世，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其说是从研究国际法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从一百多年来中国对外的屈辱史和他自己在旧中国的亲身经历中概括出来的实践经验，也可以说是他观察和研究近代世界外交史的思想总结。周恩来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列为五项原则的第一条，以之统率其他各条，足以表明他对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深得其要旨，既符合“国家”成长过程的历史，也符合世界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正如我国另一位老一代国际法专家钱端升所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对推动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过去的国际法从来没有如此完整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五项原则来说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条件和要求。

五项原则的推广和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倡议到推广，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它排除了各种干扰，曲折前进，逐渐为各国普遍接受，显示了无限的生命力。五项原则的普遍推广，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一、50年代，由中国和亚洲邻国先做起来。二、从60年代起，扩展到阿拉伯和非洲民族独立国家。三、70年代初，又扩展到拉丁美洲国家。四、继1964年中法建交，突破了美国设置的重重障碍，又有加拿大、意大利等6个西方国家步法国后尘，美国本身也不得不在1972年同意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发展关系。日本受美国“越顶外交”的冲击，于是年9月同中国建立同一基础的外交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除了通过会议、协定、声明等多种形式扩大其运用范围和影响之外，还通过我国同各国的建交谈判并以建交公报的形式加以肯定。截至1995年的联合国成员中，已有16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同意遵循这些原则。至此，三个世界的大部分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包括苏联领导人也认识到，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表示愿意把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独立、

刘文宗：《论和平共处在当代国际法上的划时代意义》，《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外交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倪立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

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以及考虑彼此的合法利益的原则基础上”。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也都继承了原苏联与中国建立的这些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及其影响从此遍及全世界五大洲的每一个地区。

中国始终不渝地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从 1958 年至 1965 年，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尼、朝鲜、加纳、刚果、马里和坦桑尼亚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友好互助条约、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在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方面，正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两国妥善地处理了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此外，也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同许多邻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与有关国家加以妥善解决的。

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2 月，周恩来出访亚非 13 国。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宣传和身体力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盛举。如前所述，周恩来在访问中提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周恩来在马里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实际上为中国处理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确立了一些具体的准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运用和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

五项原则将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外交实际上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那是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予取予夺，与公理相悖，与平等无涉，经历了几个世纪黑暗而漫长的岁月，什么国家主权，什么独立自主，什么自由平等，什么人权尊严，全都践踏在他们的铁蹄之下。那是标榜“有效占领原则”，即由谁抢先占领的领土归谁所有的时代，后来则发展为“门户开放政策”或称“利益均沾”，即对受害国家的利益列强都有份的时代，其时列强所推行的就是“炮舰外交”，谁不屈服就范，就以兵戎相加。大战的结果，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然而列宁关于废除沙俄强迫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实际上成为一纸具文，苏联逐渐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与西方列强竞相瓜分势力范围，西方的传统外交因苏联的出现而变本加厉。旧中国受尽列强的欺凌辱逾百年之久。1949 年 10 月，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身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缅怀历史，面对现实，将如何是处？本国人民的局部利益与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也就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将如何统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的道德规范如何普及于全球？新的国际关系准绳应以

何为据？世界外交格局如何打破，如何更新？这一系列严峻的课题，已在周恩来心中酝酿多时，《共同纲领》有关外交政策的制订，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说明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这些原则使国际法中原有的个别原则成为一个有机的、互相联系的整体，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次飞跃，是国际关系合理性的综合体现。和平共处是互相依存的必然，是求同存异的结果，是和平竞赛的条件，是意识形态的兼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世界持久和平的基础。五项原则的实施表明，它们是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否定，是同旧的外交传统相决裂，是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接生婆，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升华，为世界外交史开创了新时代。

1959年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遇刺身亡。他的陵墓周围巍然屹立着五根圆柱，象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令人有一种浩然正气在空中回荡之感。这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五项原则树立的丰碑。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周恩来是“开创今天的全球均衡”的“关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他在周恩来逝世后访华时对邓颖超说，几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让位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没有必要为周恩来建立纪念碑，“因为历史学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作是他的伟大的证明”。¹这是西方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的另一丰碑。

然而，如前所述，五项原则被接受为国际关系的准则，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推广的。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双边关系准则的国家，情况并不一样。一般说来，第三世界的国家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因而心悦诚服；第二世界的国家多数是随人流，因而是半心半意的；少数一两个国家是迫于形势勉强为之，往往口是心非，或曲解，或利用，并无诚意。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前苏联曾经推行过“主权有限论”，这是殖民主义时期“有效占领原则”在新的条件下的翻版。70年代以来，美国又强行推行“人权外交”，宣扬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随意解释人权，用美国标准强加于人，否定人权属于主权国行政管辖，借口人权恣意干涉他国内政；对人权实行双重标准，缄口不谈自己国内的人权状况，更不容他国过问；对其“友邦”或盟友的人权问题听之任之，从不干预。于是派兵侵入主权国家掠走其国家元首者有之，派特工人员进入他国强行搜捕其所指称的罪犯者有之，他们俨然以世界宪兵自居，其蛮横跋扈、气焰之嚣张，实不亚于中世纪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119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231、246页。

刘文宗：《论美国的“人权外交”》，《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第3期。

欧洲的暴君。这哪里是和平共处，这是制造紧张，制造战争！

正如邓小平 1984 年 10 月间会见来访的缅甸总理时所说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88 年 12 月间他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时，很有针对性地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他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应当用这些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对这一切，周恩来早已说过，“历史将要证明：一切违反五项原则，企图把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做法，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最后都会是行不通的。只有实行五项原则，才能符合我们时代的要求”。他指的时代，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9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2—283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6—1957）第 183 页。

第九章 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不容侵犯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再容忍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和侵犯。诚如毛泽东所说的，谁想损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连半个指头也不行！”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同企图损害国家主权的外国势力进行外交斗争，有几次则被迫拿起武器来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这就是本章将要论述的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和对印自卫反击、对苏自卫反击四大配合外交的军事斗争。

抗美援朝，迫使美国求和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解放战争中被赶走美国势力，要维护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和安全，不能不主要同美国作斗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当年反美斗争中最伟大的战略决策。它突出地体现了新中国在对外事务中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精神，保卫本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不畏强暴和说话算数的英雄气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先是派本国部队，继而纠集所谓“联合国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三天后，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随后，周恩来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中强调：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操纵下通过要求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是非法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而安理会的上述决议恰恰违反了宪章这一重要原则。因此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同时调遣武装力量进入台湾海峡，并侵犯中国东北领空，轰炸和扫射中朝边境地区。美国海军还在公海上破坏中国商船的正常航行，袭击中国渔船。美国对中国的挑衅更加肆无忌惮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253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35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7页。

《新华月报》1950年10月号。

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邦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印度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中国一定要管。这是为了避免出现中国被迫出兵的情况而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发出的再一次警告。可惜当年鲁莽的美国政府掂不出这一言九鼎的分量，仍然呆头呆脑地越过三八线，并向鸭绿江进逼。

在中国安全受到极其严重威胁的时刻，在新中国诞生只有一年、百废待兴之际，为援助朝鲜人民，为保家卫国，中国人民挺身而出，毅然决然派志愿军入朝参战。这一重大决策是从当年中国、朝鲜、亚洲乃至世界战略形势出发作出的。在讨论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大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我国）东北（地区）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时应急召进京，拟受命率领志愿军入朝的彭大将军，终宵难眠。他反复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东北、上海、华东；认为向它让步是不行的；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周恩来1965年6月访问坦桑尼亚同尼雷尔总统会谈中回忆当年的情况时也说：“对于这一场战争，在我国人民内部思想也不是容易解决的。有些人说，我们自己刚刚解放，朝鲜虽是邻邦，我们应先顾自己。要下决心是不容易的。我们对付的是强大的美国，它打的是联合国旗号。毛主席认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

中国除了在军事上要粉碎美军在朝鲜的进攻，同时还要在外交上同美国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一方面向世界阐明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另一方面揭露美方的停战阴谋，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各种合理方案。在美国操纵下，联合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4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5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25—27页。

《彭德怀自述》第257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38页。

国继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之后，又通过了对中国 1949 年即已实施而对朝鲜开始实施禁运的决议，妄图迫使中国就范。对这种一再破坏联合国宪章，超越安理会权限的非法行为，中国政府理直气壮地予以揭露和谴责。然而美国对中国在政治上的诬蔑和经济上的封锁，丝毫没有减少它在军事上的沉重负荷。中朝军队三次进出汉城。扬言要在 1950 年 12 月让在战场上流血的“美国孩子们”凯旋回家过圣诞节的麦克阿瑟被免职了，遂自悄悄地溜走了。双方经过五次战役，战线大体维持在三八线上。战争刚满一年，接替麦克阿瑟的李奇微将军便发出了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谈判是在美国极不愿意的心态下进行的，谈判时断时续，战火时燃时息。1953 年并肩作战的中朝指战员取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是第一次”。当年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格雷说：美国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彭德怀则以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为憾。——

美国在侵朝战争中，动员了陆军的 1/3、空军的 1/5 和海军的大部分，消耗作战物资 7300 万吨以上，花了 200 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在战场上，美国使用了所谓闪电式的攻击战，乘虚而入的仁川登陆战，瘫痪朝中运输的绞杀战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新式武器。在 3 年激战之后，美军仍然停留在 3 年前他们开始入侵的三八线上，却付出伤亡 39 万人的代价，超过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总数；被击落和击伤的飞机 12000 多架，被击沉和击伤的各种舰艇 257 艘，船舶 295 只，损失坦克 3000 多辆。

经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停止了，美国侵吞朝鲜进而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被粉碎了。这就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为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新的范例，为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和平建设，为中国人民更好地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关于召开讨论朝鲜问题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几经周折，终于在 1954 年 4 月于日内瓦举行。

抗美援朝，美军被赶下海

越南民主共和国 1945 年 9 月宣告成立时，它的抗法斗争仍在艰苦进行。新中国一诞生便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的国家，同时大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1950 年 1 月胡志明来到北京，会晤他的“同志加兄弟”周恩来。根据他的要求，周恩来表示，中国将大力援助越南的独立事业，并派出一批

《彭德怀自述》第 264 页。

《中国外交史：1949—1979》第 107 页。

顾问，参与规划抗法战争一些重要战役。陈赓奉命赴越协助组织打通中越通道的边界战役，韦国清则于 1954 年春协助组织了抗法战争决定性的最后一仗——奠边府战役。

法国军队按照日内瓦协议于 1955 年开始从越南撤走以后，美国便插足进来，支持南越傀儡政权，彻底撕毁关于在全越南进行普选以实现南北统一的日内瓦协定，残酷镇压、迫害前抗战人员和主张和平统一祖国的人士。南越人民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并于 1960 年末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这一斗争。美国开始是袭用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办法，出钱、出枪、出顾问，让越南人打越南人。美国错误地以为越南不如中国，越共不如中共，很快就可以征服，竟情不自禁地自己派出部队，由几千、几万，最后增至几十万，由军事顾问团、一般部队到“特种部队”，对越南进行了大规模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面，中越两国领导人于 1962 年夏在北京会商。中国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 个步兵营的武器。1963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应邀到达河内，同越南领导人研究敌人进攻北越的可能性，以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跟着，刘少奇到越南访问，他对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1964 年 6 月，毛泽东也对来访的越军总参谋长说：“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

1964 年 8 月，美国不甘心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和所谓“墨渍战术”遭到失败，又制造所谓“北部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美国的武装干涉又一次逼近中国边境了。对此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中国各地举行了共有 2000 万人声势浩大的援越示威。来访的越共第一书记黎笋对毛泽东说：“我国的人民和军队情绪这么高，打得这么英勇，就是心里时刻想到后面有中国的支持”。

1965 年 3 月，美国陆战队在岬港登陆，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海空袭击。美国飞机也不断在海南和滇桂中国领空轰炸扫射。美国则大肆宣传在越南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种“庇护所”，美军将实行“穷追”战略，露骨地对中中国进行战争威胁。约翰逊总统甚至扬言“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对此，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支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事实上，在约翰逊的脑

《当代中国外交》第 159、160 页。

《新华月报》1964 年 9 月号。

《人民日报》1965 年 12 月 21 日。

子中始终萦绕着中国何时派志愿军的问题。

1965年4月,应越南要求,中越签订了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有关协定,先后派出地空导弹、高炮、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多人,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沿海扫雷,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讯设备和国防工程等任务。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援越抗美战场上伤亡达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的遗骨就安葬在越南的国土上。——

在援越过程中,中国人民急越南人民之所急。中国生产的和新研制成功的武器,自己的部队还没有装备,就优先向越南提供。有的武器即使在自己生产不足时,也宁可自己的部队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有时为了应急,不少军人从自己的现役装备中抽调。由于援越野战输油管工程所需钢管不够,中国不惜把当时正在铺设的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输油管线推迟,将钢管运往越南。——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据统计,到1978年止,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备海陆空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钢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的油管和6.35亿美元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且不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呕心沥血,亲自过问和规定如何为越南战士减轻干粮负荷和物资的包装重量。

黎笋1975年9月访华时,再次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他对毛泽东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个辽阔的后方,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

1965年4月初,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同阿尤布总统单独会谈时,请他转告美国总统四句话。同年5月末,周恩来在广州同印尼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会谈时,也谈到这四句话。——12月20日,周恩来在出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的招待会讲话时说,已经陷入越战争泥潭的美国,正在策划扩大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整个印支和中国。中国人民早已做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人民再较量一次,中国人民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

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重申由阿尤布总统转达对美国政府的四句话。

《出类拔萃之辈》第1159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161、281、280—281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280—281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45、456、487页。四句话见本书附录第421页。

这是对美国的侵朝战争不能置之不理的警告以来又一次最严重的警告，甚至指出，“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队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对周恩来先是通过外交渠道，后来又公开发表的针对美国侵越战争的四句话，美国当局显然汲取了朝鲜战争初期对周恩来发出的严重警告充耳不闻的教训，不得不认真对待。此后，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频率逐步降低，最后宣布无条件停止，也未再发生对中国边境的轰炸事件。1967年美国侵越部队已达56万人，超过二战中它投入欧洲的兵力，但它始终未敢越过17度线进入越南北方，所谓“穷追”战略不过是一句空话。美国被迫于1969年1月同越南在巴黎开始谈判，越南战争进入谈谈打打阶段。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中美关系再也不能在死胡同中打转，而侵越美军已一筹莫展，他亲自同越南进行的谈判又捞不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加以美国国内反战情绪已达爆炸点。美国当局显然认为，中美关系是一把万能钥匙，将解开它所面临的困难。所以基辛格在会谈中，中美关系问题之外，便直截了当向周恩来提出越南问题。周恩来郑重指出：结束越战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撤军，不留任何尾巴，让印支三国人民各自解决自己的问题；否则，战争一天不停，中国对越南的支持也一天不止，我们还为侵略可能扩大做好了准备。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又提出越南问题。周恩来反复说明，争取远东国际局势的缓和，关键在于解决越南和整个印支问题，美国越早退出印支越好。如果战争打下去，我们将继续支持印支人民打到底。我们只有支持和同情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利。周恩来最后对尼克松说，二战结束以来26年，印支战争不断，血肉横飞，中国人民极端同情印支人民。我们同他们休戚相关，你们应该懂得我们的感情。这同苏联当年视越战为改善对美关系的沉重负担，形成强烈的反差。

周恩来的严正态度，打掉了美国要中国对越南施加压力的幻想。这就有力地支持、配合越南在巴黎对美国的谈判斗争。同时中国仍全力以赴地继续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1971—1973年，正是中国援越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61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161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162页。

《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40页。

协定总额约 90 亿人民币。周恩来当时曾亲自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没有这个决心不行。”——中国坚持不渝地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由于中国的坚定立场，由于越南人民的英勇奋战，50 多万的美军侵略军终于在 1973 年撤走。1975 年越南南方全部解放了，美国驻西贡使馆人员和留守的美军仓皇从海空逃跑。这是继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历史上另一次在海外打败仗的纪录，并因此害上“越南病”痼疾，以致此后再也不敢轻易冒地面战争的风险了。

根据权威的材料，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阵亡 5.8 万人，受伤 36.5 万人，消耗 1500 亿美元战费。

二战中曾在重庆采访过周恩来的一位美国记者深有感触地回忆说，30 年前，没有人愿意听周恩来的话。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使美国损失了千百亿美元，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按最低的估计，美国在那个名叫越南、到处是从林的国家花了上千亿美元。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代价是触目惊心的。假如华盛顿当时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这种可怕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他已去世，华盛顿却在倾听周的意见，然而已经晚了。虽然如此，尼克松和基辛格毕竟还是醒悟了，在周恩来弥留之际，接受了他的忠告，在全军覆灭之前，撤走了陷入越南泥潭中的五十几万“美国孩子们”。

对印自卫反击

中印的边界问题是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扩张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深受亡国之痛的印度独立之后，本应对此采取比较通情达理的态度，使这个问题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不料它竟采取更甚于英国的立场，致使问题从一开始便把大门堵死。——它的主要表现是：

一、1950 年当新中国在西边正忙于和平进军西藏，东边正密切注视美国入侵朝鲜的战争时，印度政府已下令把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北边境特区，也就是“麦克马洪线”南面英国统治从未到达的部落地区。西藏当局立即提出抗议，指责印度政府“把原来不属于它的地方攫为己有”，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并要求印军立即撤出达旺。印度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将达旺的西藏行政官员赶走。这样，印度就把过去英国人只是在地图上画的“麦

美国当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1995 年初出版的回忆录的数字，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 年 5 月 1 日。

杰·安德森、莱·惠顿：《为什么我们当时不听周的话？》，《华盛顿邮报》1976 年 1 月 10 日。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 276、187 页。

阿拉斯太尔·兰姆：《中印边界争议的由来》英文版第 65 页。

克马洪线”恣意移到地面上来。到 1953 年印度已占据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二、“麦克马洪线”是 1914 年中国西藏地方同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举行会议讨论西藏地方同中国其他部分的界线时，英印政府外事官员麦克马洪私自用红线在地图上画的中印边界线。会议从未涉及中印边界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不但拒绝在英印和西藏地方代表炮制的西姆拉条约上正式签字，并且代表政府郑重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这就说明，无论是所谓西姆拉条约还是附图中的“麦克马洪线”，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况且西藏地方当局并无对外缔约的权力，这条线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因而是非法无效的。英国直到 30 年代后朗还不敢在出版的地图上画出这条线，该线以南的广大地区直至 1953 年仍在西藏有效的管辖中。这就是中印边界东段的情况。

三、中国新疆和西藏同克什米尔印度占领区的拉达克接壤的中印边界西段，在 1931 年英印政府外交政治部编纂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2 卷写明：“克什米尔邦的北部和东部边界尚未划定”。尼赫鲁 1959 年 8 月 28 日在人民院谈到这一段边界时也说：“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

从西段的东南端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中印边界中段。印度官方地图迟至 1950 年还没有画出这一段边界，只注明“边界未经规定”。尼赫鲁本人 1959 年 3 月 22 日给周恩来的信中也承认这一条界线没有任何条约根据。

由此可见，长约 2000 公里的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这一点，印度政府是清楚的。不幸的是，早在 1954 年 7 月，即中印关于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 3 个月后，尼赫鲁在给内阁各部的一份备忘录中，竟认为这个协定所规定的北部“边界是牢固的、明确的，不容同任何人讨论的。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界哨所。”这个关键性政策指示的意图是：印度应当扩展到它认为是自己边界的地方，而且拒绝同中国谈判。他这个步骤就把边界问题转化为争执，而争执最后又转化为边界

战争。如所周知，上述协定并没有涉及中印边界问题。

为了执行尼赫鲁的指示，印方便私自篡改地图上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英国是用虚线标出的，表明是未定界，1954 年印度官方的地图则改力实线，变成已定界了。过去英国的地图将西段那一大片未定界用淡色标明，这时变为实线，并且把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边界线向北拐，将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划入印度境内。中段的各个山口原来都在西藏地方的管辖中，而且控制了山口以外的许多牧场、印度却指责中国侵略，而事实上双方边防部队

发生接触乃是由于印度军队向前挺进的结果。几年后，尼赫鲁本人在议会里也确认了这一点。到 1958 年，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在中印边境两端的无人地带就这样被印度占领了。——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断然拒绝周恩来所提出的两国边界应尊重一条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周恩来甚至建议那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可参照中缅边条协定中一段类似的画法处理。印度置这些合理的意见于不顾，也不理会中国提出的大量照会和周恩来致尼赫鲁的重要信件所陈述的从原则到具体细节的说明。更有甚者，印度不但占领了该线以南的地区，甚至越过该线，在被印度视为中国领土的地区增设哨所，这些哨所绕过中国哨所，形成对中国哨所夹击与包围的态势，企图迫使中国撤走哨所。周恩来对这种危险的行动及时发出警告，印度却置若罔闻。于是在东段和西段相继发生武装冲突。

1959 年 8 月 25 日，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入侵一个村庄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猛烈开火，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后来印度政府也承认这个村子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军只得撤出朗久。10 月 21 日，西段接着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一大批印度武装人员侵入山口以南中国境内，向一小支中国巡逻队发动突然袭击，被中国巡逻队击退。当时担任印度情报局局长的莫立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事件是印度方面挑起来的。

面对边境一再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情况，周恩来于 1959 年 11 月 7 日致函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 20 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两国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只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周恩来在信中还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不幸的是，此时开始谈论战争的尼赫鲁仍坚持其已宣布的立场，拒绝关于双方边防部队脱离接触的建议，表示“不可能举行任何谈判”，但同意两国总理进行会晤。尼赫鲁认为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

本来岁暮年初是新德里按例接待来访贵宾的最佳季节。其时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开，细雨压尘。进入 4 月份，印度首都便炎热起来了。这次邀请周恩来来访，却安排在炎热的季节。1960 年 4 月 19 日，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到达新德里。机场迎接的人除了外交使团，就是几个板着脸孔的主人。在这种场合，尼赫鲁的欢迎词一贯用英语，而且不用稿子。这次他的讲话却是用印地文写成的，是为了着重表示欢迎仪式是冷淡的。——印度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 87、91 页。

阿拉斯太尔·兰姆：《中印边界争议的由来》英文版第 83 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 182 页。

《人民日报》1959 年 11 月 10 日。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 142、151、168 页。

独立之初，尼赫鲁在国会第一次讲话用的就是印地语，那是出于民族自尊心，表明印度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无需借用殖民主义者的母语。可是由于东、南各邦的议员不懂印地语，又不得不改用英语，并将这一外语规定为印度政府的官方语文。尼赫鲁这次又将官方语文弃置不用，转而采用英国统治前的语文。殊不知中国客人虽听不懂印地语，但对民族语言，一向是尊重的，并不因此感到受了冷落。

印方对这次接待还有一个独特的计划，要中国客人尽可能多地会见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表态，而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中国客人的阁员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

一位当年陪同周恩来度过那紧张疲劳达一周之久的印度高级外交官说：即使那时我们对中国人感到愤怒，我们也不得不钦佩他的耐心、他的自我控制能力和他的才能。他就像我祖父珍藏着的一把纯钢的利剑。

在6天的访问中，周恩来同尼赫鲁进行了20小时的会谈，除了双方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周恩来曾建议将两国边界问题上6个共同点或接近点列入拟议中的公报，尼赫鲁却断然加以拒绝。在此期间，印方不但不为客人举办公众集会活动，而且还不让他们与私人 and 新闻界接触。会谈到了最后一天，外国记者要求为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印度外交部也不同意。然而周恩来仍按他的习惯，在这类访问结束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使印度记者大喜过望。他们往往以敢于向来访的政治家提出尖锐的问题而自豪，在边界争端中又几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都打算提出一大批问题来刁难周恩来。但是从周恩来进入大厅的那一刻起，他就控制了整个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从25日22:30持续到26日1:00，还是一位英国记者提醒注意报馆截稿时间才结束的。有150多名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记者参加。周恩来首先发表书面谈话，然后宣布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报道。

书面谈话就是上述被拒绝的那6点建议，即：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四、两国边界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六、为了保证边境安宁，便于商谈，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周恩来说，这6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的这一建议。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69、177页。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377页。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78页。

《人民日报》1960年4月30日。

有一位西方记者问，印方在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侵略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会谈中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的首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不友好的。我只能说，我们两个友好的国家不愿意在这一点上满足西方国家的希望。

周恩来在这次访问中已充分意识到，印度是想把边界问题拖下去；他们的真正意图是想把中国的西藏地区变成一个缓冲地带，不希望西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西藏。

印方对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和内容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鲁等到中国人登上飞机前往加德满都(周恩来此行同尼泊尔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飞机在天空中还没有消失，就在机场上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当记者问他是否提到侵略问题时，尼赫鲁也满口指责中国侵略。后来周恩来在加德满都举行的记者会上答复提问时，对印度东道主这番话的反应是：“他当面对说不说，可是等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是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

印度不同意双方保持边界现状和双方边防部队脱离接触，就是为了继续贯彻它的“前进政策”。在西段，截至1962年10月20日止，印度已在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在东段，仅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26个哨所，甚至在该线以北也设立哨所。在此期间，印方不断在边界挑起武装冲突。

为避免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曾反复建议及时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但印度因为在某些武装冲突中由于中方的忍让而得逞，仍坚持其无理的要求：即要求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在东段撤出“麦克马洪线”以北印方非法建立的哨所地区。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大门。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悍然宣布，他已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入侵地区“清除掉”。17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开始猛烈炮击。印度报刊对“前进政策”则欢呼为“拿破仑式的大胆策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中国不得已于20日开始进行自卫反击。

四天后，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在和平解决前，双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致尼赫鲁信中提到的双方之间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二、如果印度同意这一项建议，中国愿意通过协商将边界东段的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中段和西段双方保证不超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三、两国总理再一次举行会谈，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75页。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123页。

1960年4月28日周恩来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以谋求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这个声明显示了中国从一开始就无意利用自己在反击中的进展，向印方提出任何领土要求。不幸，印度政府收到中国建议的当天，便轻率地予以拒绝。

中国军队收复了印军越过实际控制线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并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尽管印军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已放弃了达旺，提斯浦尔也变成一座空城，已卸任的国防部长梅农惊呼此时的中国军队“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中国政府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明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一、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三、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若干检查站并配备民警，维护正常秩序，保证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坏分子的活动；检查站的位置将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印度政府。声明要求印度军队不要越过实际控制线，不要恢复1962年9月8日以前进占的位置。宣布前夕，周恩来于午夜零时20分，约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通报声明的主要内容，要他立即报告政府，并希望印方积极响应，采取相应措施。一小时后，周恩来又约见印尼驻华大使，请他将声明要点转告苏加诺总统，便于他做印度的工作。

对于中国单方面停火和后撤从而宣告这场冲突已结束，“与其说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泰晤士报》的此一评论，据说几乎代表了全球的反应。

1963年2月28日，中国军队完成了主动后撤的计划。至此，中印边境事实上不但实现了停火，而且实现了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4月，中国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并归还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作者曾多次奉命约见印度驻华使馆有关官员，通知某一批军械的移交时间和地点。）这充分体现中国始终以两国友好睦邻的长远利益为重。1963年12月3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指出中印边境的局势已有所缓和，中印关系不应该再恶化下去，双方应该想办法寻求一些共同点来促使两国关系的改善。印方于1968年也表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然而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双方的共同努力。

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官卡西亚勋爵事后评论这场边境冲突说：“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3)《新华月报》1962年12月号。

《泰晤士报》1962年10月21日。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41页。

1965年印度国防部发表的数字为：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被俘3968人。中国归还的武器中、有尚未启封的美式装备，还有一架尚能使用的苏联军用直升飞机。

《星期日泰晤士报》1966年6月12日。

“前进政策”据说是当时印度部队的参谋局长考尔将军想出来的。他后来担任东北边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1960年11月20日那一天，如果不是及时登上直升飞机，他就难逃被俘的命运。美国驻印大使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被俘。关于最后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评论说，“这不幸不是事实”。

1962年12月3日周恩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谈中印边界形势时说，现在形势已经缓和了，目前是打不起来了，是友好国家做工作的时候。即将举行的科伦坡会议有很多工作可做，可以呼吁印度正式停火，双方设立隔离地带，可以促成中印直接谈判。

印度以不结盟世界领袖自居的态度使有些亚非国家颇感不快。这次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得不到不结盟国家的支持。印度一高级官员抱怨说：“我们的邻邦和我们的朋友甚至在中国侵略印度的问题上也倾向中国一边。”有些报纸宣称印度处境孤立，“在亚洲几乎没有一个朋友”。道理很简单，受尽殖民主义之害的亚非国家怎么会支持要继承殖民主义历史遗产的政策呢！

对苏自卫反击

苏联将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问题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于1960年7月片面召回在华工作的专家，并单方面撕毁所有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已表明它不惜全面恶化两国关系。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武装冲突，把已经恶化了的两国关系推到危险的战争边缘。

1959年9月塔斯社授权发表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的声明之后，苏联便于1960年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制造第一次边境事件。此后又不断破坏边境现状，采取同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如出一辙的措施，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阻挠中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破坏中国边民的正常生活。1962年，正当中国出现暂时经济困难，台湾蒋帮在美国支持下大事叫嚣“反攻大陆”，而印度政府正企图在边境将中国边防部队“清除掉”的时候，苏联却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甚至策动了伊犁暴乱事件。这不就是苏印互相配合，企图迫使中国就范的客观事实吗！难怪英国记者说它们“秘密结盟”了。

中国政府于苏联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时，便明确提出：边界问题要通过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462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43页。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76页。

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就导致 1964 年中苏两国的边界谈判。然而在谈判中，苏方不但拒绝了中国的合理建议，不同意在旧条约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而且坚持要中国接受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的无理要求。谈判搁浅了。

此后，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1968 年初，大批苏联边防军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中国七里沁地区，打死打伤中国渔民。苏联不顾中国一再提出的强烈抗议，不惜在该岛附近的珍宝岛地区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

1969 年 2 月，苏联宣布其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3 月初便大举入侵珍宝岛，对中国边防人员采取突然袭击。中国边防人员警告无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迫使苏方后撤。不料苏联不以此为训，竟又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在飞机和远程大炮的掩护下，两次侵入珍宝岛地区，并向中国境内的纵深地区进行炮击。中国边防部队奋勇打退了苏联的三次猛烈进攻，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国家安全。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

5 月 2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示中苏边界问题和珍宝岛事件的真相；重申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建议双方维持边界现状，不以任何方式改变边界实际控制线，在以河流为界的地段不越过主航道和主河道的中心线；在任何情况下，双方边防人员不向对方射击；双方边境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干扰。中国政府在声明中郑重宣告：如果苏联认为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以为用核讹诈就可以吓倒中国人民，企图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打错了算盘。“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尽管此后苏联又将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扩大到黑龙江，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由于撞上了中国的铜墙铁壁，加以内外形势的变化，终于迫使苏联冷静下来。1969 年 9 月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赶到河内为胡志明奔丧，指望同周恩来见上一面，不料周恩来在他到达前几天已经离开河内了。柯西金失望地匆匆回国。他在途中获悉周恩来同意在他途经北京时在机场同他会晤，连忙转飞北京，于 11 日在北京机场的贵宾休息室同周恩来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晤是不寻常的，不但地点不寻常，时机也不寻常。毕竟这是 1965 年两国关系濒临破裂以来直至关系正常化之前的 20 多年中两国政府首脑之间仅有的一次会晤，虽然两人曾经是“同志”，又都是多次打过交道的“老朋友”。

那么，对苏联来说，形势究竟有什么变化呢？周恩来何以要抓住这个一纵即逝的时机呢？就在这次会晤之前一个月，苏方曾向美国刺探“如果苏联

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将作何反应”？这就表明，中国政府上述声明中所指的苏联以为用核讹诈就可以吓倒中国，是确有其事的。所以周恩来在会晤中开门见山地向柯西金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事实上中苏矛盾在珍宝岛事件中的激化反而增强了美国调整对华关系的想法；美国宣布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阻止苏联对中国的袭击，如果发生这种袭击就加以抗拒，这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当然不会把这个意向直截了当告诉苏联，更不会如此露骨地向中国作出保证，但它想改善对华关系的表示则明显地见诸行动。苏联的核袭击将导致中苏战争，这一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应该是清楚的；而这将削弱它同美国在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的地位，并将被认为在越南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在越南背后捅了一刀，且不说对华战争在苏联人民中是通不过的。事实上中苏边境冲突发生后不久，美国白宫的新主人尼克松便致函柯西金，并由其驻苏大使传达口信说，美国“无意看到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利用中苏分歧”，并明确告诉苏方：从长远来说，美国“希望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就是苏联在珍宝岛事件时所面临的形势。

美国的举措促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出核袭击威胁的同时，提出了同中国领导人接触的建议。而中苏政府首脑的会晤及边界谈判的恢复又加快了美国走向中国的脚步，三国之间关系的互相影响已表现得十分充分。——无怪乎连基辛格也感到：“到了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演变成三角关系了”。而周恩来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则居于中心地位。——

周恩来不但在三角关系中掌握了主动，在同柯西金的会谈中，也掌握了主动。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却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要“吵架也是文吵，动口不动手”。周恩来接着便说出对我进行核袭击将导致战争那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周恩来恳切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正常

基辛格：《白宫岁月》英文版第138页。又，据《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39页载，早在1965年5月，勃列日涅夫对美方提出如何牺牲越南的利益来共同对付中国的建议，曾大感兴趣。

《当代中国外交》第125—126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50、271页。

《研究周恩来》第177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英文版第191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125页。

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周恩来提出具体方案说：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然后恢复边界问题的谈判。柯西金表示同意，并同周恩来达成了谅解。在这种气氛下，两人还就恢复互派大使（1966年以来在两国首都只保留了临时代办）、扩大贸易、改善通车通航和界河航运等缓和国家关系的措施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周恩来最后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对此柯西金当场表示同意。这样，在会晤结束时，双方对取得的结果都感到满意。——两国边界谈判于是年10月在北京举行。

尽管由于苏联决策层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不一致，未能进行正式换文，并且在苏中边境陈兵百万，边界谈判也没有结果，但双方还是遵守达成的谅解，边界上不再打枪，局势相对缓和下来了。周恩来在这次会晤中，既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又可以专力处理“文化大革命”大动乱，同时还可以继续援越抗美。周恩来及时抓住同柯西金会晤的时机，真可谓一石三鸟，完全符合中央的战略意图。当时参与其事的外交部同志事后回忆起来，深感周恩来纵观风云、运筹帷幄的外交艺术之高超，他所作的努力无疑将作为谋求和平、解决边界争端一次成功的实践而载入新中国外交史册。

周恩来逝世后，中国人民于1979年对越南的军事挑衅又进行了一次自卫反击。抗美援朝胜利后的越南领导企图兼并柬埔寨和老挝以实现其“大印支联邦”计划遭到中国的反对，它对中国挑起莫须有的领土争端又不得逞，残酷迫害和大规模驱赶华侨也不得人心，乃恼羞成怒，铤而走险。越南领导人食言欺人，扪心自问，对得起中国人民吗？这次自卫反击，同以往两次一样，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

经过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和几次自卫反击，终于强化了中国的边境安全和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为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这是周恩来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作出的一大贡献。“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研究周恩来》第173、173—174页。

《研究周恩来》第175页。

详见《当代中国外交·第21章》。

第十章 解决边界问题的科学理论

中国大陆同 11 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前),陆地边界总长两万多公里,大部分为未定界。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也是周恩来责无旁贷、全力以赴的历史使命之一。与处理其他国际事务一样,周恩来为解决这一难题殚精竭虑,心力交瘁。然而出于他的睿智,他不仅在力之所及的范围年圆满地解决了同许多邻国的边界问题,而且为外交学中的边界谈判这一课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

一种态度,五个原则

为了一个一个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制订了对所有边界问题的谈判都适用的政策方针和原则。这就是对过去的边界条约和未定界采取什么态度和边界谈判的目的、原则、方法、依据和缔约等五个原则。

对边界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对旧中国过去同外国所签订的边界条约,能否像对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那样,宣布一律废除?周恩来根据他对国际关系史的了解,并广泛征求国际法专家、条约法律专家和外交史学家的意见,认为应遵照建国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重新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周恩来说:“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这就是中国政府对待旧边界条约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可以避免由于单方面的行动而引起纠纷甚至冲突,也就有了重订或新订边界条约的基础。

五个原则是:

第一,目的:为了和平周恩来 1957 年 7 月 9 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解决边界问题,其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谋求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既着眼于本国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推而广之,亦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首先要求从解决好边界问题做起。这是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性。

第二,原则: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和“平等互利”是解决边界问题三条根本原则。周恩来说:“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尊

《共同纲领》第 7 章《外交政策》第 55 条。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33、236、131—132 页。(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50 页。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和平共处的前提，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先决条件。“平等互利”原则中的“平等”，在边界谈判中体现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互利”就是既要坚持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必须而且应该在反对大国主义方面做出榜样，而不在于多占一点地方。周恩来说：“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主义思想的问题。”^①“我们解决边界问题必须同我们和平共处政策的推广联系起来进行”。根据上述原则进行边界谈判，才有可能获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第三，方法：进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和平谈判。周恩来说：“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的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②“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因为这是与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相违背的”。“我国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③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时，中国政府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中，第一项就是“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必须”两字表明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企图诉诸武力改变边界是不明智的，危险的，也不可能得逞。

第四，有一定的法理依据，并正确运用历史资料周恩来对浩如烟海的边界历史资料和地图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他说：“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像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认真对待历史资料：(1)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2)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3)要注意本国与对方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4)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边界条约。^④具体他说，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时代的材料可以作为领土主张的法律依据。解放前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新中国要全部接受，有些地方只有名义上的统治而实际上没有管辖到的，新中国也要接受，因为这些地方在法理上是属于中国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国民政府实力尚未达到，但不能因此就不属于中国领土了。过去历代绘制的地图，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地理和测绘知识有限，又很少进行实地勘察，很难说是符合实际。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出版的地图都是民间沿袭旧图自行印发的非官方地图，只能作参考，不能作法理依据。

第五，缔订新约，取代旧约旧的边界条约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历届政府被

^①《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32、237—238、131、237—238 页。

^②《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0 日。

^③杨公素：《周恩来同志对于解决中国边界问题的重大贡献》，1989 年 3 月“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论文。

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后应该签订新的边界条约，以取代旧的条约。新的边界条约对边界线进行全面划定与标定后，对一致的地段重新确认；对有分歧的地段，经过友好协商，进行公平合理的调整；对未定界则加以明确划定和标定。通过谈判对两国的边界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达成一个全面的、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基础上签订的边界条约就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等的条约，历史上已有的旧条约也就被废除了。

三种边界线的划分

周恩来对我国的边界线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之后，认为已定界和未定界存在三条边界线，即已定界的边界线、未定界中的“传统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即使是已定界中的边界线，由于种种原因，也会引起争执，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

已定界是根据旧条约强加给中国的，但因为它是一条合法的国际边界线，而且已成为历史事实，是不能单方面改变的。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传统习惯线”的定义是：根据两国历来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为两国人民所尊重的边界线。历来行政管辖所及的地区是国家主权所属的领土，其主要表现是对当地居民行使司法、行政、税收、治安以及官员的任免等。这条传统习惯线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地理条件如高山、江河、湖泊等自然形成的，虽然未经两国确认，却为双方边民所遵守。但是因为未经正式划定标界，它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可能会出现纠纷，发生争执，引起边界问题。

周恩来称为“实际控制线”与“传统习惯线”的差别在于：两者的含义不同。“实际控制”带有强制性质，是人为的；而“传统习惯”是自然形成、客观存在的，虽然这两条线都是双方行政管辖所及的地方，但“实际控制线”的历史远较“传统习惯线”为短，它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是一国将其实际控制地区推进到“传统习惯线”，如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情况；另一种是一国利用他国无力顾及的情况侵占了他国“传统习惯线”以内的领土，如英国统治缅甸时期所制造的“1941年线”。这种“实际控制线”未经双方确认，其性质是临时性的，需要通过谈判才能划定。

周恩来将中国边界线划分为上述的三条线，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政策上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为边界谈判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根据这三条边界线的实际情况进行谈判，双方还必须具有“互谅互让”的精神，才能使边界问题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公平合理与互谅互让

“互谅互让”是周恩来在处理同缅甸的边界谈判时提出来的，它摒弃你

争我夺的帝国主义或扩张主义国家的态度，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体现。旧中国被迫同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除沙俄以外，都是英法的殖民地，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没有责任的，中国人民也是没有责任的。现在中国解放了，沙俄早已成为苏联，印度、缅甸等国也都独立了。这种情况，已不能与当年相提并论。所以周恩来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

周恩来说：“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__边界问题，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做到公平合理，就要求互相照顾，不提过分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在人际关系中是一种道德规范，在国际关系中则是一种对等互利的体现。

要做到公平合理，还需要一种“互谅互让”的精神，就边界调整问题提出一个双方各有得失的连锁方案。“互谅互让”，既考虑到历史背景，也照顾了现实情况。周恩来说：“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像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__正是都有过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共同经历，又都有谋求发展的共同愿望，在处理共同面临的边界问题时，才能有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互相让步的心理基础，并升华为一种友好合作的态度，形成一种平等互利的政策。犹如“公平合理”的要求一样，“互谅互让”在人际关系中也是一种道德规范，而在国际关系中则是一种平等互利的体现。“公平合理”的要求和“互谅互让”的精神，是周恩来将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揉和到国际关系准则中并使之达到统一的又一范例。这种要求和精神，遂成为解决复杂的边界问题的催化剂。

一种态度和五个原则，三条边界线，“公平合理”与“互谅互让”构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它像一把万能的钥匙，在实际谈判中圆满地解决了同许多邻国的边界问题。不言而喻，由于同各国的边界情况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各有特点，这些特点无不凝结着周恩来的智慧。

中缅边界条约：一揽子解决的典型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37、230—231、236 页。

《研究周恩来》第 98 页。

周恩来在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案之前，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查阅了汉代以来的有关史料，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仔细检阅各种地图，弄清了各个时期的不同画法及其原因。他查考了 19 世纪以来中缅历次边界纠纷的情况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他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关于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论述和国际惯例。

周恩来 1957 年 7 月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说：“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并且认为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就是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一揽子方案。

中缅边界全长 2200 公里。三段未定界指“1941 年线”，中段猛卯三角地区和北段尖高山以北的一段。1941 年英国乘人之危，利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困难处境，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以换文的方式在阿佤山区划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即所谓的“1941 年线”。后来由于发生了太平洋战争，这条线上并没有竖立界桩。谈判中，缅方表示理解中国人民对“1941 年线”的不满情绪，承认它是英国强加给中国的；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当时的英国政府以换文划定，要求中方予以承认，并撤出 1952 年因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该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猛卯三角地区面积约 250 平方公里，属于中国领土。英国吞并缅甸后，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将该地区作为“永租地”，让它在缅北修建一条从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尖高山以北地区，英国曾不断制造事端，蚕食中国领土。最严重的是在 1911 年的“片马事件”中对片马地区的武装占领，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英国政府不得不在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均属于中国，却一直不肯归还。

根据上述情况，本着互谅互让精神，在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下列一揽子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一、由于“1941 年线”强行割去我佤族所属班洪、班老辖区，我佤族头人和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收回，我方拟将面积较大的猛卯三角地区让予缅方，以换回面积较小的班洪、班老被割去的辖区。周恩来解释说：猛卯三角地区一旦交还中国，缅甸连接掸邦和克钦邦的交通命脉就会中断；另一方面，班洪和班老部落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他们的头人都还住在中国境内，而缅甸政府过去一直没有管辖过；上述交换将使中缅双方的利益和实际困难都得到适当的照顾，既贯彻了废除猛卯三角地区“永租”关系的原则，又便于中国政府说服中国人民接受“1941 年线”。我方同意撤回该线以西的中国军队，但在取得协议后竖立界桩前，缅甸军队暂不进入这一地

《研究周恩来》第 297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32 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 147 页。

区。二、猛卯三角地区的“永租”关系应当结束，因为继续保留这种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而且考虑到收回这一地区将使缅甸北部的交通受阻，中方愿意让出这一地区以交换被“1941年线”分割的班洪、班老地区。三、尖高山以北的一段。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归还中国。缅方表示，中国的要求是有法律依据的，缅甸根本不应该要这三个地方，因为那是不公平的。中方表示，在中国军队自“1941年线”以西撤出时，缅甸军队也撤出这个地区，在达成协议前，中国军队也不进驻这个地区；此外，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一段，原则上可按怒江、瑞丽江（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一段，可按传统习惯线划界。

吴努总理同意这个方案，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经过双方不懈的努力，两国于1960年1月签订了边界协定，于同年10月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至此，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条款》和1897年《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等不平等条约也就废除了。

上述传统习惯线，就是从印度延伸过来的“麦克马洪线”。底富山口按缅甸传统的说法就是中国山口的意思，它是中印缅三国边界的交叉点，中缅边界西端终点。因为中印边界未定，双方同意将这个山口定为两国的临时终点。后来缅甸受到来自印度的压力，要求在议定书中不出现“底富山口”的名称。周恩来同意只提“47号界桩点”并在其后加上“西端终点最后确定前的临时终点”字样。这一解决办法深为缅方所赞许。

关于边界条约的写法，周恩来在一次史地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用新条约代替旧条约，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边界条约。后来他又指示外交部说：新条约是个划时代的产物，序言要写得鲜明，中心思想是谴责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对中缅边界所制造的纠纷。现在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已将帝国主义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扫而光，对原来某些不合理的界线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双方贯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当时缅方外交部官员指出，条约序言应遵循固有的体例，不宜发挥新论。此说为奈温总理所否定。他认为中方的写法符合历史事实和发展，应当受到尊重。

这一体现二战后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边界条约的序言是这样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缅甸联邦总统一致认为，两国间久悬未决的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两国先后取得独立以后，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睦邻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1954年两国总理共同倡议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更大大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且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

满意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历届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顺利地全面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

双方坚信，两国间全部边界的正式划定，并且成为一条和平友好的边界，不仅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中缅边界条约是中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具有开创性的示范意义，对此后同其他邻国的边界谈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这个条约的签订大大推动了同邻国解决类似问题的进程。周恩来关于处理边界问题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大体上是在这一过程中臻于完备的。

周恩来于条约签订第二天在首都各界人民的庆祝大会上说：“中缅两国是紧密的邻邦，山连山，水连水。两国边民历来是十分友好的，自古以来就结成亲如手足的“胞波”关系。他们有的是同一民族，有的是生活在邻近村寨，亲如一家，亲友往来，不分彼此。两国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为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珍视两国传统友谊和维护两国独立和亚洲的和平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解决边界问题时，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现实情况，确定了互谅互让和友好协商的方针，终于排除了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和经济的种种复杂的因素，克服了暂时的分歧，达成最后协议，签订边界条约。

周恩来接着说：“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几十年来中缅两国人民渴望解决的复杂问题，使长达 2000 多公里的中缅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这不仅使中缅边境的居民能够得到安宁和幸福，而且有利于中缅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和友好合作。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的良好范例。”

中尼边界条约：照顾双方民族感情

中国同尼泊尔的边界全长约 1400 公里，为未定界，大多覆盖在崇山峻岭的冰雪之中，双方地图的画法基本上符合传统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中尼边界协定签订不久，尼泊尔首相于 1960 年 3 月访问北京时，同周恩来开始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会谈。

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肯定：中尼都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和睦相处逾千年；两国在这样长的边界上从未发生过大的纠纷，保持着友好的传统；这为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接着，周恩来就如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提出三项原则建议：一、以传统习惯线和实际管辖为基础，这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 9 集。

《人民日报》1960 年 10 月 3 日。

肯定现状；二、个别争议，个别调整，按地图办事。凡双方地图上的画法相同的地方可以肯定下来，线北属中国，线南属尼泊尔；画法有出入而无争议的地方，可通过勘察，根据地形和实际管辖情况，将画法一致起来；画法不同又有争议的地方，这次能解决最好，不然可交给双方联合委员会去解决；三、希望这次能就争议的问题达成一致，签订一个边界协定，以后再正式签订一个边界条约，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促进两国友好。双方要互相保证在边界条约签订前维持现状，互不侵犯，即使这次有些争议得不到解决，也要互相作出这样的保证。这些原则进一步充实了前述一系列边界理论。

这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得到尼方赞同。双方通过友好会谈，在不到四天的时间里便大体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于1960年3月21日签订了边界协定。

双方主要分歧是珠穆朗玛峰(尼方称萨加·玛塔即圣母峰，两方则以埃弗勒斯峰 Mt. Everest 闻名)的归属问题。尼方认为珠峰在他们境内，但他们提供的地图则把珠峰画在边界线上。中国的地图也不尽相同，有的画在中国境内，有的则画为边界山峰。周恩来向尼首相说明：“这个山峰是世界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尼泊尔的民族感情；它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周恩来进一步建议说：“中国同意尼泊尔地图把珠峰画在边界线上，使这个山峰成为双方所共有；山峰的北半部属中国，南半部归尼泊尔”。毛泽东会见尼首相时也说，这个山峰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下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一半一半”，改个名字，叫做“中尼友谊峰”。

1960年4月末，周恩来和陈毅访问尼泊尔时，不但同尼泊尔签订了中尼和平友好条约，还在会谈中就两国边界某些具体问题，主要是珠峰的归属问题取得了共识。1961年9月29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应邀抵达北京。10月5日，两国元首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并立即生效。条约规定，两国边界线通过珠穆朗玛(萨加·玛塔)峰峰顶，峰南划入尼泊尔境内，峰北划入中国境内。凡申请从北坡攀登珠峰的登山队，经中国政府批准后，须通知尼泊尔政府；凡从南坡登山者，亦须履行相应的手续。这样，珠穆朗玛峰遂成为中尼两国友谊的纽带。

在北京的庆祝大会上，在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中，马亨德拉国王说：“条约的签订是两国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的另一里程碑”；“在双方整个谈判过程中，指导我们的原则是和平和友谊、尊重彼此的权利、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我们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的这种心情得到了贵国领导人的充分响应。我们必须像两个理想的友好邻邦那样生活下去。”

中蒙边界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

《当代中国外交》第148—149页。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6日。

中国同蒙古的边界全长 4000 多公里，为未定界。1945 年 8 月，苏联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换文中，对中蒙边界只作了“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的规定，既没有边界走向和具体位置的叙述，也没有附载任何划界地图。因此需要两国谈判以勘定一条能力双方共同承认的边界。

1962 年 6 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外交部照会蒙方，强调双方在解决边界问题时，应从友好团结的愿望出发，充分照顾现实情况，既不宜追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旧界，更不应将一方认定的边界线强加于对方，作为对蒙方 1957 年来照声称中蒙边界已于 1945 年划定的答复。照会接着建议划定两国边界的原则是：一、基本维持原状，稍作调整；二、对当前双方的实际管辖线的大部分地段，双方认识上一致的，可以先肯定下来；三、对争议地区，可以根据双方当前实际管辖情况，并照顾到双方边民利益和感情，通过友好协商，进行适当调整，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照会并附有同两国实际管辖情况基本相符的边界建议线地图。

蒙方于 1962 年 8 月复照，同意双方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中蒙边界谈判于 10 月在乌兰巴托举行，11 月达成协议。12 月 25 日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专程来华，第二天便同周恩来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中蒙边界条约。周恩来在签约前后同他进行了两次会谈。12 月 27 日，周恩来出席首都各界为欢迎泽登巴尔、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而举行的万人大会。晚上周恩来在蒙古驻华大使为泽登巴尔访华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强调：两国顺利解决边界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良好范例。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主张通过友好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不仅对兄弟国家是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对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抱着同样的信念，并且采取了一切可以设想的步骤。

这里所说的“兄弟国家”，当时主要是指苏联。泽登巴尔在讲话中说：中蒙两国人民站在进步力量的统一行列里，曾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建立起来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关系，正在为两国人民的利益发展、巩固。边界条约的签订是对两国友好事业的新贡献，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合作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新贡献。——

刘少奇在条约签订后同泽登巴尔的会谈中也说，中蒙两国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顺利地解决边界问题，这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国也希望本着同样的原则，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边界问题。——

《当代中国外交》第 150—151 页。

《人民日报》1962 年 12 月 28 日。

中巴边界协定：临时性与永久性兼容

中蒙边界条约签订第二天，中巴发表了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联合公报。

中国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地区的边界全长约 600 公里(实为 599 公里)，是未定界。双方于 1962 年 10 月开始谈判；12 月达成原则协议；1963 年 3 月 2 日，我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后撤完毕之日，正式签订边界协定。这个协定有不同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边界协定的两个特点：(1)名称定为《中巴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协定》；(2)规定这个协定为临时性。在双方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之前，巴方同意中方提出的主张：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得到解决前，中巴先对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的位置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协议，并在协议中规定巴印解决了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再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临时性的边界协定。中国的立场是：自己不介入巴印之间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同时也不去妨碍、实际上是有助于巴印双方对这个争端的解决；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态度是中国自始至终所坚持的政策。

所以协定签订之日，陈毅在布托外长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巴签订边界协定，对于克什米尔归属未定的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我们这样做，既有利于确保中巴边境的安谧，加强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也有利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我们愿意同巴基斯坦友好，也愿意看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友好。我们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也是始终一贯的。”

中巴边界全线基本按传统习惯线沿穆斯塔格—喀喇昆仑山脉的岭脊定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以 K2 闻名于世)则援引中尼解决珠峰先例，划为边界山峰。

尽管印度对中巴边界谈判大肆反对，但它无权阻挠两个主权国家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何况中国已作了充分照顾。1988 年 12 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时，对中巴边界协定规定中方将在印巴解决争端之后与有关主权当局重新确定这段边界的立场表示赞赏。

中巴边界协定虽说带有临时性质，这个“临时”已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岁月，而且还要继续到巴印关于克什米尔地位的争端得到解决时为止，则又带有长期性。边界协定这种临时性与长期性兼容的状况，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周恩来外交学的又一贡献。

中阿边界条约：迅速达成协议的范例

详情见本书附录《中巴关系》。

中巴签订边界协定前夕，北京和喀布尔同时发表了中国和阿富汗两国政府同意举行谈判并签订边界条约的新闻公报。中阿边界全长不过 100 公里，是问题比较简单的未定界。但因其位处帕米尔高原南部，同历史上的帕米尔问题有关，而且涉及中苏边界，又具有复杂的一面。

两国边界谈判于 1963 年 6 月 17 日开始，8 月 1 日达成协议，11 月 22 日在北京由阿富汗王国内务大臣卡尤姆博士和陈毅代表各自的政府签订边界条约，并立即生效。这是中国同邻国就边界问题从谈判到缔约为时最短、最顺利的一次。

中阿边界谈判进展如此顺利，是由于两国都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阿富汗又是小国，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因此中国决定按照双方实际管辖情况划界，对阿富汗加以必要的照顾，但声明这样做绝不涉及第三国和殖民主义条约。

1963 年 11 月 20 日陈毅在欢迎阿富汗谈判代表团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说：“在我国西南边疆，中国和缅甸之间，中国和尼泊尔之间，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已经存在明确划定的和平友好边界。在中阿签订边界条约之后，中国和阿富汗之间又将出现一条明确划定的和平友好边界。中国同西南邻国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于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加强亚非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陈老总这几句话，是对 1956 年至 1963 年间中国已签订边界条约和协定的全盘工作总结。

卡尤姆在讲话中赞扬两国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没有别有用心的打算，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没有耍外交手腕，也没有发生争执，是在一种非常友好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进行的，充满着亲切、公平和互相尊重的感情，并为这一地区现存的和平与安宁永远得到保障而欢呼。

1962 年 10 月，中国同朝鲜在平壤签订了边界条约。

1991 年 5 月中苏签订了东段边界协定。1994 年 9 月俄罗斯联邦继承解体前的苏联又同中国签署了西段边界协定。这样，绵延 4300 公里、迁延 30 年的中俄边界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只剩下西段阿尔贡河的韭菜通岛、东段黑龙江的银龙岛和黑瞎子岛尚待最后商定。

苏联解体后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将同中国签订类似的边界协定。

至此，除了印度，中国已同所有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圆满解决两个世界最高峰的归属问题，妥善处理中缅印、中巴印和中阿苏三个三国边界交界的问题，是周恩来外交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又一

《人民日报》1963 年 3 月 2 日。

《人民日报》1963 年 11 月 21 日。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338 页。

范例。

周恩来对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思想和实践，他所制订的进行边界谈判的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创见，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为国际关系史树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模式，具有世界意义。毋庸置疑，因为不同意这套理论以致未能同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国家，最终仍将回到这些理论的轨道上来；付出的代价已经证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非洲一系列背着历史包袱、被帝国主义任意划定边界而纷争不已的国家，如能参照这套理论进行谈判，应该是有益于合理解决的。

第十一章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国际经济新秩序基本准则

经济与外交：自力更生与互相依存

外交起源于原始社会物物交换的经济往来；经济需求是外交关系的最初动机。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护本国的权益，这个权益，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方面，而政治权益中，也包含着经济权益。在商品经济开始超越国界的年代，在商人开始走出国门的岁月，照顾本国商人在海外的权益，成为领事人员的职责。领事人员比外交官先登上国际舞台，领事人员是外交官员的前身。然而他们只具有半官方性质，没有权力处理商业关系所引发的政治问题，于是产生了代表政府的外交官员。外交官于是后来居上，领事馆于是从属于大使馆。然而经济与外交仍然密不可分。

周恩来称中国的外交为“鸟之双翼”：鸟的身体为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框架”，一翼代表文化关系，一翼代表经济关系；而强调经济上的自立，文化上的自强。的确，在周恩来的建交程序中，在建交条件尚不具备时，往往先互设商务代表处，或者互派记者。前者的典型事例是中日的民间贸易导致两国恢复邦交，后者如70年代初期中国同西德等国的关系。商务代表和新闻记者一度成为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先行官。

经济关系在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性早就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在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前夕，周恩来于1949年8月10日起草中共中央致刘少奇、王稼祥（两人当时正在莫斯科）的电文中便指出：“东欧各国，均与我们有通商要求”，望转告“我们欢迎他们派代表来北平商谈通商及其他一切有关事宜。”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布成立，建交问题尚未提上日程。

在随后由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的外交政策中，便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平等互利”不但成为后来共和国的宪法关于对外关系所遵循的原则，而且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周恩来在同外宾谈话时说过，“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不同别国互通有无”；“世界上的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往来，技术的合作。……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又说：“东方只有在与西方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强大。……我们不排斥西方，只有互相帮助，各国的经济才能发

罗纳德·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136页。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37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25、128、163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44页。

展很快。”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期便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这种情况预示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物质基础正在形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也在孕育中。

周恩来从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看出世界经济一方面是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加强，而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和互相渗透的程度在深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以强凌弱的不公平状态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立国之初就对外宾表明，中国的门户是开放的，不仅没有铁幕，也没有竹幕，只有加强往来，才能共同发展；同时强调平等互利，自力更生。他自始就认为“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强调“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他说：“我们所说的自力更生，绝不是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他为“自力更生”下的定义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他指出：“自力更生也要积极进行国际合作”。迷信苏联和西方，都不对。正确的态度是尊重科学，破除迷信。他说：“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新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对于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他高度概括为“一学，二用，三改，四创造”。可见“自力更生”不但不排斥开放政策，而且推动了开放政策；开放政策不但不否定自力更生，而且强化了自力更生，这是辩证的。

对外援助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同情和互相支持，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两个方面。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它本身就是对其他国家同一斗争的支持，反之亦然。所以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对外表现为国际主义，两者相辅相成。回顾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莫不皆然。

新中国砍断了殖民主义体系在东方的锁链，其影响遍及此一体系在亚非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4—255 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90、377 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40 页。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321 页。

拉的各个环节。1955年的亚非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两大洲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到了60年代初，独立斗争已在非洲形成高潮，有34个国家纷纷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周恩来在世最后几年看到非洲大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获得独立，只有几个岛屿仍分别在法国和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然而，政治独立并不等于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便缺乏物质基础。在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固然需要互相支持；在巩固经济独立的斗争中，同样需要加强合作。这是周恩来经常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宾强调的观点。

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时，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当然，我们要求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周恩来在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之后又指出：“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我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1964年1月周恩来在访问几内亚的一次讲话中说：“亚非各国人民深深地懂得，独立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斗争；独立以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也首先需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这是一条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完全独立的道路。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力更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尤其是亚非国家在各自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互通有无、互补短长、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周恩来的现身说法，是对近代以来东西方国际关系史的总结，对帝国主义长期掠夺弱小国家的挞伐，对新兴独立国家的期望。

亚非会议宣布的十项原则，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和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以及前后相继成立的各种区域性政治、经济组织，集中反映了亚非各国人民维护独立、谋求发展和加强合作的共同愿望和对建立新型

国际经济关系的憧憬。

中国同亚非拉国家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和斗争经历。新中国一向把支持、援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0年代和6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孤立”和“遏制”政策。稍后，霸权主义为控制中国而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与此同时，他们加紧以“经济援助”、“技术合作”为名，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渗透和争夺。因此，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扩大反帝、反殖、反霸阵线，挫败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宰世界的图谋，这是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外，许多亚非拉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以及独立后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已得到中国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持和援助。在新形势下，他们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这就为中国在各个领域内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说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是新中国义不容辞的义务，是二次大战后形势发展的必然。

八项原则的提出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发言中，不但强调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进行这种合作的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原则。同时他还第一次提出合作中不附带任何特权的条件。

1956年6月，中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在联合公报中郑重宣布，中方提供的无偿援助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议定书中并规定：“中国给予柬埔寨的一切设备、建筑器材和商品运到柬埔寨后，柬埔寨政府可以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它成为此后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范本。

1963年8月，周恩来向来访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进一步阐明中国向亚非国家提供经援的四项基本政策：

一、我们的援助不要求任何特权或政治条件，否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沙文主义。你们必须拿这一条作为衡量我们的标准。如果不符，那么我们就犯了错误。

二、我们援助的目的，只能有利于你们逐步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而不是阻碍你们发展这种经济，也不是造成你们对外国、包括对我们的依赖。

三、无论我们派专家去，还是接受你们的留学生，其目的是逐步培养你

《研究周恩来》第140—141页。

《研究周恩来》第14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4集。

们自己独立的建设人才。我们的援助只是过渡性质的，一旦你们自己能够搞了，我们就撤退，决不造成对我们更加依赖的情况。你们派留学生或实习工人，或我们派人员去索马里，都要照顾双方当地的生活水平。我们派去的人员，不论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只能享受与你们同级人员一样的待遇。

四、我们的援助要根据我们的力量，有多大的力量就做多大的事。不能答应了做不到，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提供的设备中有质量不好的，我们一定运回来退换。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先后访问了亚非13国。就在这次访问期间，周恩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上述四项援外政策，亲自拟定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在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时加以宣布，随后在访问马里时又将其正式写进中马联合公报。这八项原则是：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周恩来的对外援助八原则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和谐统一的典范，凝结了周恩来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呼吸、同命运、想其所想、急其所急的同情与爱心。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巧取豪夺，自不待言，就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充满了尔虞我诈，即使是当年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以老来自居的苏联，它所采取的掠夺方法，并不比美国逊色。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主要利用“经援”对受援国进

《研究周恩来》第138—139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88—389页。

行贱买贵卖，从中榨取巨额利润。它的外援，无不附带政治条件，它派出的工程技术人员则要求支付他们在苏联国内的工资。

周恩来不仅倡导八项原则，而且坚决执行，教育和指导外事工作者认真贯彻，完全落实。他要求每一项援助都应当适合受援国需要，都要为受援国着想；在选定建设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原料来源、生产成本、产品销路、能否盈利；要帮助受援国培训技术力量，要促使它们独立发展和自力更生。他强调对每一个援助项目都要以国际主义精神负责到底；在发展经贸关系时，要做到“平等互利，不能只利自己，不利别人”。他教育外事人员要有“志在千里”（曹操诗句，《古诗源》），“四海为家”（《礼记·礼运》）和“青山处处埋忠骨”的精神，全心全意为受援国服务。他还用“天涯何处无芳草”（苏轼词，《宋词选》）的诗句教育外事干部和援外人员，要虚心向所在国人民学习生产技术、文化艺术和一切有益的东西，并充分尊重所在国的民族感情，坚决反对和防止大国沙文主义。我国对外提供的每一项援助，从贷款确定到项目实施，无不凝聚着他老人家的心血。

八项原则的实施

在周恩来亲自关怀和八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得到了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54年至1985年，中国向亚非拉80个国家提供成套援助项目1317个，其中已建成1057个。1964—1977年的经援金额比1950—1963年增长了4.8倍。在此期间，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尤为显著：60年代，我国向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提供经援，派出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最著名的援建工程是坦赞铁路和索马里边境公路；先后同13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从50年代中期起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我国向非洲提供经援金额4.28亿美元；1965—1969年间虽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我国提供经援金额仍达2.3亿美元。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国调整了对外政策，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1970—1976年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70年代以来，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周恩来很关心亚非国家的水利建设。他出国访问，从不放过参观考察有关国家的大型水利设施。我国援助许多国家如蒙古、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喀麦隆（仅次于坦赞铁路的大型水电站）和坦桑尼亚（农场水利投产后，大米的产量占全国1/4）等国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和指导下进行的。此外中国还帮助突尼斯、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多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第23页。

参阅《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声》，《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第280页。

哥、加纳、尼日尔、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布隆迪等国修建了一批中小型水利工程，也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1986年，中国对101个援外项目进行巩固工作。在中方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一些长期亏损、陷于困境的项目出现转机，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经营情况大有改善。这一年在执行已签订的对外援助协定的同时，又对40多个国家提供了新的援助，在98个建设项目中，当年新开工的有27个，竣工移交的有28个。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政府间技术合作会议上，中国还承担了技术合作项目111个，为开展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一年接受中国经济技术援助的国家已达90个。1987年，尽管国内经济建设急需资金，中国仍计划对63个受援国提供222个建设项目，其中新建项目13个，续建项目59个，技术和管理项目100个，其他项目50个，计划当年竣工的项目40个。中国在对外援助支出中，用于援助成套项目占69%，用于提供一般物资和现汇援助的占31%。截至1988年，中国共计向4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经济与技术援助，建成了88个成套项目。从60年代开始，向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有了进一步增长，仅1961—1965年间，中国向古巴提供了2.4亿卢布无息贷款，用以购买成套设备，帮助古巴发展经济。70年代，我国又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与发达国家的经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正如周恩来再三指示的，中国对外经援项目，主要是一些投资少，收效快，与受援国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中小型项目。这些项目多数适合受援国需要，产生了明显效益和积极影响。

此外，自1963年起，中国还向第三世界51个国家派遣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3000多名，分布在亚非拉、南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的100多个医疗点。他们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

由于严格遵循八项原则，中国提供的经援使受援国真正得到好处，对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提高自力更生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赢得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和好评，被誉为“独一无二的”、“真正体现了国际主义”的援助。这就大大促进了中国同亚非拉各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学习、充实、发展、推广

周恩来在一次回顾八项原则执行情况时指出：“我们根据这八项原则行事，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在实际运用中加以充实和发展。”

建国初期，周恩来已预见到科学技术的革命将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他以时代的紧迫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世界科学在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特别是原子能的利用和计算机的发展等，“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前夕”。他站在迎接这个革命挑战的角度，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的措施之一，就是向国外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学习。他常说：“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有自信心的，也是有自尊心的，因而能够自强的民族”。然而学习不是盲目照搬，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1954年9月，周恩来第一次提出的“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时代的紧迫感之中形成的，这标志着他四个现代化理论已成竹在胸。经过大约10年的不懈探索和反复实践，他又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周恩来历来十分重视对外交往中的经济工作，再三强调外交人员必须“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又要有一定的科技知识，这也是两结合”；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必须懂得经济，必须善于进行经济外交。特别是在外交日趋经济化的条件下，在外交机制中提高经济职能，已是刻不容缓。

1972年11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听取水利问题汇报时，非常明确而肯定地说：“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上天”是指国家整个科学技术、工业、国防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安危；“水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保证农业旱涝保收，直接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提高物质生活的重大问题。无论天上地下，无不与经济发展相联系。

1971年3月，有一个日本农民代表团应邀来访。接待单位考虑到总理十分繁忙，没有安排他接见。周恩来知道了，临时主动安排于午夜零时50分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0—181、439页。

《不尽的思念》第270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59页。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361页。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第3页。

见。这个代表团有 14 名成员，都是经营水稻、蔬菜、果树、畜产、制酪、淡水养鱼等农业水产品的农民。周恩来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同他们“促膝交谈”，向他们详细了解日本这方面的生产情况、技术和经验，并于第二年派了一个大型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进一步学习、考察日本农林生产。这给日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批评有关单位说：“你们放着客人不管……送上门来的老师不请教，知识怎么得来？”

类似事例，不胜罗列。周恩来就是用这种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虚心学习，为我所用。

八项原则的国际意义和影响

60 年代初，随着大批亚非拉国家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反帝反殖斗争开始向经济领域发展，要求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当时这场斗争还处于启动阶段，具体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理论和主张。因此，周恩来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的提出和实施，不仅促进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加强了彼此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团结与合作，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反对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联合斗争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为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八项原则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殖反霸性质，明确提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反对一切不平等的做法，反对附带任何条件和任何特权的援助，反对以富压贫，反对利用援助干涉别国内政和攫取别国资源的霸道行径。超级大国和原殖民地宗主国在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常常要求各种特权，在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时往往附带苛刻条件，以达到他们继续控制、掠夺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目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的这种现象构成了亚非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严重障碍。八项原则所体现的反控制、反干涉和反掠夺的思想，是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损人利己行为的有力批判，向国际经济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为亚非拉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提供了理论，指明了方向。

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基本准则。八项原则是周恩来关于中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系统主张。它高度概括了世界各国在经济交往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即平等互利原则，尊重主权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互助为辅发展民族经济的原则。其目的就是要把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以求得人类的共同发展。周恩来对此曾作过多次深刻的论述。他说：我们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91—93 页。

《研究周恩来》第 298 页。

我们要把殖民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把别国搞穷的原则埋葬掉。这种政策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内，大家平等相处。如果各国都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经济发展的前途是无限的。这些原则符合世界各国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而受到亚非拉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赞赏。正是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三、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范例。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真诚无私的愿望。中国帮助缅甸等国家建立纺织厂，从设备、安装、施工到运转，都考虑到利用其本国的原料，以利其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一些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周恩来却主张派出专家去帮助他们试办茶场，以减少从中国进口。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援外的最大项目。这是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求助于西方大国和苏联遭到拒绝后由中国承担的。当时中国自己的财力物力也很有限。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施工，59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供应不上了。尽管国内也很需要，中国仍将急需的铁轨赶运到坦赞工地，保证了工程的按时完成。类似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这种真诚无私的合作，为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先例，被誉为“南南合作的楷模”。大力发展平等互利的南南合作，用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关系中的地位，进而推动南北关系的合理调整，这对冲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互相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以八项原则为基础进行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和科技交流，将使南北双方同受其惠，达到共同发展，共存共荣。损人利己，到头来也损害了自己。这同环球自然环境的性质一样，需要大家协力维护，任何破坏，都将蒙受其祸。

周恩来倡导的这八项原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国际经济关系中，为当代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八项原则是周恩来在世界经济关系中树立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他对新中国外交学和马克思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的杰出贡献。

第十二章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礼宾工作

礼仪与外交

礼仪伴随外交以俱生，惟早于外交。礼仪起源于祭祀，行于宫廷之中，及于贵族之间，是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反映了礼的等级性。礼又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因此又有民族性。礼是为一定的政策服务的，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礼的等级性在国际交往中已被国家主权平等的观念所取代，但是礼的民族性和政治性则与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共始终。礼宾工作随历史的演变而发展，它从出现开始，便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类社会永远需要一定的礼仪规范。

从历史上说，宫廷外交的礼仪最为繁琐。一部专门记载我国周代的有关专著《礼仪》，包括汉唐名家的注疏，洋洋数十万言，公认是《十三经》中最难读的一部著作。做起来而不逾矩，亦非易事。“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孔子家语·弟子行》），其繁杂可知。《周礼·大宗伯》概括为五礼三十六类，即吉礼（用于祭祀）十二类，凶礼（哀吊凶丧）五类，宾礼（朝、聘、会、同等国际交往）八类，军礼（征战与防卫）五类和嘉礼（吉庆活动、增进情谊）六类。这些礼仪，几乎无一不与国际活动相联系。

谈到军礼，空前绝后之举是我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前 325—前 299）为其父举行葬礼时，秦楚燕齐魏五国出锐师各万人参加会葬（《史记·赵世家》），连同其他各国前往会葬的军队当不下十万之众。这是对即将改风易俗进行“胡服骑射”革新戎边卫国的英主表示敬意呢，还是出于畏惧而示之以威？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仅有的一例。然而这种军礼即使是在两军厮杀的沙场上，将帅相遇，也受到当代人难以理解的尊重。春秋之世的宋楚泓之战（前 638 年），宋襄公（前 650—前 636）以“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为由，拒绝大司马乘楚军尚未渡河、渡河尚未列阵应及时下令攻击的建议，结果宋军大败，他自己也负伤（《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这种“于古为义，于今为笑”（《淮南子·汜论训》）的做法，除了囿于道德规范，显然也受“礼”的约束。前 597 年晋楚之战，晋将在战场上向楚将献鹿（《左传·宣公十二年》）。前 589 年晋齐鞍之战，晋将在战场上赶上伪装的齐侯，连忙下车叩头献礼（《左传·成公二年》）。前 575 年晋楚鄢陵之战，晋新军副帅“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向楚王表示恭敬。后来他又追上了郑成公（前 584—前 571），他的御者想活捉郑成，至加以制止，说是“伤国君有刑”（《左传·成公十六年》）。这些都是当时的礼教所要求的。

战场上的这种“君子之风”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屡见不鲜，极受称道，誉为“骑士风度”，被认为是文明高尚的表现。沿及近世，仍时有遗风可寻。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驻土耳其公使赫尔·冯·巴本（1879—1969）到郊外打野

鸭。不远处，在他的视线之外，苏联和英国大使也在进行同样的消遣。无意中，巴本击中在另一方范围内的野鸭。当他随后得知此事时，极为不安，专门委托一位中立的大使正式向那两位敌国使节致歉。这种现在将视为失节的风尚，此后便未再有所闻了。

欧洲中世纪的外交礼仪与我国春秋的外交礼仪，同属于宫廷外交，有许多类似之处。当代外交中的礼宾规格，定型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的外交，它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宫廷外交的余绪，却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受经济生活和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不是更加繁杂而是日趋简便。礼仪中的繁文缛节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礼宾是外交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职能。礼宾官在我国古代称为“鸿胪”，是从西周和春秋的“大行人”（外交大臣）之职和秦汉初年的“典客”官演化而来，至汉武帝时改称“鸿胪”，执掌朝、贺、庆、吊之赞导相礼。“鸿”形声，“胪”传导；传声赞寻，故称鸿胪。一般由卿、大夫担任，其主管部门叫做鸿胪寺，历代相传。清末改设总理衙门，其性质已不同于往昔。

外交活动一般包括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以及常驻使节的活动等等。这一切活动都包含礼宾，其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一个礼字，即使是语言激烈的抗议照会，也要以“致意”开始，以“顺致最崇高的敬意”结尾。世界各国的外交部一般都专设礼宾司，一些王室或元首府还专设典礼局或典礼官，专司礼宾之职。许多国家都很注意外交官的礼宾知识培养。例如日本外务省规定，新入部人员必须先礼宾部门实习一段时间。我国外交部也规定，凡想晋升为随员的人员必须先通过礼宾业务基础知识的考核。

礼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是直接体现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常的礼仪是维系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所必不可少的，而在必要时礼又可以用来有意识地反映一国当时的政策，使之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寒暑表。

外交实践中的礼通过多种形式得到体现，如迎送、会见、宴请，各种招待会和晚会，为不同对象举行的仪式、庆贺、慰问、吊唁以至日常交往、见面和谈话时的称呼、礼节和服饰等等。50年代作者曾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被人们戏称为“吃喝迎送跳”的干部，其实他们不但责任重大，而且备极辛劳。

“不知其君，视其所使”

《外交原则与实践》第19页。

黄金祺：《什么是外交？》第70页。

黄金祺：《什么是外交？》第70页。

“不知其君，视其所使”（《说苑·杂言》），这话据说是孔子讲的。意思是，要了解一个国君，端详一下他派来的使节就行了。端详什么呢？无非是来使的相貌、表情、神态、仪表、服饰、举止、谈吐，从而了解其来意、思想、感情、品德、爱好等等，借以窥测其君的心态。反过来说，这名使节也可能从他受到接待的人员身上得到类似的印象。毛泽东对他的学生也有过“了解对象，尊重对象”的教导，成为这名学生1949年以后终身从事外交工作的座右铭。一名使节首先接触的是东道国的礼宾官员。礼宾司也就成为国家对外的窗口。他们在最初的交往中，互相给予对方的印象，如此重要，可想而知。

孔子未尝以外交家名世。不过，他当过鲁国的司寇（司法大臣）；还当过一次“相礼”（名义上是礼宾官，实际上起着外交大臣的作用），陪同鲁侯与齐侯会谈（前500年），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一部《论语》，有不少篇幅描绘孔子朝觐国君的举止神态和待人接物的风范。他坐有坐相，立有立姿，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起居饮食，要求部很严格，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告诫儿子说：“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则无根，无根则失理；失理则不忠，不忠则失礼、失礼则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说苑·建本》）。《管子》说：“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情，则臣下轻之。衣冠不正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形势解》）衣冠不整，服饰不庄，仪态怠慢，乃人之大忌。

公元前531年，单成公代表周景王（前544—前520）到卫国去传达王命，同晋卿韩起会谈，晋国主管外事的上大夫叔向在座。叔向对单成公的表现十分失望。事后他对韩起说，作为周王的卿士，奉命出使，会谈时眼不看对方，讲起话来精神不振，语言不清楚，完全不合朝、会的礼仪。在朝见、会谈的场合，讲话一定要使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条理讲得明；目光不能低于衣服交叉和联结之处，以端正仪容姿势。语言表达思想，精神面貌反映一个人的态度，表现失态就完不成任务。单成公是周王的百官之长，在盟会中为天子发布命令，可是他在会谈时目光不高于衣带，声音在一步之外就听不清，仪态不够端庄，言谈缺乏条理。不端庄便不恭敬，讲话不清楚，别人就无所适从，看来他已经没有养生之气了（《左传·昭公十一年》）。

至于外交人员必须具有的知识和才华，本书第五章已简略介绍了，不再赘述。

周恩来对礼宾工作的要求

新中国一诞生，周恩来便在外交部的成立大会上指出，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外交方式不可学，资本主义的外交方式只能参考，即使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方式也不能完全套用。他说的外交方式，当然包括礼宾工作。

他认为，历史上的礼宾制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封建帝国的，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时代；另一类是资本主义的，如近代英、法等国。他说，过去有很多礼宾规格是资本主义国家定下来的，我们学了一些这类的东西，同时还学了一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这套礼宾，也不能完全废除，但可以打破一些。礼宾要革命，要改革，要更多地发挥创造性。礼宾改革首先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礼仪传统，摒弃陈规陋习，取消繁文缛节，同时适当汲取国际上的一些好的做法与习惯，创建独具特色的礼仪风格。建国伊始，送往迎来，接待宴请，已日趋繁重，而礼宾规格还不很健全，工作中经常出现失误。有一次在国宴上使用了外国香槟，受到周恩来批评。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于1951年7月初上报一份接待工作改进办法的报告，周恩来当天作了四点批示，强调水果、香烟、饮料和酒类，一律要用国产；“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此他亲自作出许多重要决定，如简化递交国书仪式，使节递交国书前可参加正式典礼活动，领导人生日不搞祝寿活动，领导人逝世婉谢各国派代表参加吊唁，国家主席就职不举行仪式，取消国宴上外交使团团团长祝酒和使节敬酒（这使人想起50年代使节列队依次向总理敬酒的情景），规定宴会标准，降低赠礼标准，改革国庆贺电处理办法，等等。这就把我国的礼宾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使其益臻完善，更具特色。

周恩来关于礼宾工作的指导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1)必须为贯彻外交政策服务；(2)改革创新，开拓前进；(3)对大小国家一视同仁；(4)重视交际礼节，尊重外国习惯；(5)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为了有效地为外交政策服务，周恩来强调，礼宾工作应坚持尚礼好客，礼尚往来，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和严谨细致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外交交往中有许多需要注意的礼节，如怎样打招呼，怎样称呼对方，怎样引见，怎样自我介绍，怎样告别，怎样交际应酬，怎样约会和赴约，怎样进餐，怎样穿着，怎样注意仪表等等，都应熟练掌握，切不可以为是繁文缛节就掉以轻心，从而造成失礼或贻笑大方。西方人常有送名片并注明其情意的做法，如注明p.f表示庆贺，p.r表示答谢，p.c表示吊唁，p.p.c表示告别，等等，也得留意。当然，由于谨小慎微而过于拘谨，也不是外交家应有的风度。所以恰

《研究周恩来》第290—291、288—294页。

《我们的周总理》第508页。

《研究周恩来》第288—290页。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参阅李天民著：《现代国际礼仪知识》。

当掌握一个礼字不仅是技巧，也是一种艺术。外交家虽是国家的代表，但又是有个性的人。在符合外交礼仪的前提下，在外交交往中表现出一定的个性，或豪爽健谈，或含蓄寡言，或幽默飘逸，或沉着稳重，如此等等，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古今中外杰出的外交家都是知礼的，又都是有个性的。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外交史上，有三个人形象特别富有个性。一个是周恩来，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个是陈毅，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个是乔冠华，才子风度的外交家。他们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周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路敏捷、文才横溢。

有一次，乔冠华路过巴黎，顺访法国。法国外长在爱丽舍宫为他举行极为优雅的宴会。席间有一道菜是鸡腿。大家都温文尔雅，不声不响地用锃亮的银刀叉一点一点地切着那块腿肉，小口地往嘴里送。乔冠华从来不喜欢故作姿态，刻意装扮风雅。这一次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对法国外长说：“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块肉实在不如我们东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烧方便。如果阁下允许，我想像你们平时在家一样用手抓这个鸡腿，不知阁下以为如何？”法国外长也颇具外交幽默，他说：“阁下的建议实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议我们大家都下手吧！”一时，那拘谨的晚宴气氛变得十分活跃，中法双方都啃起了自己盘中的鸡腿。

大家知道，周恩来和陈老总的机敏和才华自不待言，有时也很幽默，但是他们决不会像他们得意的助手乔冠华在正式宴会上那么恣意纵情。

周恩来对礼仪的细微末节从不放过。建国初年，新华社常因报道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名单次序不当多次受到周恩来批评。他说这是一门学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他为此找有关单位的同志专门研究和讨论过，因而被称为“名单学”。外交部建部初期，他就曾经指定专人为行将出国的同志讲解外交礼节，包括吃西餐应注意事项。对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他也多次讲过，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有一次他在宴请外宾时，服务员递毛巾先递给他，任他使眼色也不起作用。周恩来终于忍不住了，怒斥一声“岂有此理！”原来服务员把对外和对内混淆了，以为总理官大，所以优先。

周恩来宴请外宾，总是主动亲自为他身边的客人夹菜。这也是中国人殷勤好客的传统习惯，表示对客人的欢迎与尊重。日本人对此最能理解。曾任外务大臣的小坂善太郎 1966 年访问北京，周恩来宴请时他坐在主人身边。他

《什么是外交？》第 81 页。

《我与乔冠华》第 271—272 页。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 76 页。

《我们的周总理》第 415 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 145 页。

说：“周总理始终笑容可掬，亲自将餐盘中的菜夹到我的菜碟里，使我诚惶诚恐。我曾多次参加总统或首相的招待会，但受到如此热情的款待却是空前的。”¹西方人设家宴时，也有主妇亲自为客人端菜的做法，也是一种殷勤好客、热情亲切的表示。

周恩来宴请外宾时还有一种独特的做法：亲自向同席每一位外宾碰杯敬酒，而且向不同席的外宾包括随从或服务人员敬酒，无一遗漏，以示对他们平等相待。1956年岁末，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原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率团访华，周恩来设宴款待。“他端着盛满茅台酒的小酒杯，到每张桌前祝酒，每每一饮而尽。那是我喝六七杯就醉的60度烈酒，可周总理在上千人、一百桌的招待会上，干杯到最后仍面不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酒量过人，人所共知，但他喝酒的政治影响之大，无过于1946年毛泽东赴重庆期间他在蒋介石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替代酒量有限的毛泽东接受敬酒的景象。与国民党官员喝酒简直是一场战斗。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能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的话。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海潮般逐浪涌来，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酒宴上。可是最后没有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周恩来对宴请外宾是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来对待的，不是一般的酬酢。对名单(包括陪客)的遴选，菜谱的审定，座次的安排，席间音乐的考虑等等细节，对专场文娱演出的剧目都有针对性，参观项目及注意事项，他都要亲自过问，务求万无一失。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宴会席间听到了乐队演奏他所喜爱的乐曲，感到周恩来的精心安排，有一种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真切之情。这是事务性与政治性密切结合的典范。

周恩来认为，在对外工作中，交际礼节不仅起着润滑和媒介作用，而且起着粘合和催化作用，它对于表达感情，加强友谊，增进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重视交际礼节是礼宾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按照周恩来的主张，交际礼节的基本要求是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就是要态度热情，言谈文雅，举止得体，仪表端庄；不卑不亢，就是

¹《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32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65—66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223页。

《研究周恩来》第292—294页。

既不卑屈，也不高傲，稳重自然，落落大方。他说“不亢”就是尊重人家，不骄傲，以诚实、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人，而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不卑”，就是要有自信心、自尊心和自强的精神。他经常告诫外事人员，要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时刻警惕，谨慎从事，任何行动都不能随便，要有适当的分寸，必须得体。

世界上的外交礼节多种多样，各国各有不同的习惯做法。在对外活动中，必须尊重对方的礼节，尊重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以免伤害对方感情；要体现中华民族的道德风尚和文明素养，以增进彼此间的感情和友好，维护我国的形象和声誉。宴请伊斯兰国家的外宾，不上酒。到对方去访问，即使吃不惯牛羊肉，也必须留在宾馆用膳，不得外出就餐。

对外事活动中出现的礼节不周的现象，他的态度是很严厉的。例如服务员把毛巾先递给他再给客人，剔牙不掩嘴，军人不行举手礼，入室不脱帽，客人未去主方先走，文艺晚会上打瞌睡，谈话时缺乏礼貌，服饰不整洁，等等，他发现了就要提出批评，及时纠正。

建国初期，迫在眉睫的礼宾工作是安排到任的使节递交国书。由于没有经验，只好沿用当时国际上流行的程序。既有仪仗队，又有军乐队。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时，总是被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的场地上陪同使节检阅仪仗队，立正听奏两国国歌，然后登堂入室，接受国书并听取颂词，再亲致答词。一切如仪礼毕，又陪同使节至客厅品茗叙谈。周恩来身兼外交部长，一般都参与此一仪式的全过程。出于尽可能减少毛泽东负担的考虑，他对这种因袭的做法提出改革建议。他主张取消室外的仪式（不设仪仗队和军乐队，不奏两国国歌），简化室内程序（除递交国书外，只交换书面的颂词和答词，以后连颂词和答词这种形式也取消了）。毛泽东对此如释重负，欣然同意。

对递交国书这种形式，有的国家为慎重起见，甚至事前为使节进行排练。作者1950年随同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递交国书前，即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周恩来灵活处理了一起意外疏忽。1956年有一位东欧兄弟国家新任大使递交国书，因毛泽东临时有要事，由朱德副主席出面接受国书。照例由周恩来陪同。此兄到怀仁堂后，才发觉匆忙中竟将国书遗留家中，急得满头大汗。周恩来得悉后，立即与朱德商量，并面告礼宾司同志说：“兄弟国家不必计较形式，可请大使同志事后将国书补送过来就是了。”大使听说可以通融，喜出望外。没有实质的仪式得以进行，大使得以不受影响地履行公务，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虽然，我国驻外新任大使也有过类似失误。如果刻板地遵守递交国书的要求，东道国完全可以改期进行，而为了惩戒失职的大使，

《风范·思想·乡情》第336—337页。

《研究周恩来》第292—293页。

《外交风云外交官海外秘闻》第137页。

递交时间可以长期、甚至无限期地推迟，这位大使势必被召回国并因此断送其外交生涯，而责任完全在对方。周恩来对兄弟国家当然不会如此对待，即使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将权宜处理。这位大使不仅对周恩来的“宽宏大量”感恩戴德，终其一生，一直对中国怀有深厚的友情。

针对这次事件，周恩来对礼宾司的同志说，要在你们的门口写上“礼宾革命”四个大字。并指示说，外国大使递交国书前，照样可以安排国家领导人接见和其他活动。资产阶级的老一套，我们不必遵守；但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必要时我们还要利用他们自己创造的形式来约束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要是指外交豁免名目而言。

还有一次西哈努克亲王结束访问回国，周恩来亲自送至机场。按惯例到机场送行的，还有我国军政各部门高级官员和外国使团的成员。亲王同周恩来和前来送行的中外官员一一握手告别后便登上飞机。飞机尚未滑行，我方送行的人群却已纷纷离散，其中包括几名高级将领，只有叶剑英元帅和外交部官员仍站在那里，使团的人一个也没有动。周恩来发现后，立刻叫卫士长去将他们吆呼回来，重新列队。他等飞机起飞了，才转过身来面带温色地当着使团的面批评这些人不懂礼貌，没有规矩，对一国总理(特别强调不是为了他个人)反而不如外宾尊重。他还讲了一套为外宾送行的外交礼仪，并说：“他们为什么不像你们提前散去？还不是因为我还在场吗？你们这些军人，首长还没走就先走了，有这样的规矩吗？人必自重，然后受人尊重！”周恩来还当面表扬了经常同他参与重大外事活动的叶帅，要大家向叶帅学习。周恩来大约讲了一刻钟话，才过去同使团的人握手寒暄，等他们离去了，又回头来对这些违矩者说明为什么要当着外宾的面说他们一番，说非如此不足以挽回不良的影响。

50年代，国务院还设有典礼局，余心清任局长。1956年2月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访问中国，要向毛主席授勋。这是外国皇家第一次向我国家元首授勋。余心清安排在怀仁堂进行。他按照旧中国的传统，让文武官员特立两厢，由他引导亲王在两厢之间缓步向毛主席行进，行三鞠躬礼之后授勋。这种古典式礼仪，在新中国只进行过一次。后来全国性的庆典活动统归外交部礼宾司筹划，避免机构重叠，典礼局就撤消了。

还有一个事故触动周恩来对礼宾工作进行改革。“文化大革命”以前，凡有外国政府首脑来访，周恩来必亲临机场迎送，三军仪仗队便在机场接受来宾检阅。机场必有群众欢迎场面，进入首都市区必有群众夹道欢迎。1955年5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来访，机场上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我仪仗队队长跑步至贵宾面前，立正挥刀请他检阅仪仗队，但在高呼“请沙斯沙斯……”时，因心情紧张竟记不起他的全名，急得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站

黄华在外交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此事当时作者亦在场，可作为《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有关记述的订正与补充。

在贵宾身边的周恩来举手示意引导贵宾检阅仪仗队，给仪仗队队长下台阶。事后周恩来并没有责怪那位诚惶诚恐的仪仗队长，却严厉批评礼宾司同志搞“繁琐哲学”整人，指出为什么要教人家背那么长而又难记的外国人名，为什么不改为只说一声“总理阁下，请您检阅！”或者“国王陛下……”这样，不是很好记吗？那位仪仗队长并未因此被撤换，他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失误。

后来又有一次，周恩来去机场为某非洲国家元首送行。外宾登机后，突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专机无法滑向跑道，只好停留在机坪上。周恩来坚持伫立在风雨中频频向客人挥手致意。对方在机舱里一再示意要他回去，但他一直等到起飞才离开。见此情景，数千欢送群众一个也不走，在风雨中仍保持着欢送的热烈气氛，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对来访客人的友好情谊。周恩来这样周到的礼节完全出自他对友谊的珍视，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

周恩来在国际关系领域一贯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这一思想也在礼宾工作中得到反映。他认为，以前封建帝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礼宾，形式上是平等的，但用许多形式来束缚人，其本质是不平等的。新中国的礼宾工作对大小国家应该一视同仁，礼仪安排也应该统一平衡。他反复强调，要从思想上消除大国沙文主义，要经常整顿。亚非拉新兴国家，民族自尊心很强，应该尽量满足这些国家客人的合理要求，对不够重视他们的不良倾向，要作为礼宾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这同世界上某些国家歧视小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新中国礼宾工作的一大特色。1954年许多国家派代表团参加我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在分配接待任务时，剩下欧洲一小国外长率领的代表团无人负责。周恩来便自告奋勇负责接待。他说，我们是大国，但不能歧视小国，应该尊重别国的民族感情。

正是在周恩来的严格要求和具体指导下，礼宾司对接待外宾的工作力求做到“天衣无缝”（《太平御览》685）。据基辛格记述，尼克松“震撼世界一周”的中国之行，他的游览全部是按中方的计划进行的。不管计划要参观多少地方，最初出发的时间和最后返回的时间总是十分准确的。然而不管美国人做出多少节外生枝的事情，却从来不感到中国主人催促他们按照时间表行事。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和探索，也可以不这样做，最后时间表总是一分钟也不差。基辛格曾问一个中国的礼宾官员，他们怎么能够把精确的时间和自由活动结合在一起，完全不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礼宾司那样着急而气势汹汹地显示自己的才干。这位中国的外交官回答说，这很简单，对外宾只要告诉他出发和返回的时间以及要去参观的一些地点。这说明，中国人在时间表问题上不是要客人遵守主人的安排，而是主随客便。这样，中国的礼宾安排给人一种奇异的安逸感；这种作法看起来完全实事求是，更能有效地体现出对客人的尊敬和殷勤。如此严格的纪律和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

不禁产生敬畏，感到自己在它面前无能为力。这正是周恩来对礼宾工作的要求。

以周恩来为楷模

周恩来待人接物的风采，为礼宾工作做出了表率。

人们首先是看到他的容貌、衣着、握手、寒暄。由于所受教养的影响和传统优秀文化的滋润，周恩来从小就养成容貌端庄，服饰整洁，举止有度，诚挚谦逊，礼貌待人，遵守时间，言谈优雅的习惯。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对外的国事活动后，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更严格了。

周恩来的衣着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衣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即使周围没有外人，他总是衣着整洁，连钮扣也不放松。他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面孔。周恩来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令人心灵震颤。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周恩来的面容和蔼可亲，他的眼光既敏锐又慈祥，而且感情是那么自然、细腻。他的面孔，见过一次，永生难忘。那机警而又慈祥的面孔，显得年轻，甚至带有几分稚气。他那特别深陷的眼睛正视着你的眼睛，很难找到比这更不咄咄逼人，或者更和蔼可亲了。他正视来访客人的习惯，给人一种直率的感觉。他与来宾交谈，从不面向电视观众。他正直和从容不迫的风姿，温文尔雅的态度，显得坚强有力，而说话声音柔和，礼貌周到，使人完全看不出他有个叱咤风云的革命背景。廖承志孩提年代自然记不起周恩来，但他18岁时对周的印象特别深刻。“周恩来目光敏锐，任何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似乎把整个屋子以及房间里的人都摄入脑中……”——韩素音于1965年会见周恩来后也说：“他用他那一览无余的目光打量着我。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接受扫描。”

周恩来的握手给人以热情、亲切、诚恳而温暖之感。据外国人的回忆，

《白宫岁月》第1067页。

1913—1917年间，周恩来每次一进天津南开学校的校门，迎面便看见左壁悬挂着一面长方形大镜，上端镌刻着“告诫之言”，供学生对镜端正自己的仪容。下端镌刻的诫语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开国总理周恩来》第29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98、199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17页。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26、135、445、447、452页。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82、371页。

凡是曾经与他会见过的人，哪怕时间很短，几乎都为他的魅力、才能、机智和精力所倾倒。他的握手像他浓眉下的微笑一样地温暖和诚挚。有一位崇拜他的人甚至说：“周只要看你一眼，就把你争取过来，要不然就会使你动弹不得。” 一般人在和多数人握手的时候，常使人有敷衍了事作样子的感觉，但周恩来握手却一直持续到对方表现出要松手的神精为止。每次握手都让人感到，他总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像是要看穿对方的心 。

对外表的调查分析表明：外表是“非语言交流”的因素之一。在“交流行为”中，语言占7%，声音和音调占38%，外表则占55%。外表可以增强或减弱政治家在人民当中的印象。它的含义很广，如服装的风格、颜色和质料，饰物的搭配，服饰庄重还是随意，微笑、皱眉头、抬眉毛，无拘无束地打哈欠，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人们的看法。周恩来不会去追求这种外表。他的外表顺乎自然，不矫揉做作，是他独特的气质和礼貌赢得人们的敬重。

周恩来同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社会贤达交往，见面必称其字而不直呼其名，如称长者章士钊为“行老”（字行严），称沈钧儒为“衡老”（字衡山），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始终执弟子礼。他对同辈张治中称“文白兄”，对黄绍 称“季宽兄”，既尊重，又亲切。即使对外宾的称呼，何为姓何为名，“陛下”、“殿下”与“阁下”之分，从未失误。他访问过那么多国家，宗教信仰、风俗民情、饮食习惯各异，从未失态。

歌舞是人类最原始的娱乐活动。音乐与舞蹈在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已臻极致，在封建时代益趋完善。在西方，宫廷外交中的礼宾活动，舞会是一个传统节目。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至60年代。从事外交而不会跳舞，西方人是不会相信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跳舞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圣地延安已开展交谊舞活动，周恩来且被誉为“第一流的交谊舞家”。安娜·斯特朗说：周恩来跳舞时有一种外交家风度。他跳起华尔兹舞来简直完美之至——只是有时显得拘束一点。同他跳完一次舞之后，也许你愿意同俄国外科医生奥洛夫跳一次（当时延安有三个苏联人，奥是其中之一），他是按哥萨克风格不断地顿脚的。可是你总想回到周恩来身边来，这位数一数二的交谊舞家是那么节奏分明，那么潇洒自如。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回国途中访问波兰。波党中央给他授勋。访问结束时，驻波使馆以他的名义举行辞行招待会。会上应客人邀请，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127、85页。

《莫斯科真理报》的文章，1995年6月11日。

1993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韩国首次出席国宴时出现失仪，令韩国官员感到尴尬。他一再错误地称韩国总统金泳三的夫人为金夫人。在韩国，女性是保留本人姓名的。他在国宴上快要发表演说时，突然叫翻译走近他的身旁，站在他本人和坐着的金泳三之间。在韩国、任何人站在两国元首之间，都被视为一种侮辱（1993年7月11日美联社汉城电讯）。

美国《新闻周刊》1971年4月26日刊登的一篇纪念文章。

周恩来参加了跳舞。他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纷纷赞叹道：How wonderful！How wonderful！（妙极了！妙极了！）

周恩来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

周恩来与人谈话时绝不居高临下，而是与对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他的话题广泛，涉及国内问题，国际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他那卓越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不能不令人惊叹。他的话富有魅力，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他的眼神仿佛闪烁着七色光彩，根据话题的不同，或温柔亲切，或锐利逼人，眼色变化，浓淡有致，五彩缤纷。——

一位参与日本国政近 40 年的众议员，曾经访问世界各地，会晤过许多高级官员，却说没有一个人能像周恩来那样打开过他的心扉，使他充满敬慕之情。他 1956 年第一次随团访问北京。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亲切地把他们引进客厅后、滔滔不绝地谈起当时中国的建设情况和世界形势。始则语气温和，继而慷慨激昂。他谈笑风生，分秒不断。他的谈话不仅结构严谨，而且内容丰富精采，能紧紧扣动听者心弦，具有非同寻常的说服力。直到现在（1978）他从未遇到过内容如此丰富、思路如此清晰的论述。这位议员经常把放在钱夹里的周恩来照片拿出来看，每看一次，心头总要涌起一股敬仰和感激之情。

周恩来的谈后方式简洁明快，单刀直入，触及要害，但又不失善意的关照。对于世上一般政治家或外交家们所常带有的斗心计，耍花招等一套令人讨厌的伎俩，他也是一尘不染。他总是堂堂正正、诚心诚意地待人，不管怎样挑剔地去看，周恩来都是现代政治家中的佼佼者。——

对周恩来的评价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他有文雅而威严的风度，既有远见卓识，又有气贯长虹的品德。曾有世界绅士之称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1905—1961）为能同周恩来会晤，引为一生最大的幸事。他从北京归来谈观感时说过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周总理的人品，早已有了国际性定评。在他面前，竟无法不感到自己是个野蛮人”。——

杨琪良回忆文章，《我们的周总理》第 347 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 131、276 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91、58 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64—65、243 页。

第十三章 全方位多层次的首脑外交

周恩来首脑外交的含义

首脑外交出现在外交学中，据说是 20 世纪的产物。这一词语是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在西方的新闻报道中第一次出现的。它在西方外交学中，专指外长级以上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面直接参与的各种外交活动；包括会谈、非正式会晤、官方的访问或联系(电报、电话、热线、通信)，私人代表、特使或特别机构以及首脑的对外政策声明、讲话等等。有的西方学者还出版专著，认为首脑外交反映了当今世界关系的复杂和国际政治的活力，也反映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在政治领域的最高级别上把责任和行为融为一体的倾向。首脑外交可使最高级领导人彼此熟识，直接澄清其国家利益及对外政策，为彼此信任、合作和消除分歧或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铺平道路。通过最高领导人综合考虑国家的战略目标、承担义务与妥协的程度以及群众的承受能力诸方面，可以超越日常的程序，推动和促进重大问题的解决或在基本原则达成协议，取得突破，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既可以避免外交渠道的延宕、各部门之间的掣肘，又有利于此后在较低级别上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达成协议。此外，首脑外交还可以影响世界舆论，增强首脑及其国家的地位和获得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当然，首脑外交也有其局限，缺点在于它一开始就处于期待获得较大成果的压力之下，而导致过早的公开化，妨碍审慎地思考和取得合理的解决办法。如果首脑会议破裂，就会形成严重的僵局和紧张，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地采用。

事实上，外交最初就是通过国家元首之间所进行的国际活动表现出来的，他们是外交的实际发轫者。他们不但是外交的决策者，同时也是外交的履行者。政权下移之后，外交才下放到政府首脑身上，但决定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国家元首手中。古今中外，莫不皆然。我国春秋时期的朝、聘、盟、会，都由国君出面直接参与，到了中后期才出现由卿大夫(行政首脑)主管外事的局面，但他们是国君负责的，国君拥有否决权。及至战国时期，我国才出现了职业外交官，如纵横家之流，他们有的甚至当了首相，但对国内的行政措施实际上无能为力，即使外交职务，也随时有被罢免的可能。欧洲的情况，大体相似。中世纪的欧洲外交都由君主出面，自不待言。就是到了 19 世纪普遍建立了议会制，君主之下有首相，首相之下有外交大臣，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仍然由君主亲自参加主持，首相和外交大臣不过是配角而已。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三皇同盟”就是一个突出的史例。因此，从外交史的角度说，首脑外交的实践，古已有之，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可贵的遗产，充实了外交学的内容。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会形成“首脑外交”这一概念，

普利斯科：《首脑外交》最后一章的有关论述。转引自张厉厉等：《现代国际关系学》第 91—93 页。

才会出现“首脑外交”这一词语。它不过是对已有的实践赋予一个新名词而已，却“不幸成为丘吉尔先生选中的妙语”。

周恩来的首脑外交，独具特色，可以说是中外首脑外交经验的综合，从形式到内容，从广度到深度都有创造性发展，将这一外交艺术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周恩来首脑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多次性的。无论是出访或接待，他同对方相应人员的交谈并不限于正式的大范围的会谈，也包括非正式的，有时是单独促膝长谈。不仅在宴会上作正式的表态，而且进行引人入胜的交谈，这种交谈甚至在迎送的车船中进行。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史地和风土人情。与西方首脑外交不同的是，周恩来会见外国首脑，不单单是为了处理和解决当前的双边问题，而且着眼于未来两国间的友好；不仅考虑到对方现时的掌权者，而且顾及他们的后来人；不仅为了本国的利益，同时也设身处地照顾对方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眼前的、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出于长远的考虑；考虑的不只是双边的国家利益，而且是多边的国际利益；谋求的不仅是地区的利益，而且是全球的普遍利益。周恩来的永恒话题是：友好合作，和平共处，世界和平。这也是周恩来首脑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本上概括了周恩来首脑外交全方位的内涵。

周恩来首脑外交包括这样几个层次：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包括副职)；外交部长(包括副职)；特使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顾问；国会正副议长和国会中的党团领袖、党派领袖；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的负责人。凡单独来访的皇室成员包括皇太后、王后、王储、公主乃至国王的姐妹，总理夫人及其子女，一般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这种接待是各国所不及的，它更富感情色彩，为外交注入了以人文为主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他所说的“外交工作首先就是做人的工作”的思想。

所谓多次性的首脑外交，是指一国首脑多次来访和周恩来对某国的多次出访。在西方，也经常进行多次性的首脑外交，但往往限于某个特定问题的处理。周恩来所进行的多次性首脑外交则不同，它们往往加强和深化双方的关系，使之达到新的高度。

周恩来首脑外交还有一个突出的方面，那就是各国驻华使节在他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他始终把他们当作各自国家元首的代表来对待。这是迄今没有哪个国家的行政首脑能够真正做到的。

倘若对周恩来的首脑外交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就将构成新中国成立 25 年的一部外交史。

本章论述周恩来的首脑外交不包括电报、电话联系和通信，也不包括政

《首脑外交》英文版第 14 页。

《女外交官》第 64 页。

策声明、照会和条约、协定之类的文件。

周恩来“视使如君”

孔子说：“不知其君，视其所使”。毛泽东也有过“了解对象，尊重对象”的教导。周恩来对待外国使节，比孔子和毛泽东的话更加全面。孔子和毛泽东所说的，只是使节和对象一方，而没有涉及自己应该如何对待。周恩来对待外国使节，最基本的一点是，待之如国君。用孔子的口吻说，就是“视使如君”。周恩来接见外国使节，就像会见一国的首脑一样，都是郑重其事，从不敷衍。

周恩来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75 年 9 月，整整 25 年间会见外宾次数共达 6620 起，年均 265 起，几乎每天都有外事活动。其中接见各国驻华使节 1077 次，占会见外宾次数 16%。在他兼任外长的 8 年间，接见外国使节 507 次，约占接见外国使节的 47%；此后他以总理身分接见使节的次数为 550 起，约占接见使节次数的 51%。无论是以外长名义还是政府首脑身分接见外国使节，其频率之高，在当代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周恩来接见外国使节的次数如此之多，不外乎“视使如君”和工作需要两个原因。相对而言，前者是主要的，因为工作需要，委托副外长或稍后的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是完全胜任的，即使非亲自出面不可，次数也不会很多。据作者所知，凡是驻华使节提出会见的要求，周恩来几乎是有求必应。如果不是把他们当作该国首脑的代表，是不会如此重视的。

一国使节初到北京，在兼任外长期间，周恩来照例要接见三次。一次是商谈递交国书事宜，一次是陪同递交国书，一次是递交国书后以总理身分接见。在国外，前两次的任务一般都由驻在国外交部的礼宾官员承担。即使不兼任外长，使节离任时，周恩来总是接受辞行拜会，有时还设宴饯行。

有些使节捉摸到周恩来有求必应的雅量，便巧立名目求见。周恩来不是不了解这种心态，但是他仍然挤出时间接见，不使对方失望。一个使节能够多次会见驻在国首脑，亲自从他那里获得信息，不仅是个人的荣耀，尚可向国内邀功。自然从周恩来那里获得教益，也与众不同。周恩来毫无厌烦地接见他们，并非为了满足那种虚荣心，而是为了做人的工作。周恩来可能认为，作为一国的特命全权代表，是不会轻易提出要求的。多数使节体谅周恩来忙碌，不忍“额外”增加他的负担。必须说明的是，周恩来接见使节，都进行

本章引述周恩来的言论，除另行注明者外，均出自《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这个统计数字是根据《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的记载计算的。它纠正了此前一般引用《研究周恩来》一书第 298 页发在的周恩来会见来访外宾约 2890 次的初步统计。当然作者的计算可能有疏漏，而且据作者所知，大事记的记载也不完全。即使如此，统计中的百分比也不会超过半个百分点的误差。

认真的交谈，只有一次是“礼节性”的，那时他已身患不治之症。此后也只接见过两次驻华使节。1974年8月住进医院以后，他虽然仍在医院接见来访贵宾，但已抽不出时间延见驻华使节了。

周恩来亲自“郊迎”尚未就任的使节，仅有一例，即1949年10月10日到北京车站欢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抵京。这是当年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一种特定做法，也是外交史中罕见的例外。

周恩来从来不集体接见首任或离任使节，无论多忙，他都安排时间分别接见。1972年9月，建交国家已达103个，要求拜会他的首任使节为数众多，他仍于30日晚上先后接见三国首任大使和一国新任大使，以便他们参加第二天我国的国庆活动。此后建交的国家更多了，他仍坚持分别接见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不能简化呢？这只能从周恩来“视使如君”的观念上去找答案；你总不能集体延见许多国家元首吧，除非是在大型的集会，如国际会议或国家庆典之类的场合。

然而周恩来曾多次集体约见使节。1961年3月8日，他集体接见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通报我国经济情况以及我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1964年10月29日和30日，他分别集体约见越、罗、阿、古、朝和保、匈、捷、波、蒙、东德11国驻华使节，请他们向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转达我党中央和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政府代表团赴苏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并就赫鲁晓夫被免职对苏联内外政策的影响等问题同苏方进行接触的建议。除了国庆招待会邀请全体驻华使节参加外，周恩来还单独举行或参加招待会，以答谢出访亚、非、欧国家受到的款待。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往往集体为欢迎某个非洲国家元首访华而举行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总是乐意参加这种显示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的外交活动，这也是西方国家首脑做不到的。周恩来还利用到机场迎送外宾的机会同各国驻华使节周旋。所有驻华使节无不踊跃参加这种迎送，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为了能同周恩来见面。有的使节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难得的场合向周恩来传达某种信息，或提出某种要求。有时周恩来也利用这种场合及时处理一些问题。例如1961年5月9日和6月5日，他两次在机场会客室同苏联大使谈日内瓦会议和老挝问题。

周恩来接见外国使节，一般在日间进行，以照顾对方正常的作息习惯。遇有特殊情况，则随时会见。最著名的一次是1950年10月3日，他在凌晨1时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他通过政府转告美国：如果在朝鲜的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置之不理。

周恩来在接见外国使节时，特别是接受他们的辞行拜会时，往往应他们的要求签名留念。1970年7月12日，他接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华大使。谈话结束时，大使要求周恩来为他的女儿签名留念。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立了一个戒规：不搞签名，我已经五年不给人家签名了。由于阁下这

1974年2月15日“礼节”性会见刚果新任驻华大使。

样热情，我非常感动，满足你作为父亲的义务，但是不要说出去，我也不写日期了。——这是周恩来为外国友人留下的最后一次签名。有的离任使节举家(包括夫人和子女)前来拜会辞行，周恩来也乐于接待，甚至设宴饯行。这就在官方活动中注入了温馨的家庭气氛，使外宾倍感亲切，终身难忘。这种形式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公事公办的做法难以达到的。

驻华使节生病住院，周恩来亲自前往探视。如 1958 年 1 月 27 日，到医院看望丹麦大使格瑞杰生；同年 11 月 5 日，到医院看望芬兰大使孙士敦。

驻华使节举行国庆招待会，不论国家大小，不计关系亲疏，周恩来总是亲自参加，从不委托他人代理。但是，外交是讲究对等的。中苏关系不正常时，苏方降低出席我驻苏使馆国庆招待会的规格，周恩来也就不再出席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类似招待会了。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按例不参加各国驻该国使馆的国庆活动，而不是针对我国的歧视，周恩来则不予计较，仍然亲临该国驻华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对外国使节，从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从不故意奚落他们。周恩来有时也会因故迟到或临时改变约见时间，但他总会作出解释并表示歉意，从不失礼。

首脑互访如梭

周恩来出访会见和接待来访各国首脑共计 539 人，3770 人次，占会见外宾 6620 次总数的 57%。可见首脑外交是周恩来外交的重点。539 人中有 452 位是 96 国的国家首脑，87 人属于 9 个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96 国包括已建交和未建交国家，其中非洲 32 国 129 人，亚洲 20 国 205 人，苏联东欧 9 国 71 人。这些数字表明，以首脑交往为例，周恩来首脑外交的重点，从总体上说，是亚洲、非洲和欧洲。

周恩来访问过的国家有亚洲 11 国、非洲 10 国和苏联东欧 8 国，一共 29 国 64 次。以出访次数为序，计苏联 7 次(过境不计)，越南、缅甸各 6 次，朝鲜、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各 4 次，印度 3 次，印尼、波兰、罗马尼亚、阿

苏联第一任外长是格·瓦·契切林(1872—1936)、列宁称之为具有高度原则性、博学、敏锐、谦逊和智慧的外交家。德国驻苏大使布罗克多夫·兰曹有一次当日紧急求见契切林。契切林当时十分繁忙，他准备第二天接见，可是大使坚持要求当天会见。契切林于是定于夜间零时接见，大使同意指定的时间并表示感谢。契切林准时到办公室，而大使却迟到一刻钟。契切林这时不知哪里去了，直到凌晨两点钟才回来。大使耐心地等待。两人见面时，谁也不提这件不愉快的事，彼此若无其事地热情叙谈。事后契切林对提问的同事说，大使对我没有立刻同意当天接见表示不满，坚持要求我接见。我定在午夜零时接见，既非今天，亦非明天。显然，他以迟到一刻钟惩罚我。他是外交官，特别是德国人，应该是非常守时的。所以，既然他惩罚我一分钟，我就决定惩罚他两小时。——尼古拉·茹可夫斯基：《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第 416 页。

联(埃及)各2次,其他国家12次。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各个时期与各国关系的状况,当然,同各国关系不能以出访次数定论。

来访国家首脑的次数,依次为越南28次,朝鲜18次,巴基斯坦和阿尔巴尼亚各13次,罗马尼亚、柬埔寨和尼泊尔各10次,缅甸8次,苏联5次(不计过境)。可见除苏、阿、罗之外,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亚洲邻国。非洲国家来访次数最多的是刚果(布)11次;阿联(埃及)、坦桑尼亚、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赞比亚、索马里、加纳等国首脑来访的也不下3次,其中杜尔、尼雷尔、达达赫、卡翁达、恩克鲁玛总统都一再光临北京。其他国家首脑来访的,至少一次。

然而首脑的来访,只能反映一方面的状况。两国关系的状况,如果从缔订条约等文件的数量分析,又有所不同。

周恩来在职期间,由他亲自签署或经他审批和签发的同各国签订各种条约、协定、议定书、公报、换文、合同以及联合声明等外交文件共达1628件,各种照会、声明和外交函电尚不包括在内。其中50年代532件,60年代583件。“文化大革命”期间,自1967至1970年只有154件,可见“四人帮”对我国外交的破坏程度;1971至1975年8月,也就是周恩来患不治之症以至沉疴不起的最后几年,共有437件,这表明周恩来为挽回“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家对外关系的损失付出了多少心血。

上述1628项重要外交文件中,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的共达515件,占31.6%。其中苏联138件,占515件的26.8%;阿尔巴尼亚58件,占11%;罗马尼亚58件,占11%。同亚洲国家签订的共计235件,占1628件的14.4%。其中越南83件,占235件的35%;朝鲜64件,占21%;缅甸49件,占21%;柬埔寨33件,占14%;巴基斯坦23件,约占10%。这些统计表明,就条约关系而言,当年中国外交的重点是苏联东欧,而以苏联为主;亚洲国家占第二位,而以越、朝为主。

将首脑交往和两国间缔约情况结合起来看,才比较接近中国外交重点有所侧重的实际。

周恩来同各国首脑的交往,基本上反映了新中国外交不同时期的重点和特点。例如建国伊始,周恩来便受命于1950年1月赴苏进行谈判,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中苏签约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讲话时仍强调指出,中苏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意义,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有关条约协定的数字,是根据《中外条约协定索引》统计出来的。

中国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由于当时的情况在 50 年代是非常密切的。双方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两次访苏，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彭真、彭德怀等领导人对它们的访问，自不必说，周恩来访问的频率更高。1956 年波、匈事件时，由于赫鲁晓夫推行先“左”后右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政策，如果没有周恩来秉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胆略，对波、匈进行及时的访问和对赫鲁晓夫的严肃告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可能早就解体了。波兰同志曾在莫斯科向邓小平诉苦，情绪激动，简直有点像我们土改时贫雇农“吐苦水”。从波、匈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

中苏这种“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于 1957 年春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时，达到高潮。毛泽东出面迎送，周恩来亲自陪同他到各地参观访问。毛泽东还在中南海设唯一的一次家宴，为这位苏联英雄饯行。这次家宴没有让江青以主妇身分参加。

伏罗希洛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开始走入低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程 ^ 字形大起大落，是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所串演的一出多幕悲喜剧，也是苏联立国 70 多年后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

到了 60 年代中期，东欧这些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和稍后的罗马尼亚，都唯苏联马首是瞻，中国亦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双方关系遂跌入低谷。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包括阿、罗的社会主义体制纷纷产生多米诺效应，中国也尊重各该国人民的选择。只有南斯拉夫情况特殊，另当别论。

阿尔巴尼亚当年不顾身小力单，敢于同苏联“老子党”对抗，挺身而出，反对苏共领导对中国党的高压政策，的确难能可贵。在上述东欧国家中，周恩来访问次数最多的，也是阿尔巴尼亚。阿方国家领导人来访，则达 13 次之多。这盏极左的“欧洲明灯”因中国投入了 90 亿元的援助，才不至于油尽灯灭，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值得总结的一次教训。

罗马尼亚摆脱苏联羁绊，抵制国际共运中一度出现的对中国的围攻，其积极意义，也是应当肯定的。罗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也起过桥梁作用，并努力促进某些西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建交。罗来访的国家领导人达 12 次之多。周恩来 1975 年 9 月 7 日在医院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宾，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强调，对不正确的东西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

50 年代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印度。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文化上互相影响至为深广，反对帝国主义欺凌的斗争经历使两个重新自立振兴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国际舞台上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在朝鲜战争期

吴冷西：《忆毛泽东》第 15 页。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1 辑第 120 页。

间，从总体上说，中印之间的合作起了积极作用。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和尼赫鲁的密切配合，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在 50 年代两次访问印度所形成的“中印人民是兄弟”的热潮永远载入两国关系史册。这一时期周恩来同印度驻华使节过从之密，超过同其他各国使节的交往。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坚持其无理要求。1960 年周恩来第三次访问印度，就如何稳定边境局势以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极为忍让、克制而艰苦的谈判，终因尼赫鲁不愿将几点共识列入新闻公报，使周恩来极为失望。

当时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刚刚过去，国际上不友好的势力都企图乘机挑拨中国同邻国的关系。周恩来通过这次访问，表达了中国愿意同邻国睦邻友好的真诚愿望。他向尼赫鲁表示：中印边界，比起维护两国友好合作的根本问题，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为了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各种途径，中国政府从不吝惜作出最大努力。

50 年代及其后，来往密切的国家首脑还有缅甸、柬埔寨、尼泊尔和阿富汗。

中缅两国总理互访，最重要、最富有色彩的，要算 1956 年和 1961 年那两次。1956 年 12 月周恩来到缅甸作为期 10 天的访问时，总理是吴巴瑞，陪同到南北各地参观的是前总理吴努。吴巴瑞专程到掸邦首府东枝陪同周恩来，双双进入我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在那里参加别开生面的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周恩来和吴巴瑞一起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两国边境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座谈会，加强了双方的互相了解和亲密友谊。周恩来在云南代省长举行的招待两国政府领导人的宴会上说：我们两国的是山连山、水连水，自然地理把我们连结在一起，边界不能把我们的友谊分开。第二天他们又从畹町进入缅甸，直下仰光。周恩来在仰光 1000 多名华侨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勉励华侨要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并说已经选择了缅甸国籍的就不应该再参加华侨团体，但是他们仍然是中国的亲戚。没有参加缅甸国籍的侨民，可以同缅甸人民往来，但是不应该参加缅甸的政治活动。

1961 年 1 月周恩来访问缅甸那一次，两国已经签订了边界条约。周恩来乘专机抵达仰光时，受到吴努总理、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和 10 万市民的热烈欢迎。由中国几个文艺团体组成的 400 人的大型艺术团也同时在仰光访问，可谓盛况空前。

中缅两国人民不但结下了“胞波”（亲兄弟）情谊，两国领导人也怀有同样的感情。

西哈努克夫妇及其子女和首相先后访华 10 次。他对中国。对周恩来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是因为周恩来所体现的对他为维护柬埔寨国家的独立和中立地位而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坚定不移的支持。1970 年 3 月，背叛西哈

努克的首相朗诺中将在美国指使下发动政变，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得不到苏联支持，是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仍以国家元首之礼欢迎他到北京来。周恩来同他进行了 35 轮会谈，帮助这位心神不宁的亲王出主意，稳定情绪，树立信心。这是周恩来一生中同一国首脑进行会谈的次数之最。周恩来为贯彻我对外政策，为争取和团结这位力主独立、自由、和平、中立的亲王，给予精神和物质的支持，不遗余力。使西哈努克铭心不忘的另一大事，是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朗诺伪政权以后，周恩来一直劝导柬共领导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同西哈努克合作，正确对待和维护他的地位。正是这种支持，使西哈努克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最终荣归故国，继续他的统治。1975 年 8 月 26 日晚，西哈努克返国前夕。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这是周恩来生前除另一外宾外，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国老朋友。翌年伊始，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到金边，西哈努克痛哭失声，泪如雨下。他在唁电中说，周恩来是柬埔寨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和伟大的朋友，为柬埔寨人民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尼泊尔和阿富汗两国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邻邦。尼泊尔和中国夹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为邻，历史上渊源深远，互有亲近感。

1956 年 9 月 20 日中尼两国发表谈判公报，同日签订建交协议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周恩来于同年 10 月访问尼泊尔。这是历史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尼泊尔的第一次访问，受到尼泊尔朝野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这次访问中，签订了向尼泊尔提供经济援助的协定。他在尼泊尔广播电台发表告别词时说，中尼两国是由伟大的喜马拉雅山以将近一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连结在一起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这一片广大地区的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1960 年 3 月，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首次访问北京。周恩来陪同参观密云水库，往返途中在火车专列中进行会谈。随后签订了以珠穆朗玛峰为界的两国边界协定。1960 年 4 月，周恩来第二次访问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放假一天。柯伊拉腊首相和几乎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到机场欢迎，首都市民则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旁夹道热情欢迎周恩来。在这次访问中，签订了两国和平友好条约。以后又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和帮助尼泊尔修建公路协定。1961 年 9 月，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访华，并参加我国国庆。周恩来陪同到西安、三门峡和洛阳参观访问。此后尼泊尔首相两人，评议会议长两人，特使等也分别来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 年 7 月周恩来会见前来北京访问的尼泊尔共产党中央领导成员阿迪卡里和另一名中央委员，同他们进行了诚恳友好的谈话。当年谁也没有料到，34 年后，年逾古稀的阿迪卡里竟以尼泊尔首相的身分于 1995 年 4 月重访北京。原来，他所领导的党于 1994 年 11 月在大选中获胜了，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首相。他的政权虽然只维持了九个月，但在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时期，出现了一个君主立宪多党民主制度下的共产党政权，这不仅为议会制国家所仅见，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创举。

帕米尔高原并不能阻断中国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周恩来于1957年初访问了英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未能征服的阿富汗之后，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刘少奇和陈毅也分别访问过阿富汗。阿富汗则从国王、首相到外长等人都先后来中国访问。两国顺利圆满地就未定界问题进行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在阿富汗英雄的人民奋力抵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入侵的长期斗争中，中国给予全力的支持。

周恩来同巴基斯坦历任首脑的交往，导致中巴两国全方位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外交的深谋远虑，详见本书附录一。周恩来曾四次访巴，巴基斯坦米尔札总统和阿里总理之外的历任总统、总理、外长都先后多次访华。他们对周恩来怀有崇高的敬意，周恩来则视他们为挚友。阿尤布总统的儿子、布托总统的子女访问北京时，周恩来都抽空接见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1964年2月周恩来和陈毅夫妇访巴时，同布托外长全家合影。其时布托长女贝娜齐尔尚未及等。她至今仍珍藏着这张宝贵的照片。1972年7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接见来访的贝娜齐尔等布托的四位子女，又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贝·布托后来两次担任巴基斯坦总理，始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

周恩来曾两次访问锡兰(斯里兰卡)。他在1957年初首访锡兰时，参加了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庆祝锡兰独立四周年的万人大会。周恩来刚开始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参加大会的群众纷纷四散躲雨，而周恩来却谢绝为他打伞，兀自巍然不动，继续他的演讲。见此情景，躲雨的群众非常感动，又连忙跑回来，冒雨静听周恩来激动人心的讲话。雨中的周恩来和陪同访问的贺龙一直等到班达拉奈克总理讲完话，才站起来按锡兰人的习惯双手合十，以示敬意。这时群众争先恐后拥到台前，向中国客人挥手高呼“贾威伐”(万事如意)。周恩来与群众同忧患的伟大胸怀和对小国的尊重，显然感染了锡兰朝野，在班达拉奈克夫妇心中激起了亲切、诚挚、感人的情愫，从而在他们和周恩来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班达拉奈克总理于1959年遇刺身亡，周恩来在唁电中极表悲痛。我国在中印边界进行自卫反击后，继任总理的班夫人在科伦坡召开不结盟六国首脑会议，就中印关系进行斡旋。1962年底，班夫人等人应邀访问北京。周恩来和陈毅同班夫人、印尼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进行三方会谈，并陪同他们赴杭州、上海参观访问。他们在听取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以后，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

周恩来曾两次访问印尼。第一次参加万隆会议，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从政治上合理而妥善地解决了这个困扰着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与所在国的关系问题，排除了这些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中一个敏感的障碍。这也是周恩来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胸怀世界全局的表现。

第二次是 1965 年参加万隆会议 10 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在印尼会见亚非国家的许多老朋友。两国后来还签订了友好条约。苏加诺总统也曾两次访问中国，在他下野之前，印尼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都来过中国，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两国还共同发起和组织新兴力量运动会。

巴勒斯坦人民为维护其独立主权和生存权利所进行的斗争，自始就得到中国人民积极有力的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历届领导人，包括阿拉法特都来过中国，周恩来同他们进行诚恳深入的交谈。巴解组织早在 1965 年就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享受国家使节通常所得到的待遇。

拉美国家首脑最早同周恩来接触的是智利前总统贝特雷加尔。他偕夫人于 1959 年 6 月访华时，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热情款待。此后便有其他拉美国家的卸任首脑和卸任国会正副议长陆续访华，为双方国家关系正常化进行开拓性的探索。

周恩来对各国首脑的夫人及其亲属单独对我国进行的访问或过境，都十分重视，往往亲自迎送，并出面接待，给对方留下受到尊重、平等相待、诚恳热情的美好回忆。1961 年，比利时同中国尚未建交，伊丽莎白王太后以 85 岁高龄于秋高气爽时来我国访问，受到周恩来热情友好的接待。1962 年 9 月，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尼来访，周恩来亲自迎送，并和邓颖超一起破例设家宴热烈欢迎。1965 年 10 月，阿联副总统萨布里的夫人和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的夫人同机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并和邓颖超、刘少奇夫妇设宴欢迎。她们到外地参观访问，周恩来和陈毅都到机场送行。1971 年春，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妹妹阿什拉芙公主一行访问北京，周恩来亲切会见并为她们举行欢迎宴会。不久，巴列维国王的三妹法蒂玛公主也由首相胡韦达的夫人莱拉陪同，接踵来访。周恩来给予同样的礼遇。两姐妹相继会见周恩来，转达了伊朗同中国建交的友好愿望。

周恩来为来访国家首脑及其夫人举行的小型宴会，邓颖超一般都乐意参加。但周恩来出访时，她从未陪同。1956 年 9 月间周恩来在答复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转达其政府正式邀请周恩来和夫人前往访问时，周恩来对南政府的这番好意表示感谢说，我本人是很愿意去南访问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学习很多东西，还可以向铁托总统和其他领导同志领教。关于我妻子访南的事情，现在很难回答，我还要同她商量。在这方面，我们两人很难采取一致行动。我已经习惯，而她却不习惯这种紧张的活动。我将于 11 月访问印度。印度大使夫人花了许多时间劝我妻子去印度，但是她由于不习惯这种紧张活动还是谢绝了。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我妻子身体不太好，现在半天工作，如果出国访问，恐怕还是有困难和不方便的地方。

外国首脑来到我国，如果他们到外地参观访问，周恩来必定亲自陪同。1971 年 11 月，越南范文同对这种礼遇感到不过意，建议日夜操劳的周恩来不必陪同出去了。周恩来说，首先，由于我们两国的革命友谊，我应该陪你出去；其次，我出去还可以跟地方同志接触，不能者困在北京一个地方；第

三，出去比在北京休息的时间多一点。这三点好处，两个是公，一个有点私。所谓私，也就是能多睡一两个小时。——事实当然非止于此。有时双方的会谈是在外地继续进行的。此外，非正式的交谈，不但更自然、更密切，有利于感情交流，也更有助于加深相互了解。

周恩来对外宾，从来不作所谓“礼节性”的会见，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74年5月末，周恩来已重病在身。但当他得知到北京来主持法国工业和科技展览会开幕式的法国官方代表团团长带来了德斯坦总统当选第二天给他写的信时，他便“礼节性”地接见了这位团长。

“三寻求”之旅

最能集中显示周恩来首脑外交之特色的，莫过于他三次对亚非国家的出访。这三次出访，有的是回访，有的是应邀。第一次是1956年底至1957年初，由贺龙陪同访问越、柬、印、缅、巴、阿、尼、锡8国。第二次是1960年春，由陈毅陪同访问缅、印、尼、柬、越、蒙6国。第三次是1963年岁暮至1964年早春，由陈毅陪同访问阿联(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10个非洲国家，回头又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跟着又同宋庆龄副主席再次访问锡兰，共13国。这三次不辞辛劳，万里迢迢，陆续进行的大规模友好访问，以“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著称。前两次，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是“旧地重游，倍感亲切”。第三次则是为了认识和结交新朋友。而非洲的新老朋友大多是反帝反殖的英勇先驱。一国总理，一次出访达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接二连三访问这么多国家，只有周恩来胸怀全局的伟大气魄和新中国外交的恢宏气概以及国内的集体领导才做得到。这在世界外交史中是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其意义是深远的。

在这三次大规模出访中，涉及亚洲国家部分，已如前述；对非洲的访问，则是周恩来“三寻求”的重点。

非洲当时的形势，陈毅在一首诗中作了生动的概括：“非洲情况近如何？到处人民欢庆多。沙漠雪山初觉醒，重洋两海泛春波。殖民新旧谋转化，部族精华起沉疴。最喜斗争终获胜，不忘警惕荷于戈。黑非今日变红非，大地殖民已式微。象牙黄金还物主，白鹰翠鸟有林归。衣冠似雪男雄壮，妙舞如花女褐菲。喜尔新来自豪惯，京垓兆亿庆春晖。”

早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看到非洲已破晓，预感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以迅猛之势向前发展。到了1960年，5年间已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埃及已收回苏伊士运河。法国殖民主义者被迫退出阿尔及利亚。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也隐藏着种种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

题，亟待调解和弥合。中国一直同情和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周恩来和陈毅的访问，将大大鼓舞和推动这种斗争。从1960年6月至1963年9月，周恩来先后接待了即将访问的国家和非洲一些政治组织的外宾以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广泛深入的交谈，了解情况和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想法，并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就为他此行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此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苏联在非洲到处给人家贴上“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并以对华态度划线，谁对中国好，就对谁施加压力，减少援助。为了不使东道国为难，周恩来和陈毅在出发前决定，不主动提出中苏关系问题，不要求别人支持，不把观点强加于人。如东道主提及，我们只作说明解释，目的在于促进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两相比较，使非洲领导人理解了是非。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周恩来一行访非的第一站。1963年12月14日，中国客人的专机徐徐降落开罗机场时，尼罗河上的轮船放声鸣笛致敬，船员们涌上甲板挥手欢呼：“中国万岁！”参观埃及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历史馆后，陈老总强烈联想起中国革命历史，用三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中埃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都经过英勇斗争取得了独立。周恩来和纳赛尔总统是在万隆会议有过密切合作的老朋友，他在纳赛尔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回顾40年间非洲政治上的变化时谈到他的感受说：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大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周恩来在另一个场合发表讲话时指出，西方国家嘲笑我们落后，夸耀他们文明。其实，西方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只要我们亚非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仅能够赶上它们，而且能够超过它们，在创造人类新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在阿联，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随后周恩来一行访问了高举民族解放斗争大旗的阿尔及利亚。他在民族解放阵线干部大会上讲话，热烈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并指出，被压迫民族面对帝国主义武装镇压，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取得独立和解放。阿尔及利亚革命者，正是由于坚决依靠农民和一切革命人民，以农村为基地，发动和坚持了武装斗争，并且使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才战胜了殖民主义。正确的革命领导，

广泛的统一战线和革命的军队，不仅对于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是重要的，对于进一步把革命推向前进，无疑也是同样重要的。

周恩来在出访前曾经对阿尔及利亚朋友说过，在非洲人民面前摆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经过抗战取得独立，另一条是通过谈判取得独立。当然这两条道路不是对立的。谈判中有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中有谈判。因此你们的斗争给非洲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有的国家同殖民国家谈判取得了独立，这些国家都是半独立。因此在独立后还要不断奋斗，争取完全的独立，经济上的独立。

阿尔及利亚人民为纪念中国人民曾经无条件地大力支持他们的武装斗争，将首都一条新修的主要大街命名为“北京大道”。周恩来、陈毅为这条大街剪彩，并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在那块醒目的路牌下合影。

本·贝拉总统在周恩来离开阿尔及利亚数小时后，对他的中国客人作这样的描述：他是一个闪烁着智慧的火花、非常彬彬有礼和和蔼可亲的人，总而言之，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轻松愉快。他经常的笑容和他对极小的事情纵声大笑的习惯，创造了一种信任和愉快的气氛，非常动人。

1964年1月初，周恩来在访问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后，到达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在宴会上讲话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一时气氛很紧张。周恩来泰然自若，并当场作了具体圆满的答复，博得一片掌声。布尔吉巴十分满意。第二天，双方宣布建交。代表团离开时，欢送的规模特别盛大。诚如外国报刊所评论的，布尔吉巴这种坦率态度，不但没有得罪这位中国人，反而造成了谈笑风生和极融洽亲切的场面。突尼斯在两天的访问结束时承认了中国，这是这位中国总理的一次胜利。

周恩来一行在访问加纳前，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致伤事件。加纳局势一下变得十分紧张。要不要按原计划访问呢？周恩来同陈毅商量后，不顾个人安危，坚定他说，越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去，要支持。为了照顾主人的安全，周恩来打破礼宾常规，主动建议，凡是有恩克鲁玛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所住的碉堡中进行，他也不必到机场迎送。这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品德，使对方深受感动。周恩来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于当晚到奥苏城堡去拜会老朋友恩克鲁玛，并面交毛泽东的慰问信。他在恩克鲁玛举行的便宴上谴责帝国主义者对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对企图暗害恩克鲁玛总统的这种卑鄙可耻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两人多次会谈和单独会谈都在这个城堡中进行，周恩来并劝恩克鲁玛总统不必到宾馆回拜。在一次单独会谈中，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表示说：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和使革命进行下去，就必须：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在这个核心周围要

英国《新政治家报》、转引自《五洲的怀念》第340页。

英国《观察家报》，转引自《五洲的怀念》第339页。

有一批很坚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干部，在外围则要有尽量广泛的统一战线；二、要有一支可靠的军队；三、要有一个适当的经济政策，要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还向他详细介绍我对外援助八项原则。随后即向报界公布了这些原则。

恩克涛玛避难住的这座城堡是 17 世纪贩卖黑奴的丹麦商人所建。在那阴森的地牢里，石桩上用铁链拴捆过数以千计的黑奴等待押运美洲。看到这一切，陈老总心潮难平，在会谈间隙提笔填词一首《满江红——黄金海岸》：“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并祝愿“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土重光，全无敌”。“黄金海岸”是加纳独立前的名称，也是西方殖民主义掠夺加纳黄金的标志。

周恩来在告别宴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各国人民需要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开辟前进的道路。只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的力量，高举独立和自由的旗帜，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发丰富的资源，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一定能够逐步地消除贫穷落后的状态，在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早在恩克鲁玛于 1961 年 7 月访问北京，周恩来在同他会谈时，谈到刚果基赞加总理要求联合国干预内部矛盾，结果一部分爱国军队给联合国解散了，而反动武装却原封未动。卢蒙巴在国会中原是占多数的，现在国会却在卡萨武布控制下召开，等于把刀柄授给人家，等于自己解除了政治武装。卢蒙巴上过一次当，现在基赞加也可能再上一次当。

周恩来指出，把议会作为政治斗争的口号是可以的。如果作为实际行动，则不仅没有把握，而巨还有危险。如果议会通过坏的决议，这就不合基赞加政府的本意；如果它通过符合刚果人民利益的决议，则反动派可能搞政变，把进步的议员抓起来，而联合国不会帮助基赞加合法政府的。目前在刚果人民的斗争中，主要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在人民中扩大基赞加政府的影响，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反对受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反对分裂刚果、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卢蒙巴是英雄人物，是代表英勇斗争的刚果人民，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联合国、美国和比利时帝国主义的阴谋而遭到陷害。有了这样的经验，基赞加可以避免重复上当。

这里有必要补叙 1970 年 9 月刚果(布)总理拉乌尔少校访华时，周恩来在会谈中涉及的问题。周恩来说：非洲民族革命和独立运动有些失败了，原因是领导人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新阴谋，没有发动群众。我们曾劝基赞加不要离开斯坦利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但他不听，最后被关了起来。恩克鲁玛 1964 年遇刺，幸免于难，他把反革命镇压了下去。我劝他不要出来，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他的国家，离开了就要出事。到了 1966 年 2 月他第二次访华时，要到越南去，对美国轰炸越南的事情进行斡旋。我同他进行了五次单

独会谈，劝他不要去。美国打越南，你劝谁？你能起什么作用？他不听，结果加纳发生政变，他也回不去了。这是最深刻的教训。塞古·杜尔总统汲取了这个教训，所以他现在不离开科纳克里。我们还有另一位朋友凯塔。1964年我们访问马里时，劝他要把武装力量掌握在手里，军队不要被帝国主义收买和控制。他不注意，搞一个什么“民兵”，引起军队很不满意。他搞形式主义，作作样子，武装力量没有掌握住，结果就是军队把他搞掉了。西非的教训就很多，还没说东非。

周恩来对刚果局势的关心，对恩克鲁玛等人作为一个民族解放战士的爱护，确是一言九鼎，情义如山。

加纳、马里、几内亚……无论哪个城市，男女老少都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中国客人，穿着大红大绿服装，伴着鼓点起舞。老人儿童争着上前触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卸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以表达她们的友情。

周恩来一行抵达马里首都时，受到总统凯塔和巴马科倾城的盛大欢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对非洲的态度已在几次公报中表明。其中一点就是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干涉。换句话说，友好的国家、友好的人民只有尊重你们的义务，没有干涉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们的权利。——听众当然明白周恩来强调这一点指的是什么。

周恩来在同凯塔的会谈中，有一次着重谈了经济建设的道路问题。他说我们觉得在非洲国家中，像马里这样从殖民地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不可避免地要有过渡时期，有过渡时期不会影响走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过渡时期，民主方面完成得越彻底，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准备得就越好，社会主义建设得越好。在非洲的过渡时期，根据我们的经验，可能是很长的。——这是他经常阐发的革命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

随后周恩来一行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杜尔总统亲临机场欢迎。科纳克里全城友情洋溢，欢声雷动。他在杜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盛大文艺晚会演出前发表讲话时说：亚非国家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发展民族经济，要互通有无，互补短长，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互相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周恩来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赞扬非洲的革命形势。他说：今天，非洲大陆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非洲的五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有三十几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在没有独立的国家里，也都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怒火。安哥拉人民在斗争。几世纪来受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已经觉醒起来，站立起来了。非洲是非洲人民的非洲，非洲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大陆。在同杜尔总统的多次会谈中，有一次周恩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对非洲人民起了启蒙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人民进一步觉醒，他们站起来要求自由、独立、统一和团结。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在这次北非与西非的

访问中，到处看到一种生气勃勃、要求解放的精神。我对此印象极为深刻。这有点像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人民欢庆解放，到处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同凯塔总统的单独会谈中，周恩来坦诚地表示：要实现非洲的统一，首先要那些最先觉醒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起榜样作用，首先团结起来，成为非洲统一的核心力量。最觉醒国家之间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存在一些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与非洲统一的愿望相比，终归是次要的。这些国家应该首先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带动其他国家。

接下来访问的国家是苏丹。指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劫掠北京城的罪魁祸首之一的英国戈登将军，以后在镇压苏丹人民的反抗中死在英勇的苏丹人民的长矛之下。英国帝国主义在喀土穆为他塑像表彰。苏丹独立后，这个塑像被砸得稀巴烂。周恩来一行在这里受到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和全市人民英雄般的热烈欢迎。两国人民的共同命运和反帝反殖的战斗情谊使宾主双方更加深了同情和了解。

继苏丹之后，周恩来一行乘专机在六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的护航下到达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斯马拉。代表团车队经过时，常有花束抛来。一个青年为了将鲜花抛到车上，竟追车跑了半里路。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未同中国建交，而且受制于美国。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压力。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传说塞拉西皇帝表示，他不便在首都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国总理这样安排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立即对此叽叽喳喳，说这是有意怠慢。然而周恩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友好，体谅埃方的处境，仍欣然应邀。

塞拉西是二战前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英雄。他在皇宫同周恩来会谈时，再三说明不在首都接待不是像美国报刊讲的那样，绝对不是。他说：我在阿斯马拉接待你们，正是要叫美国人看看我同中国的友好，因为这里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人最多。

为了照顾老皇帝，周恩来在答谢宴会上不讲话，但是将讲话稿送他，让他了解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埃皇对此甚表感谢，不久便宣布同中国建交。周恩来在告别宴会上祝酒时说：今天我们双方签署了中埃两国联合公报。这个公报的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塞拉西皇帝于 1971 年 10 月访问北京。周恩来亲自陪同到上海和广州两地参观访问。

周恩来一行的最后一站是非洲之角索马里，会见了不久前访问过中国的老朋友舍马克总理。周恩来在舍马克的欢迎宴会上回顾中索的历史关系时说，早在 9 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载。15 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

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他在同对方的会谈中总结这次非洲之行和亚非关系时说：我们这次访问了十个非洲国家，东非其他国家推迟到以后再访问。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虽然还有一部分国家未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的。非洲和亚洲一样曾是殖民地，有共同遭遇，但是非洲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达几个世纪，遭受过贩卖黑奴的劫难，所受的奴役、压迫和摧残，超过亚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非洲是直接统治，而在亚洲某些地方，如中国，是半殖民地。他们在非洲最残暴，掠夺非洲的人力资源，造成非洲的落后。交通运输是为殖民主义的掠夺服务的，不是为非洲人民。城市也是为白人服务的。非洲的政治地图也是帝国主义者用铅笔在地图上画的结果，它不惜把一个民族分成几个部分，北非、西非、东非和南非的情况都是如此。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借机在非洲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来控制非洲。我们支持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关于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的决议。但我们愿意提出以下两点意见：第一，有核武器的大国要给予保证，不承担义务就没有用处；第二，要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一定要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因为有基地仍可储存核武器。

周恩来的“三寻求”之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三寻求”不仅体现了周恩来首脑外交的诚挚谦虚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致力于双方友好合作和世界和平的胸怀，也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高瞻远瞩和策略运用的灵活机智的反映。这些非洲首脑十分厌恶西方高级官员那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傲慢和动辄施压威胁的口气，对周恩来垂询东道国历史文物、风土民情之殷勤，阐述中国对非洲政策那种推己及人、顾全大局、谅解困难、热情相助的坦诚，反复说理、动之以情、道之以义、拳拳爱心的谈吐，以及平易近人、谦恭有礼的风度，无不倾心折服，引为战友。尤其是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对阿拉伯、对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实际上成为中国处理同第三世界所有国家关系的准则，其影响之大，超出他所访问过的国家。周恩来出访非洲前后，到60年代末，有20多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形成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建交高潮。同时也推动了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首脑相率访华，进一步密切了双方关系。诚如陈毅所说，“此行不虚，有此为证”。

周恩来晚年特别提到1967年和1974年两度来访的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对这位老朋友推动非洲许多国家同我建交表示深切谢意。他最后一次在医院里会见达达赫时，拉着他的手说，你准备有素，逐步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效果很好，堪为非洲国家楷模。周恩来诚恳建议达达赫为调解杜尔和桑戈尔之间的纠纷做些工作。

各国报刊对这次访问的反应十分强烈。所有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

周恩来这次访问都感到十分不安，而所有反帝反殖的国家却热烈欢迎这位反对全世界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英勇领袖。舆论普遍承认周恩来通过这次旅行，其影响已开始越出欢迎他的那些国家。仅仅是他的来到非洲，就足以突出尽快承认北京政府的必要性。某些国家的政府已对没有同人民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一事感到遗憾。承认北京的影响将在联合国舞台上显示出来。他的访问给予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以必要的推动力量，成功地把共产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置于更有影响的地位。他在争取过去未必支持中国，在“两个中国”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布隆迪三国，使它们承认中国并且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在这些国家中，得到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具有很大的意义。

事实果如所料。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2/3的压倒多数76票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投票中，非洲国家占25票，约占1/3，占非洲独立国家的半数，是投票支持中国最多的一个大陆。这正是周恩来的“三寻求”之旅和新中国外交的影响的最集中的反映。

1965年三四月间，为了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周恩来又由陈毅陪同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和阿联。回国途中又访问了巴基斯坦和缅甸，然后赶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大会，同亚非许多国家的首脑重聚一堂。“文化大革命”以后，周恩来想再访非洲，已经力不从心了。

周恩来的首脑外交，不仅增加了互相了解，促进了国家关系，而且加深了彼此的友情，三者相得益彰。其中不乏感人至深的生动故事，限于篇幅，难以备述。

第十四章 周恩来的民间外交：积累渐进以民促官

民间外交的由来 和周恩来的构想

欧洲中世纪的宫廷外交，禁止外国外交官同本国人民接触，惟恐内情外泄，危及国家安全。许多国家常常发生将外国外交官当做间谍扣押或驱逐的事件。我国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曾规定本国官员接待外人的情况必须登记上报(《管子·问》)。偶尔有过几次“国人”(都城内自由民)参与外交事务的事件，那是因为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陷入困境，当权者不得不求助于“国人”。这种做法，就一定意义上说，颇似当代西方国家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的国际问题交付“全民公决”的行径。

封建制度后期产生了议会制。资产阶级国会对重大外交事务拥有审议权，议员“代表民意”参与国际事务，并从事一定的外交活动。外交官在对方国家的活动范围由政府机关扩大到了各个政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扩大，除了领事官员，外交官又有了同驻在国商业机构相联系的职责。后来双方使馆互设武官、商务、文化、新闻乃至科技官员，他们之间又有了相应的活动领域。然而这些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且带有官方性质，倘若没有外交关系，这些活动都难以进行。

民间外交形成一定的组织和规模，始自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苏联为了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分别由工会或其他民间机构出面邀请各国的相应组织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广泛进行民间接触。然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往往是单行线，有来无往，不能起交流作用。

发展规模性的民间外交，在历史上开辟一个外交新天地，则应归功于周恩来。国外学者说：1938 年周恩来在武汉建立国际宣传机构，就是 1949 年以后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人民外交”的前兆。

周恩来自始就认为、外交虽然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种辩证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又说，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外交要团结世界人民，不仅对当时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和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在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中，外交不仅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要顾及对方的利益；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 122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2、52—54 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212 页。

损人利己的外交，不是周恩来的外交。

有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开展民间外交是正常的。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就广义上说，双方都需要和平，都不同程度地不愿意发生冲突，尤其不愿意引起战争；就具体方面讲，双方都需要有一定的贸易往来和一定的经济关系。双方在这两个方面就有了一定的汇合点和共同点。这种现实需要和客观条件就为双方进行民间方式的交往提供了可能。当然，如果有一方采取敌对的，僵硬的政策，这种可能性就会受到严重阻挠和破坏，突出的事例是当年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长期的封锁、禁运、断绝往来的政策。但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是不正常的。历史地说，这种偏执狂的做法是逆潮流而动的，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美国认识到这种政策是走不通的，是无法坚持的，过程虽然长了一点，最终还是不得不改变和放弃这种既损人也害己的政策，又回到现实需要中来。这样不但民间外交成为可能，正式的官方关系也建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的敌对状态带有暂时性，而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却具有长远的价值；长远的利益比短暂的利益具有更高更大的吸引力，这是历史的必然。

民间外交是在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直接目标是推动官方关系的建立，即“以民促官”；然而它又是超越官方关系的一种国际行为，它的长远影响远远超过官方交往。官方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民间交往的许多障碍，可以促进民间外交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读者如从这两个方面，即思想和现实的角度来研究周恩来民间外交的意义，就能更易理解周恩来民间外交的实践开创了多么引人入胜的先例。

新中国一诞生，周恩来便为开展民间外交作好了组织准备。除了原有的工、青、妇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四大组织仍然发挥传统的对外交流的作用之外，又新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及国别民间组织如中苏友好协会和稍后成立的中日友好协会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一次在世界外交史上以“人民外交”命名，从形式到职能规定了人民外交的宗旨、性质和作用，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的特征。所有这些群众团体都在新中国总体外交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开辟了国际关系新渠道，增进互相了解，发展友好合作，为建立和促进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各自的贡献。

民间外交——有的贸易先行，有的从互换记者开始——对国家关系正常化所起的作用，可以举出遍及五大洲的种种事例，其中最全面、最集中、最能说明周恩来人民外交方方面面的典型，莫过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了解了这一过程，也就了解了周恩来人民外交的全貌。

日本“三勇士”和周恩来的三举措

周恩来民间外交艺术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开展对日关系。对日本

的民间外交进行了长达 20 年之久才过渡到官方外交。这一漫长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周恩来耐心细致、不急不躁、细水长流、水到渠成、广交朋友、扩展友好、亦商亦官、官商并举、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思想内涵，而且反映了周恩来坚持原则，对对方尊重、体谅、宽容、照顾、诚信的仁义情操与品德。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周恩来如何将内心世界同他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追求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外交史上一枝独秀的艺术精品。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这是不可移易的地理环境。中日两国人民同文同种，友好交往两千年，只是到了 19 世纪末，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背景。二次大战后，日本受制于美国，当权派则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两国关系极不正常，这是政治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地理和历史渊源的基础上突破政治障碍，使两国关系正常化，避免两国人民再度受害，便成为周恩来始终关切并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一个外交课题。

要打破中日恢复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周恩来说：“我们几次和日本朋友谈过，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对日开展民间外交的可行性表现在哪里呢？周恩来认为，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经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则处在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指美国）压迫。这就引起我们很大的同情。因为我们过去经受过许多困难，更能理解日本人民今天所面临的困难。这样，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有过两千年历史的友谊，并且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增进友谊。这种新的基础就是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平等互利，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他认为日本人民是不会容忍被占领、受支配的。

事实上日本早在 1949 年 8 月便成立日中贸易促进会，由 270 家日本贸易、制造、轮船、银行、保险、运输、工业团体等行业组成，它们瞄准中国市场。随之成立的是日中友好协会。

1950 年美国策划对日本单独媾和，后来又唆使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所谓“日华和约”，拒绝同我恢复正常关系。周恩来在严正表明我国立场的同时，也看到日本人民已广泛发动起来，反对美日反动派这种无视现实、一意孤行的做法。不少有识之士试图冲破阻力，主张同新中国进行实际上的交往，以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此时周恩来开展对日民间外交的构想开始变成现实。

日本有识之士第一批冲破阻力的代表人物是社会党议员帆足计和其他两个小党的议员高良富、宫腰喜助。他们绕道赴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之后于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28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68 页。

1952年5月应邀来到北京，一时被誉为“三勇士”。他们所以舍近求远(以后取道香港)，是因为日本政府在他们的护照上注明不准到所谓“共产圈”的新中国，回国后又可能以违反签证法被问罪。这次访问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一次开拓性的突破。他们三人受到特别的欢迎和重视，在北京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消息传到日本，得到日本人民的普遍支持。随后他们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筹备会，并到各地参观。三人于7月间回国时在东京羽田机场受到了凯旋式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推动下，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便有日本各界14名代表绕道欧洲前来参加，其中有1名代表驾一叶轻舟偷渡出港赶到北京。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中专有一页“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有关各国一致要求缔结全面、真正的对日和约”，“撤出在日本国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建设和平的日本，取消对外贸易和各种人为的对外限制”等。从此，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打开了，再想关闭已不可能了，封锁新中国的势力被迫后退。为了照顾这些日本人士回国后的处境，周恩来没有接见他们。然而他们的来访都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他们在中国活动，也都是在他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帆足计后来再一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便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会见。

这时周恩来因势利导，采取了三大措施：(1)遣返战后尚滞留中国的3万多名日本侨民；(2)宣布特赦日本战犯417人；(3)宣布对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的处理。这一下震撼了日本朝野，两国民间交流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采取重要的政策，是出于他不念旧恶、化敌为友的思想。他曾对一位中东的外宾说，人类仇恨宜解不宜结，这是中国的古话，但是同马列主义是相通的，我想宗教的教义也是共同的。

中国政府1952年12月在宣布将遣返自愿回国的3万多名日本人的声明中指出，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生活安定，为使他们愿意回国的人顺利成行，特请日本相应机关或人民团体派代表来华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具体协商。日本政府无法反对，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协和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组成代表团，于1953年1月正式访问日本政府尚不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以廖承志为顾问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进行谈判，顺利解决了日侨回国的问题。日方随后开始派船来接人。接侨船又把日本侵华战争时被抓去的中国劳工在日死难者的遗骨送回。这是日本佛教界和许多友好人士自愿组织的“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安排的。

后来，周恩来在同日本客人谈到这批被接回的日本人时说，虽然我们打了十五年仗，可是，一旦日本军队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中国人也把日本人当做朋友，并没有记仇。最大的，最生动的一件事，就发

《研究周恩来》第214—215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46页。

生在东北。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民相信他们。大多数的日本朋友工作很好，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他们完全是自愿来的，不是我们把他们当作俘虏对待的。去年大多数被送回国了，有两万六千多人。曾经打过仗的人，放下武器就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很多中国人受了伤，请日本医生动手术，由日本护士看护，很信任他们。在工厂中，中国人信任日本工程师，一同把机器转动起来。在科学院，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相信日本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所谓“同文同种”也好，“共荣共存”也好，不是为侵略别人，也不排斥别的国家，我们为的是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友好的种子。在战争结束后自愿留在被侵略的国家并同当地人民形成这样的友好关系，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有5000多名日本妇女同中国人结婚，生儿育女，有的日本孤儿由中国人抚育成人，都舍不得离开中国。他们有不少感人的故事，在中日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1954年8月，中国政府宣布特赦日本战犯417人。10月，周恩来接见以著名学者安倍能成(1883—1966)为首的日本文化学术代表团13人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左派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1893—1970)等31人。周恩来向他们阐明中国对日本的一贯政策，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不中。中国人民很能够分析区别这个问题。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人民是担心的，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如果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起来，来往密切起来，是可以阻止这个危险的。当然，主要还是要靠日本人民。日本人民经过灾难，认识提高了，要求和平独立的欲望一定会加强。相信日本人民是要求一个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的。周恩来在听了代表团一些成员的发言后，继续说，正如各位所指出的，日本目前正处在一个困难环境，日本在九年以前处于战败国地位，日本军国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日本人民承担了。正如安倍先生所说，到现在日本还处于半被占领的地位。对于日本人民这种困难境地，中国人民是非常同情的。日本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过去日本人民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对亚洲和世界的经济也是有贡献的。而今天处于一个被压迫的境地，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不仅同情日本人民的处境，而且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自己起来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

继特赦日本这一批战犯之后，中国政府又于1956年6月对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969名是苏联于1950年移交中国的)宣布了处理办法。对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8—89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87—88页。

17名罪行特别重大的战犯，按照他们所犯罪行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判处有期徒刑。对1017名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又实行宽大处理，免于起诉，第一批335名立即释放。就在他们被遣送回国那一天，周恩来接见日本一个专业代表团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送回日本的战犯，这是第一批，大概再有两批，即可送完。还有45名罪行严重的，我们也从轻判刑，并且决定，如果他们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对年老、患病或身体不好的还可以考虑假释。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说是从轻处理呢？因为我们对这批战犯没有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刑期最长只有20年。大家知道，战犯在东京，在纽伦堡的军事法庭上都有判死刑的。但是，我们考虑现在不需要这样做，可以从轻处理。而且我们还考虑可以邀请战犯家属来中国访问，看望自己的亲人。诸位晓得，四十多人对一千多人来说，比例是很小的。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一小部战犯判刑呢？这是因为对中国人民要有一个交代。周恩来接着表示：“我向诸位谈了这些情况，希望诸位回到日本后向日本国民解释，因为他们很快就要看到一千多犯人回去，这四十多判刑的犯人将来也是要回到日本的。中国政府也要向本国人民解释。我们结束这一案件，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再开始中日间全面的友好合作。”

这种做法既确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当事者的侵略罪行，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气度，高瞻远瞩，通情达理，赢得日本各界的普遍欢迎和赞扬，对增进中日人民的友情起了积极作用。

这三件事，特别是对战犯的处理，都是战后急迫的善后问题，通过民间渠道得到解决，对日本人民是很大的安慰，中国人民也感到尽了责任。从此中日民间渠道趋向畅通，日本各界人士接踵而至。

获释战犯成为“日中不再战”的先锋

在此前后，有一批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军人希望访问中国。周恩来获悉后，立即指示向随同前首相、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1887—1978)访华(1995年11月)的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发出邀请。翌年夏天，远藤冲破种种阻力率14名前高中级军官到达北京。这些人来华前虽有某种悔罪之情，但对我仍有较大的疑虑和偏见。由于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做工作，加上访问中亲眼目睹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亲身感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宏气度，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为促进日中友好而努力。其中有不少人后来一直活跃在日中友好运动的第一线，有的还成了坚定的骨干。

这45名判刑者的服刑期包括判决前在苏联关押5年和在中国关押6年计算在内，至1964年4月服刑期最长的3名也释放了。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9页。

《研究周恩来》第232页。

日本前军人被遣返后，坚持“日中不再战”立场，决心以余生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将功赎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前释放的原战犯，有不少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会长是藤田茂中将，从事友好活动。这一团体一直活跃在日中友好第一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组团到中国参观访问。不少日本朋友说，从中国释放回来的战俘绝大多数都热心从事日中友好，而在苏联西伯利亚被关押、受过劳役折磨的战俘回国后却很少有人参与“日苏亲善”活动。远藤访华归国后也发起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扩大到日本自卫队的退役军官，并由后者成立了“中国政经恳谈会”，为中日友好作贡献。还有一个旧军人团体的“旧友会”，每年也都组团来中国访问。

远藤三郎于1972年6月再次访问中国，会见了周恩来。这次会见成了诀别，使远藤不胜悲痛。缅怀20多年的知遇之恩，他深情地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已抱病，却同我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话题中心是有关日本的国防问题。周总理说，日本如果真正成了独立国家，拥有自卫力量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说，如果把这个自卫力量理解为军备，那就难以苟同，并以日本结构上的特点、战史实例以及宪法制度等为据。周总理开了句玩笑说：“远藤先生什么时候变得比我都左了？”

“中归联”会长藤田茂也在这一年11月再次访问北京，周恩来也同他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深谈。周恩来说，今天世界各国都保留着拿破仑战史。这部战史没有一处修改过，不好之处就说不好、好的地方就说好，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直到今天对各国军事家都具有重大影响。日本的战争结束快20年了，但是我在读了日本最近出版的各种有关战争的书籍、战史以及战记之后，发现都对战争大加美化了，以致使人怀疑这些著作的真实性。最近我也看了有关山本五十六的电影和其他有关侵华日军的电影，都是被美化了的。这样做很可能使那些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人向往战争，从而再一次发动战争。周恩来还从军事学的角度批评了曾经担任陆军大臣、总参谋长的日本战时最后一任首相东条英机重蹈拿破仑把战线拉得太长的覆辙，说他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是蹩足的。并指出，在日本，政治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军人也好，如果不研究东条侵略战争失败的历史，而且还要美化他，将来还要重蹈覆辙。周恩来还郑重地要求他回日本后一定要如实地写出一部反映大东亚战争真相的战史。他说：当时的一些参谋现在因为渐渐年迈而去世，你也上了年纪，不抓紧不行啊！

临别时，周恩来又诚恳地表示，不久前与田中首相刚刚发表了中日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但是，周恩来强调说，只有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从心里互相理解，最后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关系时，才能形成一种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一直友好下去的睦邻友好关系。这需要很长的岁月。他说：“藤田

先生年事已高，我也上了年纪。希望我们在今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再做一番努力，朝这个目标前进”。

藤田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使他终生难忘：这既是言简意赅的劝诫，也是令人低头深省的箴言；并决心要把这些话作为日中友好的一面镜子而向前迈进。可惜藤田不久便去世了，他没有写出一部周恩来所期许的大东亚战争史以警惕后人。

日本这三个旧军人组织部积极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到处举行演讲会、座谈会，并编辑出版书刊，控诉原日军的侵略罪行，颂扬中国人民革命的人道主义宽大政策，并从事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有的在斗争中病倒了，中日友好协会就把他接到中国疗养，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有一位曾参加三年侵华战争的原军人，1957年随团访问中国，会见了周恩来。他说这次会见“成为我精神上的巨大支柱。”“我决心把我的余生全部献给恢复日中邦交和促进日中友好事业。不再重蹈覆辙，成了战败后我赖以生活的依据”。

“中归联”总结回国30多年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就是坚持了“反战、和平与日中友好”的旗帜。周恩来逝世后，他们仍继续高举这面旗帜，从事积极的活动。他们在中国已开放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建造了一座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他们还邀请原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的8名管理人员于1984年访问日本，有600名还能走动的成员参加了热情的欢迎会。他们从孙明齐所长的回忆中第一次听说，周恩来最初下达给管理所的指示是“不跑不死”四个字。“不跑”是指在管理上不能使在押战犯感到委屈而萌发逃跑的思想并造成事实；“不死”是指不能让犯人因饮食或其他原因致病死亡。周恩来说：虽然他们是战犯，但也是人，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此外，也不要忘记他们的民族生活习惯，不要忘记日本人一日三餐都吃大米饭的习惯……当时的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齐后来说，当时解放军一天只吃两顿高粱米饭；你们想吃活鱼，想喝酱汤，都要到沈阳去买。人家一听说是买给日本战犯吃的，就不卖；说是卖给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伤员。还好理解，给日本战犯吃就难以理解了……这使他们更深地体会到周恩来的同情心与宽恕的胸怀之伟大。

从民间交往到半官方关系

从1952年日本“三勇士”访华，到1964年两国互设廖承志—高 达之助备忘录贸易代表处(廖高代表处)，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进行了12年才走到

《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第235页、并参阅《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55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244、240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241页。

建立半官方关系的中间站，而由这个中间站走到 1972 年两国恢复邦交，又花费了 8 年的岁月，可见受制于美国的日本外交，其步履何等艰难了。

尽管在对华关系上，日本政府不得不仰承美国鼻息，但当权者的思想和对华态度，则因人而异。战后至 1972 年日本有三届内阁对华关系比较开明，他们是鸠山一郎(1883—1959)、石桥湛三(1884—1973)和池田勇人(1899—1965)。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和互设贸易代表处、互换记者的协议都是在他们当政期间签订的。有三届内阁推行敌对政策，他们是吉田茂(1878—1967)、岸信介(1896—1987)和佐藤荣作(1901—1975)。吉田阻挠中日民间贸易；岸内阁破坏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制造敌对事件，使一度上涨的日中友好高潮严重倒退；佐藤则力图抗拒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鸠山等三人反映了日本人民要求对华友好的主流，岸信介等三人则成为反华逆流的代表。

高 到万隆秘晤周恩来

鸠山内阁开始了同中国官方的秘密接触，其代表人物是高 达之助(1885—1964)。据 1989 年日本外务省公开的外交档案，日本政府认为 1955 年派代表参加亚非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高 与周恩来总理先后进行了两次对话。通过对话，使日中贸易“在两国关系险恶的气氛下走上了正常轨道”。又说，两人的“接触”(指开幕式前两人的寒暄)是历史性的一瞬间，却开辟了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但是日本把这次接触说成是“偶然邂逅”，担心此事惹怒了美国。高 自己也很敏感，他特别嘱咐外务省顾问向美国驻印尼大使作了“内部说明”，以消除记者的渲染。——从这个档案中可以看出四点：(1)日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同新中国开始接触和对话，试探中国的反应，力求摆脱在亚非国家中的孤立。(2)中日民间交往和随后开展的民间贸易，是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3)日本政府早已看到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由于害怕得罪美国，使这个过程拖长了。(4)挑选高 为代表，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高 达之助，何许人也？他是日本政界、财界的著名人物，当年“满洲重工”总裁，日本人经营的“鞍钢”老板。日本投降后，他不但没有走，还说服一些日本专家留下来帮助中国建设。后来内战扩大了，才不得不撤离。自从万隆会议后，他便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是周恩来所说的真正接近中国的几位日本友人之一。他回国后进入政界，在鸠山内阁中任国务大臣兼经济企画厅长官。鸠山想了解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高 作为日本代表团团长出席亚非会议，自非偶然。据当年为高 担任翻译、后来担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和驻瑞士大使的冈田晃回忆，周恩来与高 的会谈是在非常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前后两次谈了很长时间。他认为周恩来为了不使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23、24 页。

《研究周恩来》第 236 页。

高 紧张和为难，从早年留学日本谈起，谈到中日两国应该统一简化汉字，为子孙后代留下共同的文化遗产，说这不关美国的事，美国不会置喙吧！随后转入正题时，高 表示因日美间有安全条约，日中邦交的恢复不那么容易。周恩来却说，可以在维持日美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日中的友好关系。冈田说：“周总理在日本国内左翼势力强烈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情况下讲这样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冈田还注意到当他将高 所说的“因为日本还被美国占领，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的问题上，未必能满足贵国的愿望”，误译为“被美国领导”，在座的廖承志纠正时，周恩来马上说：“我明白了，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将对政府产生影响，日本一定会从半被占领的状态下摆脱出来”。周恩来有意避开敏感的“被美国占领”的说法而改为“半被占领”，从这种巧妙的用词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照顾日本情绪的良苦用心，也表明了他准确的判断力，他清楚地看到了日本的未来。亚非会议结束后，高 原原本本地将会谈情况分别向外相重光葵和昭和天皇汇报。

日本推动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运动的力量，主要由三方面组成：以社会党为先驱、以公明党殿后的在野政党；以执政党卸任首相和政要为中心的国会议员；各行各业各阶层友好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这三种力量客观上进行了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行动。运动虽受日本政局的影响而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这三种力量背景各异，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接受周恩来针对岸信介的反华措施提出的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1)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2)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同时提出贸易三原则：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周恩来向石桥湛三提出以“积累、渐进”的方式完成邦交正常化的进程，__和针对日方提出“政治和经济分开”处理的意见，强调“政治经济不分开”，__也都获得日方的赞同。——这是周恩来耐心，反复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地将心比心对日本各界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结果。他们不但心悦诚服地接受周恩来的这些合理的建议，有的甚至提出超过这些建议的主张。

日本社会党站在日中复交第一线

日本社会党始终站在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第一线。日本资产阶级各政党结合为统一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之前，日本社会党一度在大选中获胜组阁，由片山哲委员长出任首相，只因为时短暂，未及对日中关系发挥影响。但片山多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不遗余力。他所倡议和组织的日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26—27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89、341、416 页。

中文化交流协会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了解，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该党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左右派分立时期，历届领导人和国会议员，都不分轩輊地为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而奔走呼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日友好“掘井人”。社会党 1957 年的运动方针，规定该党不承认“两个中国”，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反对岸信介的倒行逆施，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1898—1960)挺身而出，知难而进，于 1959 年 3 月率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来到北京，同外交学会发表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联合声明。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亲切会谈。他在中国政协礼堂作了《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敌人》的著名演说，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引起日本右翼势力一片惊慌。1960 年 10 月，浅沼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倒在日本极右暴徒的刺刀之下，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献出了生命。1964 年和 1970 年，浅沼夫人应邀两次访华，邓颖超陪同周恩来设宴款待。在他遇刺 10 周年纪念日，北京人民在他发表演说的政协礼堂举行隆重集会，再次缅怀这位献身于日中友好事业的先驱。

日本政要中的有识之士则形成一个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的事实上的网络。1959 年 6 月，日本人民开展了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和反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的斗争，10 万人包围国会。被毛泽东誉为民族英雄的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死于这次活动中。我国 33 个城市约 1200 万人先后集会游行，声援日本人民。艾森豪威尔被迫中止访日。内外碰壁，四面楚歌的岸信介内阁终于倒台了。7 月初，池田勇人内阁成立了，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新的转机。池田亲口对自民党顾问、众议员松村谦三(1883—1971)说：“我的立场是必须把面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了！”“一面东朝美国，一面西向中国”遂成为日本迄今对外政策的基石。

松村谦三和廖承志原是早稻田大学先后同学，有校友之谊。他在青年时期就对中国有所了解，学年旅行及充当新闻记者期间，都曾到中国各地访问。他于 1928 年进入政界，当选为众议员。战后历任农林相、文部相等内阁职务。在农林相任期内实现了日本粮食自给自足，周恩来给予很高评价。政治上，他主张亚洲应是亚洲人的亚洲，日中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不赞成依附和追随别国的政策。他多次谢绝蒋介石访台的邀请。他在日本政界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主张对华亲善者关系尤为密切。他与高 达之助分工，他侧重政治，高 侧重经济，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前进。

池田左右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松村、高 自不待言，内阁重要阁僚大平正芳、河野一郎等人都是松村为改善和发展日中关系而四处奔走的积极支持者。松村的心腹古井喜实(任池田内阁厚生大臣)同当时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以及池田内阁官房长官黑金泰美关系都很密切，在还不便公开活动之时他

们都在幕后出了力。还有，为中日备忘录贸易而费尽心力的田川诚一是河野的外甥，正是河野把他介绍到松村门下，学习如何作一个政治家，后来当选为众议员进入国会。长期以来，古井与田川在政治方面，冈崎嘉平太(1897—1989)在经济方面为创建和维护备忘录贸易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宝贵贡献。池田上台不久，冈崎就去登门求见，并提出日中之间进行长期贸易的设想，其主要内容与后来中日双方就建立备忘录贸易达成的原则协议是基本一致的。

推动这一进程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因病卸任的前首相石桥湛三。石桥担任过鸠山内阁的通产相，支持第三次民间贸易谈判，1956年12月受命组阁。他对中国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抱负，对于改善日中关系有关事宜，与松村等志同道合的人士早有商量。不久因病辞职，为岸信介所取代。尽管他病后留下后遗症，仍抱病于1959年9月访问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对石桥为打开中日关系而访华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少数真正接近中国的日本知名人士之一。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多次坦诚会谈，达成一致意见，确认要在万隆会议的精神和政经不分的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商定，协议不署名，不签字，不叫做共同声明，所以当时便称为“共同发表”。——

松村谦三一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9年10月访问北京，走上了他立志打开日中关系的历程。周恩来多次与他会谈并单独会见，促膝谈心。根据双方会谈达成的谅解，松村第一次访华有意不公开发表文字东西。但双方交谈范围之广，互相理解之深却远远超过一般公布的文字。尤其是在“寒潮袭击”之际，对于推动日中关系的解冻，作用尤为突出。松村酷爱兰花，与中国以养兰爱兰著称的朱老总结为“兰友”。松村又好围棋，与陈老总对奕，结为“棋友”。此后他又四次访华。

松村、高 对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态度是十分积极和热情的，提出了几个“腹案”。松村提出由他访华先同中方达成一个谅解，搞一个君子协定，然后再请高 偕产业界人士去中国商谈具体贸易，即由松村在政治上开一条路，然后高 执行。松村还特别谈到以“积累方式”，从贸易入手逐步打开日中关系的设想。当时得到的印象是中日双方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经过不断的积累是可以“水到渠成”的。

中日半官方关系的建立 1960年10月，高 达之助终于实现了重访中国的愿望。高 来访前，四处奔走，先后会见了松村谦三、池田首相和吉田茂，

《中日友好随想录》第 57、50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340—348 页。

《研究周恩来》第 236 页。

《中日友好随想录》第 59 页。

为这次的访问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时隔5年，故友重逢，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先后会见四次，会谈两次。第一次会谈长达四个多小时，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两国政治形势以及对中日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集中地交换了意见。高 提出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建议，周恩来表示原则同意。此后，高 又五次访问中国，其中1962年12月双方签订了廖—高备忘录协议，同意互设办事处，使两国关系进入半官方状态。周恩来后来说，高 先生也好，后来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民主党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能说他们同我没有关系吗？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周恩来在宴会上讲话时说，中日贸易发展的前途非常广阔，两国互通有无的需要是很多的。周恩来在出席高的告别宴会时表示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把这个中日贸易的列车开好。

1963年，经高 斡旋，重新签订中断了5年的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如所周知，海上作业牵涉两国领海的主权问题，这个协定本身就带有许多非民间性质。又由于日方履行备忘录贸易协议，日本仓敷公司以“卖方信贷”的方式向中国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要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贷款，需日本政府同意。这一项目的成交，中日经济关系有了新的飞跃，整个气氛也好了起来。这年10月，以廖承志为会长、郭沫若为名誉会长的中日友好协会宣告成立，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代表团和在京的日本友人500多人出席参加。《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日友好的里程碑》的社论，说明两国关系在向新的目标前进。

1964年中日双方就互派备忘录贸易代表，并设立办事处以及互派记者问题签署了会谈纪要。为纪念刚刚去世的高 达之助，双方互设的办事处便称为“高 一廖承志办事处”。日方办事处包括通产省和输出入银行官员，我方办事处包括外交部和外贸部官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半官方机构。从此，中日贸易便在“民间友好”和“备忘录”两条轨道上运行。

推动中日发展关系的日本第三方面的力量主要代表经济界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他们组织各种形式的民间团体，接连不断地一再访问中国，产生了突出的影响。

1970年春，松村谦三五访北京。他自知年迈，请出前首相藤山爱一郎作为他的接班人。藤山1955年在万隆会议中见过周恩来，当时他是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会头，在日本政财两界都有相当影响。松村这次带他来北京，向周恩来作了介绍。周恩来对藤山印象很好。后来藤山另有考虑，不久出任“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这一地位对推动下一段日中友好事业更便于发挥作用。冈崎嘉平太继高 ，古井喜实继冈崎，接了松村的接力棒。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50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19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40页。

《研究周恩来》第220页。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深得人心

据《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不完全记载，周恩来自 1953 年至 1975 年 22 年中会见来自日本的客人共计 298 次，接见日本各界访华团体 200 个次。每次会见平均以 10 人计(有一次多达 260 人)，共达 3000 人次。会见外宾的次数虽略少于当年的“老大哥”苏联，人数则大大超过。据说我五周年国庆期间，在北京的日本众参两院议员超过了在国内议员总数，比国会内任何一个委员会的议员人数还要多。如此众多的日本政界人士和日本朋友云集北京，反映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吸引力，也反映了中日友好成为人心所向的伟大事业。这种盛况是当时各国在北京的代表无法比拟的。周恩来对来访的日本朋友，不分职务高低，不论身分贵贱，上至政府首脑、党派领袖、国会议员、专家学者、文人墨客、名优雅士，下至一般青年、工人、农民、渔夫，总是挤出时间，一视同仁，热情接待。有时深夜持续交谈 6 小时以上，有时则陪同到北京郊区作竟日游。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的知事，几乎都到中国访问过。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正是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民间外交深入人心，深得人心。他的言谈，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一直为会见过他的日本朋友所珍视，所崇敬，所怀念。

据日本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说，像周恩来那样，身为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却尽力会见众多的日本人，如果需要，彻夜长谈也在所不辞。像他那样同日本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地进行对话的领导人，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这样说，在世界范围的国际友好运动中，日中友好运动无论范围之广，或者根基之深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一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友好运动，是以周总理为中心自然形成，并发展为体系的。

曾任备忘录日本办事处代表的安田佳三回忆说，他所尊敬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伟人不胜枚举，如果让他只举出其中一位最令人心醉(由尊敬而达到倾倒)的人来，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就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继高负责备忘录贸易的冈崎嘉平太曾七次访华，对周恩来有很深的感情。他比周恩来年长一岁，但总是执弟子礼，自称是周恩来的学生，常常称赞周恩来高风亮节。冈崎一谈到周恩来，最后总是闪烁着泪花讲起周恩来早年在军用飞机处于迫降的危险状态时，脱下身上的救生衣给同机因惊慌而啼哭的老战友叶挺 11 岁的女儿叶眉紧紧穿上的往事。他说他多次扪心自问遇此情况能否像周恩来那样舍己救人，“却未能作出肯定的回答”。冈崎认为“周恩来总理对我来说是人生之师。他大概是我奉之为师的最后一个人”。冈崎悼念周恩来的

《中日友好随想录》第 22 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145、126 页。

《研究周恩来》第 224 页。

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一生最伟大的恩师周恩来总理》。

冈崎、三木与周恩来

大概是为了纪念周恩来，东京一些有志之士常聚在一家中国餐馆，倾听冈崎谈日中关系和对中国的看法。他们自称这是“冈崎先生围听会”。据一位日本记者回忆，从1976年9月延续至1983年12月，长达7年之久。讲话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关于周恩来的“逸话”。冈崎所以毕生致力于日中关系的工作，就是因为他在青年时代结识中国学友，以后又结识周恩来，受到很大影响。表明他们两人亲密关系的情景，是1972年9月29日签署日中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那天晚上在上海举行的宴会。宴会达到高潮时，开始干杯。周恩来径直走到冈崎桌边，赞扬他多年为日中友好关系而操劳，为实现这次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贡献，并提议同桌的人共同干杯。冈崎激动得涨红着脸回应。这种情景令人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自然就想到这正是有着共同目标、超越国界的朋友之间十分相称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国际间也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冈崎谢世入殓时，家属将他生前一直放在身边镶有周恩来相片的镜框放进棺中紧贴在他身上。

1972年佐藤内阁即将下台，日本自民党中争任下届首相的各派实力人物都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纷纷表态。自民党五大派系之一的三木派首脑三木武夫4月来华访问，周恩来两次与之长谈。三木反复强调，如他组阁，他将承认我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蒋条约“无效”，复交后愿缔结永不再战宣言等。第二次会谈结束时，三木又复述他回国后对新闻界谈话的口径。周恩来听后可表示，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把你完全说成亲华派也不好；当然你是愿意友好的，但是给你的帽子太大了也不行。话说得多了一点，这样人家都来找你了。要说得比较含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都有好处，还要使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对我们放心。所以你不要太突出。这都是为了促使你成功，而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大多数人的问题。

听了周恩来的话，三木深受感动。他说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他，考虑得这样周到，是没有预料到的，一再表示衷心的感谢。临行时，周恩来送至门外，汽车将要开动，三木弯腰站在车里向周恩来深深鞠躬致意。在车中三木对我陪同人员说，他从政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周总理这样处处为他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58、139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136—137、141页。

《研究周恩来》第236—237页。

着想的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了。已担任首相的三木听到广播立即到我驻日使馆吊唁，并恳请来华参加葬礼。因我国一概不邀请外宾参加国家领导人葬礼而未能成行。当时日本民间各友好团体联合举行悼念周恩来群众集会。按日本政界习惯，在职首相不参加民间群众集会。然而三木不但亲临上述追悼会致哀，而且坚持到大会结束。足见他对周恩来的哀悼超出一般外交礼节，乃是发自内心的怀念。

1975年1月，众院议员、自民党元老、吉田茂内阁成员保利茂访问中国。此时三木内阁正就缔结中日和约进行接触谈判。周恩来特意在医院里会见保利。宾主进行了气氛融洽、话题广泛深入的会谈。周恩来这次谈话之有理有据，胸怀风度之豁达，给保利的印象极力深刻。特别是对日本外交的理解和分析，谈到从日本的现实来说，外交的顺序自然是“日美第一，日中第二”，使保利更加感动和佩服。

对事不对人，周恩来赢得人心保利茂曾在佐藤内阁担任官房长官。1971年10月在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访华时，保利托他带一封信给周恩来。保利在信中作为“个人理解和认识”提出：承认中国是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想以此得到中国的赞同，打开日中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这封“保利书简”当即被周恩来驳回，在日本引起很大震动。周恩来在会见美浓部一行时指出，“这封信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唯一’二字，并且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因而这封信是骗人的”。看来，这封信即便是反映了佐藤内阁迫于形势想在中日关系上作点前进的表示，但在骨子里根本不想放弃“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想法。保利这次到京，对这件事有些不好意思。周恩来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问题，认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所以见到保利一开始就说：“有一件事对不住你，当时因为佐藤首相对台湾持有另外的想法，所以我把你的信退回去了”。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保利的心。因此“保利书简”并未影响他同中国方面的友情。保利回国后对日中问题更为积极热心，后来他又出任众议院议长，在发展日中关系方面，虽然比其他老朋友“启动”稍晚，但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日本公明党委员长、因最后致力日中恢复邦交而有“日本的基辛格”之称的竹入义胜两次访华后认为，是周恩来亲自启动日中关系发展的历史车轮。他回国后被暴徒刺伤，周恩来特致电慰问。

松村的接班人、备忘录贸易驻华办事处首席代表、日中友好会馆会长、众议院议员古井喜实曾12次访问中国，同周恩来有密切交往。除了两国关系

《研究周恩来》第237页。

《中日友好随想录》第122—123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110、113页。

为主要话题，周恩来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对他有过不少关怀。为了他的健康，周恩来亲自推荐太极拳师教他太极拳。他说周恩来“待人亲切和蔼、关怀备至的高尚品德真是感人肺腑”。——

日本方面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日中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又在国际社会上具有影响，对立状态不仅严重威胁本国安全，而且成为维护亚洲和平的重大障碍，同时在经济上也十分不利。因此战后日本各阶层谋求与中国友好的运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除了在特殊情况下，从未进行过任何努力。正如为打开日中关系长期进行不懈努力的古井所说的：“回顾日中关系的发展便可以了解，始终由中国主导。很遗憾，日本外交是无法与之较量的”。

曾任社会党委员长的佐佐木更三回忆说，我们在野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进行活动呢？那始终是为了建立周恩来所说的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谊。周恩来有时恳谈两小时、三小时，直至深夜。他不但在自己国家的人民面前，而且在隔海国家的人民面前，都是以身作则，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日本的许多人也为这种诚挚的态度所感动，受到鼓舞。因此涌现出许多即使面对任何困难也坚持日中友好运动的人。

日本三菱金曜会会长田实涉同中国交往 10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他和三菱企业集团两位元老访华为“田中和大平访华铺平道路”。周恩来 1972 年 8 月 23 日晚 10 时 50 分会见田实等人，谈到 24 日凌晨 1 时 30 分。第二年 11 月田实再次访问中国，又一次同周恩来进行了亲切的会谈。田实酷爱富士山，他将周恩来的品德比作富士山，曾写了一首歌颂周恩来的诗。诗文大意说：周总理端丽的容姿有如富士之伟容，他头上顶着理想之星；望着周恩来那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宽阔前额，便联想起白雪皑皑的富士之峰；富士山下蕴藏的地热宛似周总理胸怀的炽热思想和激情。——

1972 年 9 月，周恩来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讲话中着重讲到“饮水不忘掘井人”的道理，而且明确指出，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早在 50 年代，周恩来就讲过，照国民外交的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长、总理签字和喝香槟酒了。这是周恩来对民间外交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建交以后，周恩来又讲过，民间外交继续发展了，可以使政府间外交基础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力有利的方便条件。因此建交后民间往来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强了，继续发挥着它特有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中日建交后，民间交往面更广、更宽，工作更深更细，成绩也很突出，遍地开花结果，充分显示出复交后中日友好的新局面。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301 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 120、124 页。

《中日友好随想录》第 107 页。

1972年10月23日中日友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等单位联合邀请日本各界朋友来京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进一步推动民间友好的盛大集会，加上在京访问的代表团共有500多位日本朋友出席。周恩来亲临参加。大会结束时，他离开宴会厅前特意把桌上的两束菊花与樱花(日本国花)并列送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的两位日本女士，并说：“你们是有功之臣，愿继续努力，让中日友好之花永开不谢！”在场的人目睹这情景，莫不为之鼓舞和感动。作为“民间大使”住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高兴地点燃了久已戒掉的一支香烟，实现了他中日不建交绝不吸烟的誓言。

建交10年后的1983年，中日贸易额突破百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10倍，约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以后，日本一直是我国的第一贸易伙伴。两国人员往来与日俱增。1982年日本访华人数近20万人次，为10年前的30倍，居访华外宾之首。我访日人数也力建交前的15倍。事实证明，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因邦交正常化而更加活跃。

对日关系不能掉以轻心

本文在介绍周恩来对日工作的思想中，有两点需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其一是，周恩来根据他对日本的了解，一直担心日本军国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另一是日本统治集团对台湾的意图。

1961年2月周恩来在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山本熊一(1889—1963)率领的经济友好访华团谈话时，比较突出地提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并指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引起五大矛盾，都将构成对日本国民、日本经济和对华、对东南亚、乃至对美国的危害，不能掉以轻心。1963年10月周恩来在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的谈话中则突出台湾问题，剖析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大部分带有过去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感情，这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这种感情对中日两国的关系也是有害的。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会见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等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访华代表团的谈话中，则着重批驳了世界上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奇谈怪论，并严肃指出，日本必须承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要警惕日、台关系的走向。

所以1964年中法建交后，有的同志认为法国、日本同属第二中间地带，日本的力量和日美矛盾都有一定发展，下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将是日本。周恩来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认为，还不能说中法建交后下一步就是日本。意大利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他指出，最近有一份报告提出要日本抛弃美国，抛弃台湾。他说这不仅短期内做不到，长期也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作长期的斗争。现在日本靠美国的倾向还未根本改变，只是扭过去一些。对日本不是要它反美，而是同美国闹独立性。日本自民党虽有许多派系，

但在台湾问题上都是一致地含糊其词，大多有野心，真正接近我们的目前尚为数不多。法国也讲过“台湾归属未定”，那只是说给美国听，他们对台湾没有野心。日本则不同，吉田茂、岸信介之流就是想把台湾分出去。在海峡可岸统一之前，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周恩来讲这番话不久，日本首相在国会答辩时、果然宣称法国虽然同中国建交，但因为同西德的关系，并不承认东德，日本因为同台湾的关系，也不能与中共政权建交。这是当时日本当局敌视中国政策的自我暴露，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周恩来的科学论断。__法国之后，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果然不是日本，而是加拿大、意大利。

周恩来同日本统治集团打交道的体验，对日本某些当权人物的性格、作风等特点，曾借用一句成语加以概括：“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有如一幅高明的图画，寥寥几笔勾画得惟妙惟肖。

周恩来始终认为，日本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处于被美国“半占领”的状态，日本人民要求摆脱受制于人的决心是阻挡不了的。他也预见日本政界的右派将助长社会上右翼势力更加猖獗。这种状况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消逝的。周恩来的先见之明，不仅对我国，对日本也是值得深思的。

第十五章 高超的谈判谋略

谈判在外交中的定位

有人说外交就是谈判，这显然不全面。若说外交成果往往通过谈判体现出来，那就接近于事实。“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左传·昭公三年》），国家之间有了对双方都关系重大的问题，便举行会晤；为了解决争端，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缔结盟约。这已相当准确地说明了谈判在外交中的地位。

就某种意义上说，谈判频率高低是国际形势张弛、国家关系密疏、协调程度高低的显示器。例如我国春秋 242 年间、朝、聘、盟、会共计 450 次。朝与聘是一种加强友好的外交活动，会与盟则属双边或多边的外交谈判。《春秋》记会 165 例，记盟 105 起，合计 270 次，占外交活动总数的 60%；缔约总数 124 起，平均两年缔结一项国际盟约，其频率不可谓不高。朝与聘可以在道义上起协调国家关系的作用，会与盟则可以在法理上对国际行为起制约作用。当年活跃在春秋国际舞台上的不过十几个国家，他们进行朝聘会盟的频繁外事活动，其主旨是维持国际均势，稳定华夏秩序，与战国时期消灭地方割据、谋求全国统一的性质殊异。

再以清代的 249 年间为例，被迫同列强签订各种名目的不平等条约 712 起，反映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和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屈辱状况。缔约国 20 个，比春秋只多几国，但其性质已大不同于春秋，其数量亦已大大超过当年。即以民国短短的 38 年而论，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亦达 882 起，而缔约国的数目已增至 40 个，出现了一些国际组织，扩大了多边谈判，反映了列强要求在中国“利益均沾”的激烈角逐。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地位结束了，出现了与世界各国平等、友好、合作的新局面。计自 1949 年 10 月至 1980 年 12 月的短短 30 年间同 124 个国家签订维护国家主权，发展友好合作，增加经济联系、解决边界问题等重要方面的条约、协定、宣言、合同、公报等文件共达 1160 件。

若将当代世界各国之间所签订的类似文件加以统计，则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就充分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际形势向纵深发展，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需要协商和处理的事务日趋繁多，外交谈判也就更加频繁了，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即此一端就足以证明，没有谈判，便没有外交，外交与谈判始终相伴随。

从国共谈判到国际谈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1 编第 177 页。

清代以来的缔约数，据《中外条约协定索引》统计。

周恩来的一生，可谓谈判的一生。建国前，他同国民党的谈判，是为了通过统一战线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建国后，他同世界各国进行谈判，是为了国家能独立自主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平。独立自主始终贯穿在他的国内、国际的谈判中。

周恩来从 1923 年在巴黎开始就国共合作问题同孙中山的代表进行谈判以来，一直同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周旋，直到 1946 年全面内战为止，历时整整 23 年。

周恩来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取得多大成果，产生多大影响，只要引用国民党一位高级官员的话就够了。这位官员说：“让周恩来坐在谈判桌旁，就是让共产党赢得大陆。”另一种说法是：“假如内战期间，我们这边有个周恩来，情况会大不相同。也许是毛泽东被赶到台湾去，而我们却在北京呢！”

在周恩来的谈判生涯中，达成协议的成功事例，是很突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力量，为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开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奠定了基础。二是建国后同苏联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为新中国的巩固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日内瓦关于印支问题的谈判，为结束印支战争，争取越、老、柬的独立得到国际承认。四是万隆会议的成功，推动亚非独立解放斗争走向高潮。五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形成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周恩来、张群和美国代表马歇尔（1880—1959）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为阻止内战而进行的谈判，是“死马当活马医”（《搜神记》），谈判失败，在意料中。然而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个阶段一共进行 68 次会谈，是新中国建立前我党与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接触，也是我党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我与美谈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我接受美调解实际上就牵制了美国的手脚，剥掉了美国立即援蒋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借口，推迟了战争。即使到了后期，美国采取援蒋内战的政策，但它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最重要的是，我通过与美谈判获得了国际斗争的宝贵经验。我通过谈判，证实了美国没有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力量，认识到中国的命运是任何人都不能左右的。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独立自主地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马歇尔，这位美国老谋深算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曾向中国民主同盟的领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 246 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 277 页。

《周恩来研究》第 272 页。

领导人感慨地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他在正式场合提到周恩来时“是带有友情和敬意的”。周恩来被迫撤离南京时，马歇尔前来道别。他带着一种真诚的表情对我工作人员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离开重庆赴南京前夕，在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上，深有感触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于重庆、延安之间。谈判消耗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事实上这只是他谈判生涯的开始，此后他的谈判生涯又延续了三个十年，而且由代表共产党的谈判发展到代表国家，登上国际舞台的谈判，而他的谈判对手则比当年的国民党强大、复杂、狡猾得多。然而他不是谈老了，而是老当益壮，焕发谈判青春。他的谈判谋略，他的谈判艺术在进一步锤炼中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

本文仅就日内瓦和万隆两次国际会议的多边谈判，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双边谈判中周恩来的谈判谋略作一“扫描”，其他各种谈判都已在有关篇章分别论述过了，不再重复。

日内瓦会议：登上世界外交舞台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两个交替进行的国际会议：讨论朝鲜停战后的政治解决问题和印度支那的停战问题。前者是从沙场上的战略战术的争衡中转移到谈判桌上的智力谋略的较量，后者则从摆脱厮杀中谋求印支的长治久安。两次会议的斗争对象主要是美国。美国在战场上吃了亏，在谈判桌上也占不了便宜。这说明，美国斗力不足，斗智技穷。智力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谋略的高低。

周恩来由国内的国共双边谈判登上以中苏美英法五国为主的国际舞台进行多边谈判，是从日内瓦会议开始的。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了解周恩来是由重庆到朝鲜、再到日内瓦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深化和扩大的。他们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当代难与匹敌的世界外交家。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大型的国际会议上亮相，也是周恩来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一显身手。朝鲜问题的会议有中苏英美法等17国和朝鲜双方的代表参加；出席印支问题讨论的有中苏英法美和越南双方与老、柬等国的代表。中

《周恩来传》第625页。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30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8页。

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文萃》第31期，1946年。

国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运作，可以说完全是按周恩来的设想进行的，被称为“中国实现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大突破”。

周恩来在出发前分析了形势，他指出，美英法在朝鲜特别是在印支问题上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它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方针：应积极参加，尽一切努力，务期达到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哪怕是临时性或个别性的协议，力求不使日内瓦会议无结果而散，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应该通过这次会议，争取打开我国的外交局面，使更多的国家了解新中国。

尽管中苏和朝鲜代表提出几个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方案，尽了最大努力，由于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军，根本不想通过政治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朝鲜问题的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这是周恩来国际谈判中仅有的两次未能取得协议的一次(另一次是与尼赫鲁进行的边界谈判)。然而周恩来谋求解决问题的诚意，致力于世界和平的良苦用心，内刚外柔的外交艺术，周旋于各国代表之间的分化与争取并用的统战手腕，使顽固不化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陷于孤立，使他的副手史密斯无所适从。

美国代表狼狈不堪

据说，杜勒斯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勉强同意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时，曾措辞挖苦地问道：“这个传说中的周恩来是何许人也？”三个月后，杜勒斯自己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眼看这个“传说中的周恩来”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几乎像爆发一样突然地把革命的中国推向世界外交的前沿。

据我国代表团老资格的俄文翻译师哲的现场观察，1954年6月15日，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大会出现了戏剧性场面。讨论南日外相新提出的六点建议；周恩来表示支持；莫洛托夫提议与会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体会后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建议。周恩来再次发言，深感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他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下列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

《研究周恩来》第253页。

柴成文：《三大突破》第163页。

柴成文：《三大突破》第131页。

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肯定这个建议和 16 国宣言（美方炮制）的精神不矛盾，并表示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立即抓注这个裂缝第三次发言说：“如果 16 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16 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 19 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次会议竟连这一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又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一张字条给斯巴克。

这时，主持会议的两主席之一艾登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

史密斯气急败坏，狼狈不堪，他乘艾登尚未扣锤定案，仓皇站起来说：“在请示我国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以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肯定。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鸦雀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恩来的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的好战立场揭露无遗。这场舌战真是妙不可言。后来，史密斯私下向我们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

就是这位史密斯，很想同周恩来接触，也因为他有别于死硬派杜勒斯，有一次会间休息在咖啡厅小憩时，周恩来向他走去，主动伸出右手。他狐狸般机灵，猛然想起杜勒斯不准同中国代表握手的禁令，右手连忙端起一杯咖啡，无可奈何地用左手碰碰周恩来的胳膊，表示接受了周恩来的好意，并略

《新华月报》1954 年第 7 期第 73、74 页。

《新华月报》1954 年第 7 期第 74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552—553 页。

事寒暄。这个小插曲遂传为外交佳话。

西方几家主要通讯社报道有经验的外交家和外交观察家的评论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地位一直在提高，完全担当得起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特别作用的角色；由于周恩来的出席，国际会议久已失去的尊严和礼节又恢复了；他在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上第一次发表了“亚洲人的亚洲”的演说，使莫洛托夫的发言相形见绌；他的发言无懈可击；他成为日内瓦会议最令人瞩目的主角，使会议重新活跃起来；他的个人品格与他的和解气度给日内瓦这个国际会议之都以深刻的印象；印支问题受人欢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周恩来赢得一次无价的胜利，无论西方喜欢不喜欢，现在是世界五巨头之一，共产党中国是大国之一，在千百万亚洲人的心目中，将唯周恩来马首是瞻。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当年印支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停止战争，恢复和平，在越南划界而治；一个是确认越老柬为三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谈判对手也不止是一个法国，还有支持法国的美英两国。所不同的是中苏越密切配合，步调一致，而法美英则各有打算，时露破绽。

周恩来在讨论印支问题的活动中立足于争取上述两个问题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他的活动包括互相关联的几个方面：与蓄意破坏会议的美国进行坚决的斗争；对有一定和平愿望但又态度动摇的法、英既斗争又联合；对有中立倾向的老挝和柬埔寨两个由右派掌权的王国采取和解和争取的政策；与友方越、苏密切合作，保持一致但又不消极等待。他根据形势发展，把握时机，先后提出两个重要建议，使会议转危为安。他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所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所坚持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不输出革命相结合的原则，所提倡的和平共处思想，构成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外交的主要特色。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要掌握好两个互有联系的关键：越南内部的统一意见，从分化法英美的工作中争取法国。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并未根本改变越南敌强我弱的局面，而越南代表范文同却滋长着过高估计自己的倾向。在谈判的全过程中，周恩来始终清醒地估计到美国干涉造成战争国际化的可能性及其严重后果，因此当出现僵局时，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妥善考虑适当让步，极力避免谈判破裂。他说服范文同制定一个适中的方案，终于达成会议开始以来第一个实质性协议，决定先解决越南问题，促使法越双方军事代表直接谈判。

当时西方还盛传周恩来想同杜勒斯握手而被拒绝的谎言。其实会议期间两人从未相遇。

《五洲的怀念》中《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一文。

《研究周恩来》第 254 页。

在讨论老、柬问题时，又由于范文同坚持否认越军进入老、柬抗战的事实而陷入僵局。随后则由于法国拉尼埃内阁倒台而美国又迫使其仆从国中断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几乎使印支问题的会议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周恩来立即在我三方紧急会商对策时提出，应承认“过去”越南“志愿军”曾在老、柬参战，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原则处理。周恩来于是先会见艾登和法国总理皮杜尔作了疏导，然后按事前的分工分别在会议上提出，这才扭转了局势，达成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柬军事问题直接谈判的协议。

周恩来又抓紧日内瓦会议暂时休会的间隙，对印、缅进行短暂的访问后，赶到柳州会晤胡志明，确定越南南北军事分界线的方案，说服范文同放弃在划界问题上不切实际的要求。并乘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上台急于解决印支问题以稳定其在国内的地位，两次会见孟戴斯—弗朗斯疏导他。在法越双方互作让步与调整的原则下，终于在会议上达成以 17 度线分界的协议。老、柬的军事问题也得到合理解决。

周恩来看到了英法考虑各自利益而与美国有矛盾的现实，采取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并孤立美国和法国顽固势力这一传统的统战策略，不但挽救了会议免遭破坏，而且实现了恢复印支和平的战略目标。美国着眼于全球反共战略，既要阻止印支“赤化”，还要从印支遏制中国；它不得不支持法国，却又公然要求法国从印支三国分离中撤出去。而周恩来从策略上考虑，曾对孟戴斯—弗朗斯表示，中国愿意看到印支三国留在法兰西联邦之内，愿意和法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法国当局在权衡得失利弊后认识到，战争在美国支持下继续下去，法国的利益可能丧失殆尽；接受中国和平建议，对它更有利。英国这只老狐狸，只想保住毗邻印支的固有势力范围不受损害，也怕战争继续将危及自己，更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对抗，因而也希望印支恢复和平。这样就加剧了美法、美英之间的矛盾，将杜勒斯死硬派孤立起来。周恩来还成功地利用法国内部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与范文同协商一致确立争取孟戴斯—弗朗斯的方针，建议范文同抢在杜勒斯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之前去见孟戴斯—弗朗斯，以稳定孟戴斯—弗朗斯谋求和平的决心，加强他顶住美国 and 法国主战派压力的信心。这种“拉孟戴斯—弗朗斯一把，孤立美国 and 法国主战派”的策略，起了最后达成印支和平协议的催化作用。

周恩来通过会议辩论和会外接触，更加深了他对越老柬是三个各不相同的独立国家的认识。如果不顾印支三国“明显而严格”的国家界限而迎合建立“印支联邦”的构想，强制老、柬人民依靠越南军队建立与越南一样的政体，实际上就是输出革命。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的思想是：作为共产党

柴成文：《三大突破》第 156 页。

《研究周恩来》第 258—262、265 页。

人，他希望看到老、柬人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但是深深懂得，“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因此他在谈判中不强求老、柬两国的解决方案与越南相同，但在要求对方承认老、柬本国抵抗力量的问题上决不让步。这是周恩来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不输出革命原则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支持老、柬的主权和独立，对争取这两个王国，分化他们同法美的关系，促使他们站到中越苏的解决方案上来也起了重大作用。周恩来注意到这个王国的代表虽然同属右派，但他们在会议的发言中都反映了一种和平中立的愿望。如果中越离开这一事实，一味追求不现实的印支联邦或印支革命化的目标，那实际上是打击了他们的中立倾向，迫使他们倒向美国，从而导致谈判破裂，战争扩大；反之，就可以争取他们同中越和平共处。这不仅有利于中越两国的安全和东南亚的和平，也向其他国家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愿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诚意。正如周恩来敏锐指出的：“是用战争能够团结老挝和柬埔寨呢，还是用和平可以团结他们？是用战争能团结东南亚呢，还是和平可以团结他们？答案是和平可以团结他们，用军事手段则只有使他们投向美国。”这就更加坚定了老、柬走和平中立的决心，并推动会议在孤立美国的进程中达成尊重老、柬两国的民族权利，促使他们接受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本国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为这一地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在处理印支问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国际主义与不输出革命原则相统一，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不仅是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外交的特点，也是他整个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

中越苏在会议中取得的胜利，一是将持续近十年之久的紧张的国际关系，继朝鲜停战后缓和下来，证明只要通过和平协商，友好谈判，任何国际争端都可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二是越老柬三国的独立地位得到确认，越南北方获得完全解放，为全国的解放和统一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三是中国边境的安全，从东北到西南所受的威胁基本上消除了。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领导中国代表团同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方、民间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仅法国就有各阶层人士组成的135个代表团669位代表专门访问了中国代表团。他们不但对中国增进了了解，而且在推动法国政府采取和解政策方面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开辟了道路。

美国对印支问题的解决方案，一如它在朝鲜问题的谈判中所持的僵硬立场那样，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不同的是，史密斯奉命发表一个单独的声明，声称“美国将不使用威胁亦无意去妨害这些协议和条款”。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的情况是动摇、困难、矛盾，这是它的特点。例

如，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协议，似乎有它一份，又似乎没有，这样的外交真是世界奇闻！”然而美国还是不甘心失败，最后仍然武装干涉老、柬两国内政，撕毁了它自己的声明，甚至发动一场对越战争而以更大的惨败告终。胡志明逝世之后，越南当局又狂热地追求“印支联邦”的空想，对柬埔寨进行明目张胆的武装侵略，破坏和平共处的协议，结果也理所当然地失败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惩罚那些没有信义的国际协议的破坏者。

在亚非会议上扭转乾坤

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有亚非两大洲29个国家参加，其规模比日内瓦会议大得多，而且是近代以来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它反映了超过世界人口半数的亚非人民反帝、反殖、反侵略、反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确定争取会议成功的方针

中国决定由周恩来亲率代表团应邀出席会议。他多次召集会议制定方案，把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成功作为中国的目标。代表团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为完成会议的下列宗旨作出独特的贡献：一、促进亚非各国的亲善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的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和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和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周恩来认为亚非会议的性质和任务与日内瓦会议不同。他对参加国家进行了逐个分析。29国中只有6个建交国家，其余的大部分是原来列强的殖民地，少数独立国家也受西方国家的长期影响，然而它们又都有反帝反殖和谋求独立自主的传统。它们对中国的看法是复杂的。对中国的解放、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和不久前在日内瓦会议上赢得的声誉，既有同情、羡慕、钦佩之情，对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这一点则深怀疑虑。他们中会有一些人对中国怀有对立情绪，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怀有敌意。日本曾经是侵略者，在会中是孤立的，不会站出来唱反调。

经过分析，周恩来决定对这次会议的参加国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他要求代表团成员心理上要有所准备。他告诫大家说，无论出现什么挑衅言行，

都不要发火，都不要使用过激言词。美国试图孤立我们，但我们正要打破这一企图。我们将冲破一切幕障，不管是铁幕、竹幕还是烟幕。他教导工作人员如何与新闻界打交道，对提出尴尬问题或发表不友好讲话的记者必须以礼相待。“我们信仰共产主义，但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表明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别人和我们信仰一样。除了意识形态，我们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和目标。”

会议前夕，发生了美蒋特务将定时炸弹安放在周恩来拟乘坐的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而在香港起飞后不久爆炸的严重事件，致使中越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 11 人全部遇难。周恩来因应缅甸总理邀请赴仰光而幸免于难。然而美蒋特务破坏会议的阴影仍笼罩在万隆会议大厅周围。美国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却派了 70 多名其中不少是带引号的“记者”进行会外活动，被讥为变相的最大代表团。

果然不出所料，除了美国在会外展开恶意宣传，对某些与会者进行拉拢、贿赂、威胁、收买等破坏活动之外，会上也先后掀起了两次反共反华逆流。据身临其境的陈老总回忆，大会发言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国发出阵阵指责非难，有人端出“共产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论调，言词偏激刺耳，会场充满了火药味。跟着又有某邻国代表表示怀疑中国在边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为了向他国搞“渗透”、“颠覆”。会场气氛极度紧张，简直一触即发。继这位代表把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说成是“为了保卫自己”之后，又有某国代表为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和已格达条约辩护，说是为了“抵御共产主义”，等等。会内，与会者的目光都盯着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密切注意他们的反应；会外，记者们早已发出许多消息和评论，猜测周恩来理所当然要进行反击，有的“记者”巴望着这种反击，以激起更大的风波，使会议陷入纷乱而不可收拾。

“求同存异”的方针驱散了会上乌云

轮到周恩来讲时，一直徘徊在外面走廊上的数以百计的记者和秘书们一哄而入地涌进了会议厅，有的人站在椅子上。他们热切期待着目睹这一关键的场面。

这的确是关键时刻。周恩来面临会议因产生分歧而走向破裂的危险，如何及时而万无一失地处理这个逼上来的场面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经验丰富而又韬略满腹的周恩来在谛听第一个不友好的发言时，已有了如何作出恰当反应的腹稿。他同陈老总商议后决定将原定的发言稿改用书面发言，亲自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 319 页。

《陈毅传》第 538 页。

法新社万隆电讯，1955 年 5 月 19 日。

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明确表达求同存异的方针。当大会主席宣布请他发言时，他站起身来，从容走上讲坛，会上响起热烈的欢迎掌声。人人全神贯注等候他的讲话，安静得几乎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周恩来用安详的语调，以诚恳、大度的姿态发言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接着列举了亚非国家的共同点。然后指出：“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下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周恩来随即就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与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有针对性而又心平气和地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口吻扼要而又明确地阐述了中国的政策。

短短 18 分钟的发言，驱散了两天来笼罩在会议上的乌云。它给会议指出了方向，使它能够抵抗那种想把它拖入对立和争吵的企图，能够绕过前途的暗礁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地。这个发言也使与会的其他 28 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更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它的谦逊，它的诚恳，它的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

发言一完，会场沸腾了，掌声如雷，各国代表纷纷涌上前向中国总理表示祝贺、钦佩、感谢，完全扭转了会议的紧张局面。尼赫鲁走上前与周恩来热烈拥抱。一度发言指责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称赞周的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巴基斯坦总理阿里说：“我是带着成见来的，但想不到周恩来总理这样尊重别人的意见。现在成见消除了。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代表团。”缅甸吴努总理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周恩来这篇发言的惊人之处就在于没有闪电惊雷。

周恩来已将敌意化为敬重和钦佩。他的发言打动了在场的许许多多代表们爱国主义与憎恨西方人的心弦。在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里，亚洲国家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手足之情。猜忌和疑虑烟消云散了。周恩来沉着冷静、彬彬有礼地驳斥了西方记者及亚洲记者对中国的指责。他邀请与会代表访问中国“亲自看看，任何人都会受到欢迎”。陈老总的感触更深，他说“这是马列主义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21—125 页。

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第 33 页。

《陈毅传》第 539 页。

《当代中国外交》第 86 页。

美国的中国通鲍大可的现场评论。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 321 页。

外交的典范，是给我们代表团学习得最多的一点”。在代表团中他以“学生”和“练习生”自喻，处处突出周恩来的作用，实际上他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会内会外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克制，谋求团结的诚意，求同存异的耐心，他是早有体会的。这一次恰如其分的揭露和反击，更使这位易动感情的开国元帅折服。

智释宣言分歧

西方记者几乎完全改变了开始时不怀好意的立场，不得不承认，亚非会议进入第三天，周恩来的形象完全支配着这个会议，会议的进程在他的影子下进行。有人对五项原则的提出不尽同意，甚至连和平共处这个词也被说成是共产党的语言。这就出现了亚非会议的第二场风波。吴努呼吁大家保持团结，尼赫鲁也作了长篇发言，都没有取得建设性的效果。会议接近尾声，又到了关键时刻。4月23日，周恩来再次发表被许多代表团称之为“亚非会议最重要的讲话。”周恩来说：与会各国都是一致要求和平的，应该寻求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了，但是考虑到在座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同，那么我们可以另换一个，而不必在用词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随即归纳多日来讨论中大家都接受的主张，提出“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的七项原则，并采用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定名为《和平宣言》，作为草案提请大会讨论。周恩来特别针对各国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强调指出：“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是不愿意同美国作战的，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如果大家愿意推动中美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那就会大大有利于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大大有利于推迟和阻止世界大战。”周恩来并就各国代表在辩论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分别作了阐述。

敏锐的外国记者立即发出评论说，中国总理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其目的是阻止任何捣乱的倾向。周恩来今天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三个战线上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对一切重要的方面都有所建议；对于激烈反共的西方，他表示愿意同美国和英国友好；对于亚洲的中立主义者，他表示愿意

法新社万隆电讯，1955年4月20日。

柴成文：《三大突破》第182—183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7、129、133页。

《印度教徒报》记者万隆电讯，1955年4月23日。

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给予防范军事侵略的保证。他的和平七点建议是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运动的高潮，先发制人地对付把会议变成冷战讲坛的反共评论家。他以和平的声音发言，以出色的技巧和讲道理的谦和态度，产生了令人感动的影响。

三句话迫使美国进行谈判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科伦坡五国代表加上菲、泰外长集会讨论如何缓和远东地区由于美国插手台湾海峡两岸事务引起的紧张局势问题。那位刚刚在会上提出“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的锡兰总理就上午周恩来发言中谈到的中美关系问题进一步追问周恩来：如何缓和本地区的紧张局势？周恩来本已表明不在会议上提出有争议的问题，经他当众一问，便把中国的立场直截了当说出来。在场的人听后无不感到鼓舞。尼赫鲁建议把它公开发表，周恩来欣然同意。第二天，轰动世界的《周恩来声明》便在世界各大报作为头条新闻发表了。周恩来的声明只有短短的三句话：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

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三句话让美国白宫和国务院足足忙了三天三夜，迫使美国不得不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同中国开始了为期 15 年的大使级谈判。

法国《世界报》说，周恩来最后最巧妙的业绩就是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这一轰动一时的声明，它使中立主义者同反共者的争吵悄然收场了。大多数代表都认为，周恩来做了他能为和平而做的事，而美国却拒绝得太快，恐怕不会得到人家的同情。周恩来还加强并扩大了特别在亚洲中立主义地区盛行的这一信念：世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不安是美国造成的。

也就是这三句话加上上午周恩来在大会上的重要发言廓清了会议中的一片阴霾，改变了会内会外的悲观空气。人们对于在最后一天完成任务这一点，感到放心了。会议公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七项原则扩充为“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十项原则”通过了，并以“万隆精神”闻名于世。29 个亚非国家的代表第一次用一个声音讲话。这次会议不仅推动了亚非人民

路透社万隆电讯，1955 年 4 月 23 日。

《印度时报》记者万隆电讯，1955 年 4 月 23 日。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34 页。

法国《世界报》1955 年 4 月 25 日评论。

美联社万隆电讯。1955 年 4 月 24 日。

40 年后，苏哈托总统在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时说，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献给人类的一份无价之宝。

的反帝反殖斗争，而且对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黎巴嫩驻美大使在万隆会议闭幕第二天会见周恩来。他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在这次亚非会议上，你赢得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旁人犯了错误，例如尼赫鲁先生有一两次发了脾气，不得不事后道歉。而你在每一场重要的战斗中，都获得胜利。我们虽然还有不同意见，却同你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获得比别人都大的成功。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外电也评论说，对照之下，尼赫鲁被人几乎普遍认为是“近乎失败”，因为他在会议期间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计划或建议，他悄然落后了。

本来以为会议将不欢而散的西方记者不得不承认，历时7天的29国会议是一次成功。它向全世界无数有色人种显示，无论他们抱什么观念，他们是处在相同境地的；不论他们的政治制度如何，一种人道的共同联系把他们团结起来了。在这么极端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中竟然达成了这样大程度的协议。29个国家终于开成功了会议这一事实，实在是有点惊人的。周恩来不仅是万隆会议上的英雄，在会场以外他也是万隆最为人追求的人物。每天上午成千的人聚拢来看这位显赫、无限智谋的新中国的发言人，他的十足风度具有奇妙的吸引力。代表们都承认周恩来的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和平攻势用像这样逐步推进的艺术以及非凡的天赋施展出来，是从未有过的。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察力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向大多数代表团包括印度代表团在内进行调查后所获得的明显印象是：周恩来是会议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他的语调极其温和的演说和他所提供的保证，使得与他交谈的人为之倾倒，消除了疑惧。——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是不论西方或东方都绝对不能再加以忽视的了不起的外交活动家。今后举行的任何重大国际会议，若没有中国参加，都将是反常的现象。

会议期间，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地在会外开展广泛的友好活动，特别是对周围邻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国家。用印度记者的话说，周恩来放松了不同那些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国家公开会谈的做法，摒弃所有这种性质的礼节，会见了那些国家的主要代表，例如阿拉伯国家、泰国、菲律宾等，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过，中国愿意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08页。

国际新闻社万隆电讯，1955年4月24日。

美联社万隆电讯，1955年4月24日。

法新社万隆电讯，1955年4月24、20日。

美联社万隆电讯，1955年4月24日。

《印度时报》记者万隆电讯，1955年4月20日。

路透社万隆电讯，1955年4月24日。

和平解决所有的纠纷。中国没有“竹幕”，公开欢迎各与会国代表在任何时候访问中国，由于周恩来推诚相见，这些工作对争取巴基斯坦后来脱离美国军事集团，对争取西哈努克亲王，甚至对日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年后，菲律宾老资格的外长罗慕洛记忆犹新，他说，菲中建交虽晚，但从万隆会议开始，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巴基斯坦财长在会上对我不太友好，周恩来举行招待会仍然请他参加，而且盛情地以礼相待。巴总理当着周恩来的面批判他年轻不懂事，周恩来表示理解。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同印尼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成为此后中国同有关国家签订类似条约的范本，从而消除拥有大量华人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对发展中国同他们的正常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会后，周恩来应邀到雅加达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邀请苏加诺总统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访问中国。

万隆会议是周恩来继日内瓦会议后参加的另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型的、多边的国际会议。他在两个会议上所运用的谋略因性质和对象的不同而有重大差别，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却是共同的：结交朋友，孤立敌对者，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

中美谈判推动国际政治结构多极化

前文提到，万隆会议之后，中美大使级谈判进行了15年。周恩来说，这在现代史上恐怕是空前的。的确，历史上有过30年战争，然而还没有长达15年、多达136次的谈判纪录。谈判因形势变化而时断时续，然而美国从来不肯轻率地关闭谈判的大门。1969年末为恢复会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一个展览会上甚至紧追中国代办要求进行接触。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说，美方这一举动差点使这位代办得了心脏病。

两国关系的解冻是在漫长过程中的最后两年加速进行的。直接的历史背景是：美国已陷入中国全力支援的越南战争中难以自拔；同时在同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已有力不从心之苦，急需捞一根稻草以自救。中国在当时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中，特别是在1968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也感到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形势是明显的：美国需借助中国继续与苏联争霸，中国也需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以便继续与苏联抗衡。这也就是尼克松所说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

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万隆电讯，1955年4月23日。

朱霖：《大使夫人的生涯》第55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84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8页。

《尼克松回忆录》英文版第562页。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美苏关系中一举一动的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动向，根据两害权其轻的谋略思想，对美国试探中国态度的种种气球，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应；坚冰于是开始融化了。

为了保密，以免在国内外引起相反的反应，诡计多端的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基辛格施展了他的遁形术，在周恩来的精心配合下，于 1971 年 7 月初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进入北京，开始了富有戏剧性而又卓有成效的一系列表演，导致 1972 年早春 2 月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任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也就是尼克松本人所说的“改变世界的一周”（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产生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中美关系步入了正常化轨道。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大突破。

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说：在这个高潮背后，双方都进行了长达 30 个月耐心而周到的准备。双方都小心谨慎，以意味深长而又微妙的信息和姿态去试探对方，而这些举动一旦遭到拒绝却不必承担责任。我们与中国人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巧妙，双方都可以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任何一方都不必显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中美苏三角关系由模糊而初露端倪，由逐渐明朗而趋于完成，国际结构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

基辛格抵达北京当天下午，周恩来来到他下榻的宾馆。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因此这位客人受宠若惊，深为感动。基辛格对周恩来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面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自信。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梧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精神，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他警惕性极高，令人一眼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锤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

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谈判方针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旗帜鲜明地表达我国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主张，争取取得成果，以利改善两国关系，缓和国际局势。从整个谈判过程来看，无论是同基辛格还是同尼克松讨论问题，无论涉及的是重大的国际问题，还是两国关系症结，周恩来始终掌握了主动。基辛格也承认，在他们相遇的半小时内，周恩来就已定下这次会谈的基调。他以高度的谈判艺术，

柴成文：《三大突破》第 266 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685 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87、176 页。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 227 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43、476 页。

寓论辩于说理之中的机智，严肃的激烈交锋与委婉的谈笑风生并举，使对方感到尽管立场不同，周恩来的意见和主张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是可以接受的。谈判一直在周恩来引导的轨道中运行。谈判高峰迭起，周恩来驾御航向的才智可以从一驳美方的不能抛弃“老朋友”论，二驳美方的“真空论”，从规劝美国及早从南越脱身，以及美方愉快地接受我方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中，鲜明地显示出来。

在谈到改善中美关系时，美方曾表示不能迈出大的步子，不能放弃“老朋友”。周恩来指出，美国所以陷入越南泥沼中不能自拔，就是因为支持阮文绍这些“老朋友”；中美关系不能改善，就是因为支持蒋介石这些“老朋友”。既然中美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然要改变一些关系。如果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不但不能迎接新时代，还会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尼克松和基辛格听后，不得不承认周恩来言之有理。

尼克松在谈到越南问题时说，一旦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可能出现“真空”。周恩来不同意这种托词，他反问尼克松：美国退出中国后，出现了“真空”了吗？还不是中国人填补了。英国当年退出美洲大陆，出现了“真空”了吗？还不是美国人民填补了。尼克松听后唯有点头称是。

可见，尽管基辛格是西方公认的谈判高手，也是周恩来所尊重的外交家，尼克松并且是毛泽东所欣赏的大右派，他们所抛出的“老朋友”论和“真空论”不过是旧瓶老酒，了无新意；他们提出的公报草案更是西方外交的传统手法，未脱陈腐巢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方对周恩来的谈判艺术，口服心服。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关键。这次所以达成协议，就是因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个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双方达成的共识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接受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并承担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建立霸权的义务。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周恩来和他用了25个多小时一起研究世界形势，还用了15个小时起草一个声明，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基辛格说为这份公报花费那么多时间是因为他提出的公报初稿是按照老一套的格调起草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他用这种办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基辛格正以此自鸣得意。不料周恩来第二天发言尖锐，他宣布我们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他提出自己的公报初稿，其构思是前所未有的。他以毫不妥协的词句阐述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而留下几张白纸由我们来阐述料定是相反的立场。他在台湾问题上寸步不让的。乍一看这个草稿，我大吃一惊。

《研究周恩来》第206—207页。

《研究周恩来》第8—9页。

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这在国际上和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就可以看出，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我们的困难(可使盟友放心，可避免老一套的解释，不致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等)。

基辛格的助手，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回忆当时起草公报的某些戏剧性场面说，美方的草稿是“掩盖分歧，尽量寻求共同点和一致意见”。当时周恩来对美国人调和分歧的做法作了一小时“用词尖刻”的讲话，认为这个草稿的措辞不是“真实的反映”。他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各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突然弥合了这些分歧，找到了广泛的一致，谁能相信呢？”

结果，洛德说：“美方的草稿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随后周恩来提出了中方的草稿。“这是一种全新的公报。每一方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清楚地列出可以达成一致、进行合作的原则和领域。”

其后美方在我方提出的初稿中填满了他们的观点。双方经过字斟句酌的讨论和润色，终于达成了协议，这就是规定中美关系基本准则的《上海公报》。

基辛格回忆尼克松和周恩来的会谈时说，会谈涉及广泛的问题，包括台湾和越南问题。这些会谈是以独特的间接的方式和微妙的暗示来进行的，尤其是中国人方面更是如此。没有作相应的承诺甚至并没有尝试规定协调的行动，一种奇特的伙伴关系形成了，这种关系正因为从未正式明文规定更为有效。

尼克松终于认识并告诫其后继者：“我们在对华政策中可能犯的最糟的错误，莫过于按美国人特有的习惯，肆无忌惮地对别国如何处理其政治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国人酷爱独立，别人企图影响或操纵其事务，只能惹得他们发怒。美国政府或新闻界对中国内部明显的反改革或反民主倾向表示关切，除了触怒和疏远中国领导人，并可能产生与那些天真的批评者的意图恰恰相反的作用之外，别无用处”。尼克松进一步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在棘手的台湾问题上，我们一步也不能走错”。这是美国当权者在处理对华关系，特别是涉及台湾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正因为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当权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经验教训，才使中美关系有时陷于紧张状态。

尼克松承认二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世界上出现了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这一认识驱使他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而周恩来因势利导，争取在谈判中达成协议，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82页。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505页。

公报全文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74页。

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英文版第258页。

这就推动了国际局势在大动荡、大改组中进一步向多极化发展，而且不可逆转。多极化的世界比两极对立或一极独霸更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周恩来的谈判谋略

将中美关系纳入正常化轨道的谈判，是周恩来谈判生涯中最重要，也是最集中反映周恩来谈判谋略的一次谈判。

同周恩来打过交道的各国官员和各方面人士，对他的谈判谋略无不表示钦佩。周恩来的谈判谋略，早在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中已经形成，在国际活动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结束之后，在归国途中，应同志们们的热切要求，周恩来利用休息机会比较详细系统地讲了他对这次国际会议的看法、感想和经验。据师哲回忆，大约有如下几点：

一、国际间的问题总是靠谈判、协商来解决的。对任何复杂的问题，只要双方都有诚意，能互相谅解，就能找到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二、会议上的正式辩论，都是照本宣科，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而且多半是为了体面，为了进行宣传，而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三、会外活动，私下接触，可以冷静地交换意见，互相揣摩，各自逐渐亮底。双方经过协商和讨价还价，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倒是较切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四、为了解决真正问题，历来都需要互相谅解，互相迁就，互相让步，互相照顾，使双方观点互相接近起来，并照顾到双方的利益，最后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达成协议。如果对个别问题双方一时不能达成一致看法，那就搁置起来。这就叫做妥协。

五、帝国主义国家总是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非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肯改变。所以同他们打交道要特别细心和耐心。他们由于受到自身阶级利益的支配，决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六、同小国家、弱小民族打交道，应特别注意处处照顾到他们的面子，就是说，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我们对这些不仅能理解、体会到，而且作为一个大国，也完全能做到。

周恩来说，这里只谈了几条原则，但在运用的时候，还应该高度的灵活性。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际谈判作出小结。此后他从事谈判的实践更多了，心得体会也更丰富了，但是他连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了，

已不能作全面系统的总结了。即使如此，人们仍不难从中窥见周恩来谈判谋略中基本要素的梗概。

谈判谋略取决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近期目标，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谈判战略和策略、谈判方针和政策，以及为完成谈判目的而采取的立场、方法和手段，也可以说是谈判艺术和技巧。

谈判是双方的，除了“城下之盟”，彼此必须作出让步和妥协，才能达成协议。所以谈判的过程，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双方进行讨价还价、互相让步和妥协的过程。至于让步多少，妥协多大，则决定于灵活性的高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周恩来有过原则指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可见让步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仅限于基本立场和政策允许范围之内。让步和妥协在谈判谋略中就是“折衷”。

不言而喻，灵活性也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就失去了原则性。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是周恩来谈判谋略的核心。灵活性从属于原则性，反过来又服务于原则性，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两者关系的第一层含义。注意轻重缓急，区别基本要求和一般要求，基本利益和一般利益，以及道义上的要求，是第二层含义。“区别对待”则是对外政策灵活性的基本依据。第三层含义是解决办法的折衷选择。在对外战略目标许可的前提下，采取折衷选择的办法解决问题，是灵活性的重要表现。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就是折衷选择的若干原则。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不是外交的目的，但是灵活的外交却是外交政策成功地实现其原则目标所不可缺少的。

周恩来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必须很好地结合，才是完整、正确的策略方针，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功。原则是前提，“是不能让的”，放弃原则就意味着丧失立场。但是原则性要通过灵活性保证落实，没有灵活性也就没有了原则性。所以他说：“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以求达到成功。”他认为这种结合应是辩证的统一，有机的联系。关键是“正确的结合”，而且要做得“巧妙”。所谓正确巧妙的结合，从他的实践中可以归纳以下几点：(1)掌握事物发展全过程和阶段性的辩证关系，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措施，以求有步骤地最终实现既定原则。(2)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区别对待，灵活处理。(3)审时度势，选择最佳时机，寻找最恰当的结合点。周恩来常说：“要根据形势决定策略。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因此，他主张“见机而作”（《周易·系辞下》）。

谈判的成败，固然取决于实力和政策，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在主

《研究周恩来》第 187 页。

《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 277 页。

《研究周恩来》第 353—356 页。

要方面，要看进行谈判的人如何机智地体现实力和运用政策。就一定意义上说，谈判主要是双方主持人智力的较量。

中美谈判是在双方长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开始的。双方都意识到两国关系所涉及的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因为双方的影响幅度不是地区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以往的谈判未能取得协议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双方立场不可调和，而且受国际格局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格局向多元化发展时两国的关系就取得了突破，这个突破充满了戏剧性的扑朔迷离，不乏京剧《三岔口》中的情趣。

尼克松于 1968 年末当选并于 1969 年初上任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后，出于对内外政策的需要，开始试探同中国改善关系。他抓住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葬礼的机会，请求这位西方大国中首先同中国建交的法国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达美国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口信。不久，尼克松又转托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捎来了同样的信息。尼克松还采取一个象征性的步骤——撤走自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表明美国对蒋介石承担义务的两艘驱逐舰。1970 年初，应美方要求，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了。美国国务院发布消息时，开始说会谈在“中共大使馆举行”（过去都在第三国提供的场所进行，这已是没有先例的突破），12 小时后又改口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而且重复三次，惟恐听者疏忽。这种试探气球或小步舞的姿态在谈判谋略中叫做谈判传播。谈判传播又有公开传播和秘密传播之分。由法国、罗马尼亚传来的口信是秘密传播，撤走军舰和发布消息是公开传播。尼克松惟恐有误，两种手段全采用了。

明察秋毫的周恩来，对谈判传播尤其敏锐。他有许多谈判传播的巧妙运用。他立即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中国决定释放两名误入我广东海面的美国人。

1970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国庆典礼的照片。照片经过精心处理，只有他们和身后的翻译四人。这是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向美国发出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基辛格事后说，可惜周恩来、毛泽东过高估计了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传过来的信息如此微妙，以至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奥妙。基辛格并非粗心大意之人，他是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周恩来的外交艺术缺乏了解。

然而基辛格对周恩来导演的另一手“乒乓外交”则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比赛后“顺便访问中国”，不过是体育界的一次交往，却因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而赋予深刻含义。这一公开邀请的举动所包含的“机关”，牵动了美国首脑人物的神经。基辛格以赞叹

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 年》第 54 页。

周敏、王笑天：《东方谈判谋略》第 35 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698 页。

的口吻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杰作。它有多层的意义。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最明显的意义是：它是中国同美国改善关系的象征；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透露——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这是向白宫发出的第一个信号。由于被邀请的选手不代表某种政治倾向，因而更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

当“乒乓外交”的信息来往于北京、华盛顿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大受震撼而不知所措；莫斯科的报纸经仔细选择发表了外国报刊的反应综述；西德外交长发表谈话说，联邦德国“感兴趣地注意美中关系的发展”；东京佐藤政府一片茫然；台湾各种反应的基调是继续观察。

1972年8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宾回顾此一插曲时说，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起战略性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战略性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1973年6月周恩来接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时也说，打开中美关系的是乒乓球，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客人说，这是一种天才的举动。真是小小银球推动了大地球。

看一看《尼克松回忆录》和基辛格的《白宫岁月》的有关章节，就不难了解，他们想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心情何等急切。他们为了了解谈判对手，进行了充分准备，细读了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有关周恩来的记述，40年代美国驻重庆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费正清等人对周恩来的评价，以及美国的“中国通”对中国的看法。尼克松还熟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下他访华时将引用的名句。临行前，他当面请教美国著名记者阿特莱和在重庆同周恩来有过交往的白修德。前者说：周恩来“是难以抵挡的，他机智、有吸引力，有手腕”；后者告诉他：“在周恩来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

尼克松的印象

百闻不如一见。尼克松同周恩来进行几次会谈后，认为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出本能的机敏，善于运用国际力量的原则，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同他对外国人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在他身上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10页。

《多勃雷宁回忆录》第239页。

钱江：《乒乓外交始末》第163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44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78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225页。

家之一。尼克松说，我在谈判中认识到，要周恩来突然放弃其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外交立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然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我们从政治谈到历史，谈到哲学。周恩来在所有这些谈论中，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他是一位学者转变成的造反者，他从未失去学者心灵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度。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然而，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尼克松还发现，在非正式的宴请和观光中变得更熟悉的时候，周恩来的表情更加豪爽，面部更是显得兴致勃勃。他常常是背靠椅子坐着，并充分发挥富于表情的那双手的作用。当他要扩大他发言的范围或进行概括时，就用一只胳膊在前面扫动一下，当他要要把一个论据的各个要点组成结论时，就把双手的手指插到一起有时候又会采取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它的观点。正式会谈中，他对言下的双关语发出低沉的微笑，但在交谈中对善意的笑谚，他却报以轻松的，有时是响亮的笑声。他的满脸笑容加深了面上的皱纹，又似乎显出一种真挚的愉快，那时，欢乐使他的双眼闪出了光彩。

无限经过十几个小时的会谈和其他接触，尼克松说周恩来在四个方面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无限的精力，周密的思考，谈判技术，在压力下的沉着。他对周恩来的逝世深感悲痛，他在表示悼念的声明中说：“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周恩来)”。

1976年尼克松再次访华时，对邓颖超说，你的丈夫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从来是坚定不移的，却又彬彬有礼，而当他“手上拿了好牌”时，说起话来更是温文尔雅。这归功于他的涵养和经历，但这是成熟的自信的反映。——

基辛格的感受

富有谈判经验的基辛格谈到周恩来的谈判谋略，更是佩服有加。他说，周恩来在会谈中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学对话一样，几乎掩盖了这场会谈的性质。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机智而有风趣，样样卓越超群。他对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

尼克松：《领导者》第231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233、222、224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246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221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234页。

《五洲的怀念》第237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48、744、747、746、174页。

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有明确的目的。——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的。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他也采取这种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我们之间的会谈，较之我担任公职时同其他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到。——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周恩来毕竟是一位镇定自若，才智过人的谈判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在这次访问以及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所有的会谈都持续几个小时（一次会谈长达5—7个小时并不稀奇）；然而没有一次他表现得有丝毫不耐烦，或者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没有受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公务而中断。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曾经开玩笑说，社会党的高级官员过复活节也不可能腾出这么多时间。基辛格说，我很欣赏周恩来的杰出的品格。除戴高乐之外，我不曾遇到过一个领导人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无论谁同周打交道，都不会低估他讨价还价的本领。他会十分耐心地阐述他的观点，极尽说理和敦劝之能事，直至看来再前进一步不可能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会作小小让步，仅足以为第二轮会谈铺平道路，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时，对方往往会发现他们被诱上钩，作出的让步比周多得多。

从上述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谈判艺术具有三方面的特点：(1)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巧妙结合。(2)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求同存异。(3)善于做人的工作。

周恩来的谈判谋略，不但坚持和发扬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改造了《鬼谷子》一整套纵横捭阖的论述，而且渗透了他的人格和道义的力量。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44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45、781页。

《外国人看周恩来》第173页。

《研究周恩来》第353—356页。

研究、分析古今中外大量的谈判案例，特别是许多成功的谈判范例，广义的谈判原则可概括为下列四条：(1)谋求双方共同利益；(2)知己知彼；(3)建立双方心理相容的合作气氛；(4)突破双方心理防线。

四项谈判原则的谋略思想是：调节谈判者的指导思想，为谈判者有效的谈判指出最佳的途径；为谈判者寻求共同点、消除分歧点提供线索。这可以说是对周恩来谈判谋略的概括。

谈判谋略是一门庞大的、多学科的学问。本文所涉及的周恩来谈判思想与实践虽然挂一漏万，已足以显示他对这门学问的造诣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第十六章 周恩来的语言艺术

外交与语言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言词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这是语言的一般功能。语言因行业不同又有其不同的作用。

就政治而言，古时已有“天子无戏言”（《史记·晋世家》）之说，且有“一言丧邦”（《论语·子路》）之诫，还有“驷不及舌”（同上《颜渊》），也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邓析子·转辞篇》）之惧。所以孔子主张“慎言”（《论语·学而》）、“讷言”（同上，《里仁》），不要“信口开河”（《元曲选》171页）。

至于语言与外交的关系，用周恩来的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他说：“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他说的“文打”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比军队打仗而言、外交是文明的，它的武器不是枪炮等硬件，而是不用枪炮的软件；不过既然都是“打”，其后果必然是严重的，因此都必须严阵以待，切不可等闲视之。另一层含义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所谓软件，就是以语言为武器同对方较量。还有一层含义是用文字打交道，这也是一种软件。外交以口舌先行，以文字随后，恐口无凭，故立字为据，则文字又是软件中的硬件。语言和文字都是为外交服务的，对外交用语要慎重，对外交文件更不能掉以轻心。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外事无小事。有时候，我们的政策思想就表现在一字一词的争执上，表现在一言一行的不同处理上。乔冠华和基辛格为落实《上海公报》的行文，几番争执，几番协商，几个不眠之夜，合计花了20小时。不是亲自参加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个联合公报中的一些文字，其一词一字曾是经过怎样的斟酌修改，最后怎样协议的。例如不讲双方都“致力于”，而讲双方都“希望”；不讲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而讲“不应该在”；不讲任何一方“不代表”任何第三方，而讲“不准备代表”；不讲考虑到这一“前提”，而将“前提”改为“前景”，等等。这些细微的差别显然不属于语言学，而是外交学和政治学。

孔子聚徒传艺，设有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等多门学科（《论语·先进》）。言语科相当于现代大学中的外交系，因为孔子把语言、诗赋和外交融为一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1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7页。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254页。

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同上，《子路》）。可见早在我国春秋时期，孔夫子已将言语与外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现代西方外交学的教科书中，往往有专篇论述外交语言。外交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语言没有阶级性，但外交语言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而政治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字才能准确地表述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一次周恩来在报告中引用昆剧《十五贯》中况钟在审理案件时说过的“下笔千斤重”；他说封建官僚尚且有这种责任感，我们新中国的领导干部能不感到责任“千斤重”么？外事人员在处理国家关系时能不感到“千斤重”么？“下笔千斤重”，说明外交文件的分量非同小可。

外交语言又有别于其他交际活动的语言，它涉及国家关系，即国家的利害得失。不同时代的外交语言又有不同的特征。我国春秋时期的外交辞令，“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春秋三传》首卷荀崧评语），它的特征是“婉而有致，词强不激”。比及战国时期，外交辞令重饰辞，贵激昂，尚铺张。这是适应宫廷外交与兼并外交的要求。欧洲中世纪的外交其辞令颇与我国春秋时期相似，而欧洲近代外交的外交辞令则接近于我国战国时期。到了现代，外交语言又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即更加坦率，更加明确，更少“外交辞令”，有的西方大国的外交官，甚至用语粗鲁放肆。

英国议会至今仍禁用粗鲁的语言。“撒谎”须改为“用词不当”。梅杰首相骂反对党领袖是“笨蛋”，议长第二天发表一个特殊声明，要求议员在辩论时须“保持理智，态度温和”，不指名批评了梅杰。在多数情况下，议长都要劝说不遵守议会规定的议员使用贵族式语言。显然受这种“绅士风度”的传统影响，英国的外交官表面上是比较文明的。

美国的外交人员纵然是女性，有的就不那么文明了。1991年底，中国外经贸部新上任的副部长吴仪女士飞到太平洋彼岸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女士进行了一场棘手的谈判。希尔斯一开场就辟头说了一句“我们是在同小偷谈判”（指音像制品的盗版问题）。以真诚、坦率、明快风格闻名的吴仪立即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我们是在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1992年1月，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两位谈判女性在一份文件上分别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天，香港股票市场的恒升指数劲增28.98点。在外交场合，希尔斯女士如此粗野鄙俗，不仅在欧美近代外交中极为罕见，即使当代西方有名的外交人物也难以望其项背。语出一位高度发达国家的名门闺秀之口，更显现她极不文明的一

方祖安 1989年3月在外交部举行的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周恩来 1956年四五月间曾就《十五贯》作过两次讲话，详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2—199页。

刘亚林：《左传 外交辞令语体风格分析》，《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路透社伦敦电讯：1994年2月20日。

徐泓：《吴仪：中国开放的形象》，《中国名流》杂志1994年第6期。

面。她受到吴仪狠狠的一击，就变得乖巧了。

周恩来对外交语言的要求

周恩来对外交语言(文字)是极为重视的。他的基本要求是：严密，明快，简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有的放矢；选词命意必斟酌，分寸轻重要权衡；语调强弱须适当，表达方式宜讲究，进退左右应掌握；地貌坐标和统计数字务求绝对准确；谈话既要主动，又要灵活，既要冷静，又要诚恳。周恩来的外交语言不求华丽，不堆砌形容词。他能言善辩，但从不讲套话、空话、假话或危言耸听的话。他说话算数，言行一致，是非分明。他的外交语言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往往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正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欢芬芻(和气)以送之”，这是荀子十分赞赏的“宝、珍、贵、神”的“谈说之术”(《荀子·非相》)。周恩来确有“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的才华。这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的表现，是他的深邃思想的流露，是他对对手心理分析的掌握，是他“不辱使命”的锐利武器。他对拟用的发言稿和拟发的外交文件，字斟句酌，逐句圈点，或润色，或修改，或充实，或提高，段落分明，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对一般人常常混淆不清的同声歧义字从不放过，对简体字和繁体字务求规范化。他引用成语典故，十分恰当，但也不过分拘泥。例如“前仆后继”(《全唐文》795)的成语为什么改成“前赴后继”，因为这一改有继往开来、后继有人的积极意义。有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秘书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这是负累过重的感叹，还是对他人的期许？可惜终周恩来之世，他的这副重担始终未能息肩。

如所周知，周恩来青少年时代有过许多诗作。他的诗隽永深醇，确为上品。他写旧体诗，也写新体诗，有的发自肺腑，撼人心灵。他是话剧的倡导者，自己也写过剧本。如果他献身文艺创作，肯定会成为一名文学家。正因为他懂得诗，所以周恩来的外交语言，富有文采，蕴含着诗的韵味。尼克松也发觉周恩来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有时会用一首诗来解释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他说周恩来的思想带有诗的情调，这在伟大领袖们身上是不足为奇的。政治这个东西，在表现最佳时，往往诗多于文。韩素音说：周恩来能言善辩，满口珠玑，使犹豫彷徨者心服口服，使迷失方向者重新坚定立场。他从不发火，与一些易冲动、脾气暴躁的人争辩时表现出巨大的耐心。美国记者约翰·吴德施说，周恩来的风度和巧妙地使用语言，在二次大战期间产生了历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69页。

尼克松：《领导者》第235—236页。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64页。

史性的反响。

周恩来具有诗人气质。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大多如此。诗人在饱含诗情时，便不能自己地吟诵出来，并形之于书，细细品味。周恩来也不例外。然而他的传世诗作，都是入党前写的。入党以后，只留下一首毛泽东拍手叫绝的声讨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的四言诗。事实上他写了不少诗，但在自我欣赏之后，便都撕得粉碎，只字不留。他弥留之际，强忍病痛，吟诵的也是毛泽东的新作。他是一个顾全大局而谦让的人，他如此割爱只能理解为他不愿给人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感觉。这实在是中国现代诗坛的一大憾事！

尼克松回忆说，周恩来在所有会谈中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同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戏剧性行为大为不同。他从不提高嗓门喊叫，从不拍桌子发脾气，从不恫吓要中断谈判来压制对方。表现出“宽而不慢，廉而不别，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的君子风度(《荀子·不苟》)。

周恩来的外交语言之丰富，是以他的博学为基础的。一位外国学者说，就语言而言，周恩来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对法文有相当运用能力，也能掌握或应用英、德、日、俄等国语文。

“一见如故”的感染力

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气度，能使初次见面的客人拘谨不自然的情绪骤然消释。着迷的外国人说这是由于周恩来的“技巧”，委婉的说法是因为他有引人入胜的“魅力”。其实这是“一见如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感染力。周恩来并非表演艺术家，他是政治家、外交家，而真正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是不需要做作的。周恩来只承认他是一个中国人。可是要做一个像周恩来那样的中国人必须具备特殊的素质，这种素质，不是一般人具有的。

周恩来同陌生人见面，往往在寒暄中缩短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1936年4月，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从陕北瓦窑堡到当时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延安同从未见面的张学良会谈。周恩来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们是同乡啊！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一下子就被感动了。他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诧异地问道：你也在南开上过学？张学良爽快地回答：不瞒你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先生的规劝，完全戒掉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所以我们不但同乡，而且是同师。——同为故土沦落人，同乡之情，同师之谊，一下子把两人在感情上的隔阂消释了。会谈便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他们谈得很坦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37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74页。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31页。

率，也很融洽。

1971年7月基辛格一行秘密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周恩来以一国总理之尊亲自来到宾馆看望他们。这使基辛格受宠若惊。他向周恩来一一介绍他的人员，包括两名特工。周恩来一一同他们亲切握手，对每个人都说出他的特点，诸如谁发表过什么文章，谁不但讲中国的普通话，而且能讲广州方言，谁的夫人是华人，有什么爱好，等等，同他们轻松地开玩笑。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周恩来往往一席话就使人茅塞顿开。1971年4月周恩来接见应邀来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其中有一个叫科恩的要周恩来对当时在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发表评论。周恩来对“嬉皮士”并不采取排斥的态度，他很诚恳地表示，虽然他不很了解这个运动，但它可能是青年人不满现状，想寻求真理的一种反映；青年人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不成熟的或不固定的形式，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周恩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懂得青年人特别好奇的心理。他说他接待过许多国家的青年，他们也有留长发的，但不一定属于你们那一派。周恩来最后语重心长地表示，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人类的大多数才能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科恩对这一席发人深省的话表示感谢。周恩来的话被电波传到美国。两天后，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被送进周恩来办公室。玫瑰花是科恩的母亲通过国际鲜花组万里相赠的，感谢中国总理对她的儿子讲了一席富有启迪意义的话。这是乒乓外交的一段插曲，它透露了周恩来对青年人慈父般的胸怀。他用体谅的、引导的而不是教训的口吻讲话，使对方感到亲切，得到理解，受到尊重，因而信服。

驳倒对方的辩论

周恩来在会谈中遇有涉及国家主权的对立意见，往往驳倒对方，或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论点，或使之“不能诘”、无以置辩。这类事例很多，这里只举当时未公开发表，却很典型的一例。

1955年1月5日，也就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不到一年，中英双方根据协议已互换常驻代办，却还没有完全的外交关系。那一天英国驻北京代办杜威廉

《周恩来传》第308页。

《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年》第186页。

据美国英语辞典解释，Hips是对一些追求新事物、赶潮流的人士的一种称呼。人们通常在美国城市中看见一些奇装异服、不修边幅的男男女女，形似“嬉皮士”，未必反映他们不满现状的真切内心世界。

钱江：《乒乓外交始末》第161页。

求见周恩来，转达外交大臣艾登的口信。为此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阐明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批驳了英国政府的谬论和政策。

由头是周恩来在政协的报告中说，英国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对华态度有所改变。艾登对此感到不安。口信说，艾登保证英国的态度仍然是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这在日内瓦会议前后是一致的。杜威廉还对我国报纸指责英国不守信义，感到惊奇；说英国只承认中国政府，同蒋介石没有关系；现在不能用战争解决任何问题，英国不是美蒋条约的参加者，但认为条约对远东局势起了“制约作用”，因而表示欢迎；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对其同盟者蒋介石的保护，等等。

周恩来欢迎愿意改善关系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表态，强调两国制度不同，想法不同，并不妨碍两国和平共处和改善关系。不过，如果在有关两国中的一个问题上存在对立的作法，无论如何是要影响两国关系的。周恩来坦率地问他，如果中国对香港采取不同态度，会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对方说，那当然。

周恩来说，那么，英国对台湾的态度就不对了，这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美国侵占台湾，美海军在台湾海峡活动，美国帮助蒋介石占据我们的沿海岛屿并对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袭击，又劫夺来我国通商的船只，包括英国商船。但是英国说这一切都是对的。中国要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的袭击，英国却说这一切是不对的。这是不公正的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周恩来举例说，如果美国占领北爱尔兰，并且帮助进攻英伦三岛，而又说英国无权打退这种进攻，这行不行呢？

周恩来进一步批驳英国外交次官纳丁说台湾的法律地位还需要研究。周恩来列举英国参加签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的事实，指出这种无视历史与现实的說法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更坏的是，纳丁公然说，如果中国去解放台湾，英国将同联合国一起行动。这是完全敌视中国的态度。还有更令人愤慨的：美国强行扣留朝中被俘人员，英国政府对此一句话不说。但是中国判处 13 名美国间谍，这是纯属中国主权和内政的问题，英国政府竟说了极不礼貌的话，用了很坏的字眼。这已经不仅是不论是非，而是颠倒是非了。

周恩来进一步批驳远东紧张局势是中美双方、甚至说是中国一方造成的荒谬说法，列举事实并明确指出，紧张局势是从美国方面来的，中国是致力于缓和局势的。周恩来还提到艾登曾建议缔结有利于和平的亚洲洛迦诺公约，但是由于美国反对，他后来不但不提，反而同美国一起搞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跟着美国制造紧张局势。艾登和丘吉尔首相曾经反对导致二次大战的慕尼黑协定，现在却要中国承认东方的“慕尼黑”——美蒋条约。

1925 年英法德意比捷波等国在瑞士洛迦诺会议的一系列条约的总称，旨在保证德法、德比边界不受侵犯和遵守凡尔赛和约。希特勒上台后单方面宣布废除该条约。

周恩来列举事实说明中国一直致力于搞好中英关系时指出，不要彼此伤害，否则就会妨碍改善关系。凡是英方采取合乎实际并有利于缓和局势的步骤，都会得到中国赞成。但不能要求我们承认侵略，让美国肆无忌惮地制造紧张局势，放手准备新的战争。中国不能重犯历史错误，不能容忍美国胡闹，也不会被吓倒。艾登在日内瓦曾经告诉我，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愿意和平的。如果美国政府还可以说理，英国恰恰能起说服作用。周恩来希望中英关系能按照日内瓦会议时同艾登谈话的精神得到改善。

杜威廉感谢周恩来所作的充分的叙述，表示一定如实转告艾登。但是他又建议，以后周恩来有何不满之处，直接向他提而不要通过报纸。周恩来同意以后有意见找他谈，同时指出舆论是中国人民的事，况且中国舆论对英国的批评是由英国引起的，中国从不主动发起对英国的批评。这叫做“后发制人”。

由于杜威廉对纳丁的谈话又作了辩解，并说什么英国建议双方克制，不仅对中国提出，而且也向美国提出。英国认为中国把美蒋条约说成是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是错误的”。英国“绝对相信”这个条约的目的是要起制约作用，所以英国表示欢迎。周恩来对此批驳得更加透彻了。他说，如果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一拳，第三人出来劝架，他不劝第一人放下拳头，却要求第二人不还手，甚至责骂被打的人，这如何能说要求双方克制？如果一个强盗跑到你家里，霸占楼下的屋子，竟然说可以用条约容许他占据楼下的屋子，只是不让霸占者上楼去。试问：你住在楼上会感到安全吗？一个外国武装霸占了我们的领土，这怎么能说是制约？英国承认美国的侵略，这对中英关系是不利的。承认“慕尼黑”就是承认既成事实。英国现在连慕尼黑的教训都拒绝接受了！

这时杜威廉一方面不同意这种历史对比，另一方面又为纳丁的话辩解，甚至公然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只宣布要把台湾归还中国的意图，还没有一个国际协议来履行，因此从法律上说，“台湾还不是中国的领土”。还说什么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只是把日本人从台湾“移走”而已。

周恩来更进一步批驳说，台湾已归还中国的事实是毫无问题的，甚至连美国(1949年8月5日发表)的白皮书和杜鲁门(1950年1月5日发表)的声明，都承认这个铁的事实。说台湾还没有归还中国，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过去英国政府并没有这样说过，这个新论调是为了替美国开脱，使美国有权占领台湾。至于纳丁的话，不简单。他的意思是如果中国去解放台湾，英国就要同中国打仗。英国舆论已经说明了这个含义。

杜威廉连忙辩解，纳丁的意思只是说，如果对台湾进行攻击，将会引起更广泛的战火，使联合国都被牵涉在内。

周恩来问道，联合国并没有对台湾作过任何决定，何以会将它牵涉进去？纳丁是否要联合国通过决议，使台湾不属于中国而归美国保护？

杜威廉连忙否认说，没有这种打算。

周恩来进一步追问：既然没有这种打算，只要美国不再霸占台湾，中国去解放台湾，如何会引起更大的战火？如何会使联合国都牵涉在内？是不是美国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承认？

杜威廉又重复那句话说，英国只是要求“承认事实”。

周恩来于是指出，美国懂得英国的弱点，因此造成事实以后，就要英国承认，然后英国又要大家承认。

杜威廉改口说，英国要求的不是承认事实，而是考虑事实。

周恩来说，如果是考虑事实，那么只有美国撤走武装力量才能缓和紧张局势。如果英国愿意缓和紧张局势，那么努力的方向就应该是劝美国撤走武装力量。不能因为美国造成了事实，就要大家容忍。如果美国不听英国的劝告，英国当然不能负责。如果英国说美国是对的，中国是不对的，这就伤害了中英关系。

杜威廉否认纳丁的话是对中国的责备，说他今天所转告的口信才代表英国政府的意见。但又替东南亚条约组织辩护，并且同中苏的条约相提并论。

周恩来说，对艾登的口信，请照我所说的转告他。东南亚条约组织同我们同意艾登建议缔结的亚洲洛迦诺公约，性质不同，它是制造分裂和对立的，所以许多亚洲国家反对。亚洲以外的国家用这个条约在亚洲建立集团，而许多亚洲国家没有参加，这不能同中苏条约作同样的解释。亚洲以外的国家到人家的地区去，提供人家没有要求的保护，在人家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如何能解释为防御性的呢？美国正在越南南部破坏印支协议，美国对南越的援助和训练军队都是破坏印支协议的。

杜威廉以不熟悉越南情况为由结束了这次谈话，答应将如实向艾登转达周恩来所提出的不满之处。

40 年后再来回顾这场针锋相对的辩论，周恩来措词得体，用意又很尖锐的批驳，态度克制，并不为对方极不友好的话所激怒，因而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观杜威廉这名职业外交官，有些话很可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实在有负训练有素的资历。事实已经证明，在台湾问题上，做得不对的是美国及其追随者。周恩来所坚持的立场和言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周恩来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资产阶级的外交家是望尘莫及的。

妙趣横生的对答

遇到猝不及防的问题，及时作出巧妙的对答，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机敏才智的表现。

1950 年 1 月周恩来到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多次同斯大林会谈。有一次涉及我国东北地区的问题时，斯大林竟提出不准第三国公民进入和居留东北地区，并且粗鲁地要求我国承担义务。谈话陷入冷场。周恩来稍加思索便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

更不用说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才勉强说明，他的本意是指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不能进入东北活动。斯大林虽然对中国极力作出不同于对其他国家的姿态，但他那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已根深蒂固，有意无意地总要表现出来。

1957年9月7日他会见第一次来我国访问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代表团长说，他们事先有个协议，每人只问一个问题，这样大家都有机会。周恩来说，这是机会均等。团长说，正是。

于是一个代表问：24名美国记者是否被允许进入中国？

周恩来回答：关于记者问题，就适用你们团长刚才说的原则，就是机会均等，彼此互惠，有来有往。可是美国政府不但禁止中国记者去美国，而且不允许美国记者到中国来。今天在座诸位虽然没有记者，但是听说也有几位兼作记者的。这等于说美国记者先到了中国。从你们的接触中，可以看到中国是不是愿意对外国新闻记者开放，并且在互惠的基础上开放。

还有一位代表问：美国国务院对我们说，我们来中国同中国青年接触并且亲眼看看中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我知道周总理不愿意干涉美国内政，可是，你是否能够对这件事情评论一下？特别是对今后美国人到中国来旅行的问题。

周恩来说，你问我个人，我看不出美国青年或美国其他朋友到中国来有什么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诸位既然来了，大概也有同感，如果违反美国的利益，诸位就不会来了。我看诸位都是爱护祖国的嘛。美国国务院说不是，说你们来了是违反美国最大利益的，这不是矛盾吗？

接着又有人问：听说现在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内政策意见很不一致，特别是关于“百花齐放”的政策。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不一致的地方究竟是什么？能不能取得协调？你是否认为现在有人争夺权力的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很遗憾，我都不晓得，你倒晓得了？我完全可以向你声明，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流言或挑拨。如果有人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发生他们所希望的这种事情，那他会落空的。

提问者说，请你不要感到遗憾，你的话使我感到很高兴。

另一名代表问道：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不是愿意在个人基础上同艾森豪威尔见面，来调整两国关系？

周恩来说：为改善两国关系，我个人从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并且也愿意这样做。但是像你提的那样的具体问题，现在很难回答。

又有一名代表提问是否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可是在上次选举中有95%的人投了两党的票。而中国政府说这两个党遵循着同样的政策。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是美国内部的矛盾问题，是要你来回答的。你自己来回答比我更恰当。

1961年5月9日，周恩来前往机场欢送陈毅赴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飞机起飞后，他照例兴致勃勃地同前来送行的外国使节寒暄。有一位使节半开玩笑地问：阁下可能再去日内瓦吗？周恩来想一想，便用英语诙谐地回答说：Sorry, I am not the Foreign Minister any more! (可惜我不再兼任外长了!)说完立即回头问翻译说得对不对，周围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英国有一位新闻记者有一次对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结束时，周恩来笑着问他：“你怎么那样忧心忡忡呢？你所提的问题都是忧心忡忡的问题。你多大年纪了？”记者回答：“51岁了。”周恩来说：“唔，我比你大多了，可是我不那么担忧。那你又何必呢？”这位记者恍然大悟，对周恩来的谈话顿时加深了理解。

1963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一起访问摩洛哥。哈桑国王盛宴之后，在会客室品茗。谈话中，国王问起中国生产军用飞机和导弹等有关情况，然后突然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笑着说，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今后会怎么样？总理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总随之说道：亚洲有一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总理接着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嘛！说毕，三人哈哈大笑。我国大使在一旁也不禁笑出声来，并暗自思忖：哈桑事前可能有所准备，问题提的相当巧妙，而总理和陈总的回答更是妙趣横生，诙谐中含有深意。

周恩来的幽默

“幽默”是20年代初林语堂(1895—1976)从英文humour音译过来的外来语，原意是诙谐、滑稽。我国古代只有“滑稽”一词，其代表人物是战国稷下学宫的博士淳于髡。此公并不滑稽，却很幽默，曾以其幽默完成几次外交使命，并难倒孟夫子。幽默与滑稽不同，不能在它们之间画等号。

幽默就是风趣巧妙地思考和表述问题，是一种智慧，一种艺术。有幽默感的人，善于不失时机地抓住事物有趣的一面，分寸得当地以诙谐的语言和动作，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幽默可以使人们的关系变得亲切、自然、和谐，幽默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有句格言说得好：“幽默是生活波涛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9—247页。

孔繁农在外交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36页。

《研究周恩来》第331页。

中的救生圈”。幽默，可令心头的愁云化为乌有，幽默者的生活愉快而充实，幽默者受到他人的欢迎和喜爱。幽默的人必然乐观，乐观的人往往幽默。幽默乐观的人，能将生活点缀得绚丽多彩，并为创建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断奉献。

幽默是“亦庄亦谐”，是智慧的火花，是心灵的折射，是含蓄的批评，是深刻的启迪。幽默可缓解紧张，可稀释敌意，可消除隔阂，可化险为夷，可震撼魂魄。幽默不是浅薄的戏谑，不是带刺的讥讽，不是恶意的挖苦，不是冷漠的奚落，更不是暗枪冷箭。

有幽默感的外交家，他的话有时一句顶一万句。

外国人对周恩来的幽默留有难忘的印象，说他的幽默语言，寓意很深，对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有同感。

幽默有时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几个外国记者存心刁难周恩来。一个记者突然发问：“中国人走路为什么总是弯腰，低头呢？你看，我们国家的人走路总是挺着胸，昂着头的。”周恩来说：“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嘛，能不弯腰埋头使劲吗？你们走的是下坡路嘛，能不挺胸昂头吗？”几句幽默含蓄的话语就把主动挑衅的外国记者推到了被动位置，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幽默机智而叹服。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时，就苏联处理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以及处理兄弟党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等问题，当面对赫鲁晓夫进行了真诚而又善意的批评。然而赫鲁晓夫听不进去了，他“炸”了似地弹起来，粗鲁地指责东欧的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是什么“狗屎”，“坏蛋”，“像驴一样”，遭到周恩来的反驳。赫鲁晓夫怒不可遏，此时他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涌了上来。他瞪着那双牛一样的眼睛对周恩来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周恩来听了这话，脸色严肃起来。他巧妙地回敬了一句：“你说得对，赫鲁晓夫同志。但是我也有共同之处：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赫鲁晓夫一怔，显得十分尴尬。周恩来这句话听起来既幽默又含蓄，说穿了就是：你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而我则光荣地背叛了资产阶级。多么锋利，简直是一针见血！

有一次，周恩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哈哈一声大笑，竟产生了比千言万语还要大的魅力，化解了一场异常严峻的氛围。那是1964年12月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了一个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参加的有亚非国家

高占祥：《幽默乐观》，《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3月3日。

《林语堂自传》第88页。

《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37页。

程绍堂：《生活需要幽默》，《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6月2日。

智南：《周恩来与赫鲁晓夫》，《大地》月刊1994年第10期。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342页。

的许多著名作家。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一道出现。在座的老作家刘白羽意识到这是一次极其隆重的会见。哪里知道，毛泽东一落座就指了指中国代表团，向外国朋友说：“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这一来整个会场一下僵住了。毛泽东的话音一落地，周恩来就大笑起来，他没有说一句话，但这笑声却像是在理解毛泽东刚才说了一句幽默的言语，使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于是整个会场上的人，连外国人带中国人都笑起来，毛泽东也跟着幽默地笑了起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冰消雪化。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刘白羽回忆说，我有一次想到这件事，觉察到毛泽东当时不是偶然失言，而是有所针对的。但只有周恩来才能那样机智而又那样圆满地在一瞬间处理了这一难以处理的场面，一下化险为夷。我不禁更加佩服起周总理来。真是毛泽东一语惊四座，周恩来一笑尽解颐。周恩来深感遗憾的是，他虽然竭尽全力，仍无法挽救被封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中国作家在毛泽东亲自动员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历尽浩劫，而并非作家的刘少奇则首当其冲，蒙冤辞世！周恩来自己的健康也因此受到极大的损伤。

第十七章 科学预见与调查研究

周恩来“未卜先知”

周恩来具有“一叶知秋”(《淮南子·说山训》)、“见微知著”(《国语·晋语二》)和“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新序·杂事》)的睿智，已为举世所公认。在当代电讯传递瞬息可达、看电视听广播就可以了解世界大事的情况下，所谓“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在周恩来身上则表现为他那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深邃的洞察力和科学的预见上。这种“未卜先知”(《元曲选》1035)的智慧，是外交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因素。

据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回忆，周恩来一生有过“三次预见预言”。其实不止此数，且不说其中一次为秘书解释神签是否也算作预见预言。作者在这里还可以补充几次。

早在1916年10月，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一次演说比赛中，以“中国现时之危机”为题，深刻分析了国家的内忧外患之交叉紧迫，谓“吾敢断言，五载之内、发生必矣”。他说的“发生必矣”是指大战结束之后，列强又将竞相鱼肉中国。真是不幸言中。为时不过3年，1919年巴黎分赃会议召开，帝国主义又对我虎视眈眈，日本则乘机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种种特权，其时周恩来只有18岁，而目光之敏锐，见识之超群，预见之准确，实在令人叫绝！

本世纪20年代初年，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时，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德国复辟势力卷土重来的原因，深感不安，已隐约预见日后希特勒将崛起于欧洲的危机。他的预见已被历史所证实。

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前卫士长马坤，请他到了台湾向蒋介石和马坤的老朋友转达几句话，就说国共合作过两次，现在我们并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不排除任何人，只要他赞成和谈。马坤说，蒋介石是美国教会他信教的，而这些美国人现在不愿意劝他放下枪和剑。周恩来说，那不要紧。他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是使台湾回归祖国，成为祖国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多。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此外，他还说过，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这表明，周恩来已有台湾可在保留其制度的框架中同大陆统一起来的构想，只是尚未到

详见《三次预见预言》，《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171页。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16—17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41页。

《不尽的思念》第479页。

明确提出的时候。

周恩来不但早已预见“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继续坚持其错误，必将导致国家变色的严重后果，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同样的看法。

1950年周恩来同苏方谈判签订友好互助条约时，已经觉察到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可能走向反面。朝鲜战争，他们一个子儿不给，却要新生的中国掏钱购买他们的武器去抗美援朝。跟着又在波匈事件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对苏联党和国家是一个转机，周恩来呼吁兄弟国家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为的是劝说苏联继任者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结果失望了。1965年3月他访问河内时，面告他的亲密战友胡志明：经过几个月观察，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苏共新领导执行的就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根本不可能改变。

1969年10月21日，周恩来接见来访的多米尼加前总统胡安·博什。博什说，他这次途经莫斯科，惊奇地看到苏联社会还是个阶级社会。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很多人不承认。所以我说你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事实上周恩来早就看出苏联仍然是个阶级社会，他在建国初期便告诫不要事事照抄苏联的经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苏联模式不可为范。

1970年10月23日午夜，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机械工业部部长时已明确指出，苏联从十月革命到现在50多年了，还没有摸索出一个定型的东西。过去我们学习苏联，不行了，行不通。照抄别人的总要付出代价。赫鲁晓夫同我们闹翻了，我们(从苏联模式中)得到解放了。——

周恩来逝世不过15年，苏联解体，东欧一系列兄弟国家相继变质，“社会主义明灯”也熄灭了。

对于越南的抗美斗争，周恩来早就预见到最终的失败者将是“强大无比”的美国侵略者。这不完全是出于“得道多助”(《孟子·公孙丑下》)的道德信念，而是对客观事物的深刻了解。他多次向越南领导人阐明他的观点，以坚定其信心。到了1973年1月3日他在会见基辛格的谈判对手黎德寿时，预言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美国佬会尽快撤走。果然，一年后美国便决定开始从越南撤军。

自己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核武器却又为它的使用吓得全身发抖的赫鲁晓夫，以此为借口力图制止中国拥有自卫的核武器。对核武器的发展是否会导致核战争灾难的问题，周恩来的预见更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早在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毛泽东称之为“纸老虎”的原子弹，他和周恩来就已料定美国不可能长期垄断核武器，而拥有核武器的

1963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和傅作义两次致函陈诚，表示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外，悉听台湾权宜处理。这表明中央已有“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久，陈诚去职，1965年去世，跟着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蒋介石、蒋经国去世后，此议遂寝。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38、545、569页。

国家多了，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增长，但是局部战争不可避免。1961年9月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问北京，同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有同样的看法。此后西方才出现核威慑、核平衡战略的理论。

1963年7月12日，周恩来接见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秘书。这位秘书是为了面交罗素90寿辰纪念册和罗素近著《非武装的胜利》专程来会见周恩来的。他说，这是一本只包含一句话的小册子，是供火星上小孩读的。这句话是，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以来，人类就尽一切力量干蠢事。书中最后有核爆炸图片，表示人类将以此告终！可见这位老哲学家对核武器已忧心如焚，不能自己。周恩来认为这太悲观了。他讲了一通人类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唯物史观之后，进而发挥他的哲学思想说，人们在偶然现象损害力小时，注意力就小；在知道偶然现象损害力大时，注意力就大。现在人们知道核战争的毁灭性，就会注意对它的保险和防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知道它会伤人，也会伤自己。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同意不使用核武器。大家都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危害性，最后就可以达成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事实也在一步一步地证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除了将在禁止核试验达成全球性协议之外，也必将步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后尘，最终达成不使用核武器乃至销毁核武器的协议。

中美关系解冻前15年的1957年9月，两国没有任何贸易往来，周恩来在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时答复提问说，两国的经济往来和技术合作是阻挡不住的，因为彼此互有需求。1964年，中日的民间贸易额很小，周恩来对日本经济界人士说，今后在真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十年后就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事实果然如此。周恩来这些英明预见和预言，都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了，尚未公布的档案，还将进一步透露更多的预见。这些屡试不爽的预见是因为周恩来具有“未卜先知”的那种生而知之的天才吗？当然不是。春秋初期，齐桓公进兵孤竹（今河北卢龙至辽宁朝阳一带）陷入所谓迷谷时，有“老马识途”之智的管仲，挑选当地的老马引路，走出迷谷而免于覆灭。齐桓公立拜管仲于马前曰：“仲父之圣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回答说：“臣非圣也，善承教也。”（《管子·小问》）译成现代白话是：“我不是圣人，我不过善于学习罢了。”管仲的话，对周恩来来说，再恰当不过了。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未得证实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没有谁像周恩来那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19、321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64—365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44、414页。

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周恩来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前途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其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周恩来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__周恩来在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着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上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周恩来不是“未卜”，他是卜过的。他这个“卜”，和“神机妙算”(《全唐诗》94)中的“机”与“算”，不是到寺庙中去求神签，也不用《易经》的办法占卜，而是凭借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因而是科学的论断。

周恩来如何进行调查研究

周恩来从小就刻苦学习，勤奋钻研。他从来就把学习与调研密切结合起来，懂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的道理，理解“三人行，必有我师(同上《述而》)的真谛。所以他具有“每事问”(同上《八佾》)，“不耻下问”(同上《为政》)虚心请教的态度，发扬了“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同上《为政》)、坚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同上《子罕》)那种不主观臆测、不绝对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是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些还逐渐融化到他的品格中，并发展为思想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升华为政治上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开始对日本社会的调查研究。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他通过日本社会“百现象”逐步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腐朽本质，明确了要走日本维新的军国主义道路以救中国是行不通了，必须另找出路。出路何在？他从研究各种“新思潮”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终于在“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1921年周恩来留学西欧，认为“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1、35页。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6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277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00页。

也。”“ 虚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象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干吾民族间者”，进一步认识到“ 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他在伦敦期间对英国作“ 社会实况之考查”，深入工厂、煤矿参加生产劳动，实地了解英国工人运动。他想在中国组织工会为职工福利进行斗争的思想就是在这次考察中产生的。

凡事必调查研究，这是周恩来的基本工作方法。他本着“ 不做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 的信念，无论工作多忙，从不肯放过一个个他认为是调查研究的好机会。他随时随地都在做调查，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各样的人——有实践经验的、内行的、有专门知识的，中国的、外国的——做调查。调查研究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简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总是抓住时机，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做调查研究。有时虽是礼节性的会见，时间很短，他也不放过。他说：“ 接见外宾，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也是调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学习的好机会，这是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不要放过。”

1970年7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正在我国访问。有关部门没有考虑请周恩来接见。当他得知该团成员多数来自日本农村，又是基层的工作人员时，为调查了解日本农村的情况，周恩来决定接见。周恩来说：“ 放着这么多人，主动送上门来，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今天我把其他工作都放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我舍不得这个机会，见他们一次，专干这个事，做调查嘛！” 周恩来于7月31日午夜12：30至8月1日凌晨4：50，同外宾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从日本农村的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到使用的农业机械。农民收入等等，都一一详尽地做了调查。周恩来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虚心向外国朋友求教的态度，不仅使在场的中国同志深受教育，而且也打动了外宾的心。该访华团团团长常山升回国后，又专门找了从事农村研究的菅沼正久教授，重新收集了大批材料，并同菅沼教授一起再次访华，向我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

由于这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人之短，引为借鉴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周恩来的思维方式，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也一向主张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到世界大背景中去，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潮头上去，不能做“ 井底之蛙”，不能故步自封。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对比，才能竞争。周恩来主张，对此不仅要与自己的过去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93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90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91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9页。

《我们的周总理》第539页。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87、91页。

作纵向比，看到自己取得的进步；而且要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作横向比，看到我们还很落后，很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要急起直追。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一切先进的东西都要学，目的是使我们自己变得先进起来。正是在这种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的支配下，周恩来总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要进展及其在工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应用。他除了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实地考察外国的情况外，还把在国内接见大批外宾作为调查外国情况，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极好机会。向日本来宾询问农业机械化这件事，还生动地表现了周恩来调查研究的一贯态度：诚心诚意地做小学生。其前提，就是要承认自己对所调查研究的问题不懂得，或不甚懂得。自以为什么都懂得了，还调查做什么呢？可见，调查研究，当然有方法技巧问题，但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方法、技巧问题，而是态度问题。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有恭恭敬敬做小学生的态度。要诚心诚意，不能虚情假意。

周恩来在处理涉外问题时，总是坚持对有关的历史和现状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遇有特别重要的文件，他看完秘书的摘要，还要看全文，有时还圈圈点点。他也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他常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

中缅边界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同邻国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周恩来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取得宝贵经验，对我国解决同其他邻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进行的调查研究，耗去了更多的心血。他对中印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之具体透彻，连印度主管官员也自叹不如。外交部主管其事者更有深切的体会。1962年为了发表照会揭露印度在中印边境的挑衅，需要配一张示意图。这张图几个单位都审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不料到了周恩来手中，他竟指出少画了一个印军侵略据点的错误。在图上不过是少了一个小黑点，但在严肃的国际斗争中，却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漏洞。

周恩来召集有关同志商讨外交重大问题，有时是一杆子插到底，从部长副部长、有关司长处长，直到主管科员都找来，听取意见，特别注意找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来共同研究。1973年某国发生政变，他深夜开会讨论对策。当他听说有一位同志刚从驻该国使馆回来，不问其级别，马上派人接到会上，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谈该国的最新情况。

周恩来主持讨论会，从不唱独角戏，总是鼓励、启发大家提意见，特别提不同意见。他经常说：“不怕提不同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嘛！”如果听不

刘泾山、时学军：《周恩来的思维艺术》第31—32页。

《我们的周总理》第539—540页。

亚洲司同志在外交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我们的周总理》第541页。

到不同意见，他就说：“要你们来就是提意见，不提意见来干什么？”“都让我一人拿意见，还讨论什么？”如果有人提出了好意见，他就采纳，事后还讲这个意见是谁提的，他说这叫“不能掠人之美”。

周恩来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他从不轻信自己的记忆，遇到问题常常戴着老花镜查阅原著、资料、地图或辞典等工具书；遇有不熟悉的地名，总要从地图上找出来才放心。如有引语，一定要查到原出处。遇到有关理论问题，常常要翻阅马列主义著作，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反复领会思索。

周恩来一再强调，“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他说：“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之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

对外事调研的要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然而即使它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也不等于说人人都能身体力行。作者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常常因为调研工作是“软课题”被办案工作的“硬任务”所挤掉而深感苦恼，归根结蒂就是由于没有真正认识到调研工作是硬功夫，是外事工作成败的关键。

周恩来历来十分重视外事调研。从1938年在武汉成立国际宣传组到解放前夕成立中央外事组，他都作了一系列加强调研的指示和具体安排。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恩来就把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在部内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自兼主任。当时规定该会的研究对象是：(1)一般问题；(2)专门问题涉及许多国家而又不属于国际司主管业务者；(3)特定问题；(4)我国外交政策问题。总之，既须作系统研究，又要研究临时性问题。

此外，部内还出版《外事调研》和《业务研究》两种刊物。部内调研成品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外事调研，是对各国基本情况和重大国际问题的系统研究；二是临时通报，是对当前国际动向和临时问题的研究和报道；三是业务研究，对领事、礼宾、条约、法律、总务、人事等各种专业问题的研究。各地区业务司和驻外使领馆也都有各自的调研课题。同时还建立四个机构：一所学校(外交学院)、一个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个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一个图书馆(事实上研究所和外交部本身各有一个图书馆)。这四个

《我们的周总理》第542、540页。

《研究周恩来》第296页。

《研究周恩来》第295页。

《张闻天传》第620页。

机构各有自己的研究计划和出版物。外交部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正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蓬勃开展起来的。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事调研的卓越奠基人。

周恩来自己抓外事调研一丝不苟，对外交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强调外交干部要加强学习，努力钻研业务，成为熟悉情况的“活字典”。他提倡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要学一门外语，以便研究各国情况。他要求各单位经常积累有关各国的基础材料，制成卡片，不断补充；要求外交干部学会抓材料，要抓得恰当、及时，不要多，但要有分量，要经过思考，特别要求大使们自己动手写调研报告。他说动手写东西可以使你的思想得到发展，不写成套的东西，就不能在思想上有个整理的过程。他强调调研文章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要有内容，有来源，有数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计，要短而精，可以一题一分折。写文章要注意三性：阶级性，鲜明性，准确性。

周恩来每次了解情况总要刨根问底。外交部的干部到他那里去，随时都要准备接受这种“考试”，常有负责干部由于答不上来而受到批评的情况。1971年8月20日，周恩来向一些领导干部讲解第二天报上发表的关于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外交声明，提到美国为了在联合国坚持制造“两个中国”而找20个国家开了一个会。他问与会同志，在亚非拉，欧洲和大洋洲各有哪些国家参加了这个会议？被问者绝大多数答不上来。周恩来严肃地说，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样子不行啊。接着，他一一说出这些国家的名称，并指出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在周恩来那里开这样一次会，对大家的教育有多深刻，可想而知。而在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的20多年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有一次，周恩来在会上问一位司级干部某国总理的名字，这位同志说出了中文译名的姓氏。周恩来不满意，要他说出英文全名，这位同志答不上来。周恩来说这样不行啊！应该知道外国人的全名和外文字母的拼法，光记住一个姓，容易引起误会；外国人也和中国一样，同名的不少，同姓的就更多了。

周恩来对统计数字尤其认真仔细，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计划项目，每个数字虽经秘书核实，他还要亲自核算一遍。他最听不得“估计”、“大概”、

《研究周恩来》第300页。

韩叙、凌青在外交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建部初期，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副司长，外衣两个口袋装着各种材料。他有一次开玩笑说，到总理那里去，不能一问三不知，他一问起来，如果这个口袋的材料不对，就得换出另外一个口袋的材料来应付。

指内部发行登载世界主要通讯社当日电讯的刊物。

《研究周恩来》第300—301页。

韩念龙在外交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说“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挥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重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外交要为国内的建设服务，要重视经济、科技调研，这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早在1956年，他就指示我驻西北欧国家的使节们(当时尚未同西方发达国家建交)要尽可能参观人家的工业设施，了解人家工业技术的特长，介绍给国内。1966年，他又强调：驻西方的外交人员要学点科学，我们要有根高的政治水平，又要有很高的科技水平，这也是两结合。在西方当大使要亲自学些东西，自己不懂，可以找一两个帮手，认真啃点东西。他还要求驻西欧地区的使节们回国向他汇报工作时，要谈科技情况。

周恩来常用“天涯何外无芳草”的诗句教育外交人员认真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期间，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并一再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部落后，非洲国家有根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他对驻几内亚使馆一位年轻同志说：“非洲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陆。在非洲工作大有可为。你们要立足于几内亚，放眼全非洲。要热爱非洲，熟悉非洲。你知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两句诗的意思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周恩来转身对陈老总和黄镇说：“可惜喽，我们的高级干部还不懂这首诗的含义呢。”陈黄对视了一下。他们清楚这是周恩来不点名地批评一位老同志不愿出使非洲。

当时国内正在开展石油大会战。为了借鉴人家的经验，周恩来一路上非常留意参观炼油厂。在加纳，他路经一家炼油厂时，主动要求参观，后来便将该厂的长处介绍给国内主管部门。

他在摩洛哥参观一座炼油厂，兴致甚高，问得很详细。他对使馆的同志说，外国人帮助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生产能力与此厂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六千人，而这个厂包括技师在内总共才三百多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等惊人！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专家来考察。果然，周恩来回国后，很快就指示石油部派来一位总工程师。还有一次，周恩来在使馆用餐时，感慨地说，全世界柑桔的老祖宗是中国，可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柑桔退化，原因是缺少科技人员对改良品种进行专门研究。当他听说有一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柑桔专家、法籍教授就在摩洛哥工作后，便建议使馆先选些优良品种的树苗运回国。他回国后不久，果然由广州和西双版纳两个植物研究所派人去考察，并在那位法籍教授的协助下挑选了已嫁接好的三十来个优良品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68—169页。

《研究周恩来》第299页。

尹家民：《将军不辱使命》第176页。

《研究周恩来》第300页。

种的树苗 300 株空运广州。这位法籍教授也应邀访华，作了几次有价值的学术报告。

他经常教导外交人员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而要多活动，多接触，多调查研究。他说要活动，但不要什么都做，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交朋友，要调查。他还说，为了进行外交活动，首先必须学习，必须由学习进入活动。

1955 年 7 月，因上海市长陈毅需要他继续留下来担任文化局长而从未到职的外交部第一任亚洲司司长夏衍改任文化部副部长，终于来到北京。周恩来视夏衍为亲密战友。夏衍到文化部上任前夕，周恩来找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因为文化部也有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周恩来的谈话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外事工作，你就得从头学起，不能掉以轻心。”他谈了许多问题，其中青重讲的是“三勤”——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工作的范围扩大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懂的业务更广了，要交的朋友更多、也更复杂了。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要遵守外事纪律，同时要学一点外交艺术。从广义上说，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不能忘记内外有别。

夏衍认为，周恩来从新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战后世界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如对战争与和平，对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政府外交与民间交往，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主动与被动，对必然与偶然，等等，总是以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评估，经过审慎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决策。

在外事接待工作中，这位老作家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文化部接待的外宾，按惯例，都要事先拟好接待计划上报总理办公室。有的计划还提出希望周恩来接见的要求。夏衍以为周恩来日理万机，不可能亲自批阅。事实上，凡涉及请示报告，周恩来是无一放过的。周恩来常常亲笔在接待计划上一条一条地批注，提出他要了解的问题；有时甚至深夜打电话，要夏衍和接待单位的负责人向他当面汇报。1956 年为了接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周恩来把夏衍和阳翰笙找去面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我会见，那就得让我知道这个代表团的具体情况。你们这个计划也未免写得太简单了，团长只写了职务和年龄，过去的经历，专业，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有没有到过中国，哪一县市的人，全是空白。中国文艺界有京派、海派，日本也有关西、关东学派之分。你们随便送个报告，很轻松，你们主动，使我这个要会见他们的人就陷于被动了。他指着那份用红铅笔画了问号的文件说，“团员皆文化界知名人士”，太笼统了。团员一共几位？是美术家还是

《研究周恩来》第 331—332 页。

《研究周恩来》第 299 页。

《研究周恩来》第 20—28 页。

音乐家？中日还没有建交，得不到使领馆的帮助，为什么不问问廖承志他们呢？为什么不问问西园寺公一呢？

夏衍说，会见过周恩来的外宾都说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除了他的才华和丰富的经验之外，也和他会在会见之前有针对性的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他会见外宾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政治思想倾向，还会问到对方的籍贯、健康、家庭，乃至个人的性格和兴趣。在会见中岛的时候，廖承志也在座，他说了一句中岛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会后周恩来就对夏衍说，你不是也喜欢集邮吗？你可以把你的集邮请他看看，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这比送什么礼品都会更让他高兴。——

周恩来不但对文化部提出上述要求，他对包括外交部的所有涉外部门，也都有同样的要求，所以类似事例是多不胜举的。

周恩来对发生涉外的意外事件，要求采取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不允许轻率处理。1963年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海域沉没了。当时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主张发抗议；有的说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有两次响动。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亲自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船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周恩来认为“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可能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他随即派海军带着潜水员到沉船现场，潜入海底勘察，终于查明真相。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正确。

1967年6月，我驻东德使馆的一辆汽车同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我方死伤数人。当时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使馆一些同志未弄清情况就怀疑甚至断定是一起政治谋害，擅自向驻在国外交部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查明事故原委。调查组离京前，周恩来特别叮嘱他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先入为主。调查的结果表明，那并不是一次政治谋害事件，而是一次车祸，而且主要责任在我方。今天，“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了，但在调查研究方法中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仍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可以从周恩来的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中得到极大的启发。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外事工作者必须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在重要的时刻，重温周恩来关于外事调研的论述和实践，继承和发扬他所提倡的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研究周恩来》第23—24、24页。

《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第69—70页。

《研究周恩来》第298、301页。

第十八章 国际宣传与外交

宣传与外交的关系

就一定意义说，新中国的外交是从国际宣传开始的；让世界了解“红星照耀中国”，也是从宣传入手的。外交与宣传的关系，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周恩来既是杰出的外交家，当然也是国际宣传的大师。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从实践中体会到宣传可以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政治作用。他当过记者、编辑，办过刊物、报纸，对宣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外交通过宣传所产生的影响视传播媒体发育的程度而定。在传媒尚未诞生，或者虽已形成但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宣传对外交的影响是有限的。传媒主要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它们的传播手段主要靠电讯技术。传播媒体的主体是人，传播媒体是通过人运作的。周恩来牢牢掌握了“人”这个宣传的主体；他靠“人”去宣传，对“人”进行宣传。

世界第一张报纸《新英格兰报》是在1720年创刊的。1791年美国杰斐逊(1743—1826)在30个月之后才收到美国驻西班牙代办发回的电报而叫苦不迭。7年后，即1898年，无线电技术才开始在欧洲进入实用阶段。1910年无线电收发功能开始在美国应用。1929年美国首次进行彩色电视的实验。此后传媒便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以致世人感到地球越来越小了。传播手段的发展不但改变了宣传的速度、形式、效果和范围，也影响了外交的方式、进程，甚至成败。

外交与宣传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美国统治集团从心理学的角度总结他们在越南战争中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能阻挡住新闻记者电视上所反映的极其残酷的厮杀场面，在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战情绪，在政治上给当权派以巨大的压力。这是托词。因此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美国的电视新闻中，只看到密集的美国飞机狂轰滥炸和闪光的火箭到处飞溅，已看不到血腥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宣传与政治、宣传与外交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程度。

欧洲外交史家认为历史上最善于通过传媒为外交服务的高手莫过于19世纪英国外相坎宁(1770—1827，1827年任首相)和普鲁士—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兼外长俾斯麦，说他们往往肆无忌惮地，也可以说是丧尽天良地

(unscrupulously)制造公众舆论以遂其政策目标。就俾斯麦而言，事例之一是：奥地利战争(1866年)之后，在同法国谈判时，俾斯麦从法国驻普大使手中接到一份秘密联盟条约草案，包括拿破仑三世要求从德意志割让领土的内容。俾斯麦不同意接受这样的条约，对此不置可否，却小心翼翼地将条约草案和他拒绝该条约的意见透露给巴黎反对派的报纸。这一曝光引起轩然大波，法国外长被迫下台。事例之二是，法国驻普大使在同俾斯麦会谈之后，

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说是普鲁士同意法国兼并比利时，等等。俾斯麦将备忘录留待法国 1870 年对普宣战时，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全文发表，从而赢得英国公众对普鲁士的同情。事例之三是，本书前已述及俾斯麦的“埃姆斯电报”所引起的后果在欧洲外交史上的传闻。然而他们企图影响的只不过限于对国际事务有兴趣的一小群人。以后其他人的做法就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了。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1856—1924)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公之于世，他的对象是指向全球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传媒对付敌人，欺骗群众。

为“一鸣惊人”的国际宣传拉开序幕

如果说利用传媒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是欧洲外交的首创，那么在现代条件下(智能与传媒)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地从事国际宣传为我所用的大师，莫过于周恩来来了。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立足甫定，便来了由宋庆龄介绍的一位不速之客，头角崭露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周恩来前一年在武汉已同斯诺有过一面之缘)此时只有周恩来预见到此人来访的深远意义。他说服毛泽东同斯诺深谈，并不遗余力地、全面而周密地安排斯诺在边区各地进行广泛深入的采访达四个月之久。斯诺以耳闻目睹、亲身体察的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西行漫记》一书在美国出版，轰动世界。这是第一部客观系统地描绘外界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和边区实际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为国为民的真实形象第一次在世人面前“真身毕露”，揭穿了国民党极尽歪曲丑化的谎言与毁谤，从此堂而皇之地起步走上国际舞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理解。此书遂成为西方研究当代中国的不朽之作，斯诺也因此一举成名。

斯诺从此戴上了“中国人民之友”的桂冠，他也终生无愧于这一称誉。1960年8月在阔别25年之后，斯诺终于冲破美国当局的重重阻力重访故土。周恩来亲自陪他到京郊密云水库作“竟日游”，在来回的火车上长谈。预见到中美高一级的会谈终将到来，在谈到两国关系时，周恩来对斯诺说：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应达成的具体协议包括两点：第一点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包括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点是美国必须同意将其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撤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情。10年之后，正是美国接受了周恩来这两个条件才开始了两国之间的最高级谈判，导致两国关系的解冻。

1963年10月，周恩来嘱咐外交部新闻司长龚澎，托一位英国朋友路过瑞士时，代他探望已移居日内瓦的斯诺。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非洲10国，

他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又一次会见了专程赶来的老朋友斯诺。是年10月，斯诺第二次访问北京。这回周恩来又特意向他透露一件足以震撼世界的新闻。10月16日，即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出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低谷，正在发奋图强，重振雄风。周恩来在接见斯诺时，交给他爆炸的照片。他对斯诺说，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这颗原子弹比你们美国人在广岛投的那一颗还要先进。他又说：这些照片，龚澎没有看过，在座的几位（指负责文化交流工作的同志）也没有看过。你今晚不必忙于发电报，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斯诺事后说，我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先把特大新闻透露给我，而且还有照片，这些照片恐怕会轰动世界。第二天，斯诺立即赶回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幅照片，果然轰动了全球。

外界以为中国这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蓄意”选择在赫鲁晓夫下台时送的“贺礼”，以渲染中国对不受欢迎者下场的政治反应。这些误导流传甚广。周恩来觉得这将造成对中国的误解，他在同斯诺的另一谈话中澄清了事实。他说两件大事凑在一起纯属巧合，其实中国并不知道赫鲁晓夫哪一天下台，而且发射原子弹事先要对各种安全数据进行周密的、科学的预测，不像放焰火似的可以随时随地决定时间。

1970年9月斯诺第三次访问中国。他这一次寓意深刻的表演是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并立观看国庆庆祝活动。这是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场景，意在向美国当局传递一种谈判信息。详情已见前文。

1971年1月15日，周恩来会见斯诺，同他从晚上9:30谈到翌日凌晨5:40。他在谈话中第一次公布了我国1960—1970年10年间的经济情况。斯诺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批准来中国访问的西方记者，他的访华报道自然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周恩来又一次抓住适当时机，属意有影响的新闻媒介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起了释疑解惑、争取人心的巨大作用。

斯诺晚年在日内瓦身患重病，周恩来派了国内最好的医生去为他诊治。1972年2月斯诺病逝，噩耗传来，周恩来不胜悲怆。他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斯诺死后，在他曾任教的燕京大学的校园内（现属北京大学）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以作永久纪念。斯诺并不是以这样的形式为中国人民所怀念的唯一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占有一席之地也不是仅有的另一例。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和作家结下不解之缘的名单不胜列举。

《研究周恩来》第279—280页。

《研究周恩来》第280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622页。

国际宣传中的非官方外交

周恩来历来重视对外国记者的工作。他认为外国记者是向国际社会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的重要媒介，是争取世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要手段。

抗日战争伊始，周恩来在武汉亲自领导国际宣传组工作，亲自同国际友人开展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世界各主要通讯社和报纸驻中国的记者。在周恩来看来，宣传工作是外交过程中十分自然且十分合理的部分。外国人把周恩来此时建立的国际宣传组称之为共产党最早的外交机构。——

在重庆期间，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同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各国援华组织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结交朋友，经常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接待进步人士，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策动内战，断送国土的真相，从而在国际舆论界，特别在美国朝野引起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同时大力宣传党中央关于抗战的讲话和声明，宣传解放区的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奋勇抗敌的战绩，使不少外国人士对党的政策逐步有了较深的了解。当时美国远东军司令史迪威在向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说：蒋介石“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他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援华抗战物资的一部分应分给共产党”。美国驻延安观察组人员目睹解放区朝气蓬勃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也得出结论说，“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将不决定于蒋，而决定于共产党”。

1940年冬，正当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路过重庆，周恩来同她谈了几个长夜，透彻地揭露了蒋介石内战投降的阴谋，预言更大的事变和战争将接踵而至。谈话结束时，他告诉斯特朗：“这些材料暂且下发表，什么时候需要公布，请你等我的话。”不出一个月，蒋介石果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特朗刚从中国回到纽约，便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请将你所知道的材料公诸于世吧。”当时由于国民党新闻封锁，同时散布诬蔑新四军的宣传，使国外许多人士不明真相。周恩来向斯特朗提供的关于蒋介石长期媚日反共、酝酿内战的材料在美国一发表，惊动了世界舆论，使不少人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介石大伤脑筋，后来他甚至公开破口大骂外国舆论对他不公。——同时周恩来还在外交上对英国驻华大使、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和苏联驻华大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的外交压力下，深恐自己在政治上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境地而不得不有所收敛。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5、22页。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2辑，第99页，人民出版社。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2辑，第99页，人民出版社。

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还经常通过外国记者宣传我党寻求国内和平的诚意，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事实以及美国以“调处”为名援蒋打内战的图谋，使后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国际上得到一定理解和支持。

周恩来不但通过直接接触进行外交宣传，而且充分发挥宣传阵地的作用。他作为党中央的代表驻在重庆，实际上是党在那个时期驻在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抗战初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张报纸《新华日报》就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他经常、有时是深夜召集报社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精神。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和重要专论，圈圈点点一字不苟地修改稿件，还经常亲自动笔为报纸撰写社论、代论和专论。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每周写一篇“代论”。据统计，从1938年12月到1946年6月，报纸上就发表了由他署名的文章37篇，此外，还在新华日报社出版的党刊《群众》等杂志上发表了13篇文章。至于经他亲笔修改的文章，更不计其数了。

周恩来要求报社的同志要敢于说出真理，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对敌进行斗争，善于对敌进行斗争；要使《新华日报》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和号角；并提出“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

日本投降后，周恩来预料内战不可避免，《新华日报》将难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存在，立即指示并派人到香港建立新的宣传外交阵地。《华商报》因此在1946年1月复刊，党的声音在《新华日报》被迫停刊后得以继续在海内外传播。

官方外交中的国际宣传

建国后，周恩来仍然频频接待外国记者，并把这项工作同贯彻我国的外交政策巧妙地融为一体，充分运用国际传媒推动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开展。1950年6月，周恩来亲自修改并批准了新中国第一个《外国记者登记暂行条例》，将外国记者的管理工作纳入正规化、正常化轨道。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中中国代表团的新闻组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宣传与外交斗争第一次在国外进行密切的配合，不仅对外宣传工作本身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对外交使命的完成，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建国后周恩来从未在国内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但他对接见来访的记者和记者代表团，几乎有求必应。他的记者招待会都是在出访期间举行的，一方面是没有时间个别接见记者，同时也是为了扩大出访的影响。最集中而突出

《周恩来研究》第422页。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的事例是 1963 年末 1964 年初他的亚非 13 国之行，先后在开罗、达卡、摩加迪沙等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开罗是此行第一站，也是此行外国记者最集中的地方，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此行的目的，阐述中国对非洲以及记者所关心的其他问题的政策，对此行有重大的意义。我国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以及对外援助八项原则，都是在这一类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周恩来仍然留心将一些重大事件让有影响的外国记者率先向外披露。他提醒外交部随时将要求访华的外国记者特别是有影响的记者或专栏作家的要求及时上报，1971 年 7 月中美关系开始解冻，8 月初《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夫妇来访。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长达 4 个多小时的谈话，充分阐述我国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一贯立场，提出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所在；说明我对核试验和核武器的一贯政策。周恩来还着重介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并欢迎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赖斯顿以《中国通讯》为题，就访华所见、所闻、所感连续写了 17 篇报道，赞扬“睡狮正在觉醒”，认为美国政府必须“按照不断改变的事实来审查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这些文章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反响。事实上这是周恩来对基辛格二次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前夕，通过公开的报道，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对他们两人打招呼，并让美国公众思想上有所准备。

周恩来究竟接待过多少外国记者，至今尚无确切统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政府首脑接见外国记者为数之多、谈话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在世界外交史上，迄今只有周恩来一人。他是我国新闻外交史上的光辉典范。

周恩来同外国记者谈话的方式灵活多样。有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有时说的内容很多，但要求少报道；有时则明确交待所谈内容仅供参考，不能公开发表；有时谈话之后又叮嘱外交部新闻司再补充有关资料供记者报道；有时先安排有关人士同记者接触，然后再根据情况由他深入交谈；有时又先让记者参观或看有关资料、电影，然后再谈。这样大大扩大了宣传效果。

周恩来深知宣传与外交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外交需要宣传，宣传得当，有利于外交。得当，包括内容和形式，时间和地点，对象和方法，适度 and 界限，分寸和轻重，等等。必须掌握的关键是实事求是，过与不及，夸张与虚假，都不是实事求是。什么问题应事前披露，什么问题应事后报道，报道采取社论、声明或通讯等方式都要考虑。什么问题应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在电视上放映，什么问题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什么问题应该揭露，什么问题应该反击，什么问题着重于说明，什么问题偏重于批判，周恩来在这些方面都做出表率。

周恩来从事对外宣传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长时间的，有时是直

这次记者招待会全文，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373—389 页。

《研究周恩来》第 277—278 页。谈话日期和内容参照《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600 页作了订正和补充。

接的，有时是间接的。多方面，是指他所宣传的对象不仅是新闻记者，也包括士、农、工、商、学、政界、宗教界、艺术家、运动员等，用他的话来说，是“来者不拒”。多层次，是指他的宣传内容由表及里，由单一而多元，由点及面。多形式是指新闻、电影、文体，丰富多彩。他的谈话有时通宵达旦。遇有重要文件的广播，周恩来往往亲自部署，亲自审阅广播稿，要求简明扼要，删掉过多的形容词。有时找播音员亲自讲解文件的政治意义，每个段落如何广播，如何掌握速度，如何间歇，等等。

中国的新闻记者在未建交的国家中，有时可以起沟通两国关系的作用。周恩来尤其重视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把他们当作文化使节看待，出国前往往往亲自向他们介绍东道国的情况，交待我国政策，提醒应注意事项，吩咐要学习人家的优秀文化艺术。

周恩来同来访的日本体育和艺术代表团成员还建立令他们怀念不已的友谊。将体育与外交结合运用的典型要算是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了。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同样重视电影在外交中的作用。新中国初期派出的电影代表团携带的影片，事先都经过周恩来的审查。它们在国外所引起的反响，有时可以产生一下子缩短与东道国距离的作用。发生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一段插曲，更加生动地显示，周恩来通过电影进行国际宣传的艺术之高超。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新闻报道组，曾为云集日内瓦采访这一重大国际会议的各大通讯社和各国记者专门演过一场新中国电影，反应很好。周恩来听说后，建议再给他们演一部当时在国内倾倒观众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报道组先在旅馆住所试映，旅馆里的瑞士职工也来观看。不料放映不久，他们便纷纷退场了。报道组为了便于观众了解剧情，便组织人力编写了剧情介绍，并拟译成英文发给外国记者。负责这一工作的是熊向晖。他说周恩来获悉后，当面批评他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周恩来不光是批评了事，他还出主意，帮助解决问题。他说，只消在请柬上写一句“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略作说明，概括地介绍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熊向晖回忆说，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放映前座位已全部爆满，那位吃

八股文起源于宋元，盛行于明清的科举考试。以《四书》内容为题，起端为破题、承题，后为起讲。起讲之后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末股四个段落抒发议论。每个段落都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共八股，故称八股文。这是封建统治者扼杀人才、统制思想的工具。党八股是指中国共产党内的一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文风。1942年在延安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中，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党的文风。

过闭门羹的台湾中央社记者也来了。来晚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

演到“哭坟”、“化蝶”，可以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灯光复明，观众还似醉如痴地坐着，大约沉默了一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事后，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说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性。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虽然这场“赌博”周恩来是赢家。

熊向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到美国留过学，对西方文化颇多了解。莎翁著作也是他所熟悉的。他在周恩来领导下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秘密工作，抗战期间对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保卫延安曾作出重要贡献。他的学识与机敏堪称上乘。为什么在放映《梁祝》的问题上赌输了一瓶茅台酒呢？这说明从事国际宣传，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只是一般地了解对方的文学艺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学习一点心理学，懂得宣传对象的心理；如何宣传，也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罗·朱》歌剧在西方上演了几百年，《梁祝》的故事在中国也广为流传。周恩来抓住了外国观众急于一睹中国的《罗·朱》究竟如何的心理，一个题目胜过上千的文字说明，运用之妙，大概只有周恩来才有此“灵性”。

一名日本记者心目中的周恩来

作为中日两国互换的第一批记者之一的东京《每日新闻》首任驻北京特派记者新井宝雄，对周恩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他说有一天，他们正在机场休息室等待一位外国贵宾到来。当周恩来快步进来时，他们立即起立默默施礼。周恩来走过来问道：“你们是哪一国的？”当他得知是日本记者时，似乎考虑了什么，但还是很快伸出手来，一边用温和的目光注视，一边郑重地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离去。这是一种既高雅又爽快的举动。

新井认为周恩来对他们略现迟疑，是因为当时到日本赴任的7名中国常驻记者实际上是在“保护”的名义下被置于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他们即使在某些场合遇见日本外相等要员，也往往受到冷落，仿佛是“不受欢迎的人”似的。他认为周恩来不会不知道这种情况，所以遇到日本记者不免犹豫一下。然而周恩来随即果断地伸出手来热情握手。他说这虽然是桩小事，其意义却

是深远的。

除了中国驻日记者受到不礼貌的对待，那时日中关系又由于“吉田信件”（不准在对华贸易中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笼罩着险恶的气氛，佐藤内阁甚至明目张胆地抛出“一中一台”的政策。然而周恩来对日本记者的态度没有丝毫变化，他同意廖承志每月在东安市场的日本料理同新井等人聚会一次。当时世界上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军开始轰炸越南北方，中苏对立加剧，印巴爆发武装冲突，中印边境形势紧张，等等。在这种形势下，不仅针对日中问题，还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能每月一次同接近周恩来的部长级的重要人自由交谈，这对记者来说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好事。当时在北京的一大批来自苏联、东欧和西方的记者，能见到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就算是很幸运了。至于“自由讨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一种破格的待遇。日本记者因此竟成为苏联和东欧记者的采访对象。更令日本记者感动的是，尽管日本当局同蒋介石进一步勾结而使日中关系出现更加险恶的势态，他们却从权威人士那里获悉周恩来制订了不依靠日本赔款从事经济建设，因而不向日本索赔的方针。新井不禁们心自问：如果将战争胜利者与失败者的位置颠倒过来，日本会采取什么态度呢？（新井想必不会忘记马关条约除强迫清政府赔偿 2 万万两白银之外，还对台湾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更不要说其后侵占东北达 14 年之久，以及蚕食鲸吞华北广大地区的罪行了）他说自己每当想起这些，就越发痛感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那种囊括万物的博大胸怀和洞察未来的政治远见。

新井说他在担任常驻北京记者期间，亲眼目睹了周恩来不为时代风波所干扰，孜孜不倦地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中友好以及永久和平而辛勤工作的高大形象。这也是引导他更加深入地走上日中友好这条康庄大道的一个转折点。新井回国后撰写了《周恩来的实践》和《领导能力的秘密》两本纪念周恩来的书。他说在撰写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廉洁奉公，无私地彻底地为人民奉献等高尚品德的过程中，不知有多少次禁不住潜然泪下。

对从事国际宣传者的要求

周恩来不但自己积极做外国记者的工作，而且要求各有关部门也这样做。他指示外交部新闻司，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外国记者的工作，新闻司应当成为“很敏锐的触角”。他针对一些同志害怕同外国记者接触的情况说：“怕什么？怕说错话犯错误？但不接触你们怎么了解他们呢？……在游泳中学游泳，不要怕犯错误，否则，怎么能提高呢？”他对下面的干部不但要求严格，而且精心指导，具体帮助。他亲自规定和倡导的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原则、

方法和作风，至今仍然指导着各单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出发前亲自主持研究了新闻报道和对外国记者的工作，并就此作了5点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妄动。(3)回答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要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他还对代表团负责新闻宣传的同志说，接待外国记者方式大呆板，只是“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效果不大。对友好记者，可举行小型宴会；对一般记者可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茶，吃中国菜，边吃边谈，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这是为了便于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对外政策。

周恩来特别强调做外国记者工作应有周密的调查研究，知彼知己。要了解来访记者有关背景，在情况了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即使对熟悉的老朋友亦不例外。1964年斯诺第二次来访之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新闻司整理1960年斯诺访华后对中国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以及斯诺新著《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的简介等有关材料。周恩来每次对外国记者发表重要讲话前后，都要深入调查有关情况。1963年12月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同中东通讯社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广泛回答了有关我国内外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等问题。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答记者问。中东和非洲许多国家都作了长篇报道。为准备这次谈话，他在出访前便开始了解国际舆论动态、将访问国家主要新闻机构的背景、重要记者的有关情况、外国记者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做到心中有数。1964年12月，他在巴基斯坦举行记者招待会前，也仔细阅读了各种材料。

周恩来对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仓促上阵而现场又随意回答问题的做法，非常不满，多次批评。

周恩来经常告诫外交部的同志，做外国记者的工作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不能强加于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一些极左思潮和做法，他曾强调指出：“一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会适得其反。”对外宣传采取什么方法？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一插就插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插棍子就不行了。不能搞倾盆大雨。

做外国记者的工作，事先事后的调查研究，既要从政治上考虑，又要实

《研究周恩来》第280页。

《领袖交往实录：周恩来》第302—303、304页。

《研究周恩来》第281页。

《研究周恩来》第282页。

事求是，要体谅照顾其困难。

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新闻组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中央社驻巴黎记者要求参加，因怕造成两个中国的印象，加以拒绝了。周恩来听了汇报，批评没有从政治上考虑，不合情理，且不说事先不经请示的组织性问题。并交代设法补救，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意参加我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可酌情帮助；但同他接触要注意掌握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有一次，外交部新闻司认为几家外国记者的报道有些问题，打算在他们离境时提出批评，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认真核实，如报道中有些事确有根据，即不必提。他还提醒看人家的报道时甚至要注意他们使用的某些关键词是用过去时态还是现在式，以便确定是否确有歪曲。

1967年5月22日，北京市报告，有一名外国记者向海外发了《二月提纲》全文，请示中央文革如何处理。陈伯达、江青等当天批示：“要追查。这是盗窃机密文件，是违反中国法律的。首先查明是什么记者？并侦察这是什么人提供的？建议赶走这个记者。请总理批示！”周恩来便指示外交部调查此事。经查，该记者所发《二月提纲》乃抄自人民大学红卫兵的小报和街头的大字报。外交部据此认为赶走这名记者的理由不充分。周恩来同意这一意见。江青恼了，她竟“建议(文革)小组再议一下，然后呈报主席、林彪、总理”，说这“是国际间谍情报的枢纽，问题不限在《二月提纲》问题”，妄图以此对周恩来施压。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位记者终于未被赶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像这样妥善处理了几起外国记者的案件，突出地显示了他实事求是的品格。但他因此承受了多大的政治压力，可以想见。

周恩来从不忘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过贡献的外国记者朋友。他同一大批外国记者和作家交往甚密，对他们关怀备至。前述对斯诺的关怀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对外国朋友如此体贴入微，至今仍为人们传为佳话。

《领袖交往实录：周恩来》第302—303、304页。

《研究周恩来》第282—283页。

第十九章 周恩来外交的哲学基础

周恩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以他始终如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依归。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嬗变而更加坚定不移。

本书第二章已提及周恩来的世界观在他 13 岁时就确立了，那就是“为中华之崛起”六个掷地有声的大字以及“大同世界”、“为了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16 岁时他提出“作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年代，当林彪掀起极左逆流四处横溢、毛泽东像章泛滥时，周恩来上衣别的是“为人民服务”熠熠发光的胸徽，从内心到外表表明了他的一贯立场，显示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非凡气魄。

周恩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哲学上是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世界观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则是实现此一理想与目标的手段与途径；两者密不可分。他的世界观在外交上表现为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争取一个持久的和平国际环境，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而人生观在外交上的表现则为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合作，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他的外交目标是他的世界观的自然延伸，外交政策则是他的人生观的对外运用，两者在哲学上不但是相互为用，而且是合二而一。

周恩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是同时产生的。他的世界观形成于他对国对家遭际的感受，是自觉的。而他的人生观是经过探索和思考之后为实现其世界观而提出的要求，是后党的。然而当他面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时，他的目标与手段却是同时具有的。这种思想的形成过程，在哲学上反映了认识与实践的一致性。

本书曾述及周恩来对思想改造必须过好“五关”的政治修养论。本文试图对周恩来的人生观反映在外交政策上的哲学基础进行一些粗浅分析，以期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深化对周恩来外交学的理解。

周恩来人生观的哲学根源

一个人实现其理想的意志，并非先天形成而是靠后天的修养和锻炼。周恩来亦不例外。

“修养”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修”主要是指整治、锻炼、学习、提高；“养”主要是指培育、涵养和熏陶。修养包含举止仪表、学问技艺、政治思想、品德情操等多方面的陶冶、锻炼和造詣。修养是把社会道德规范

变成人们的道德品质、道德行为的关键环节。儒家典籍不仅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提，而且把修身作为前提和基础来看待。所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墨子》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论述，认为修身是人生所必需。修身的意思绝非仅限于外表的修饰，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修养，即所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同上），修身首先要正心。所以说“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一个有道德、高尚的人，必须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舍此别无他途。历史上任何一次飞跃，都以提高人的素质为先导。人的素质主要靠修养。它包括思想特性、智力特性和体质特性。据心理学家对20%最有成就的对象和12%最无成就的对象的分析研究，发现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不在于智力，而在于意志、信念、进取心等非智力因素。可见人的修养程度决定自身的潜在智慧能否充分发挥，从而决定其在事业上的成败。

古人以为，修身有三个层次：“修己以敬”（修养自己以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修己以安人”（修养自己以求一般人安乐），“修己以安百姓”（修养自己来使老百姓得到安乐。《论语·宪问》）。“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包括在内。平天下，用现代的观点来说，就是周恩来世界观中的“争取世界和平”。

“修身”既然主要指道德修养，那么，道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这里可列举十大范畴：(1)忠——“尽己之为忠”。封建性的忠君不能要，要的是忠于祖国和人民，忠于职守。(2)孝——基本要求是敬养父母，它是家庭道德的基础，无孝则家将非家。(3)仁——“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心即同情心、慈悲心，这是人性的根本，无爱心则人将非人。丑恶的东西不能爱，所以爱必有憎。(4)义——义是一种正义感、原则性，代表全局的公共的利益。反之，不义就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见利思义，取之有道，永远是人们利益活动的道德准则。(5)礼——封建性的礼要革除，但文明礼貌和新的社会礼仪仍是必要的。没有规矩，社会就会发生混乱。(6)诚——不伪之为诚。诚就是真挚，实在，坦率，让人信得过。一旦伪而不诚，再好的道德也将瓦解。(7)信——守诺践约谓之信。信既是交友之道，也是立业之道。没有信誉的政府、团体和个人，都是维持不下去的。(8)廉——不贪为廉。不苟取，有节操，这是当官的道德准则。贪赃必枉法，廉洁则奉公。(9)耻——道德羞愧心曰耻。有羞愧方能反省，有廉耻而后能励志，故“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知耻是道德心的生机，无耻是道德心的死亡。(10)恕——“推己之谓恕”。对人宽厚、理解，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子贡有一回请教老师“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东西方道德都离不开这一条，被称为金律。不过，实行恕道应以义

为前提，超过这个限度就变成不义了。

对周恩来来说，除了“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修身》）的诚，还可以加上一个“谦”字。“谦”在《易经》中占有重要地位，谦恭、谦逊是伟大人物的美德。仁、诚、谦是周恩来追求实现其世界观而鼎立于传统美德之上的规范。英明与谦逊，在周恩来身上有机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英明中蕴涵着谦逊，谦逊中显露出英明。英明而谦逊，使他才高不骄，位高不显，高于人而又平易近人；谦逊而英明，使他谋远虑深，从众却又出众。古人有两句话：“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天不言自高，地不语自厚”，完全可以用来描绘周恩来谦逊又英明的亲切形象。正是由于谦逊，他的英明就愈加光辉，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英明，他的谦逊就更加感人，更使人乐于接受他的教诲，心悦诚服于他的领导。……谦逊不是消极的不争，而是积极的进取。谦逊为他的英明供给用之不竭的“能源”，使他的英明永放光彩；谦逊为他的英明开拓思路，开阔视野，使他的英明不断创新；谦逊更为他的英明吸引广大群众，开辟新的“阵地”，使英明不断发挥作用，显示更大的力量。

道德有“不变的”与“可变的”分别。仁爱、正义、礼让、理性、信义、和平、正直、廉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不变的，即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具有永恒的价值。——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主要是以儒、墨、道、法各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道德，包含着丰富博大的思想。它们的共同点是：推崇仁爱原则，重视人伦价值，追求精神境界，提倡修养践履等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传统。而作为这些传统美德的核心，就是中华民族的全局意识和整体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华民族所以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发展和不断壮大的精神力量。“公忠体国”成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要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就提倡“国而忘私，公而忘私”和“以公灭私”，为国家、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为了民族整体和国家利益，应当有“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精忠报国”（《宋史·岳飞传》）、“先公后私”的精神。而这一精神，经过长期的不断深化、积淀并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为整体、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人历来重道德，重情操，有理想，有追求。传统美德在历史上曾经铸造一代代英烈的灵魂，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建立功勋。传统美德可以列举很多，如“气节”。“气”是指人的思想状态、也特指勇气、豪气。孟子所提倡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便是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六合

牟中鉴：《道德改良论》，《群言》月刊，1995年7月号。

成一丰：《英明在谦逊中放射光辉》，《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520页。

罗国杰：《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核心》，《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7月21日。

之内的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节”有节制、法度的意思。要求人既有“气”，又有“节”，使之归于正而不流于邪。既要见义勇为，又要有所不为。

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和道德情操，就是周恩来人生观的历史根源。周恩来一生的言行完全体现了上述的精粹品质。

继承、改造、发展中西文化的优秀传统

周恩来青少年时便对中国传统的“圣贤书籍”和新的“各种科学”进行“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同时他也对西方“各种科学”进行深入的探讨。他对东西方的优秀文化不只是继承，而且加以发展和改造。

周恩来早年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思潮中汲取了什么文化素养？如何将两者相融合？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何意义？

第一，周恩来从道家学说中体会到了冲破罗网的精神，并融合了西方高扬“民主”与“自由”的启蒙主义思潮。他在这一时期曾用“飞飞”的笔名，寓意“拔剑削罗网”，“飞飞摩苍天”。他融会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个性自由”、“民主”等思想。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重生贵我、重视矛盾运动的历史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方面也给周恩来以积极的影响。

第二，周恩来用进化论主张积极奋进的精神，改造了道家消极无为的态度；用进化论积极向前的姿态，取代了道家返身远古的社会倾向。周恩来早年的作文中很少提到儒家所强调的“礼”，甚至对“礼”提出了某些批评。他对道家学说的重视，在去日本求学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他一再提到“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①“进化的轨道”和“自然的妙理”并提，正是周恩来南开时期老子的“生存常道”和赫胥黎(1825—1895)的“天演竞争”并论旨趣的延伸。然而周恩来在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并没有积极投入“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他对儒、道学说仍怀有相当敬意。他善于融台、调和不同的学说，兼采众长。

第三，周恩来从儒家思想中继承了大同理想，并由此同情社会主义思潮。在《诚能动物论》一文中，他对大同世界有精辟的描述。当然他也应用道家学说来论释大同理想。

第四，周恩来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伦理践履的精神，以西方的科学思想为补充，由此向社会实践转化。早年周恩来认为，实现大同的途径在于伦理

陈来，《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化》，《群言》月刊，1995年7月号。

见《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

《风范·思想·乡情》第161—164页。

《风范·思想·乡情》第161—164页。

践履，这就是他所说的“虚诈绝，诳伪逃，无人我之分，鲜名利之见，相跻于大同之境”。中国传统儒、道文化具有极浓郁的政治道德化色彩，所谓“内圣”而“外王”，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周恩来强调“诚”，注重“人格”的力量，主张待人处事“端赖良心”，并将道德教条提到相当高度。周恩来富有道德践履精神，自幼就以中国先哲的道德格言督促自己，如“克己恕人”，“自新不已”，“坚忍精进”等等。通过人们的道德完善而走向大同社会，当然具有空想性。但这种重视道德践履的精神，在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中有可能向社会实践转化。如他强调社会实验，注重实证，提倡社会调查等方法都有积极意义。他的“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切实”的治学要求，以后又概括为“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认识到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他参与组织的“觉悟社”，以“革心、革新”为宗旨。“革心”即道德完善，“革新”即社会改革。

周恩来的道德观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他自身具有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精华交互作用的结晶，再加之渊博学识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作用，便造就了周恩来完美的道德修养。

周恩来幼年熟读经史子书。儒家的德治、仁政、礼义、爱人、孝悌等道德观念；墨家的举义、尚贤、兼爱等学说；道家的德化、柔和、俭约、无私、寡欲等观念；法家的法治、方廉、质美等论述；对周恩来的浸染与熏陶是明显的。然而周恩来的养廉、质朴、诚实、爽直、文雅、正义等非凡气质，绝非儒学一家之德所具有，而是整个民族精神道德所铸造的，周恩来的道德观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定型。其内涵是：爱国，为民，公心，无畏，民主、洽和。而其外延则是：刻苦，勤政，谦恭，刚毅，豁达，平和。概括地说，周恩来的道德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东西传统美德的结晶，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具体化。他的道德观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不仅属于当今，而且属于未来。

中华文化的本源是一个“和”字。它的古字“𠄎”，左边是乐器，右边是声符，表示古代文化发源于礼、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和六律以聪耳”(《国语·郑语》)，含有相反相成之意。《易经》中的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的天、地、人的法则依靠一个“和”字和谐地融合起来，才能互相为用，充分发挥其功能。“保合大和”(《易经·乾卦》)，保持大自然法则的大和谐，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于是有“天人合一”(《春秋繁露》)之说，“和衷共济”(《尚书·皋陶谟》)、“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思想。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和”成为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君子和而不同”(同上)；因不同，始重和；重和，却又不是“消灭不同”；若无不同，焉用重和之德义功能？由此可以窥知周恩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主张的文化根源和哲学基因。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507—509 页。

周汝昌：《中华文化寻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5 年 12 月 4 日。

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老子·第四十三章》）。司马迁在评论尧的为人时，说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史记·五帝本纪》）。对照周恩来的一生，这些话正是写到似神恰如人！如果说善于究察事理是智哲风貌，以真情感人是圣哲品格，那么周恩来集二者于一身，堪称共产主义的圣哲。

求同存异——周恩来外交哲学的核心

同与异原是一个哲学命题，周恩来赋予两者以辩证的关系，并运用于国内统一战线的革命实践之中而演化力行动，又将这一智慧之果用“求同存异”四个字概括出来并推行于纷繁的国际交往之中，而成为周恩来外交艺术的精华，外交哲学的核心。求同存异反映了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宽恕，仁慈，平和，平等，博爱和克制；也展示了他的外在世界：对真善美的酷爱，对人类进步的奉献，对世界和平的追求。这些美德构成了周恩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周恩来集“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于一身。他终生体现着“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他勉励乒乓球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一定要“打出水平，打出风格”；水平是技术，“风格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政治要挂帅，技术才能更好地发挥。这种风格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人感到特别亲切，在国际交往中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这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他的伟大风格。他的外在美，来自内在美；他的伟大风格，来自崇高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形成他统战风格的内在因素。他在国际交往中表现的风格，是他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作风的延伸和发展，许多国际友人就是通过周恩来的形象认识新中国的。西方人认为，在许多方面，周恩来象征着中国的形象：坚强而讲道理，有文化修养，不是好战的——这正是西方人愿意看到的；他决不是亲西方，然而却是值得西方尊敬的。

求同存异在实践中是一种方针。正是本着此一方针，周恩来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使命、在新中国的外交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独特作用。这是他

《研究周恩来》第 238 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32 页，原是对毛泽东工作作风的概括。

1963 年 3 月周恩来为学习雷锋的革命精神题词。

1971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接见即将出国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赛的中国代表团的谈话，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581 页。

《周恩来研究》第 241、243、233 页。

大卫·劳森：《值得西方尊敬的人》，1976 年 1 月 8 日英国广播电台对外广播节目。

的外交哲学和外交实践的重要结晶。

周恩来善于在矛盾中求同。从哲学上说，就是在许多对立中寻找一致性，进而克服对立，发展统一。正是由于他的思维特色，使他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方面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周恩来的思想风格，有一个成长、发展、演变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调和，第二阶段是求异，第三阶段是求同。周恩来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有个过渡。尤其是人的思想、不要过渡，一步登天，哪有这样的事情？周恩来的思想演变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

调和与协调

调和思想是周恩来学生时代形成的思想风格。他勤于思考，善于观察，逐步形成了研究问题、观察事物的一定的统一的思想风格，形成了思维的个性化。调和思维就是这一时期他的思想风格的特征，然而他这时的调和风格也不是庸人的调和，不是简单的折衷，而是立足于更高的视角上综合各种观点之所长而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在南开学校的四年是知识和思想的大吸收时期，也是他的调和思想发展的时期。他广泛涉猎中外古今知识，他的思想处于杂糅状态之中。但这种“杂糅”并不是思想的大杂烩，并不是各种矛盾思想混合于头脑之中。揉和就是一种简单的统一。当年在周恩来众多的思辨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调和倾向逐渐成为他的定向、定势的思路。特别是中学二年级以后，他的文章中调和的色彩日益浓厚，调和的格调日益高超。他逐步地超越了庸俗调和论，达到更高的积极调和的境界。调和不一定是折衷，矛盾不总是分裂才能前进，有时统一也能推动矛盾前进。在众多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时，调和也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调和。周恩来的调和思维不同凡响。他善于把看起来对立的东西融为一体，把思想引入更高的层次中去。他对各种思想，观点，采取广泛吸收调和于一的立场。例如孟子好言义，而亚当·斯密斯(1723—1790)好言利，他在《子誉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作文中认为，根据今日中国之所需，“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因而提出“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的根本解决办法。他认为双峰并举则国民之德性可“达于尧天舜地之境界”，国家之富强则可“比隆于欧美”。周恩来提出双峰并峙救国的观点，是包含了对立的双方在高层次上实现了统一。这确是不同凡响的调和。

又如他在《老·赫》一文中找出中国的老子与二千年后的英人赫胥黎在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462 页。

1971 年 3 月 3 日周恩来会见日本藤山爱一郎时的谈话，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580 页。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462 页。

研究客观世界这个命题中的共同点。可是，一主退让，一主竞争，又如何统一呢？他认为“二氏未为冰炭”。他进一步阐述老子思想的积极意义，论证老子并不是消极退让，退让中包含着竞争的道理，而赫氏在竞争中包含着退让，并说“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可见 18 岁的周恩来调和格调之高超。他不是把退让和竞争形式上调和起来，而是摆脱了形式上的矛盾，超越了对二氏学说的一般浅见，而在二氏学说中的道德的积极意义上统一起来，熔二氏主张于一炉，创“退让竞争主义”一同则更有辩证统一的味道。

周恩来不是庸俗的调和者，而是在有是非、有原则基础上的调和。这种不同凡响的风格，为他的思维个性化打下了基础。——

1922 年周恩来在欧洲给国内亲友写信时，承认自己认清共产主义较晚的原因之一是“天性富于调和性”。1930 年 11 月在中央政治局几次会议上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采取了“调和态度”；对“左”倾斗争不够，留有“调和倾向”，——对所犯“调和主义错误”承担责任。——1932 年 10 月在苏区宁都会议上就第四次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受到后方中央局的批评。周恩来认为这种批评过分。他们反而批评周恩来“在斗争上是调和的”，周恩来不同意这种批评。他认为他只是说话宽厚一些。

调和思想的原意有二：一指音乐中的和谐(《新书·六术》)，一指人际关系中的融洽(《墨子·节葬下》)。从一定意义上说，调和与折中(衷)同义，即“取正”(《史记·孔子世家赞》)、“适中”(《管子·小匡》)、“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或调节过与不及，调和不同的意见，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可谓得其要旨。一般人以为“调和”和“折衷”是圆滑的表现，是一种没有原则的不足称道的人品，其实是误解；加上“主义”如调和主义或折衷主义就使它偏离原意更远了。

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协调思想和折衷主义、中庸之道有本质区别。协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第一，协调思想是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其实质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整利益关系，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而奋斗。协调工作仅仅是实现无产阶级目的的一种手段。它在解决人民内部、党内和国家之间矛盾的程度，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特性：彻底性、暂时性(局部性)、妥协性(让步性)。这就是说，协调思想是有原则性的，是根据客观条件决定解决问题的程度的，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它和把各种不同思想、观点以及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在政治上把对立阶级、对抗性的矛盾调和起来的折衷主义是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462 页。

《周恩来年谱》第 54、194、198 页。

《周恩来年谱》第 231、233 页。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 144 页。

有本质区别的。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墨家的思想。这位学者引述毛泽东对此一思想的解释说，两家都肯定质的安定性，反对“过”与“不及”。“过”是“左”的，“不及”是有的。过与不及是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从量的关系上找出并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东西，主要是指排斥异端，树立己说，但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无疑义。毛泽东称赞这个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¹这就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协调思想吸取了中庸之道的积极因素，虽然两者是有区别的。周恩来始终做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并坚持反“左”防右。

周恩来的协调思想产生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他说“由于阶级的存在，各阶级的利益不同，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思想、观点就不同，就会有矛盾，有斗争”。需要通过协调工作，正确处理他们的各自利益，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去掉错误的、消极的东西，保存和发展正确的积极的东西，实现安定团结，步调一致，去为共同目标而奋斗。因此，周恩来把统一战线工作称之为“协调工作”。周恩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总结处理人民内部关系方面的经验，提出协调关系三原则：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和忍让。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议事原则。

周恩来思想风格不同凡响的调和色彩，渗透到个人风格的各个方面，尤其在人对人、人对事上表现出的温和的风格。他早年已有“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的定评。善于团结人是他个性中的一大特征。他之所以善于团结人，在于他对人有诚挚的感情。所以有诚挚的感情，在于他相信人性善。这显然来源于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儒家思想的熏陶。

求异、立异与求同的关系

1921年周恩来实现了与头脑中杂糅状态的决裂，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他的思想在入党后还有一段激烈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斗争中完成的。他当年所发表的论战文章，笔锋犀利，一扫过去调和色彩，充满战斗激情。他早期的调和风格不能适应思想信

¹《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486—487页。

²《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6—147页。

³《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486—487页。

⁴《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486—487页。

⁵《周恩来年谱》第22页。

⁶《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467页。

仰急剧转变中的需要，他的思想风格发生了变化，调和让位于求异。他在系统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各种错误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实现了与自己头脑中的杂糅思想的决裂。打破杂糅，剥离杂质，最需要的是求异思想。求异，成了周恩来旅欧期间思想风格的主流。他的思想风格中求异成分的增长，加强了他与旧思想决裂的彻底性，加强了他的思想风格的战斗色彩。

周恩来思想风格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求同阶段，开始于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之后。在统一战线的复杂实践中，他的求异思维向求同思维发展。正是求同思维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贯彻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他的求同思维并不是回到他早期的调和思维上去，而是建立在求异思维基础上的，具有不可动摇的立场和原则。调和和求同是处于不同的思维层次上。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调和思维的框框容纳不下多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内容。而求同思维是一个辩证思维的过程，它是从发展中驾驭矛盾，在对立中求得统一。求同思维是辩证思维过程中的一种基本倾向，它并没有离开求异思维。它与形而上学的调和思维相比，显然高级多了，因此不能与调和思维混为一谈。虽然，他的求同思维发端于早期的调和思维，包含有调和思维的合理成分。

当然，求同并不是他处理问题的唯一倾向，在需要决裂时，会坚决转入求异思路。1927年蒋介石刚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迅速地抛弃了对蒋的幻想、犹豫和妥协，把蒋当成首要之敌与之决裂。这表明周恩来已具有在形势突变中的洞察力，其转变之迅速远远超过当时中央的多数领导人。所以不应把周恩来的求同风格看成是一味求同。当矛盾的主导方面需要求异时，他的求异思维和求异行动并不亚于求同。而当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成为革命的主要矛盾时，周恩来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对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理解得迅速而深刻。特别是对蒋介石的态度，迅速由求异转力求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是他辩证求同的一个范例。求同的结果是促成全国抗日的新局面。这种求同是在求异基础上向更高的统一推进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充满冲突的国共合作中，在驾驭矛盾的基础上，保持着、维系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存在。他那炉火纯青的辩证求同思想，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矛盾的死结。

正如在国共统一战线工作中一样，当求同立异成力不可能时，周恩来便毫不犹豫地放弃求同，走向立异，在国际统一战线斗争中，亦复如是。人所并知的事例是中国在中印边境采取的自卫还击措施和苏联撕毁合同后将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扩大到两国国家关系上的分歧。换句话说，需要求同时就谋求妥协，需要立异时就坚决斗争；立异也是求同的一种方式，求同存异在一定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462 页。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 462 页。

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立异求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周恩来求同思维的内涵中有一种异彩，这就是动人的真诚感情。周恩来是有伟大个性的政治家。他把人当人，他对待人的态度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他早年是性善论者，他成为共产党人后，不断前进，超越了对人的物化的理解，达到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理解的应有高度。他的马克思主义人道精神，渗透在他一生的言行之中。他对人的真诚感情，使他的求同行动具有特殊的魅力。他的求同风格不仅具有思想力量，而且具有感情力量。在国际交往中，他不是怀着故意而是怀着诚意去求同的。他的求同诚意，就是敌对的人也能清楚地感觉到。求同存异已经成为当代和解潮流中的重要思想原则，具有哲学意义。对人的真诚感情是他求同思想的伸延。他的求同风格是立体的，从思想、感情到行动是和谐统一的，是完美的整体，是思想风格和思想风采的统一。他的求同风格和求同行动中的尊重人、友爱人的真挚的感情，如同磁石一般在他的求同风格上发射着强大的吸力。只有把他的求同思想、感情和行动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才能真正理解他的风格、感到他的风采和吸力。

求同存异在外交上的运用

1954年8月，为了搞好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接待，周恩来在内部讲话中第一次阐述“求同存异”的思想。他列举了双方的同与异，并强调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第二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才公开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他说：“求大同，存小异，国际上朝这一方面解决问题，那就行了”。1957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这样，“求同存异”就成了我国处理各种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方针。

那么，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求什么同，存什么异呢？就国家关系而言，求同，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存异，就是把两种制度的矛盾“撇开”或“放一放”。所谓“撇开”，是指在相互关系中不主动挑起制度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互相都不要把自己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强加给对方；外交的目的是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不是争取对方在制度、思想上“跟我们一样”；不因制度和思想的对立和不同而影响国家间的合作。就社会制度本身而言，他指出两种制度既对立又联系的辩证关系，要求“从异中求同”。

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来求同存异，解决矛盾。例如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462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1—82页。

《研究周恩来》第356—357页。

对亚非拉国家，由于同我国的历史遭遇大体相同，又面临反帝、反殖、反霸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周恩来强调要求大同存小异，着重于求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平等互利、科技上互相学习，但对其违反五项原则的言行，如干涉我国内政、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等，要适当揭露和批评，这可以说是“求同存异”。还有一种“求同立异”的做法，如中美《上海公报》，既写了一致的地方，又明确写上分歧之处，双方都保持了各自的真实形象。求同存异，求同抑异，求同立异，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这就是周恩来外交艺术的哲学依据。

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复杂的矛盾中寻求一致，达到普遍满意的结果。例如亚非会议中，有的代表提出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问题，引起激烈争论，会议面临分裂的危险。周恩来为此耐心地做各方面的沟通工作，并在政治委员会上作了第二次关于求同存异的发言，“成功地消除了矛盾的种子”。在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文件这个关系到会议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更加显示了他的灵活应变、协调矛盾、求同存异的本领。他提出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非国家共同遵守的原则。当有的代表说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是共产主义名词时，他当即主张改用联合国宪章中“和平相处”(live together in peace with one another)的提法，为大家所接受。当有的代表表示不同意和平共处的措词和数目时，周恩来说“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共同的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他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方案供代表们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方协调，会议才终于达成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展起来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并以“万隆精神”载入史册。

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化异为同。国家的对外行动，归根结蒂都是以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转移的。不同国家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必然有相互冲突的地方。周恩来认为，正确的态度是：既珍视自己的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为此，可以求同存异，即先维持现状，再徐图解决；而最好是化异为同，达成妥协。他强调，这种妥协必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平等的协商和互谅互让才能实现。他提倡善于妥协，即使是严重对立的双方，也要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而对朋友则既要肯定大利益的一致性，也要善于调解具体利害的冲突。无论是日内瓦会议还是万隆会议，无论是中缅边界谈判还是中美会谈，都表示周恩来是善于妥协、化异为同、解决难题的大师。

求同存异思想是在谈判中达成协议的有效渠道。它的主要条件是：双方

《研究周恩来》第 357—358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29 页。

《研究周恩来》第 358—359 页。

必须是平等的，彼此都具有妥协的准备和胆识。求同存异思想带有周恩来本人的特色，他常引述儒家人际关系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成语。求同，就是谋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双方都可以接受，就能够达成协议，取得妥协。存异，就是容许双方都保留不同的意见，彼此都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这就不妨碍双方互相妥协，达成协议。周恩来还提倡在谈判中双方应当有“互谅互让”的精神，并且把它当作一项原则。互谅互让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体现，只有互相谅解、互相让步，才能互相妥协，取得共识，达成协议。互谅互让是带有周恩来特色的谈判艺术。只有互相谅解，才能求同存异。谅解是相互的，既要求对方谅解，同时也要谅解对方。周恩来在谈判中不单单是要坚持自己的要求，同时也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正是这一点往往使对方感到合情合理，乐于接受。而这一点则体现了周恩来诚恳宽厚的胸怀。损人利己就是把自己不要的东西强加于对方，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可能求同存异，也就不可能在谈判中取得协议，这是一种强权政治的霸道行径，不可与平等协商同日而语。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又是他的大同理想的具体运用。他用唯物史观的思想将儒家的大同思想改造成为人类社会所向往的共产主义。实现这个理想，一方面要靠中国本身在社会主义方向上不断地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也要造成一个有利于这种自我完善的、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环境。后一个课题则要求处理好同世界各国，尤其是邻国和大国的关系，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求同存异是在这个课题下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对本国是爱国主义，对世界是国际主义。正是周恩来这种立足本国，放眼世界的远大胸怀，使求同存异思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大同的理想大放光芒，喷发异彩。

求同存异，求同化异，不仅是一种谈判手段，也是交朋友，增进了解，取得同情，赢得人心的一种艺术、为人处世的一种哲学。立异，他引用一句古语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当行即行，当止即止，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日内瓦会议本来不必花那么多时间。相持不下，问题在于美苏两国外长的思想僵化。莫洛托夫对什么问题都用 HeT(俄语“不”)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一切都不，那就没有会谈和对话的必要了。——

谈到求同存异时，他曾说，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小异也不让人家存，那就不可能有对话，不可能有外交了。——

周恩来对人的真诚爱护，有口皆碑。在外交上也有很多例子。1962年4月，中国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在对印自卫还击中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同时归还缴获的印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现场情况都编进了纪录影片，题名《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周恩来亲临制片厂审查。当他看到我边防部队撤

离时，印度群众依依惜别的感人镜头，立即指示把这些镜头全部割舍。他认为应以这些群众的安全为重，不能让他们因为上了镜头而受到追究和迫害。1970年10月15日，周恩来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表示，今天凌晨才决定留你们多住一天。主要原因是我们在空中进行了一次核爆炸。上午8时爆炸的烟云由西向东经过北京。你们原定起飞的时间是8时以后，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空中很干净，不会造成污染，但是出于对客人安的考虑，所以挽留你们一天。周恩来仁爱心肠的确把外交工作做到对方的心中了。

周恩来同外宾以及在内部谈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哲学思想来说明外交行动。例如要“见机而作”（《周易·系辞下》），但不能性急，要“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孙子·九地》）；这是讲有机会决不放过，抓住时机的重要性。在发生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荀子·议兵》）的原则，[也就是周恩来曾引用的“引而不发”（《孟子·尽心上》）、“不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对我们不好，可是我们决不先对人家不好”；这是讲政治争取主动，不搞突然袭击，不求形式上的“先声夺人”（《左传·文公七年》）。“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记·曲礼上》），你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这是讲忍耐要有限度，不可一味退让。还有“针锋相对”（《儿女英雄传·176》），“退避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备无患”（《尚书·说命》），“细水长流”（《佛教遗经》），“见缝插针”（《平妖传》）等等。

周恩来不但按照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办外交，而且以其道德品格的力量，思想感情的力量，通过他的智慧和才华，使新中国的外交在世界外交中独放异彩。当代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迄今还没有人能像周恩来那样将其道德修养和哲学义理自然地融化于外交艺术之中；宜乎周恩来外交学在世界外交学中占有独特地位。

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这是新中国外交方略的灵魂，是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南，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宝库中最珍贵的一笔遗产。

周恩来外交学在20世纪下半叶曾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建立举世瞩目的业绩。进入21世纪，在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它在克服各种新的挑战中，必将再创辉煌。这应该是周恩来对未来社会主义中国外交的期望，可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附录一 从中巴关系看 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

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发

《女外交官》第91页。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67页。

钱其琛引语，见《研究周恩来》第7—8页。引语出处和方括弧内引语由作者附加。

展中巴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而已有助于稳定南亚的局势，对巩固亚非团结也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对巴基斯坦的工作，早在 1951 年 5 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便开始了。由于对一些关键问题处理得当，中巴关系数十年来得到持续、稳定发展，堪称友好睦邻的范例。这自然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周恩来在对巴外交中的远见卓识和正确指导起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争取巴基斯坦成为友好邻邦，主要成就有三：一是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符合各自的战略要求。二是推动巴基斯坦改变了结盟的立场，先后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三是巴基斯坦主动在中美之间起桥梁作用。

敦促巴基斯坦退出军事条约集团

中巴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两名高僧法显(约 337—约 422)和玄奘(602—664)就是取道今天的巴基斯坦东北部进入印度“取经”的。有名的“丝绸之路”也穿越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经中亚细亚直到欧洲的边缘。近代以来，两国都曾经遭受殖民主义的祸害；都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同情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都迫切要求发展国民经济，摆脱殖民主义带来的落后状态；也都有发展友好关系的热切愿望。然而 50 年代的巴基斯坦是一个同美国结盟的国家，而美国当时执行极端敌视中国的政策。由于巴美结盟，巴对华政策不能不受美对华政策的影响。例如在对待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台湾问题上，巴基斯坦就曾一度受美国的蒙蔽。这是当年中巴发展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

早在 1953 年 12 月，中国政府便向巴政府提交经周恩来审定的备忘录，对巴美谈判军事协定和巴将参加中东军事集团一事表示异常关切，因为两者都涉及亚洲稳定的问题，尤其是直接关联着中国的安全。1954 年 2 月 13 日，巴驻华使馆照会答复我国政府，说明巴美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是因为巴基斯坦需要得到各国包括美国的援助，以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巴基斯坦绝对没有敌视中国的意图。同日，巴驻华大使罗查将军奉命就此事当面向周恩来作出类似的澄清。周恩来坦诚指出：巴美军事协定严重损害巴基斯坦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并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加深了国际紧张局势。

两国总理第一次接触，是在 1955 年 4 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而对巴工作则是周总理参加这次会议的重点之一。周恩来在同阿里总理的晤谈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几个问题。一是巴基斯坦参加美国拼凑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周恩来说，中国对此是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友好，我们没有公开指责巴基斯坦。二是巴基斯坦跟着又参加了受美英支配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巴参加这两个条约组织使自己在亚洲处于难堪的地位。巴是亚洲大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这样左右牵制，对巴人民是很不利的。三是巴基斯坦还同美国

签订军事协定。这不仅对巴不利，也使我们感到不安。美国不仅要利用巴的领土来挑拨同印度的关系，也会以巴为基地来包围甚至进攻中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阿里表示，巴人民曾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巴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他郑重声明，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和它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还庄严保证，如果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或者美国发动世界大战，巴将不参加，例如朝鲜战争，巴就没有参加。周恩来随后在万隆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阿里总理的上述保证，阿里当场欣然予以确认。

周恩来事后曾对巴新闻工作者访华代表团说，在万隆会议上同阿里的接触是很有益的。双方都坦率地说出了不同意见，并找到了共同点。共同点就是彼此没有伤害或侵略的意图，友好的基础就是和平共处。他还对已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说：我们是根据巴领导人所表示的这种良好的愿望来谈共同的认识的，我们这个共同点是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找到的。阿哈默德大使申明，巴不属于西方集团，一旦时机成熟，巴希望能摆脱这两个条约组织。周恩来强调说，目前要摆脱它们是困难的，但是必须摆脱。巴应把自己看作是亚洲的成员，不要做导致东南亚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分裂的事。

1956年10月，苏拉瓦底总理应邀访华。这是巴基斯坦政府首脑首次来访。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四次长谈。苏表示，巴对中国没有恐惧，两国间没有利害冲突。巴没有侵略野心，希望同中国友好，愿意同中国建立更多的联系，不怕英美因此生气。尽管早已预见美国所拼凑的军事同盟条约的作用将日趋减弱，周恩来再次提出巴参加两个军事条约组织的问题。他说，中国对巴没有恐惧，只是担心巴参加这两个条约组织会被美国利用来制造紧张局势，甚至在巴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中国。周恩来说，民族主义国家都想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保持友好关系，都要求独立的经济发展而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对此我们是赞成的。但是美国并不是这样。杜勒斯公开说中立是不道德的。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我们还是对巴友好，因为我们相信你们的善意。你们愿意同双方都做朋友，也许你们在这方面能做更多的工作，可以劝说双方和缓局势，和平共处。我们希望巴基斯坦能起这样的作用，使巴参加的条约的侵略性质逐步消失。我们在思想意识上有所不同，但在政策上可以找到共同点，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努力。谈到巴印关系时，周恩来转告苏拉瓦底毛泽东的意见，我们愿意劝说印巴和好，互相协商，互相妥协。周恩来说，这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有好处。反过来，我们也希望巴劝劝美国，不要同中国为敌，那样对美国不利。苏拉瓦底显然受了感动。他说他非常高兴能与周总理像真正的朋友一样交谈，以友好谅解的精神交换意见。周恩来说，只要巴同意没有进行侵略的意图，决不参加侵略战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苏拉瓦底主动承担义务说，一定要劝说美国同你们交换意见，和缓紧张局势。

1962年1月，我政府又要求巴方就其参加这两个军事组织、同中国的关系问题有个书面谅解，并澄清以前的保证。3月19日，巴使馆送来其政府前后一致的书面澄清。1963年3月，布托外长专程来北京签订中巴边界协定。他在同周恩来和陈毅外长的会谈中说，由于巴采取不介入反华的立场，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失灵了，而且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下去。他还说，巴格达条约组织也在起着类似的变化。1964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他由阿尤布总统陪同在达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阿尤布总统多次向他说明，巴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是为了防卫自身的安全，巴不参加侵略战争。阿尤布总统执政以来所参加的许多国际活动和他所执行的对华友好政策，证明了他的解释是真诚的，可信的。同年4月，周恩来和布托外长同时访问印尼，同苏加诺总统会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布托对周恩来说，由于巴的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基本上已失去作用。美国对此十分恼火，推迟了阿尤布总统对华盛顿的访问。1966年6月，周恩来出国访问，路过巴基斯坦。他在同阿尤布的会谈中指出，由于不参加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不积极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活动，巴基斯坦的立场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不反对巴基斯坦同美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他还以客人的身分到机场为东道主阿尤布出访苏联送行。这种不拘泥于礼宾规格的行动和坦荡无私的胸怀，使阿尤布深为感动。

1968年4月，巴基斯坦政府决定，不再延续美国在巴设立通讯基地的协议，以示对美国当时采取“重印轻巴”政策的不满。美国设在白沙瓦的这个基地遂于1970年初关闭。1972年初，巴基斯坦宣布退出英联邦，以抗议英国支持肢解东西巴的政策。这是英联邦成立以来，第一个主动退出该组织的成员。1972年12月，巴又宣布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1979年3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时退出中央条约组织，该组织旋于9月间宣布解散。巴先后退出这两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有国际局势变化的原因，有自身的需要，还有美国政策上的失误。但是，中国的原则立场，尤其是周恩来坚持不懈的富有说服力的工作和中巴友好关系的长足发展，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劝说巴基斯坦改善同印度的关系

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而长期不和。如何对待巴印关系是处理中巴关系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从促进亚非团结的愿望出发，不管中印、中巴关系本身状况如何，对印巴分歧始终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并力劝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来改善关系。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所持的立场。

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分治遗留下来的，也可以说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恶果之一，迄今仍悬而未决。除了教派冲突，克什米尔一直是印巴两国不和的根源。双方都竭力寻求国际支持，以强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自然也是它们争取的对象。

1954年4月周恩来初访印度时，印方曾临时插入由尼赫鲁总理陪同访问克什米尔查谟首府斯利那加的日程，其用意十分明显。当时中印关系是很好的，但周恩来以时间匆促为由，婉言谢绝了。尼赫鲁在会谈中详细陈述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要求周恩来在适当的场合说几句同情印度立场的话。周恩来又答以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尚待研究，一时难以表态，希望谅解。多少年来，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始终如一。

巴基斯坦方面，在谋求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时，也屡次向周恩来提供克什米尔问题的书面资料，并当面阐述其立场，要求予以支持。尤其是印巴双方在该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时，巴方的要求更为迫切。周恩来1956年1月间曾对巴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反复说明，印巴是源出同一母体的姐妹国家，应为两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友好相处，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勿为外人利用而损害两国团结，并指出这就是万隆精神。他强调，一是不应该利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克什米尔争端，这对印巴双方都不利。二是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不宜引入外力进行干涉。三是印巴两国最好坐下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在这方面，两国政治家要起领导作用。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像我们这些东方国家，过去都受过殖民主义压迫，现在独立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只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应该是容易解决的。即使有分歧，也不要让它成为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阿哈默德大使代表巴政府对中国报纸和中国领导人严守中立，未偏袒任何一方表示感谢，对周总理真诚希望巴印友好的态度表示赞赏。而对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印度的立场，表示强烈不满。

苏拉瓦底总理访问北京时，再次直截了当地要求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支持。周恩来诚恳说明我国对此问题的方针是劝巴印双方和好。两国都是我们的朋友，站在朋友的立场，愿你们和平协商，达成协议，长期共存。周恩来说：“我即将去印巴访问，也将对双方履行同样的劝和使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会一事无成，但我不灰心，要继续努力，因为你们两家和好，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有好处。”

周恩来感到，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不能只限于私下交谈。他于1956年12月和1964年2月间，利用访问印、巴和锡兰三国的机会，三次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阐述。周恩来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不赞成派联合国部队到克什米尔去，这样做得不到什么好结果。他说，他曾经向印巴呼吁过，要求它们自己来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两国领导人都没有拒绝他的呼吁。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时，公开陈述了我国向印巴双方所做的工作，并重申中国上述立场和愿望。

这一立场和愿望得到了巴方的理解和欢迎。1963年3月，来访的布托外长在同周恩来和陈毅的会谈中，对我国的态度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态度是巴中关系日益发展的根源”。这句话，道出了这个问题在巴基斯坦对外政

策中的分量。此后，两国政府首脑在互相访问时所签署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都重申了对克什米尔争端的立场，并表示希望这个问题能像印巴双方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这个敏感问题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希望双方和解的方针，中国才得到了巴方的信任，中巴关系中的一些疙瘩才易于解开，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才能远远超过当时同一般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签订边界协定，发展全面合作

由于两国在彼此最为关切的问题上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双方的友好关系逐步走向全面合作。

1961年3月，巴政府正式向中国建议谈判边界问题。早在1956年苏拉瓦底访问北京提到这个问题时，我有关部门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作了调查研究和相应的准备。中巴边界本身情况并不复杂。中国新疆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地区的接壤线全长600公里，历史上是未定界。双方地图对边界线的画法虽有出入，但争议地区不大，也从未发生过重大的边境事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与中国接壤的巴基斯坦控制地区涉及印巴之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商讨巴方的建议时分析，我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一贯立场，巴方是一清二楚的；考虑到巴基斯坦实际管辖的地区既然同新疆接壤，同巴方划定这段边界是必要的；至于这条边界所涉及的克什米尔地段，只要避开其归属问题，不但巴方不致拒绝，印度也没有理由反对；因此，同巴方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是可能的。周恩来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大大推动中巴关系的发展，但也告诫大家要准备好印度作出强烈反应。外交部遵照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于1962年2月复照巴方，同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明确表示：在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解决之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中巴先就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在协议中规定，在印巴解决了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临时协定。如所预料，巴方同意了我国的上述建议。双方遂于5月初发表公报，宣布两国代表将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公报包括了我方上述复照的内容。中巴边界谈判于同年10月间在北京开始。针对印度方面对这一谈判可能产生的疑虑，周恩来在罗查大使为双方代表进行谈判当晚举行的宴会上特意强调，中国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同一切邻国发展友好睦邻关系。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巴印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它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我们高兴地看到，巴基斯坦和印度已经达成协议要进行这种谈判。我们祝愿谈判获得积极的成果。

由于中巴双方以友好合作的大局为重，既考虑了历史背景，又照顾到实际情况，为确保边境的和平和安谧，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精神和万隆

会议所阐明的十项原则平等协商，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1963年3月2日，由陈毅外长同布托外长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

不出所料，从中巴商定将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伊始，印度便对中国反复指责，横加干预。我外交部多次答复，合情合理地陈述我国立场。协定签订之日，陈毅在布托招待包括周恩来的我国领导人宴会上说：边界协定的签订是中巴友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但标志着中巴友好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是对亚非团结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中巴两国边界协定的签订，又一次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地解决相互关系中的问题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是双方推诚相见的光辉范例。他接着指出：协定对于克什米尔归属未定的特殊情况，作了必要和适当的照顾，使之既有利于确保中巴边境的安谧、加强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也有利于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我国愿意同巴基斯坦友好，也愿意看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友好。我们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也是始终一贯的。

两国边界协定的签订将中巴关系的发展推向更高的层次。两国领导人频繁往来，各种代表团络绎不绝。双方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必要性，关于实现普遍裁军包括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重要性，以及本地区最新的形势发展和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都达成了更充分的谅解。在阿尤布1965年3月访华时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强调，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都是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障碍，必须彻底加以根除。支持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把核武器运进印度洋的阴谋；中印边界争端持续下去是违背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希望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获得解决；亚非国家之间对这类争端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对邻国进行恫吓，并利用这类争端推行扩军备战的政策，绝对无助于争端的解决。从1965年到1971年，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巴基斯坦都作为提案国，积极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台湾问题也一直采取支持我国的鲜明立场。

在加强政治合作的同时，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都向纵深发展。1963年1月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64年7月间，周恩来在接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商业部长瓦希杜查曼时，原则上同意向巴方提供贷款。周恩来在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交谈中，一向十分重视它们发展独立的、自力更生的民族经济的问题。在同巴基斯坦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个问题也往往占相当大的比重。周恩来常以中国的实际，现身说法，阐述自力更生、减少对外依赖的必要性。1964年2月间，他在达卡群众的欢迎大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还不过刚刚摆脱了殖民主义在政治上加予我们的枷锁，都还远远没有摆脱它所遗留给我们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要使我们的国家达到现代科学和文化所要求的水平，是一个同争取独立一样艰巨也一样重要的任务。过去我们就是因为落后而受到殖民主义的侵略。现在，如果我

们一天没有消除这种落后，我们就一天还没有免于遭受殖民主义侵略的危险。为了保卫和巩固我们的独立，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965年2月，两国签订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3月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与此同时，在阿尤布总统访华期间，周恩来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6000万美元无息贷款，并同意对巴方第三个五年计划继续提供援助。1970年11月，叶海亚总统访华，我国答应再提供5亿元经济援助，帮助巴实施第四个五年计划。

1963年8月签订了《中巴通航运输协定》，翌年4月正式通航。这是继中缅通航之后中国第一条经过巴基斯坦直接通往西欧的航线，它不但大大缩短了中巴两国的交通距离，而且为中国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开辟了捷径。周恩来在接见罗查大使时，赞扬巴在巴中通航问题上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他并建议修建一条中巴国际公路。双方进行多次磋商，经过实地勘察定点后，开始施工。同时，我在卡拉奇和达卡设立了两个总领事馆、以加强领事业务。

1970年4月，我对巴援建的一项工程落成投产。拉瓦尔品第东北中国援建的塔克西拉重型机器厂也开工了。总经理伊什塔克中校说，这个机器厂是巴基斯坦发展重工业的又一个里程碑，将对巴自力更生的工业能力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两国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议定书》。这是1965年和1968年两次《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继续，目的在于进一步发展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中国将提供某些工程所需的全部设备。巴基斯坦舆论指出，这将使巴基斯坦大大减少对外的依赖性，朝自力更生的目标跨进一大步。巴报还赞扬这种援助是不附带条件的，是真诚合作、无私友好的光辉范例和确凿的证明。1970年5月，《中巴政府贸易议定书》在北京签订，中巴关于进一步发展边界贸易换文的签字仪式也在拉瓦尔品第举行。

1971年2月，周恩来建议的中巴公路巴基斯坦一侧的红其拉甫达坂——哈利格斯段建成。巴陆军参谋长哈密德·汗上将在交接仪式上说，这一段公路的建成是中巴友好合作又一次建设性的发展，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极为重要的。他强调，巴基斯坦正在努力斩断依靠别国的锁链，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1988年10月，中巴公路我国境内段提前一年竣工。该段北起新疆古城喀什，南止中巴两国交界的红其拉甫山口，全程400多公里，把海拔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以及举世闻名的公格尔和慕士塔格山脉的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变成了通途。中巴公路是继中尼（泊尔）公路之后中国另一条通往南亚次大陆的要道，它不仅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样，加上1966年10月签订的海运协定，在中巴之间，地面上有和平的边界和公路交通，空中有友谊航线，海上有货物运输，两国密切地联结在一起了。所有这些，都是周恩来亲自出面洽谈并具体落实的。他虽然未能目睹中巴公路通车，但是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间架起桥梁

在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两国签订边界协定以后，这种合作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65年4月周恩来出访路过巴基斯坦，在同阿尤布总统会谈时，针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升级，不断派出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的严峻局势，要求巴方转告美国：美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中国不能置之不理；中国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不挑起战争；中国已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如美国对中国进行轰炸，这就意味着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美国从空中轰炸，中国就从地面上用别的办法到处活动。阿尤布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慎重复述周恩来谈话要点，以求准确无误地转告美国。1966年4月10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将上述谈话概括力对美国侵越战争的四句话，让该报公开报道出去，这一回，美国当局显然已汲取了当年侵朝战争开始时对周恩来通过印度的警告充耳不闻导致我抗美援朝的历史教训，在接到巴基斯坦私下的和公开的口信之后，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降级，并且在整个侵越战争期间，始终未敢将战火扩大到北方。

另一件影响更为深远的事是：巴基斯坦在中美关系解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早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中巴两国政府首脑初次接触时，阿里总理便对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示不安和关切。正是在他的倡议和要求下，周恩来先向科伦坡会议五个成员国首脑详细介绍了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阐明中国的立场和政策；随后，又在更大范围作了类似陈述，并郑重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这就导致了中美双方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大使级谈判。

前面提到，苏拉瓦底总理1956年访问北京时，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主动承诺要劝美国同中国对话，以缓和中美紧张关系。1963年3月布托外长访华时，也主动向周恩来和陈毅表示，要在中美之间充当桥梁。1964年2月周恩来访巴时，阿尤布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如果在填平中美之间的鸿沟时需要巴基斯坦的话，巴将乐于提供帮助。周恩来在重申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严正立场后，表示欢迎中美双方的朋友朝这个方面作出有益的努力。

1969年，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对摆脱越南战争危机、缓和中美关系采取了一些松动的措施。同年8月，尼克松访巴，他在同叶海亚总统的会谈中，请叶海亚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旨在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愿同中国对话。1970年9月，叶海亚访问美国。尼克松再次要求他向中国当局转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意图。10月，美国又通过同一渠道通知中国，它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叶海亚于是年11月访问北京，在同周恩来

的单独会谈中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一两名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同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翌日，周恩来请叶海亚向尼克松转达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并表示，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他的特使来北京商谈，时间可通过巴基斯坦商定。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老朋友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的。”

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进一步磋商后，由巴方精心安排，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秘密地作了一次传奇性的飞行，悄悄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着重同他讨论了台湾问题，并就尼克松来访事宜进行磋商。10月，基辛格再次来访，继续就台湾问题同我方交换意见，同时也为尼克松的访问作最后安排。1972年2月，尼克松以美国总统的身分到达北京，进行他所说的“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历史性访问。周恩来在上海同他签署了《联合公报》，即有名的《上海公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通道。

事后，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以布托为首的巴基斯坦代表团时谈到基辛格来华的秘密之行，说这是二次大战中美军登陆诺曼第以来第一次成功的保密行动。1973年10月，巴前任驻美大使希拉利访问北京。这位大使是中美之间秘密接触的经办人之一。周恩来在接见中称赞他为此事操劳备至，说他的保密工作很出色。对巴基斯坦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第一次中美会谈是巴基斯坦在万隆会议开的头。第二次是基辛格和尼克松来华，也是巴基斯坦出了力。在中美关系的缓解方面，巴基斯坦做了大好事，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对周恩来外交谋略的粗浅体会

巴基斯坦从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长期与中国为敌的军事集团的成员，走上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道路，并同中国密切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这一事实雄辩地表明，周恩来争取与国的远大谋略是成功的。而这种谋略在争取巴基斯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例而已。

周恩来争取与国的外交谋略，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的课题，只有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才能作出现律性的结论。作者限于水平，只能在本专题的范围内归纳几点意见，以供进一步探讨。

一、争取尽可能多的友国，孤立极少数敌对者，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力化敌为友，最好连一个敌对的国家也没有，使国家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这是我国外交谋略的出发点。对对象国进行战略考察，如实认清其国情，全面分析其政策，则是正确贯彻执行争取与国谋略的基本依据。巴基斯坦当年是一个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反帝反殖是它的主导面，它同美国结盟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和特定时期中的一种

选择，是可以争取它改变的。巴印矛盾有深刻的宗教、文化，社会和历史根源，要发展同它们之间任何一方的关系，就必须正视并且慎重对待这一矛盾。正是从这样的科学分析出发，周恩来在巴美关系上采取耐心敦促巴退出条约集团但支持其同美发展正常关系的态度；在巴印关系上采取是非分明、不偏不倚、立足劝和的态度，从而使中巴关系得到健康的扎实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保持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二、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争取巴基斯坦成为友好邻邦的过程中，无疑起了根本的作用。周恩来对战后国际政治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并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不只是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的理论，而且是一套具体的国家行为的规范。国与国之间如果做不到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就不可能和平共处。周恩来在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交往中一再表明，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反帝反殖，反对扩张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不构成对他国的威胁，自然也有理由希望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解除对中国的威胁。中国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巴方确信，中国是全面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不仅自己尊重巴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反对别人侵犯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自己不干涉巴内政，也反对其他国家干涉其内政。中巴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合作，也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的；损人利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巴友好合作的坚强基础。在对待克什米尔这个涉及巴印双方主权的敏感问题上，周恩来又本着三方都应和平共处的精神，以其公正，明智的态度赢得了巴方的信任，真可谓一棋对路，全盘皆活

三、始终高举反侵略的正义旗帜，这是周恩来外交谋略的一个基本原则。侵略和干涉违背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破坏受侵略国的领土完整，与正常的国家关系完全背道而驰，即使是弱小的国家，也不会容忍。巴基斯坦曾经是美国的盟友，这种军事联盟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安。只是当巴基斯坦不仅在口头或书面上作出解释，而且事实上也证明其善意时，两国关系才消除了障碍，得到顺利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巴政权虽然数易其主，但周恩来总是本着耐心等待。反复说服的态度，终于取得了成功。而设身处地站在巴基斯坦的立场，对它的敌、友、我的战略关系进行恰当的分析，则是采取这种态度的政治思想基础。后来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抗击印度的武装进攻，并不是因为中巴友好，中印关系不洽，而是根据一个不变的原则，即反对任何侵略和干涉。反过来说，纵使中印关系很好而中巴不洽，中国也不会背离这个原则去支持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进攻。中国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朝，也都是这一崇高原则的体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对美国在其他地区采取的无视别国主权的行径并没有保持缄默。中国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反对苏联的武装侵略，固然因为这种侵略危及中国的安全，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必须坚持反侵略这一基本原则的缘故。

四、发展中巴关系而不针对任何第三国，这是周恩来外交谋略的重要特

点，显示了新中国宽宏博大。光明磊落的气度。他认为，中巴友好有符合各自利益的一面，还有符合各方利益的另一面，两者是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和对立的。自己需要睦邻友好，人家也需要睦邻友好，而邻国往往不止一个。自己的朋友越多越好，人家同样需要众多的朋友。要求人家对自己好，却反对人家同别人好，这不但得不到对方的友谊，还将丧失对方的信任。有一个时期，中印关系相当好，而印巴关系颇为紧张，中国并没有偏袒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而是竭力劝说双方和好。如果中国站在友好的印度一边，去反对当时对中国不如印度友好的巴基斯坦，印巴关系就会更加恶化，中巴关系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不是中国所谋求的目标。有一个时期已美关系极为密切，而中美关系则尖锐对立，如果中国也以对待美国的政策对待巴基斯坦，那就只会使已美更加接近，而不利于巴中友好。在美国执行重印轻巴的政策时，巴基斯坦感到美国这样的盟国不可靠，不足信赖，对美十分不满。如果中国加以利用，很可能使巴美关系恶化。但中国只反对巴美结盟，而下反对巴美友好。因为结盟对巴不利，对南亚各国和中国都不利；巴美友好则对各方都没有坏处。同样，有一个时期，中苏关系极不友好，而中巴关系很融洽，印苏关系密切，而已苏关系冷淡。然而，中国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巴基斯坦去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周恩来在处理这些错综复杂、变化不定的国际关系时，始终把握住不利用中巴关系影响乃至限制巴方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样一条原则，这是赢得巴基斯坦友谊和信任很重要的因素。反观美苏印三国对中巴发展友好关系的态度，就更显见周恩来谋略的高超无比了。这正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范例，任何机会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外交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五、周恩来外交中一个经常起作用的积极因素是他个人的外交风格。这种风格的重要作用反映在中巴关系上，就是巴基斯坦各阶层人士，包括国家领导对他的敬重和钦佩。而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谅解和信任对国家关系是有很大影响的。苏拉瓦底总理在访华时第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就曾坦诚地说：“你出席万隆会议，受到很大欢迎。你的合作态度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如果不是你在那次会议上所采取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也不敢到中国来。”可见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具有多大的魅力。尤其重要的是，服人以德，待友以诚，立言以信，这已不仅是他个人也正是中国国家风范的写照了。布托总理于周恩来逝世时深情地回忆，在巴基斯坦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周恩来所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他说，“在周恩来总理指导下中巴关系的岁月里，我们两国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经受了世事沧桑的考验。我毫不怀疑，这种友谊将会持久地继续下去。”

中巴友好关系的全面发展，周恩来既是带头人，又是勤奋的园丁，这棵枝繁叶茂的常青之树，渗透了他多少血汗和精力。他为中巴友好合作，为南亚次大陆各国之间的和睦相处，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树立了一座永放光芒的丰碑。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是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外交是通过具体的人进行的。外交政策贯彻得如何，同个人的风格有密切关系。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包括他的外交风格，的确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一门学问。学习和研究这门学问，并在实践中加以发扬，是新一代外交战士的历史使命。

附录二

引用书目

引用书目分为七类：(1)周恩来言行、著作和有关文献。(2)马恩列斯毛著作。(3)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法论著。(4)有关回忆录。(5)条约集和期刊。(6)我国古籍。(7)外文书刊。引用中外文日报和电讯、辞书，以及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已在文中注明，不再列入书目。书目以书名、编著者、出版单位、出版年份为序。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周恩来早期文集》刘 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 1 辑)》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续编)》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五洲的怀念》1978 年版。

《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周恩来(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权延赤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开国总理周恩来》力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甄小英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早年周恩来》庞瑞垠著，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刘 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刘 、杨大钊主编，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 《周恩来传》迪克·威尔逊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译本 1989 年版。
-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罗纳德·基思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译本 1992 年版。
- 《西方人看周恩来》方钜成，姜桂依编译，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 年版。
- 《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韩素音著，中央文献出版社中译本 1992 年版。
- 《周恩来思维艺术》刘径山、时学军编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风范·思想·乡情》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译本 1992 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斯大林文选》中文版，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 《毛泽东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年版。
-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 《忆毛泽东》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 1955 年版。
-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 《奴隶制时代》郭沫若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周一良等主编，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世界通史讲义》弗·尼·尼基甫洛夫著，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译本 1954 年版。
-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1987 年版
- 《西方政治思想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西方外交思想史》陈乐民、周荣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世界的中国观》忻剑飞著，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三联书店 1948 年版。

《中国的昨天与今天》马宇平、黄裕中编，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

《世界外交史》弗·鲍爵姆金主编，五十年代出版社中译本 1953 年版。

《外交史》维戈兹基等编，三联书店中译本 1979 年版。

《中国外交史》钱亦石编著，生活书店 1938 年版。

《中国外交史(1840—1911)》王绍坊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外交史(1949—1979)》谢显益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清季外交史料》王亮编，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1933 年版。

《翁同 日记》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0—1989.10)》石志夫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沙俄侵华史》复旦大学历史编写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门户开放与中国》李祥麟著，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李剑农著，上海书店 1945 年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当代中国外交》韩念龙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外交概览(1987)》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外交科学概论》刘达人著，中华书局 1940 年版。

《什么是外交？》黄金棋著，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国外外交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外交智慧与谋略》谢益显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东方谈判谋略》周敏、王笑天著，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三大突破》柴成文等著，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

《现代国际法概论》阿库斯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1981 年版。

《君主论》马基雅弗里著，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5 年版。

《现代国际关系学》张厉厉等著，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金应忠、倪世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罗振宇、李景全等著，群众出版社 1987 年版。

《国际法》周鲤生著，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国际法》科热夫尼科夫主编，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5 年版。

《国家主权》王沪宁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国际法基础》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 1983 年版。

《国际关系资料选编(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摩奴法典》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2 年版。

《在波茨坦的会晤》小查尔斯·米著，三联书店中译本 1978 年版

《印度对华战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三联书店中译本 1971 年版。

《中外条约协定索引》陈尺楼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1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3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4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 3 集)》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 9 集)》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 19 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赤光(第 2 期)》1924 年 2 月 15 日。

《文萃(第 31 期)》1946 年 5 月 23 日。

《新华月报》1950 年 10 月号、 1954 年 7 月号、 1962 年 12 月号、 1964 年 9 月号。

《党史文汇》1995 年第 4 期。

《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期。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77 辑)》天津高校党史协作组编。《北京市教育学院资料中心》1990 年第 6 期。

《重庆文史资料(第 9 辑)》。

《中国政府机构名录 1996 / 上卷》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版。

《历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

《外交学院学报》1988 年第 2 期、第 4 期， 1990 年第 1 期， 1991 年第 1 期， 1992 年第 2 期， 1993 年第 1 期、第 4 期， 1994 年第 3 期。

《国际问题研究》1994 年第 3 期。

《文艺学习》1994 年第 4 期。

《中国名流杂志》1994 年第 6 期。

《大地月刊》1994 年第 10 期。

《群言月刊》1995 年 7 月号。

《望》周刊 1997 年第 20 期。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

《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伍修权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王炳南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将军不辱使命》尹家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洪学智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亚非会议日记》李慎之、张彦著，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李越然著，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年》陈敦德著，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乒乓球外交始末》钱江著，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中日友好随想录》孙平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外交官丛书·开启国门》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外交官丛书·外交风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

《外交风云·外交官海外秘闻》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

《大使夫人的生涯》朱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我与乔冠华》章含之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女外交官》程湘君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版。

《随章文晋出使美国》张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外交官》马丁·梅那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

《苏联早期外交家故事》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4年版。

《心灵的历程》刘白羽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林语堂自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拿破仑一世》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7年版。

《梅特涅》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4年版。

《俾斯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3年版。

《出类拔萃之辈》戴维·哈尔箔斯但著，三联书店中译本1973年版。

《现代国际礼仪知识》李天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西行漫记》斯诺著，三联书店中译本1990年版。

《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76年版。

《诗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春秋左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

《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

《毅梁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公羊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周礼》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论语》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孔子家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孙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孟子》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荀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老子》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6 年版。
《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鬼谷子全书》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邓析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吕氏春秋》中国书店 1992 年版。
《说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吴越春秋》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史记》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文史通义》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风俗通义佚文》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佛遗教经》上海世界书局 1937 年版。
《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全唐文》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古诗源》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元曲选》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版。
《搜神记》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儿女英雄传》上海书店 1981 年版。

